历史学研究入门丛书

非洲史研究入门

AN INTRODUCTION TO AFRICAN HISTORY

舒运国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 INTRODUCTION TO AFRICAN HISTORY

本书旨在为非洲历史与文明的学习者提供一部全面、实用的工具性指南。在简述非洲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主要线索的同时，本书还对该领域的主要研究资料，世界各国非洲史研究的现状、特点和代表人物，以及当前国内外重点关注的学术课题进行了深入的讲解与分析。附录的学术资源、关键词和推荐阅读文献，可为读者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提供参考。

ISBN 978-7-301-21385-8



定价：27.00元

历史学研究入门丛书

非洲史研究入门

AN INTRODUCTION
TO AFRICAN HISTORY

舒运国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洲史研究入门/舒运国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2

(历史学研究入门丛书)

ISBN 978-7-301-21385-8

Ⅰ.①非… Ⅱ.①舒… Ⅲ.①非洲-历史-研究生-教材 Ⅳ.①K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8432 号

书　　名:非洲史研究入门

著作责任者:舒运国　著

责 任 编 辑:岳秀坤　陈甜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21385-8/K·0895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4.5 印张　202 千字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7.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历史学研究入门丛书》弁言

一、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历史学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继积极接受社会科学的影响之后，又将其触角伸向了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其表现之一，就是相对于以政治活动为中心的史学传统，诸多新的对象、新的领域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视野，举凡妇女、儿童、市民生活、民间信仰，甚至城市卫生、声音与气味，都可以作为历史书写的中心问题。随着历史学家们领地的扩展，在断代史、国别区域史、事件史等传统专门领域之外，渐次形成思想史、文化史、城市史、妇女史、文明史、书籍史等众多的新兴史学分支。历史学的这一变化，既得益于相关学科理论或方法的启迪，同时，其进展反过来也为其他学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因此，将历史学各个专门领域的知识框架、研究传统、核心文献等基本内容精编为一册，随时浏览，便于入门，无论对历史学专业还是其他相关学科的读者来说，均有必要。

二、“历史学研究入门丛书”旨在为历史学学科内外的读者群提供基本的专业指南。因此，丛书着重于基本知识、历史脉络、基础理论及经典成果的缕述。一般来说，每种图书介绍某一专门领域，其内容至少包括如下几方面：(一)历史概述，让读者的历史想象有所凭借，把握基本的发展脉络；(二)原始文献介绍，史料是历史学的根基，是历史解释的基本依据，应特别重视；(三)学术史概述，通过国内外研究成果的梳理，给予读者一幅知识树生长、延展的图景；(四)经典研究的重点研讨；(五)工具书、资料库、学术期刊等必备的学术资源，给初入门的研究者提供指引；(六)关键词，亦即最基本的核心概念和术语。当然，最后还要为读者准备一份进一步扩展阅读的书目。这样的构想看似简

单,实则是艰巨的写作任务。

三、丛书遵循短小精悍、简明扼要的编写原则。“入门”不是“手册”,我们这套丛书面对的是学科内外的广大读者,功用在于读而非在于查。列入丛书书目中的各个历史分支都有一定的历史积累,知识含量丰富,“入门”目的是让读者了解该领域的重心和走向,不求面面俱到,亦难免挂一漏万。还需要说明的是,各个史学分支虽然同属于历史学领域,但各有自身的特点,内部知识生长的具体情形差异颇大,因此,我们一方面力图遵循一定的撰写体例,另一方面亦不拘泥于此,以在写作中尽量体现各领域的知识重点为要务,而无须削足适履,追求形式上的整齐划一。

四、根据历史学目前的学科特点,丛书大概分为专题系列、国别系列和人物系列等若干类别,其中专题和国别区域两个系列为目前编写出版的重点。为了给广大读者奉献一套国内一流的史学入门丛书,我们力求以“成熟的选题、最佳的作者”为出版方针,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将丛书规模渐次扩充。在此,我们要恳请国内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们鼎力襄助。希望本丛书的刊行,能为学术薪火的绵延传承略尽微薄之力。

陈 恒

2009 年 8 月

导 言

《非洲史研究入门》尝试为人们了解和研究非洲历史提供一把钥匙。它主要为那些希望更深入了解非洲历史、或者希望对非洲历史做些初步的研究工作的人员,提供一些基本的帮助。本书希望达到的主要目的如下:

第一,对非洲历史做一整体的介绍。

非洲有53个国家,数以千计的民族。如果按照国别或者民族介绍历史,不但线条纷繁,头绪复杂,而且容易使读者犹如进入云雾山中,无法把握非洲历史的发展脉络。考虑到北非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自己的特点,它又属于中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书介绍的非洲主要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本书抓住非洲历史整体性强的特点,视非洲为一个整体,分析非洲各国和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共性,剖析非洲历史发展的整体走向,从而给读者以非洲历史发展的概貌。

第二,介绍非洲历史研究中可资利用的史料。

从事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必须掌握足够的第一手资料,亦即史料。因此寻找史料往往是研究的基础。没有充足的史料,就无法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此外,掌握史料质量的优劣,对于研究成果水平的高低,也产生十分明显的影响。因此,对于史学工作者而言,史料犹如原料,只有优质的原料,才能加工成优质的产品。本书按照地区或者主题的形式,向读者介绍一些非洲历史研究中经常出现或者使用的史料,包括古代、近代和现代、当代的史料。由于涉及非洲历史的史料(尤其进入近代以后)十分丰富,因此只能择要介绍。如果已经有相关的资料集出版,则介绍资料集。通过阅读资料集,一则可以了解该类史

料的概貌,二则还可以据此寻找和扩大史料的范围。

第三,国内外关于非洲历史研究的进展和现状。

要进行非洲历史的研究,另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对国内外非洲历史研究的进展和现状有基本的了解。本书介绍了非洲历史研究的学术史,一些著名的研究机构,有影响的学者以及他们的著作和观点。

第四,专题研究介绍。

这是本书的重心。由于非洲历史涉及的空间和时间都十分广阔,而国内外学者(尤其是国外学者)所进行的研究专题又十分广泛,所以本书无法一一进行介绍。本书集中选择了非洲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和意义的十二个研究专题,分别给予介绍,使读者对当前非洲历史研究动态有初步的了解。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非洲历史的研究,国内外水平具有较大的差距。国外(包括西方国家和非洲本土)早已经进入了微观研究,他们不但进行国别研究和定量研究,而且大量收集和利用口述史料,从而使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相比之下,国内的研究尚停留在宏观和定性的研究阶段,对于口述史料的利用还不多见。考虑到本书强调非洲历史的整体性,又考虑到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尚处于宏观研究阶段,因此在介绍专题研究时,主要选择了一些宏观研究的专题,也就是中国学者关注较多的课题。每个专题都同时介绍了国内外的研究动态。

其五,介绍一些对读者有帮助的学术研究资源。

研究非洲历史,至少有三种学术资源是经常要用到的:(一)相关的期刊和报纸;(二)有关的工具书;(三)网络上的电子资源。与非洲历史研究有关的期刊、报纸和工具书,是研究人员必不可少的辅助工具。但是,相比之下,网络资源的涉及面更广,资料更加丰富,使用更加方便,效果更加明显。因此,网络资源已经成为今天非洲历史研究人员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对于中国而言,网络资源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国内缺乏相关史料,曾经阻碍了几代研究人员的研究。今天,通过网络,可以快捷地获得各种有关非洲历史的信息和资料,因而大大方便了国内的研究者。

考虑到本书的读者主要是准备研究非洲历史，或者是刚开始研究非洲历史的人群，包括大学本科高年级学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其他专业的研究人员，因此，“入门”始终是本书撰写过程中把握的标准。

必须说明的一点是，由于当前国内外对非洲史研究的范围日益扩展，在一定程度上与非洲学研究相互渗透和融合，因此，本书对非洲史研究的介绍，也做了一定的扩大，在介绍某些专题时，以非洲学研究作为背景。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同行和朋友的关心和支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刘海方博士为附录部分中的重要期刊、工具书与网络资源的内容提供了许多资料，没有她的帮助，笔者是不可能完成的，在此对她表示深深的谢意。

在中国学者的历史研究中，世界历史相对薄弱，在世界历史的研究中，非洲历史更加落后。因此，撰写《非洲史研究入门》，是一件颇为困难的工作。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尽管做了很大的努力，肯定仍然有许多不足、甚至是谬误之处，特别在介绍研究动态时，难免挂一漏万，恳请同行和读者提出批评和指正。

舒运国

2008 年 9 月

于上海富嘉花园

目录

目录

第一章　非洲历史概述

非洲大陆具有悠久的历史，它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史前时代，它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在古代，它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在近代，它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今天，它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力军，并且正在努力走向现代化。

一、史前：人类的诞生

（一）非洲大陆经历了从猿人至现代人的全过程

劳动使古代猿类进化为人。从古猿到人的进化过程经历了五个阶段：腊玛古猿、南方古猿、猿人、尼人和现代人。从1920年代起，在非洲陆续发现了上述五个进化阶段的化石。人类演进的连贯性和延续性在非洲大陆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一点上，世界其他地区都无法与非洲比拟。

人类演进的诸阶段（万年）

腊玛古猿	南方古猿	猿　人	尼　人	现代人
1400—700万年前	400—100万年前	200—20万年前	25—5万年前	5万年前—

1962年，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L. Leakey）在东非裂谷地区（今肯尼亚的特南堡）发现了腊玛古猿的化石以及腊玛古猿用于打击、割削的石器。据测定，这些化石距今1400万年以前。

从腊玛古猿向南方古猿的过渡，大约花费了 300 万年的时间。1982 年，在肯尼亚的卡纳波依、罗塔加姆和罗凯塔等地出土了这一时期的化石。这是一些高等猿类的遗骨，如臼齿、上臂骨和下颌骨。尽管出土的化石既少又残损不全，但是其科学意义却十分巨大，因为这些化石被测定为距今 400—600 万年，这一发现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由腊玛古猿向南方古猿过渡时期的证明。还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人类化石，迄今为止只在非洲有所发现。

南方古猿又称为"能人"，距今约 100—400 万年，他们过着聚居的生活并且开始制造工具。最早的南方古猿化石于 1924 年在南非开普省的汤恩被发现。当时出土的化石是一个儿童的头骨。经研究，该儿童在 6 岁左右，已经可以直立行走。考古学家把该化石命名为"汤恩幼儿"。此后，考古学家们先后在南非德兰士瓦省境内的斯泰克方丹和马卡潘斯塔德、坦桑尼亚北部的奥杜韦峡谷、肯尼亚的库彼福拉、埃塞俄比亚的哈达和阿瓦什河流域等地，都发现了南方古猿的遗骨化石和石器工具，数量达数百件之多。其中 1959 年发现的"东非人"头骨和 1974 年发现的"露西女士"骨架化石，更是令人瞩目。考古学家认为，在非洲大陆，多次而又大量发现南方古猿的化石，对于研究人类的进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这种情况是世界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

猿人，因其已能直立行走，又被称为直立人。这个人种最初是依据远东和中国遗址（中国的北京猿人和印度尼西亚的爪哇猿人等）所发掘出来的材料而确认的。但是，自从 1970 年代以来，猿人的遗骨化石在东非、北非（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等地均有出土。其中东非最早的化石估计为 160 万年前的。因此，许多考古学家认为，"非洲以外大陆的直立人居群是在早更新世时期起源于非洲的迁移居群"①。考古研究表明，猿人制造工具的能力已经大大提高。他们会制造和使用石制

---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 1 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年，第 329 页。

工具,作为猎人或者采集者,生活在非洲辽阔的草原上。

从猿人向尼人过渡时期的遗骨化石,1975 年在摩洛哥、1976 年在埃塞俄比亚都有发现。据研究表明,其生活年代为至今数十万至十万年前。

尼人的脑容量已经接近现代人,故又被称为“早期智人”。尼人的遗骨化石在北非的摩洛哥、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南非的开普地区和西非都有发现。研究表明,尼人生产手段是采集和渔、猎,生活内容比较丰富,墓葬和穴居已经出现。

现代人,又被称为“晚期智人”。在东非的肯尼亚、坦桑尼亚和西北非的一些地区,出土了大量现代人的遗骨化石。科学家们的研究认为,尼人演化为现代人,在五万年之前的非洲已经完成。至今一万年前,现代人的活动已经遍及非洲大陆。

非洲大陆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明确告诉我们,从腊玛古猿到现代人的演化过程,在非洲大陆表现得十分清晰。这在世界其他地区尚没有发现。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非洲很可能是人类最早的发祥地。

(二)史前时代的工具

石器时代

劳动创造了人类,而人类也在劳动中得到不断发展。人类从事的劳动首先从制造工具开始,随着人类的演进,人类制造的工具也不断改进和发展。

人类最早制造和使用的工具是石器工具。西方学者根据对欧洲石器工具发展的研究,把它划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考古发掘,表明欧洲的分期不适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的石器工具的出现远远早于欧洲;第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的石器工具的类型与欧洲有所不同。于是,考古学家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石器工具提出了另一种分期:早石器时期、中石器时期和晚石器时期。对于石器时期的不同划分,不但显示了非洲是世界上最早制造和使用石器工具的大陆,而且说明了非洲大

陆的石器工具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

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发现了距今约300万年的石器工具，其中在坦桑尼亚奥杜韦峡谷出土的石器工具的数量最多。考古学家把这类石器工具称为奥杜韦型石器（又称为奥杜韦型文化）。奥杜韦型石器的代表是石斧，它是用卵石或者其他石头打击另一石头而成，一面薄，另一面厚，薄的一面可作刀刃，厚的一面可作掷砸之用。这类石器在埃塞俄比亚和南非也有发现。奥杜韦型石器不但是在非洲发现的人类制造的最早石器，也是地球上发现的人类最早制造的石器。它比世界其他地区发现的最早石器早几十万年。

在距今100万年至10万年前，非洲出现了比奥杜韦型石器先进的石器，由于这些石器与法国北部圣·阿舍利出土的石器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也被称为阿舍利复合型石器（或者阿舍利文化）。阿舍利复合型石器在非洲分布颇广，在东非（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北非（埃及、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西非（安哥拉、尼日利亚）、中非（扎伊尔）和南部非洲（赞比亚、南非和津巴布韦）都有发现。阿舍利复合型石器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形状似扁桃，一端尖薄，一端厚钝。根据不同场合，可以用以切割，也可以用以挖掘和砍砸。在众多遗址中，肯尼亚奥罗格萨利遗址最具有代表性。它是一个遗址群，已经发掘的遗址有十余个，出土的石器有手斧、手锛、石球、各种形状的挖掘器和刮削器。肯尼亚政府在当地建立了一个博物馆，展览出土石器，供人参观。有迹象表明，在阿舍利文化时期，非洲居民已经开始使用火，并用火烤制食物。

约12.5万年前，非洲进入中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的遗址分布较广，在东非大湖地区，西非的尼日利亚和加纳，以及南部非洲的津巴布韦、南非、莫桑比克、赞比亚、安哥拉和马拉维均有发现。中石器时代遗址的广泛分布，表明当时非洲大陆居民的数量增加，而且活动的地域更加扩展。上述遗址发掘的石器具有以下特点：石器的体积趋小；加工更加精细，石器经过打磨后，还装上木柄；这一时期的石器种类更为丰富，包括石锄、石砍刀、石凿、石锛、石箭头等。

距今约2万年至1.2万年前，非洲进入晚石器时代。晚石器时代

遗址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如南非、扎伊尔、刚果河盆地、赞比亚、安哥拉和东非一些地区。晚石器时代的工具制作更加精细，种类更加丰富，包括半圆型石器、双面刀、石核手斧、凿子、磨光的斧头、各种削刮器、打猎用的弓箭和加工食物用的臼和杵等。

北非地区进入晚石器时代则稍迟些，尼罗河流域约为公元前16000年，其他地区更晚。但是，北非地区的晚石器也有自己的特点。在突尼斯南部和阿尔及利亚东部发现的卡普西安型石器的制作和类型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出土的不同，有安上木把的錾刀和投掷器，此外还发现了骨针和骨锥。

铁器时代

尽管非洲人类活动的时间较早，非洲进入早石器时代的时间也较世界其他地区早，但是，非洲经历的石器时代的时间很长，从而使石器时代向金属器时代的过渡显得十分缓慢。在北非，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现了青铜器制造的生产工具；在公元前7世纪，埃及已经普遍使用铁器，著名的麦罗埃成为重要的冶铁中心。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情况与北非不同。除了个别地区（苏丹和毛里塔尼亚部分地区）外，绝大部分地区都是跨越了青铜器时代，由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铁器时代。考古研究显示，西非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早掌握冶铁技术的地区。仅西非一地，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址有：

伊格博乌库遗址——位于今尼日利亚东南部。对遗址的研究表明，公元9世纪前，当地已经进入铁器时代。

奥卡遗址——与伊格博乌库遗址十分靠近，出土的铁器与伊格博乌库遗址的铁器有相似之处，说明两个遗址曾经存在一些联系。

尼日尔河中游地区发现三处遗址——尼日尔河与巴尼河汇流处的巴尼河谷、马西纳和塞古的北部和东北部以及尼日尔河曲以东地区。出土的文物包括陶器、铁器、磨光石制工具和铜器等。

塞内冈比亚地区——在塞内加尔河口的拉奥和塞内加尔北部滨河地区，发现一些墓葬遗址，出土的文物包括铁制工具、铜手镯、黄金及罐、碗、酒杯和一些骨制品。

加纳地区——在加纳的贝格霍附近以及埃特维特维布沙，出土了一些铁器和陶器。

除了上述遗址外，早期西非铁器时代最典型的代表应数诺克文化和萨奥文化。

诺克（Nok）位于今尼日利亚境内，在贝努埃高原重要城市阿布贾东北方向通往卡方尚之间的一个小村庄。1930年代开始，在诺克村及其附近地区，出土了一系列重要文物，其中有古代冶铁遗址、原始炼铁炉、大量的陶器和石器，包括磨石、石臼和磨光的片形石斧等。对诺克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当地居民经过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在公元前500年至公元200年，已经掌握和发展了冶铁技术。出土的冶铁炉（公元前5世纪至前3世纪制造）十分独特，炉内壁由黏土制成，呈圆桶形，炉壁上留有进风口，特制的风箱通过进风口向炉内鼓风。这种冶铁炉虽然制作尚粗糙，炉内容量也不大，但是，诺克人正是利用这种冶铁炉制造了刀、箭头和箭刃等铁器。还必须提及的是，诺克遗址中铁器和石器常常同时出土。对于这种现象，专家们认为，诺克人尽管掌握了冶铁技术，但是由于刚刚步入铁器时代，铁器制作的技术尚不精当，而石器作为一种长期使用的工具，仍然可以作为铁器的补充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讲，石器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工具。铁器和石器的混合使用，不但是诺克文化的特点，也反映了西非早期铁器时代的重要特点。

萨奥文化的遗址位于乍得湖地区的沙里河下游，分布在半径约100公里的河流两岸。在众多古代村落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文物，既有青铜、黄铜和铁器等金属物品，也有石质、骨质和角质物品，还有许多用黏土制成的物品，诸如谷仓、炉灶、纺轮、玩具和陶土制品等。萨奥文化和诺克文化虽然都是西非早期铁器时代的典型代表，它们既有共同的特点，又有各自独特风格，说明西非各地在铁器时代按照各自的道路发展，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至公元5世纪时，冶铁技术已经传播得十分广泛。东非的卢旺达、乌干达、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等地，都发现了公元2—5世纪的铁器生产遗址。此外，在中部非洲和南部非洲的扎伊尔、

赞比亚、南非和斯威士兰，也都发现公元2—5世纪的铁器时代遗址。

（三）史前时代的生产技术和生活

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进步，非洲大陆的生产技术同步前进。在晚石器时期，农业和畜牧业逐步发展起来。

对于北非的情况，我们知道得稍多一些，尤其是古代埃及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因为它对北非其他地区的农牧业生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西非是早期非洲农牧业生产的一个重要中心。在毛里塔尼亚南部沙漠地区的提季特·瓦拉塔遗址，发掘出许多晚石器时期的村庄，据测定，距今约3000年。遗址中有的村庄占地1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较高，说明当时农业生产已经得到相当发展。据研究，由于西非河流众多，供水充沛，因此提供了农业生产的良好条件。当地种植的主要农作物有高粱、香料、可可、芝麻、水稻和西瓜等。畜牧业在西非出现得更早，根据考古发现，在公元前4000年，当地的畜牧业已经十分发达，饲养的牲畜有牛、狗和羚羊等。

东非的畜牧业也很早就形成了。在大裂谷地区的许多遗址，发现有畜牧业的遗迹。在纳罗苏拉遗址的出土物品中，95%的动物遗骨属于家畜，其中57%是山羊和绵羊，39%是牛。据测定，这些动物遗骨距今约10000年。苏丹境内的沙海纳卜遗址中也出土了大量动物遗骨，其中有驯养的家畜遗骨，如山羊和绵羊等。这些动物遗骨经测定是公元前4000年的。东非农业的形成比畜牧业稍迟，根据考古材料，东非种植的农作物有高粱、芝麻、小麦、大麦和黑麦等。

（四）非洲的岩壁画

在非洲的考古材料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是原始居民所创造的岩壁画。

1721年，一个葡萄牙旅游团在莫桑比克发现了第一幅岩壁画。之后，这一类岩壁画在非洲各地不断发现，它们主要集中在南部非洲的莱索托、博茨瓦纳、马拉维、津巴布韦、南非和安哥拉，而在南非境内（奥

兰治和德兰士瓦等)的数量最为丰富。除此之外,在东非的坦桑尼亚中部和肯尼亚、东北非的埃塞俄比亚、中部非洲和撒哈拉地区,都发现了这类岩壁画。据不完全统计,已发现的岩壁画遗址达上万个。据测定,岩壁画最早的创作时间可以推定至 1 万年前。

岩壁画大多创作在高地边缘的岩壁上。根据制作的方法不同,岩壁画可以分为刻画和绘画两种。刻画利用石器工具刻凿而成,而绘画则先凿出轮廓,然后再加上色彩。由于颜料来自自然原料,因此数千年后色彩依旧。

非洲的岩壁画生动反映了当时居民的生产场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岩壁画的大量内容与动物有关。岩壁画中有各类动物,包括野猪、大象、水牛、长颈鹿、羚羊、斑马、河马、犀牛和鸵鸟等,说明当时人类的生活与动物有密切的关系。有的岩壁画反映了人们狩猎的场景,也有的描绘了人们驯养动物(主要是山羊和绵羊)的景象。专家们认为,这些岩壁画说明当时的居民仍以狩猎为主要的生活手段,动物是他们的主要食品。同时,原始畜牧业也正在逐渐形成。在上埃及的岩壁画中,更多反映的是人们从事采集和农耕的场面。比如男子在收割谷物,而妇女们在弯腰拾穗。

非洲的岩壁画生动反映了当时居民的生活场景。岩壁画上的人物都穿着动物皮衣,有的插着羽毛作为装饰,他们头发用束发带扎好,显得十分干练。从画面上看,非洲居民已经居住在房屋里。当时的房屋有用木头建成的,也有用山头筑成的,屋内还有一些家具。有的岩壁画勾画了家庭生活,妇女抱着孩子,男人则在挤牛奶,一派平和、宁静的家庭气氛。

与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是原始宗教活动。岩壁画中出现当时居民们祈求神灵保佑的情景,根据画面,有的在求雨,有的在为丰收而感谢上苍,还有的在祈求人丁兴旺。由于人们对许多自然现象无法理解,因此就用宗教或者巫术目光去看待这些现象。岩壁画正是这些目光的真实反映。非洲的岩壁画的此类内容十分丰富,由于我们尚无法掌握原始人类宗教和巫术的全部内涵,因此,对于岩壁画还不能做出充分的

读解。

值得指出的是，非洲的岩壁画还是非洲生态环境演变的证明。撒哈拉地区的岩壁画告诉我们，当地曾经是适宜于畜牧和农耕的地区，在公元前 4000 年的岩壁画上，还是水草丰富、牲畜遍地；但是到了公元 4 世纪，沙漠化已经相当严重，之后，沙漠化不断扩散，当年的动物逐步绝迹。

二、古代：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

（一）北非

尼罗河流域是世界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这里出现过许多文明古国。除了埃及外[①]，这里还出现过库施（Kush）和阿克苏姆（Axum）两大古国。

在公元前 2000 年，在尼罗河上游的第二瀑布至第六瀑布之间的地方（古埃及人称之为努比亚），出现了库施国，由于库施国经济繁荣，出产丰富，因此在埃及古王朝时期，埃及法老就曾派兵掠夺当地资源。公元前 8 世纪末，趁埃及国力衰落，库施赶走埃及人，并定都纳帕塔（Napata）。公元前 751 年，库施军队北上，征服埃及，建立了埃及历史上的第二十五王朝。第二十五王朝存在 88 年，亚述的入侵结束了它的统治。公元前 530 年，库施迁都麦罗埃（Meroe）。从此，库施摆脱了埃及的影响，开始了独立发展。公元 1—3 世纪是库施国的全盛时期。库施国的经济十分发达，畜牧业经过上千年的发展，成为当地居民生活的重要来源，而灌溉农业的建立，则推动了农业的发展。采矿业在库施也有悠久的历史。除了黄金和宝石的开采和生产外，铁的开采和冶炼十分发达。考古发现证明，库施国早在公元前 7 世纪已经掌握冶炼铁器的技术，麦罗埃成为地中海以南最大的炼铁中心，被西方考古学家称为“古代非洲的伯明翰”。生产的发展有力促进了对外贸易，出口或者转

---

① 关于古代埃及，有专书介绍，本书不再论述。

口的商品有黄金、象牙、奴隶、香料和乌木等，公元前7世纪后，铁器和铁制工具也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纳帕塔和麦罗埃等城市都成为当时繁华的商业中心。库施国是个奴隶制国家，在生产和社会生活领域中，广泛使用奴隶，而奴隶的来源主要通过战争。库施国的政治制度，主要是模仿埃及的官僚体系。对于政治制度的具体内容，现在了解的不是很多。

公元4世纪，库施国已经消亡。有学者认为，南方的阿克苏姆的崛起，遏制了库施的对外贸易，使其迅速衰落。

位于东非高原上的阿克苏姆王国，在公元前后建立，建都阿克苏姆。公元3世纪，阿克苏姆王国征服阿拉伯半岛的也门地区，进而控制了经过红海的东西方贸易通道。公元4—6世纪，阿克苏姆王国进入鼎盛时期。公元320年即位的埃扎纳国王（Ezana，320—360年在位）积极发展经济，推行文字改革，把基督教引入国内，令其广泛传播。在此基础上，他不断对外扩张，国威大震，成为与同时代的中国、罗马和波斯齐名的世界四大强国。在阿克苏姆王国的经济生活中，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是其主要内容，铁器工具的使用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已经学会开垦梯田和灌溉。在手工业方面，阿克苏姆王国除了冶铁和制陶业比较发达外，造船业和建筑业也达到了较高水平。阿克苏姆王国的对外贸易借助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繁荣的经济，开展得十分活跃，红海沿岸的港口阿杜利斯（Adulis）成为当时名扬四海的国际贸易中心之一。阿克苏姆王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王的意志即法律。

公元7世纪后，随着阿拉伯势力的兴起，以及它对东西方贸易的垄断，阿克苏姆王国受到沉重打击，逐渐衰落，至公元10世纪，为外族所灭。

除了库施国和阿克苏姆王国外，北非还出现过迦太基（Carthage）、努米底亚王国（Numidia）和毛里塔尼亚王国（Mauritania），它们也都曾经创造了古代文明。但是，它们后来都被罗马占领和统治，成为“罗马非洲”的组成部分。

阿拉伯人从公元7世纪开始占领北非，从埃及向马格里布扩展，至11世纪又大规模移民北非。阿拉伯人带去了伊斯兰教，并与当地居民相互融合，从而完成了北非地区的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北非的绝大部分居民讲阿拉伯语，穿阿拉伯服装，信奉伊斯兰教。

公元16世纪，土耳其人占领了埃及、苏丹、利比亚、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这些地区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在北非地区，只有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亚还保持独立状态。

（二）撒哈拉以南非洲

班图人迁徙以及班图人国家

公元前2000年左右，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居民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逐步由狩猎和采集过渡到驯养动物和培植农作物。公元前500—1000年，西非进入铁器时代。诺克文化（Nok Culture）和萨奥文化（Sao Culture）是西非早期铁器时代文明的典型代表。随着铁器的使用和推广，生活在西非的班图人（Bantu）的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提高，人口迅速增加。从公元1世纪开始，班图人从其居住的西非出发，不断向南迁徙。班图人的迁徙运动持续了一千多年，至19世纪才告停止。

班图人迁徙的路线十分复杂，大致上可以分为东线、西线和南线。

东线：东迁的班图人于9—10世纪抵达东非沿海地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同移居当地的阿拉伯人、印度人和波斯人混合，形成斯瓦希里人（Swahili），居住在沿海地带和邻近岛屿；另一部分人则保持其独立性，居住在坦桑尼亚境内。

西线：西迁的班图人进入西赤道非洲，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居住在北部热带森林，从事原始农业，兼营狩猎和采集；另一部分人则生活在南部的草原地带，从事农耕活动。

南线：南迁的班图人最初进入鲁伍马河与赞比西河之间的地区，其中一些人进入坦桑尼亚南部；之后，他们向南迁入赞比西河与林波波河之间的河间地带，并最终进入南非。南迁的班图人在19世纪建立了强大的祖鲁（Zulu）部落联盟。

班图人在迁徙过程中,一方面传播了铁器和锄耕农业,另一方面又积极吸取当地有用的生产技术,因此推动了生产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在一些地区,以部落联盟为基础,进一步出现了国家组织。

古代刚果国(Congo)位于今安哥拉西北部、扎伊尔西南部和刚果的一部分,大约于14世纪建国,15—16世纪之交达到鼎盛时期。该国居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农作物包括甘薯、香蕉、玉米和高粱等。居民大部分是自由民,也有少量奴隶。该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具有一套较完整和严密的行政机构。刚果国是班图人迁徙后建立的最强大的国家。

隆达国(Lunda)是建立在中非草原上的国家,16世纪后期逐渐强盛,领土辽阔,包括今扎伊尔西南部、安哥拉东北部和赞比亚北部地区。该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国内虽然已经使用铁锄开荒,但是居民主要从事狩猎。社会组织以母系氏族为主。19世纪时分裂为许多小国。

布干达王国(Buganda)位于今乌干达南部,16世纪建国,18世纪逐渐强大。实行封建的土地制度,是班图人建立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最为发达的国家。该国的农业和渔业十分发达,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充分发展。国内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奴隶,既用于生产,也作为奴仆。

莫诺莫塔帕国(Monomotapa)是班图人于13世纪在南非建立的国家。在其境内发现的"大津巴布韦"遗址,是一个石头建筑群,反映出很高的建筑技术和水平。

伊斯兰教的传播

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占领北非,伊斯兰教随之进入非洲。之后,伊斯兰教在非洲不断传播,其方式大约有三种:一,通过移民进行传播。比如在东非,阿拉伯半岛和波斯的移民在公元初就开始移居其沿海地区,公元7世纪达到高潮。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后,这些移民以伊斯兰教教义规范自己行为,举行宗教仪式和活动,他们为伊斯兰教的传播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二,通过商业贸易活动进行传播。比如在西非,阿拉伯人在北非完成了伊斯兰化后,积极参与穿越撒哈拉商道贸易。阿拉伯人不仅把商品输入西非,而且同时带来了伊斯兰教。随着贸易的发展,

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商人在沿着萨赫勒和苏丹地区与商道连接的道路上逐步建起许多贸易据点。这些据点的居民是清一色的穆斯林,内部有清真寺,他们完全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生活。商道沿途的穆斯林居民点,不但成为西非黑人社会中的飞地,也成为伊斯兰教向西非渗透和扩展的据点。三,通过对外扩张传播。在东非和西非,都出现过穆斯林发动的对异教徒的战争。战争不但为伊斯兰城镇统治者带来了利益,也把伊斯兰教推广到被征服的地区。

在东非,伊斯兰教从沿海地区向内陆渗透,坦桑尼亚中部、乌干达南部和肯尼亚一些地区都开始接受伊斯兰教。在西非,最早接受伊斯兰教的,是参与撒哈拉商道贸易的黑人商人和苏丹地区诸王国的统治者。到加纳、马里和桑海期间,伊斯兰教进一步扩展,在主要的政治经济城市,出现了一批穆斯林学者。这些学者最早来自北非,后来逐步本土化,形成了由黑人组成的穆斯林教师、法学家和学者。

伊斯兰文明在非洲的传播,对非洲历史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撒哈拉商道贸易和古代西非国家

撒哈拉沙漠虽然给非洲大陆南北之间的交往带来了巨大困难,但是北非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交往却始终存在。据研究,早在公元前1000年,北非和西非就有贸易往来。公元1世纪,罗马人将骆驼引入非洲,解决了穿越撒哈拉沙漠贸易中的交通工具问题,至5世纪,贸易规模大大扩展。阿拉伯人进入撒哈拉地区后,逐步控制了贸易,到8—11世纪,穿越撒哈拉沙漠贸易迅速发展,此后的三四百年达到了顶峰。从北非出发,经由撒哈拉沙漠到达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商道就有三条,即西部商道、中部商道和东部商道。其中,通往西非的西部商道最为发达。

撒哈拉商道贸易促进了沿途经济的发展。在商道上出现了一批居民点,并逐渐发展成为城市。最早的西非城市有加奥(Gao)和昆比萨利赫(Kumbi-Saleh)等,之后不断增加,至13世纪,已经达到几十个之多。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西非社会的变化。城市的统治者在贸易中积聚了大量财富,使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增强。为了有效地控制贸易,

他们对外实行掠夺,对内强化控制,于是国家产生了。在西非,加纳(Ghana)、马里(Mali)和桑海(Songhai)是最著名的三大古国。

加纳:3—4世纪,在今毛里塔尼亚与马里交界处出现了加纳王国。加纳利用其十分优越的地理位置,控制了黄金贸易的通道,加之它对周围地区不断发动征服战争,势力日益壮大。9—11世纪,加纳国力达到顶峰,成为西非第一强国。它不但有辽阔的疆域,其首都昆比萨利赫还是贸易中心之一。加纳的农业、副业和手工业都很发达。国王是这个奴隶制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11世纪,加纳开始衰落,1240年为马里所灭。

马里:11世纪初,马里是加纳的属国,后乘加纳衰落,恢复了独立,但是1224年又被苏苏国(Susu)占领。马里王子松迪亚塔(Sundiata,1217—1255年在位)于1234年击败苏苏国军队,使马里恢复了独立。此后数年,他兼并苏苏国,占领加纳,马里迅速崛起。马里是较为发达的奴隶占有制国家,国王集大权于一身,它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撒哈拉商道贸易及其税收,同时,其农业和手工业也得到较快发展,产品的丰富又促进了贸易的繁荣。14世纪上半叶,马里进入全盛时期,曼萨·穆萨国王(Mansa Musa,1312—1337年在位)赴麦加朝圣途中所显示的富足,震惊了伊斯兰世界和西欧,而马里在文化方面的建设和成就,也令世人瞩目。

桑海:原先是马里的属国。14世纪中叶后,趁马里中央内讧,逐步摆脱马里的控制。1464年即位的索尼·阿里(Sonni Ali,1464—1492年在位)四处征战,初步建立起桑海帝国。1493年,阿里的外甥穆罕默德·杜尔(Muhammad Toure,1493—1528年在位)通过政变上台。杜尔通过军事改革,大大提高了军队战斗力,他不断扩张,势力一直发展到撒哈拉中部;杜尔尊重学者,发展文化,用伊斯兰法规进行统治。桑海在15世纪末已经十分繁荣,农业、手工业、建筑、造船和纺织业都很发达。首都加奥是著名的商业中心,廷巴克图是当时的文化中心。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t Du Bois,1868—1963)认为,桑海文明仅次于古代埃及文明。1528年,杜尔年迈失明,内争再

起。1590—1591年,摩洛哥军队入侵桑海,占领廷巴克图,全城被焚掠。桑海从此衰败。

乍得湖区的古国:公元2世纪,在乍得湖周围地区居住着黑人游牧部落。6—7世纪,北非的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进入此地,他们带来了新的生产技术,并与当地黑人融合后形成新人种。随着经济的发展,当地陆续出现了国家。它们是加姆涅—博尔努王国(Kanem-Bornu)和豪萨(Hausa)城邦。

几内亚湾沿岸的国家:在几内亚湾沿岸,生活着约鲁巴族、埃维族、阿散蒂族和埃多族等,尽管他们与外界联系较少,但是他们在古代也创造了自己的文明。约鲁巴人建立了城邦国家伊费(Ife,6世纪)、奥约(Oyo,6世纪末)和贝宁(Benin,9世纪);埃维人于17世纪建立达荷美国(Dahomey);阿散蒂人于16世纪建立了阿散蒂国(Ashanti)。

东非沿海城邦

东非濒临印度洋。早在公元前后,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在长期的航海实践中,发现并掌握了印度洋上季风的变化规律,他们驾船往返于西南亚、东非沿海和南亚之间进行贸易活动。因此,东非沿海地区很早就与外界发生往来。

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和伊斯兰教的传播,印度洋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公元695年,一些阿拉伯部落因为国内战乱,大批迁居东非沿岸;公元975年,波斯设拉子的王子哈桑·本·阿里(Hasan bin Ali)率其六子迁居东非沿岸,并以基尔瓦为中心,建立了一系列城邦。于是,东迁而至的大批班图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长期共同生活,相互通婚,形成了斯瓦希里人,在此基础上,阿拉伯的穆斯林文明与当地的班图文明也逐渐融合,形成了新的斯瓦希里文明。无论是斯瓦希里人还是斯瓦希里文明,都是以东非当地的班图人和班图文明为主,吸收和融合了外来的人种和文明而形成的非洲的新人种和新的文明。

斯瓦希里文明的产生促进了东非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约12世纪前后,东非沿岸开始出现一系列城邦,至15世纪,东非沿岸的城邦已经多达37个。

这些城邦以城市为中心,城市周围有附属的农业区。城邦以对外贸易为主,其经济生活十分繁荣,内容包括农业、矿业和建筑业等。城邦盛行奴隶制。在众多城邦中,摩加迪沙和基尔瓦发展较快,曾经先后称雄。

三、近代:西方的政治、经济附庸

资本主义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后,东、西方关系开始失衡。西方列强在资本原始积累的推动下,以暴力为手段,向亚非拉地区进军,它们烧杀抢掠,大肆搜刮当地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长期以来平等的东、西方关系被打破,东方开始从属于西方,非洲开始成为西方的政治、经济附庸。

(一)奴隶贸易

非洲是最早遭受西方殖民侵略的地区。1415 年,葡萄牙入侵摩洛哥的休达城,此举标志着西方殖民主义正式登上历史舞台。1498 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找到了通往印度的新航路。与此同时,葡萄牙在西非沿岸和东非沿岸建立了一系列的殖民据点。葡萄牙的殖民活动揭开了西方殖民非洲的序幕。但是,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活动仅仅是个开端,其影响尚十分有限。

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方列强在非洲的殖民活动主要表现为对当地人力资源的掠夺——奴隶贸易。奴隶贸易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5 世纪中叶至 17 世纪中叶为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奴隶贸易规模不大,而且主要集中在大西洋。第二阶段,17 世纪中叶至 18 世纪末为全盛阶段,在这个阶段,奴隶贸易的规模急剧扩大,贩卖奴隶的地区从非洲西海岸扩大到非洲东海岸和非洲内陆地区,参与的西方国家不断增加,贩运非洲黑奴的人数达到历史顶峰。第三阶段,19 世纪初至 1880 年代为禁止奴隶贸易阶段,西方工业革命的进行和完成

与奴隶贸易发生了冲突,英国于1807年通过了禁止奴隶贸易法令,其他西方国家也随后颁布了类似法令。然而,奴隶贸易禁而不止,走私活动十分猖獗,东非沿海地区成为奴隶贸易的中心,这种情况延续到19世纪末。

在长达四百年的奴隶贸易中,贩运黑奴的体制大约有三类:第一类,由西方殖民者直接掠夺和控制,如葡萄牙人在安哥拉的做法;第二类,由沿海的当地中央集权国家的上层垄断贸易的体制,如在黄金海岸和贝宁湾;第三类,商人经营的体制,如东非阿拉伯商人经营的贩奴活动。

在奴隶贸易中,西方的贩奴船从欧洲装入当地廉价的工业品至非洲换取奴隶;然后把非洲黑奴运到美洲出售并换得当地廉价原料,最后把这些原料运到欧洲。人们把这种贸易称为"三角贸易"。

奴隶贸易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奴隶贸易所提供的超额利润促进了西方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从而有力推动了西欧北美制造业、商业金融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使西欧北美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

奴隶贸易对非洲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它极大破坏了非洲生产力的发展,中断了非洲国家正常的历史发展进程,而奴隶贸易的直接恶果——种族主义更是给非洲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心理伤害。这些负面影响也是今天非洲落后的直接原因。

(二)四C政策

1760年代,英国率先进入工业革命,不久其他欧美国家也卷入其中。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和完成,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由资本原始积累进入了自由竞争时期。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的工业资本要求把非洲改造成西方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这与当时尚在进行的奴隶贸易发生了冲突。为此,工业资本提出了四C政策:即商业(Commerce)、基督教(Christianity)、文明(Civilization)和殖民(Colonization)。四C政策的实质是,以所谓"合法商业"替代奴隶贸易,以传播基督福

音和西方文明为手段，打破对非洲内陆的神秘感，最终把非洲变成西方殖民地，即西方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在四C政策推动下，西方国家首先发起“禁止奴隶贸易”运动。英、美、法、丹麦、荷兰、葡、西等国在19世纪初都已宣布禁止奴隶贸易，但是奴隶贸易却迟迟禁而不止，各种形式的奴隶贸易，诸如走私、自由劳工移民等长期存在，而且奴隶贸易的方式更加隐蔽和残酷。直至1880年代美洲三大蓄奴区废除了奴隶制，奴隶贸易才真正衰落下去。

在禁止奴隶贸易的同时，传教活动也在非洲展开。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对非洲的传教活动掀起高潮，基督教新老教派纷纷成立传教组织，并积极派遣传教士赴非洲活动。在非洲各地，包括西非、东非、南非、中非和北非，都建立了传教站。应该指出，传教活动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绩，但是传教士的作用却往往超越了传教本身的范畴。首先，传教士深入内陆，在长期生活中熟悉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语言文字和自然资源等情况，他们把这些情况向外界反映，客观上为西方资本提供了非洲内陆的宝贵情报；其次，在传教活动中，传教士创办了许多学校和医院等。通过办学行医，向非洲人实行文化思想渗透，并培养了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非洲本土人士，为日后的西方殖民统治提供了社会基础。

由于西方列强长期以来仅在非洲沿海地区活动，因此对内陆一无所知。十分明显，要把非洲变成殖民地，就必须打破对非洲内陆的无知。于是，内陆探险兴起了。内陆探险运动始于1769年布鲁斯(Bruce)的尼罗河之行，终于1876年的布鲁塞尔会议。内陆探险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通过内陆探险，西方掌握了非洲内陆的地理、物产、人口和语言等各方面情况，这不但为西方拓宽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准备了条件，也为日后西方列强瓜分非洲奠定了基础。

(三)列强对非洲的瓜分

抢占殖民地的行动，一直是西方列强在非洲的活动的内容之一。随着内陆探险的进行，从19世纪上半叶起，西方开始进入内陆活动。在1780年代和1820—1830年代，以遣返获释黑奴为名，英国在塞拉利

昂、美国在利比里亚、法国在加蓬分别建立了殖民地。与此同时，以禁止奴隶贸易等各种借口，西方列强不断蚕食非洲领土。法国在塞内加尔河口、象牙海岸、几内亚和达荷美的沿海地区、加蓬河口得手，英国在冈比亚河口、塞拉利昂、尼日利亚等地建立殖民统治。此外，英国积极渗入南非，英法插手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尽管如此，直至 1870 年代，西方列强抢占的非洲土地面积仅为 10.8%。

1870 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市场的斗争日益激烈。由于亚洲和美洲已经被瓜分完毕，因此最后的争夺集中在非洲。英国制定了从开罗至开普敦的二 C 计划，法国实施了从塞内加尔至索马里的二 S 计划，后来居上的德国企图建立德属赤道非洲，而实力不济的比利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也想分得一块殖民地。

西方列强在争夺中不断发生冲突。为夺取刚果河领域，法国与比利时互不相让，而英、德、美也乘机染指，于是，列强于 1884 年底至 1885 年初召开了柏林会议。会议除了讨论瓜分刚果河流域的领土问题外，还提出了在瓜分非洲时要遵循的“有效占领原则”。柏林会议后，列强掀起了瓜分非洲的新高潮。它们一方面以武力进行扩张，另一方面彼此之间又争夺又勾结。至 20 世纪初，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保持着名义上的独立外，非洲基本上被西方列强瓜分完毕，大致情况如下：

英国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包括埃及、南非、苏丹、尼日利亚等，面积约达 886 万平方公里，占非洲总面积的 29%；法国占有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等，面积约达 1079 万平方公里，占非洲总面积的 35.6%；德国占领了喀麦隆、德属东非和德属西南非洲，面积约达 234 万平方公里，占非洲总面积的 7.7%；意大利占有厄立特利亚、意属索马里和利比亚，面积约达 233 万平方公里，占非洲总面积的 7.7%；比利时占领刚果，面积约达 234 万平方公里，占非洲总面积的 7.7%；葡萄牙占领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等，面积约达 208 万平方公里，占非洲总面积的 7%；西班牙占领西属撒哈拉等，面积约达 30

万平方公里，占非洲总面积的1%。

这样的瓜分格局没有维持很长时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它的殖民地遭到重新瓜分。德属东非的坦噶尼喀成为英国委任统治地，德属东非的卢旺达和布隆迪则划归比利时；德属多哥和德属喀麦隆由英法两国瓜分；德属西南非划归为南非联邦的委任统治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收获甚少的意大利于1931年占领的黎波利，1936年吞并了埃塞俄比亚。

（四）殖民地非洲

政治制度

西方列强入侵和占领非洲殖民地后，在政治上剥夺非洲人的一切政治权利，取消了非洲国家的独立，并实行十分严厉的殖民统治。在殖民地初期，宗主国一般都采用直接统治的方式，即取消和摧毁非洲传统社会制度和传统统治者（如酋长），由宗主国直接委派官员实行殖民统治。当然，各国采取的具体方式有所不同，比如，法国实行“直接统治制度”，铲除当地的部落势力，剥夺酋长一切权力，由法国委派的总督及其他殖民官员进行统治。德国实行军国主义统治，把普鲁士的官僚机构引入当地。葡萄牙实行同化政策，力图把非洲殖民地改造成本国的“行省”。然而，直接统治的方式效果并不理想，非洲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英国殖民官员卢加德经过探索，提出了间接统治制度，并在乌干达和尼日利亚进行实践和总结。所谓间接统治，就是在确保宗主国的宗主权的前提下，保留殖民地的传统制度（如土著税收制度和土著司法制度等）和传统统治者（酋长等），并使这些传统制度和传统统治者为宗主国的殖民利益服务。因此，在间接统治制度下，传统制度和传统统治者已经失去了原来独立的地位，成为西方殖民统治制度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间接统治制度具有较强的欺骗性，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殖民地的社会矛盾，降低了殖民统治的成本。间接统治制度很快跨出了乌干达和尼日利亚的国界，在英国的非洲殖民地得到推广，成为英国统治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地的一种基本制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和比利时等国开始实行统治制度的改革，在反思直接统治制度的得失的基础上，引入了间接统治制度，当然各国的具体方式不全然一致。比如法国建立咨询性质的机构（显贵会议、殖民地会议或议会），吸收当地的传统统治者和代表参加；比利时则尽量起用土著为酋长，让他们参与一些社会管理。无论是直接统治制度还是间接统治制度，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的，即取消非洲殖民地的政治独立，使其成为宗主国的政治附庸。

殖民地经济

西方列强占领非洲的目的，是把非洲改造成西方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为此，西方列强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掠夺非洲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包括土地、矿产和其他资源。各宗主国采取的手段不尽相同，如德国在德属东非颁布法令，宣布所有土地归德皇；英国在肯尼亚和南非实施"保留地"制度，把占人口大多数的当地居民赶入面积窄小的保留地等。土地是非洲居民世代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的易手，使非洲传统经济结构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基础。西方掠夺的另一重点领域是矿产，非洲的采矿业完全控制在西方资本家手中，他们大量采挖黄金、钻石、锡、锰和铜等矿藏，满足了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实施残酷的剥削。殖民当局征收各种税收，诸如人头税、茅屋税、过桥税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使非洲人民无力应付，陷于日益贫困的境地。此外，殖民当局为筑路、采矿和公共工程，经常实施强迫劳动，非洲人民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从事超强度劳动，死亡率极高。在殖民当局的剥削下，大量居民破产，生活陷于极端贫困之中。

三，倾销宗主国的廉价工业品，使殖民地成为宗主国的商品销售市场。西方宗主国利用对非洲殖民地海关和市场的控制，大量倾销本国的廉价工业品。非洲原本弱小的民族经济遭到冲击，非洲成为西方的商品销售市场。

四，推行单一经济作物的生产。殖民当局一方面强迫非洲居民放弃传统作物的生产，改种殖民当局规定的经济作物。如黄金海岸专门

种植可可，塞内加尔生产花生，尼日利亚生产棕榈油，乌干达生产棉花，桑给巴尔生产丁香等。另一方面吸引白人移民经营大庄园，专门生产经济作物。在肯尼亚和南部非洲的一些地区，白人移民建立许多大农场，专事生产宗主国所需的经济作物。

在西方宗主国的强制下，非洲殖民地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腐蚀和破坏，逐步解体；单一经济结构开始形成。单一经济结构，是殖民地经济的根本特点，它表现为殖民地在其生产领域只生产一种或几种农矿初级原料产品，这些产品并非供应本国使用，而主要出口供应世界市场、尤其是宗主国市场。因此，世界市场和宗主国市场对这些产品的需求程度以及价格高低，对殖民地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必须指出，殖民地经济与宗主国经济始终保持着紧密联系，而这种联系却是一种不平等的依附关系，宗主国处于主要和统治地位，主导着这种关系；殖民地处于次要和被动的地位，受到这种关系的严重束缚。十分明显，非洲的殖民地经济是一种“奴仆经济”，它运行的全部出发点和归宿就是追求宗主国殖民利益的最大化，而这种最大化恰恰是以牺牲殖民地利益为代价的。

非洲的回应

面对西方殖民势力咄咄逼人的渗透和侵犯，非洲社会各阶层深切感到了自身的生存危机。如何应对西方的挑战？非洲的回应包括两个方面：一，非洲统治集团试图通过向西方学习，实行改革，增强国力，以抵制西方的入侵；二，非洲各阶层团结起来，以武装斗争的方式抗击西方的渗透和侵犯。

实行改革的非洲国家主要集中在北非、东北非和马达加斯加。它们一方面因为地域的原因比较易于受到欧洲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它们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已经受到欧洲殖民势力的侵略，因此危机感更加强烈。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1769—1848）在 19 世纪初首开改革之先河，随后，马达加斯加的拉达马一世（Radama Ⅰ，1810—1828 年在位）、埃塞俄比亚的西奥多二世（Theodore Ⅱ，1818—1868）、突尼斯的贝伊艾哈迈德（Ahmed Bey，1837—1855 年在位）和摩

洛哥的哈桑一世(Hassan Ⅰ,1873—1894年在位)都先后进行改革。这些改革的内容大多是学习和引入西方的科学技术,对现存的社会制度作一些修改等。应该指出,上述这些改革多由非洲国家的统治集团(国王、王公和酋长等)发起和进行,因此,改革仅仅以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没有从根本上触动非洲国家落后的社会制度(如封建制度)的基础和根基。从这个角度讲,改革即便取得了一些成效,最终还是难免失败的命运。改革的失败加快了西方殖民渗透的速度,非洲国家的民族危机更加急迫。

在一些国家进行改革的同时,非洲社会也没有放弃武装抵抗的行动,这种抵抗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和瓜分时期。

从葡萄牙人入侵休达开始,非洲人民的抵抗就开始了。无论在早期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活动中,或者在奴隶贸易中,非洲人民的抵抗持续不断。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瓜分和入侵非洲时期,非洲人民的抵抗斗争更是激烈:在埃塞俄比亚,经历了抗击英国军队入侵的斗争后,1896年3月的阿杜瓦战役(Aduwa)全歼意大利侵略军,捍卫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在马达加斯加,当地军队和人民对法国殖民军进行了有力抵抗,沉重打击了入侵法军;在南非,祖鲁人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抗击了布尔人和英国人的入侵;在西非,阿散蒂人民英勇抗击英国殖民军,迫使英国付出了巨大代价。英军占领后,阿散蒂人民再次掀起大规模的起义,英国殖民者花费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把阿散蒂人居住区吞并为直辖殖民地;在西非还爆发了奥马尔(Umar,约1797—1864)领导的反抗法国侵略的斗争,出现了萨摩利(Samori,1830—1900)领导的反对西方殖民入侵的斗争;在北非,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和利比亚的人民对法、意殖民军做了长时间的抵抗。

非洲人民反对西方殖民入侵的斗争十分广泛,除了上述的起义和斗争外,在刚果、安哥拉、东非沿海地区、南罗得西亚、象牙海岸、达荷美、贝宁、上沃尔特等地都爆发了同样性质的起义和斗争。

第二阶段,西方实行殖民统治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非洲国家在最初的改革和抵抗失败后，他们的斗争并没有因此而停止。随着西方殖民统治机构和制度的建立，宗主国和殖民当局对非洲人民的压榨更加严厉，双方的矛盾不断激化，大规模的反帝武装斗争高潮再次出现，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塞拉利昂的茅屋税战争和坦桑尼亚的马及马及起义。在这一阶段，非洲人民的斗争具有以下特点：一，许多起义由传统统治集团（国王、王公和酋长等）发起和领导；二，许多斗争以宗教为外衣，号召和动员群众；三，由于部落对立的因素，斗争往往分散进行，缺乏彼此的联系；四，斗争基本上都失败了。

（五）非洲民族独立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和非洲的形势都发生了变化。首先，德国在大战中战败，它失去了在非洲所有的殖民地，战胜国英法则进一步扩大在非洲的殖民势力；其次，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格局，无所不包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被打破，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对被压迫人民（包括非洲人民）产生了极大的鼓舞；第三，一战期间，数百万非洲人被强征入伍，其中许多人被派往欧洲作战。这在客观上促进了非洲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开阔了非洲人民的眼界，他们接触了新的思想，民族意识逐步觉醒，成为日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主要力量。第四，一战也培养了一批掌握现代武器和现代战争技术的非洲战士，他们成为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骨干。

一战期间，西方宗主国加紧对非洲殖民地的改造，使非洲社会基本上完成了由传统的自然经济向殖民地经济的转化。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转型，非洲殖民地社会的阶级构成也出现相应变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新兴的社会力量，但是非洲的资产阶级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力量十分弱小，非洲无产阶级则因为其特有的流动性而处于比较涣散的状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牧民在殖民统治下，许多人丧失了土地或其他生产资料，生活日益贫困；传统统治集团在政治上出现分化，有人与殖民当局进行合作，有人则抵抗殖民统治；非洲民族知识分子的力量发展很快，而且承担起领导民族独立运动的重任。

世界和非洲社会所产生的变化，促进了非洲民族的觉醒，其表现为：一，以泛非主义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思潮广泛传播；二，一战后，非洲大陆各地都出现了民族主义政治组织。在一些殖民地还出现了政党，诸如埃及于1919年成立了华夫脱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也建立类似政党，英属西非的黄金海岸、尼日利亚、冈比亚和塞拉利昂于1920年成立了英属西非国民大会，南非于1921年成立南非共产党，1929年成立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这些政党和组织多由非洲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知识分子发起组成，并且提出要求改变现状、甚至自治和独立的口号。与此有关的是，非洲各地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埃及和苏丹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①]，摩洛哥里夫山区人民的斗争，英属西非和法属西非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此外，在肯尼亚、索马里、乌干达、法属刚果、南非等地，都出现了同样性质的斗争。应当指出的是，一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尚属初始阶段，斗争的目的还不是十分明确，而且群众斗争有许多是自发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世界和非洲发生了进一步的重大变化：第一，非洲民族资本和社会经济在二战期间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民族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队伍都有所增长，这使民族独立运动的基本队伍更加壮大；第二，战争期间，数百万非洲人参战，其中有些人赴海外作战，他们不但得到战争的洗礼，增长了才干，而且受到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民族意识迅速觉醒，民族觉悟不断提高，他们在战后成为民族独立运动的新生力量；第三，二战的结果是德、日、意彻底失败，英法严重削弱，西方宗主国的力量大大下降，国际环境有利于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战后亚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和许多殖民地的独立，对非洲殖民地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在内外有利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开展。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不但其数量增加，而且分布更加广泛；工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跨国的反帝群众性组织开始出现。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

① 埃及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迫使英国于1922年承认埃及独立。

北非的民族独立运动首先揭竿而起，并且明确提出了政治独立的要求。在埃及，纳赛尔领导自由军官组织于1952年推翻封建王朝，建立埃及共和国，并废除了《英埃条约》；阿尔及利亚人民经过七年半的艰苦的武装斗争，于1962年获得独立；利比亚、苏丹、摩洛哥和突尼斯也在1950年代取得独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在战后初期并没有提出政治独立的明确要求，而只是停留在要求自治的阶段。加纳和几内亚在1957年和1958年取得独立，大大推动了其他殖民地的斗争进程。1960年代，一大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殖民地（主要是法属、英属和比属殖民地）纷纷走上独立之路。1974年葡属殖民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取得独立，1980年津巴布韦走上独立之路，1991年西南非洲（纳米比亚）获得独立。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的任务宣告完成。

四、现代：走向现代化

（一）非洲国家独立后的政治发展

非洲国家独立后，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新生国家采用何种政治制度？因此，探索适合非洲国情的政治制度是非洲国家独立后政治发展的一个特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西方入侵前，大多尚没有建立国家，因此缺乏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在这种情况下，非洲国家在独立之初通常都借用原宗主国的某些制度。在政体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民主共和政体，也有少数采用君主立宪政体。在政党制度上，非洲国家在独立之初大多实行多党制。在196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末，许多国家取消多党制，改为一党制。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在民主化浪潮冲击下，这些国家又恢复到多党制。从总体上看，非洲国家的政治制度都具有一些共同特点：一，一般都采取中央集权的管理方式，大权掌握在中央政府、甚至少数领导人手中；二，国家的权力结构呈现二元结构形式，即既有现代权力机构，又有传统权力机构，在县、省和中央的层面上有现代的权力机构和制度，在基层（尤其是农村）还保存着前资本主义的

权力机构和制度。

“非洲社会主义”是非洲国家独立后政治发展的又一特点。许多非洲国家在独立后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当然，他们宣称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非洲社会主义流派众多，包括村社社会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村社社会主义是其中较为典型和流行的一种，它把非洲传统社会与社会主义划等号。在理论上，它一方面批判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却又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实践中，非洲社会主义推行生产资料国有化、经济计划化和农业集体化政策。由于非洲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十分低下，因此过早消灭私有制和私营经济，过快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遏制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农业集体化则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些奉行非洲社会主义的国家在独立后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在低水平徘徊。非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受挫，使它的发展几起几落，尤其在 1980 年代末苏联解体后，非洲社会主义更是遭受沉重的打击，呈现衰落趋势。

频繁的军事政变是非洲国家独立后政治发展的第三个特点。涉及军事政变的非洲国家众多，政变指数逐年上升，成为世界上发生军事政变最多的地区。非洲国家之所以发生频繁的军事政变，除了外部势力（如冷战时期的苏美插手）的干涉外，内部原因（诸如国内严重的部落主义和地方主义，人民生活水平迟迟不能提高，官员的贪污腐败等）也不可忽视。军人执政虽然在短时间内可以平息社会动乱，维持政局稳定，但从长期来看，军人不熟悉文官政府的运作，不熟悉社会经济生活，因此大部分军人政权难以在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有所作为。1990 年代后，民主化浪潮席卷非洲，军人政权纷纷落马，或者还权于民，军人政权逐步退出非洲的政治舞台。

追求非洲的统一，是非洲国家独立后政治发展的第四个特点。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洲的非洲裔黑人发起了泛非主义运动。泛非主义实质上是非洲黑人的民族主义，它的宗旨是号召全世界黑人团结起来，联合奋斗，首先实现非洲大陆的独立，然后建立非洲合众国，完成非洲

的统一。1945 年前,泛非主义的活动重心主要在欧美,活动的目的是反对种族主义,为黑人争取平等的地位。1945 年第五次泛非大会后,泛非主义的重心开始转向非洲本土,活动的目标是推动非洲大陆的民族独立运动。1960 年代大批非洲国家获得政治独立后,为继续推进泛非主义,1963 年成立了非洲统一组织。所有获得政治独立的非洲国家,无一例外地成为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因此该组织成为泛非主义的基地。非洲统一组织为了实现泛非主义的最终目标,在推动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帮助尚未独立的殖民地争取民族解放方面;在巩固非洲国家的新生政权方面;在和平解决非洲国家的矛盾和冲突、防止外来势力的干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初步实现了泛非主义的第一个目标,即非洲大陆的政治独立。

(二)非洲国家独立后的经济发展

独立之初,非洲国家普遍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没收白人殖民者的土地,对外国资本控制的企业实行国有化;建立一批国营企业,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完善独立的民族经济;政府制定国家经济发展计划(三年计划或五年计划等),规划本国的经济发展目标,有计划推进生产力的提高。这些措施对于消除殖民地"奴仆经济"及其后遗症,建立和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非洲国家在独立之初的头十年里,经济发展较快。然而,也必须指出,非洲国家独立后,一直处于苏美两极的夹击之下,因此自由、独立探索符合非洲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的空间十分有限。在冷战格局下,一部分非洲国家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或者"非资本主义"道路,另一部分国家则采用西方的市场经济道路。实践证明,无论是东方的发展模式,还是西方的发展模式,都不适合非洲国家的国情,都不能有效、持续推动非洲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1970 年代中期后,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危机迹象,在自然灾害(旱灾等)的推波助澜下,经济危机迅速遍及全非,成为全非性现象。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于 1979 年制定了《拉各

斯计划》;次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伯格报告》。[1]《拉各斯计划》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殖民地经济的后遗症以及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即外因的作用,而《伯格报告》则把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于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失误,即内因的作用。为了克服危机,为了取得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和贷款,非洲国家接受了《伯格报告》的观点,并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结构调整"方案,开始了经济改革。"结构调整"方案实质上是西方经济运作模式的翻版,它与非洲国家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因此它的失败在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1980 年代是非洲国家进行结构调整的十年,被非洲国家称为"失去的十年"。进入 1990 年代,非洲国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探索。

(三)南非人民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斗争

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南非前,当地生活着布须曼人、霍屯督人和南班图人,他们处于原始公社的解体阶段。1651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南非建立了开普殖民地。之后,大量自称是"布尔人"(在荷兰语中,Boer 意为农民)的荷兰移民迁居南非,他们经营农场,并把当地非洲人当作奴隶使用,于是,剥削和奴役非洲黑人成为布尔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为使这种状况合法化,布尔人制造了一套种族主义理论,宣扬"白人至上",黑人是劣等种族,因此白人统治黑人是天经地义的事。19 世纪初,开普殖民地的法律正式把居民分为"欧洲人"和"奴隶"两类,规定只有欧洲人才能享受各种权利;这标志着种族主义制度的确立。

1806 年,英国占领开普殖民地。尽管英国人和布尔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并爆发了英布战争,但是对于种族主义制度的立场却完全相同。1910 年,南非联邦宣布成立,英国议会颁布的南非联邦宪法是世界上最为露骨的种族主义宪法之一。自 1910 年以来,尤其是 1948 年国民党上台后,南非当局颁布了数以百计的种族主义法令。《土著土

---

① 该报告起草人为伯格,故名。

地法》(1913)确定了黑人保留地制度,规定占人口70%以上的黑人只能得到13%的土地;此外,《特定住区法》、《纳塔尔法令》、《种族隔离法》、《通行证法》、《班图人教育法》等,从各个方面对黑人种族的社会生活、工作、教育、就业等加以十分严格的规定,从而从根本上剥夺了黑人的各种基本权利,并且使种族主义制度最终合法化和法律化。

南非人民为反对种族主义制度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1912年,非洲土著人国民大会宣告成立(后改名为非洲人国民大会);1921年,南非共产党成立。上述组织发动群众,多次组织反抗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非人民的反抗斗争进一步高涨,非洲人国民大会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方式,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取消通行证制度等要求。1952年,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印度人大会联合发动藐视不公正法令运动;1955年,非洲人国民大会等五个组织联合召开南非人民大会,通过《自由宪章》,反对种族歧视,由全体人民管理国家等主张;1959年,南非泛非主义者大会成立,次年组织了反通行证法运动,南非当局进行镇压,发生了"沙佩维尔惨案"。为了强化种族主义统治,南非当局宣布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为非法组织,大批领导人流亡国外。残酷的斗争现实使他们认识到,非暴力不是唯一的斗争方式,他们开始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1970年代中期,"索韦托惨案"再次激起南非人民的斗争高潮,工人运动开始与学生运动相互结合,共同推动反对种族主义制度的斗争向前发展。至1980年代,武装斗争频繁出现,南非人民以革命暴力反击种族主义统治。

在南非人民坚持不懈的斗争的打击下,在国际社会的持续制裁下,加之非洲大陆形势的变化和冷战结束所带来的冲击,南非当局深感统治危机,博塔(P. W. Botha)力图以有限的改革来克服危机,但是效果欠佳。德克勒克(F. W. De Klerk)上台后,加快改革步伐,他一方面宣布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等组织的禁令,一方面开始了与非国大领袖曼德拉(N. R. Mandela)的会谈。经过艰苦的多党制宪谈判和南非首次民主大选,1994年以曼德拉为总统的南非民族团结政府成立,新南非终于诞生了。

(四)非洲的国际地位

非洲国家在获得独立后,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努力推动建立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

在联合国,非洲国家占有53个席位,约占总数的1/3弱。当联合国进行重大议题的审议和决定时,离不开非洲国家的参与。而非洲国家也总是抓住时机,宣传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并利用众多的票数对国际重大问题施加影响,因而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非洲国家现已成为联合国中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

非洲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主力军之一。非洲的大多数国家加入了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非洲国家始终支持殖民地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始终反对霸权主义,捍卫发展中国家的权益,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始终加强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对话,谋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五、中国与非洲

(一)历史上的中非关系

中非关系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汉朝时期,中国与非洲已经发生了间接的往来,中国的丝绸等产品进入了北非地区。

在唐代,中国与阿拉伯帝国之间已经发生了交往。在唐代裴氏小娘子墓(西安南郊)内发现的黑人陶俑和当时文学作品中的"昆仑奴"形象,说明唐人对黑人已有一定接触和了解。唐人杜环在8世纪所作的《经行记》是中国关于黑非洲的最早文字记载;一个世纪后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再次提及非洲。唐代的中非关系,仍停留在间接交往的层面上。

宋代的海上贸易得到很大发展。中国生产的瓷器、杂色帛、各类矿产品和铜币被运往海外,其中也包括非洲。根据考古发现,在东非沿海

的基尔瓦、桑给巴尔和布腊瓦等地都出土过宋代钱币,而宋代的瓷器发现的地区则更加广阔,最远的已经到达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地。宋代赵适汝的《诸蕃志》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这二部著作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埃及、马达加斯加和东非沿海产生的物产、风土人情、地理和宗教等情况。这说明宋代对非洲的了解已经大大超过唐代。

蒙古人东征西伐,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帝国,因此,元代时中国人对非洲已经不那么陌生了。元代地理学家朱思本在其绘制的地图上,已标明了非洲,尽管当时把非洲的地形画成三角形,但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元代介绍非洲的著作有刘郁的《西使记》和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值得一提的是,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塔在其游记中叙述了他到中国访问时的所见所闻。

在明代,中非关系进入一个高潮,郑和下西洋正是这个高潮的标志。郑和代表明朝多次访问北非和东非的一些国家,而一些非洲国家的代表也访问了中国。中非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中国产品(瓷器和漆器等)大量进入非洲,而非洲的象牙、犀角和乳香等也输入中国。跟随郑和下西洋的费信撰写了《星槎胜览》,对非洲的一些国家进行了介绍。

15 世纪,西方列强开始殖民非洲,在经历了 400 年的奴隶贸易后,非洲遭到西方列强的瓜分和入侵。因此从 15 世纪起,非洲逐步失去了独立自主对外交往的机会。在中国,清政府采取严格的闭关自守政策,与海外的往来也中断了。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但是中国也逐渐失去了独立自主的地位。于是,中国和非洲都处于西方的控制之下,已经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相互交往。但是,中非之间的交往并没有停止,而是以新的方式进行,比如非洲黑人来华和中国劳工赴非;又如中国与一些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等。应该指出,近代黑人和华工相互移植,是资本主义国家掠夺劳动力的结果;而近代的中非官方关系是一个不能自主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与殖民地的南非、莫桑比克和扎伊尔的关系。在近代,由于中国和非洲都遭到西方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因此双方在反帝反殖斗争中相互激励和相互支持。这些

都是近代中非关系新的特点。

（二）当代中非关系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非洲大陆的独立，中非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非洲国家大多没有独立，因此在这段时间里，中非关系主要表现为民间交往。非洲国家的群众组织（工会、妇女和青年）通过各种渠道访华，了解中国的发展，学习中国革命经验，寻求中国的援助。1955 年亚非万隆会议促进了中非之间的了解，1956 年埃及率先与中国建交。

在非洲国家纷纷走上独立道路之际，1963 年周恩来率团访问非洲。访问期间，周总理宣布了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之后，周总理又宣布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这些原则在非洲引起强烈反响，得到非洲国家的高度好评。大批非洲国家与中国建交，中非关系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1970 年代，中非建交进入高峰。50 个独立的非洲国家中，有 44 国与中国建交。中非领导人频繁互访，经济贸易往来扩大，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成为双方合作的标志，而在非洲国家大力支持下，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进入 1980 年代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而非洲国家也根据国际格局的变化，调整了内外政策。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中非双方在加强政治合作的同时，更加注意经济领域的交流。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提出中国在同非洲国家经济技术合作中所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既坚持了传统，又与时俱进，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为了应付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中非关系，中非双方经过协商，共同决定建立“中非合作论坛”，这标志着中非关系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

第二章　史料概述

历史研究的任务,是恢复历史的原来和真实的面貌。要做到这一点,最基本和必不可少的前提是,占有充足和可靠的史料。所谓史料,就是人类活动所遗留下来的历史踪迹,包括考古材料、文字资料和口头传说等。只有占有充足和可靠的史料,我们才有可能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才有可能掌握历史发展的脉络,才能剖析历史发展规律。如果离开了史料,历史研究就无从进行。有人说,历史研究要根据史料说话,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它指出了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一、考古材料

非洲大陆历史悠久,因此历史遗址和文物都十分丰富。非洲国家独立后,考古事业发展迅速。自 1960 年代至今的 40 多年时间里,是非洲考古研究和成果最为丰富的时期。由于考古报告比较分散,而且专业性比较强,因此本书除了介绍一份考古报告作为样本外,主要推荐一些期刊和著作,我们不但可以从中了解非洲考古的成果,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从这些著作中寻找所需要的考古报告和资料。

(1) 普赖斯-威廉姆斯:《近期对于斯威士兰西北部的西贝贝遗址的中石器和晚石器层面的发掘的初步报告》(David Price-Williams, "A Preliminary Report on Recent Excavation of Middle and Late Stone Age Levels at Sibebe Shelter, North-West Swaziland", *The South African Ar-*

chaeological Bulletin,1981)。

这份报告对于斯威士兰西北部的西贝贝遗址的发掘做了说明。通过对遗址的研究,发现该遗址具有从中石器时期向铁器时期过渡的层次。

(2)《剑桥非洲考古专论》(*Cambridge Monographs in African Archaeology*)。

自1983年以来,总数已达79期。每一期都有相对集中的研究专题,比如77期的主题是“从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看石器工具的运用”(Using Stone Tools: The Evidence from Aksum,Ethiopia);76期的主题是“6—15世纪坦桑尼亚沿海地区的考古”(The Archaeology of Tanzanian Coast Landscapes in the 6th to 15th Centuries A. D.);74期的主题是“当前加纳的考古研究”(Current Archaeology Research in Ghana)等。这套专论的特点是:第一,比较快速地反映了非洲考古的研究成果,相对其他专著的出版,其时间更快,及时反映非洲考古的新成果,满足了考古学界了解最新动态的需求;第二,每一期专论不但提供了相关的基本资料,而且阐述了研究的重要成果,因此内容比较全面;第三,专论涉及的时间跨度长,从史前直至非洲古代社会,且涉及的空间大,覆盖了整个非洲大陆。

(3)斯塔尔:《非洲考古》(Ann Brower Stahl, *African Archaeology*:*A Critical Introduction*,Blackwell, 2005)。

这是布莱克威尔全球考古系列丛书(Blackwell Studies in Global Archaeology)中的一本。这套丛书专门为考古专业的本科生设计,每一卷都由该领域的专家编撰。《非洲考古》收录了十七篇论文,为读者提供了有关非洲大陆考古的有关材料。领域包括全非洲、南部非洲、中非、西非、马格里布、埃及。值得一提的是,书中专辟两章,介绍非洲考古学的先驱们。

(4)菲利普森:《非洲考古》(David W. Phillipson, *African Archaeolog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1993,2005)。

这本著作总结了非洲考古40年的成果,对非洲考古的发展做了总

揽。此书不但提供了历年非洲考古研究的资料和结论,而且为读者开列出一份全面的参考书目。作者在介绍非洲考古研究时,每一个主题都引用考古的原始资料,并且阐述了这一主题研究中的各种学术观点及其沿革过程。此书于 1985 年问世后,广受欢迎,于 1993 年和 2005 年两次再版。

(5)里德、莱恩主编:《非洲的历史考古》(Andrew M. Reid, Paul J. Lane, eds. *African Historical Archaeologies*,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2004)。

历史学和考古学是两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学科,这部著作提出了"历史考古学"的新概念,认为历史考古学应该有三部分内容:口述史料、文字史料和考古材料。书中介绍了自 1960 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历史考古事业,包括努比亚、斯瓦希里海岸、萨赫勒地区、尼日利亚河流地区、津巴布韦、茨瓦纳城市、大西洋奴隶贸易起源、南非的工业等领域的考古进展。

(6)帕韦特、索珀编:《非洲考古纵览:泛非协会第十届大会关于史前史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论文集》(Gibert Pwiti and Robert Soper eds., *Asperts of African Archaeology: Papers from the 10th Congress of the Panafrican Association for Prehistory and Related Studies*, University of Zimbabwe Publication, 1996)。

这是泛非协会第十届年会的学术讨论论文集,所收集论文主要涉及非洲的史前时代,其中大量介绍了相关的考古成果。

(7)南非考古学会:《南非考古公告》(South African Archaeological Society, *South African Archaeological Bulletin*)。

南非考古学会编辑出版的杂志,主要涉及非洲、尤其是南非的考古动态和该学会的活动,每年一期。1993 年刊登了南非沃特威尔斯特兰大学考古系岩画研究室的霍尔曼的《关于南非西开普省库比岩画的初步报告》(J. Hollmann,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Koebee Rock Paintings, Western Cape Province, South Africa")。

(8)柯拿:《被遗忘的非洲:非洲考古介述》(Graham Connah, *For-*

gotten Africa：*An Introduction to Its Archaeology*，Routledge，2004）。

作者熟悉非洲各地的考古研究及其成果。书中还有许多照片、图片和地图。可为读者提供非洲考古情况的概览和简况。

二、文字资料

（一）古代非洲

由于非洲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比如，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很少，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表现得更加明显；又如，非洲各族的文字出现得较晚，在古代，许多地区的居民尚没有文字——在古代非洲，非洲本地的史籍十分稀少。但是，阿拉伯地区和北非地区与撒哈拉以南非洲较早发生了来往，有一些阿拉伯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和商人穿越撒哈拉沙漠，进入撒哈拉以南非洲，他们把所见所闻笔录成书。他们的著作（许多是游记）成为我们研究撒哈拉以南非洲古代历史的宝贵的史料。

（1）希罗多德：《历史》（*The Histories*）。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前425年）被人们尊称为“历史之父”，古希腊历史学家。他长期在地中海周围地区游历，到过埃及、巴比伦、黑海沿岸和希腊的许多地方。他所著《历史》叙述西亚、北非及希腊诸地区之地理环境、民族分布、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历史往事、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名胜古迹等，尽管这本书涉及非洲的内容不多，但是书中关于北非地区的叙述具有参考价值。

（2）无名氏：《古红海环航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又译《厄立特里亚海环航记》）。

公元50—60年（另一说为210—220年），一位希腊商人把他从埃及港口至东非沿岸以及返回阿拉伯港口的贸易航行笔录成书，即《古红海环航记》。Periplus 是“航海指南”之意；所谓“红海”，在当时是指从非洲海岸至希腊罗马世界的最东端的广大海域，主要指印度洋。《古红海环航记》详细注明印度洋贸易中的重要港口，对东非有较多的

涉及。书中介绍了东非沿岸的居民、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的情况。书中也介绍了沿海的贸易情况。《古红海环航记》还介绍了阿克苏姆的城镇(如阿克苏姆和阿杜利斯)及其经济贸易状况。总之,《古红海环航记》是研究早期印度洋的非洲沿海地区历史的十分重要的原始资料。

(3)托勒密:《地理学》(*Gography*)。

托勒密(Ptolemy,约 90—168 年),古希腊著名的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于 125—155 年间编撰此书。作者根据当时各种游记和传说的资料,进行分析和取舍,最终确定了世界的形状、规模和特征。托勒密认为非洲是长方形的,西部海岸线是直直的。他认为德尔加多角是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德尔加多角通过一条长长的陆地与亚洲相连。书中还对一些河流(如尼日尔河)、山脉(如月亮山)和湖泊,以及当地生活的居民做了一些描述。托勒密的《地理学》对西方产生了巨大影响。直至内陆探险前,西方关于非洲的许多认识均来自于此书。

(4)马苏第:《黄金草原》(*The Meadows of Gold*)。

马苏第(Abu-Hasan Ali b. Husein al-Mas'ūdi,约 9 世纪下半叶—956 年),大半生在旅行中度过。在 30 余年的旅行生涯中,他的足迹遍及亚非国家。他曾经印度洋,抵达东非的桑给巴尔,晚年定居于埃及。他把旅行中的见闻笔录成书,成于公元 947 年。在书中的第 31、32、33 章,介绍了埃及和东非的见闻。《黄金草原》已由耿升翻译成中文,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5)伊本·白图塔:《伊本·白图塔游记》(*The Rihlah*)。

伊本·白图塔(Ibn Battutah,1304—1369),中世纪阿拉伯最伟大的旅行家。他于 1325 年开始离乡旅行,并数次到达非洲,曾沿着东非的海岸,到达了索马里、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后来又到达尼日尔河旁的廷巴克图城。他口述了自己的游记,正如他的笔录者所指出的,“全部游记都是以自己的回忆为基础的”。他的旅行见闻被记录成书,称为《伊本·白图塔游记》。马金鹏将埃及出版的阿拉伯原文本译为汉文的《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6)科林斯编:《非洲历史资料集》(三卷)(*African History in Documents*)。

科林斯(O. Collins,1933年生),美国非洲历史学家。这本资料集共3卷,分为西非、东非和南部非洲三个地区,每个地区一卷。已出版了第一卷的简写本。

(7)戴维逊编:《再现非洲文明》(*African Civilization Revisited*)。

戴维逊(Basil Davidson,1914—2010),著名非洲历史学家。最初出版的书名为《非洲的过去》(*The African Past*),后改为现名。该书收集了非洲古代至1900年的资料,不但数量丰富,而且配有很好的说明。

(8)勒夫津和霍普金斯编:《关于西非历史的早期阿拉伯资料文集》(*Corpus of Early Arabic Sources for West African History*)。

勒夫津和霍普金斯(N. Levtzion and J. F. P. Hopkins),是两位研究阿拉伯非洲和伊斯兰文化的学者。这本书的资料主要来自阿拉伯学者和旅行家,比如伊本·白图塔和伊本·卡尔顿(Ibn Khaldun)等所撰写的关于西非历史的原始资料,涉及西非的历史、文化、风俗和前殖民时代的伊斯兰国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9)威廉姆斯编:《南非历史:故事、资料和争论》(*From the South African Past: Narratives, Documents, and Debates*)。

威廉姆斯(John A. Williams)编辑的这本资料集收集了自1652年以来的有关南非的历史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与非洲早在汉朝时期已经发生了间接的贸易往来。这种交往不断发展。因此,有关非洲(主要是东非)的一些中文史料,也散见于中国的古籍之中。

(10)杜环:《经行记》。

杜环(生卒年不详)是唐朝亲身到过非洲并留下文字记录的中国人。他于752年随军西征,战败后为大食所俘,此后居留他国。直到762年,他才得以回国。他把在国外的见闻整理成《经行记》一书。在此书中,提及摩邻国和大秦。根据书中提供的材料,学者们认为"摩邻国"为东非的马林迪。至于大秦,则是指埃及。《经行记》已被收入《新

唐书》(卷二二一)。

(11)段成式:《酉阳杂俎》。

段成式(约 803—863),唐朝学者。他对“拔拔力国”做了报道,描述了当地居民的饮食和衣着习惯,介绍了当地的主要产品。根据学术界的研究,拔拔力国就是今东非索马里沿海的港口城市柏培拉,并认为这些报道很可能是作者从印度和阿拉伯商人处得来的间接资料。该书成于 9 世纪。

(12)赵汝适:《诸藩志》。

赵汝适(1170—1228),宋朝官员。作者在宋嘉定至宝庆年间(1208—1227)两次出任福建路市舶提举。由于他的职务主要涉及对外贸易,因此他在职期间广泛接触到海外各国风土人情和物产等各种资料。他将所积累的资料整理成书,即《诸藩志》。该书成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分上下卷。上卷记海外诸国的风土人情,下卷记物产资源。该书对东非沿海做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原书久已佚亡,今本自《永乐大典》卷四二六二“蕃”字韵下辑出。

(13)周去非:《岭外代答》。

周去非(1135—1189),曾任宋朝桂林通判,于 1178 年写成此书。全书共十卷,共录存二百九十四条, 用以答客问,故名代答。书分地理、边帅、外国、风土、法制、财计等共二十门, 其中外国门、香门、宝货门兼及南洋诸国, 并涉及大秦、大食等。对马格里布和马达加斯加的出产和社会习俗有所记载。此外,作者还指出了由中国前往非洲的海上航路。原本已佚, 今本从《永乐大典》中辑出。

(14)汪大渊:《岛夷志略》。

汪大渊(1311—1350),元朝大旅行家。他曾两次随中国商船到东洋(即南洋)、西洋(即印度洋),历时约 8 年,足迹遍布东南亚、南亚、西亚、地中海地区,途经沿海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1339 年根据亲身经历写成《岛夷志略》。该书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关于亚、非各国的实况记录,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书中除介绍地理气候、风土人情、珍奇物产以外,还有关于商品的产销信息、流通等方面的情况。作者在麦加

朝圣后，经红海抵埃及，先后访问了北非的埃及和摩洛哥，东非肯尼亚、坦桑尼亚的沿海地区，因此书中记录了这些地区的风土人情、社会风俗、出产物品、贸易活动，内容十分丰富。这些资料成为研究非洲历史的宝贵史料。可见《四库全书》本。

（15）费信：《星槎胜览》。

费信（生于1388年，卒年不详），曾经陪同郑和四下西洋，到达过22个国家和地区，回国后撰写了此书。书中对所经国家的位置、沿革，重要都会、港口、山川地理形势，社会制度和政教刑法，人民生活状况、社会风俗和宗教信仰，以及生产状况、商业贸易和气候、物产、动植物等，做了扼要的叙述。对于研究15世纪初亚非各国，特别是郑和使团出访的几个非洲国家的基本状况，极有价值。书中对郑和等访问各国时的一些情况，也做了比较翔实的记述，是研究郑和下西洋和中西交通史的基本史籍之一。关于郑和下西洋访问东非的材料，在《明史》中还有涉及。

（二）近代非洲

奴隶贸易

西方在非洲从事罪恶的奴隶贸易活动长达400年之久，对非洲历史发展产生了十分恶劣的破坏作用。由于奴隶贸易的自身特点，使其史料显得零碎和分散。这些史料主要散见于以下几类：非洲的奴隶输出港和美洲等地奴隶输入港海关关于征收（奴隶）人头税的统计材料；西方国家参与奴隶贸易的公司和商人所遗留的业务档案；在非洲活动的西方传教士和探险家的回忆录；贩奴商人和贩奴船员的回忆录；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等地有关本地黑人人口的统计资料；以及西方国家的政府和议会所汇编的有关文件资料。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使用上述这些史料，特介绍几本涵盖了上述几方面内容的非洲奴隶贸易的文件资料集。

（1）比切编：《东非奴隶贸易资料集》（*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on the Slave Trade of Eastern Africa*）。

比切(R. W. Beachey)是非洲历史专家。他把分散的东非奴隶贸易资料经收集、筛选和分类后,编成专集。书中的内容大致为:古代及中世纪时期的东非;法国和葡萄牙奴隶贩子在东非的活动;桑给巴尔作为集散地的奴隶贸易;东北非和非洲之角的奴隶贸易;海上禁止奴隶贸易的巡查;以及禁止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法令和条约。本书是东非地区奴隶贸易资料比较集中和全面的一本资料集。它既涉及了历史上传统的奴隶买卖,也涉及奴隶贸易期间的黑奴买卖;它既反映了西方国家奴隶贩子在东非的活动,也反映出阿拉伯奴隶贩子的活动。

(2)亨维克和鲍威尔编:《非洲人在伊斯兰的地中海世界的迁徙》(*The African Diaspora in the Mediterranean Lands of Islam*)。

亨维克(J. Hunwick)和鲍威尔(E. T. Powell)编辑的这本资料集资料丰富,主要涉及对伊斯兰世界的奴隶买卖和奴隶贸易。书中还附有两篇简单的介绍性的文章。

(3)唐南编:《美洲奴隶贸易历史文件》(*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Slave Trave to America*)。

唐南(Elizabeth Donnan)编辑的资料集收集了美洲 13 个殖民地、西印度群岛和西属美洲的奴隶贸易的有关资料。编者认为,上述三个地区奴隶贸易活动相互交织,联系如此紧密,因此必须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资料集收集了已经出版的材料,也有一些书写稿。资料集共有四卷,各卷的副标题:第 1 卷为 1441—1780 年;第 2 卷为 18 世纪;第 3 卷为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第四卷为殖民地边界和南部殖民地。后二卷的内容主要涉及输入北美 13 个殖民地的奴隶贸易。全书的时间跨度从 1441 年至 19 世纪初。

内陆探险

关于内陆探险的史料,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和探险家们的考察材料和回忆录。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资料是西方人第一次观察非洲大陆的真实记录,内容已经大大超出了探险的范围,不但包括他们在非洲生活的亲身经历,而且记录了这一时期非洲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这对于我们研究非洲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这类资料十分丰富,

因此只选择一些主要的资料供参考。

(1)布鲁斯:《尼罗河源头探险记》(*Travels to Discover the Sources of the Nile*, 5 vols)。

布鲁斯(James Bruce,1730—1794),苏格兰探险家。1763 年出任英国驻阿尔及尔领事,1765 年开始旅行,1768 年到达埃及的亚历山大。之后又从开罗启程,经尼罗河和红海,进入埃塞俄比亚境内。布鲁斯利用给埃塞俄比亚王室治病的机会,在当地人民的帮助下,对尼罗河的上游青尼罗河做了一番考察,并于 1770 年抵达青尼罗河的源头塔纳湖。在本书中,布鲁斯对他在埃塞俄比亚的所见所闻和所为,尤其是对青尼罗河的考察活动做了阐述。

(2)克拉普夫:《在东非十八年的旅行和传教》(*Travels and Missionary Labours During an Eighteen Years' Residence in Eastern Africa*)。

克拉普夫(Johann Ludwig Krapf, 1810—1881),德国籍传教士。1840 年代中期,受英国行教会派遣,与另一名传教士雷布曼(J. Rebmann)赴东非建立传教站。1848 年,雷布曼看见了白雪覆顶的乞力马扎罗山;同年底,克拉普夫看见了肯尼亚山,并测定了塔纳湖。同时,克拉普夫和雷布曼还听当地居民说,内陆有个巨大的"乌季季海"。克拉普夫和雷布曼的所见所闻,为英国和西方世界寻找尼罗河源头提供了重要线索。克拉普夫在东非生活 18 年,在本书中叙述了他在东非 18 年的传教、探险和旅行生活。

(3)斯皮克:《发现尼罗河源头日志》(*Journal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Source of the Nile*)。

斯皮克(J. H. Speke,1824—1864),英国探险家。为了探明尼罗河源头,在英国外交部和皇家地理学会的支持下,伯顿(R. F. Burton, 1821—1890)和斯皮克进入内陆。1858 年 2 月,伯顿首先见到坦噶尼喀湖,而斯皮克则见到了另一大湖,他取名为维多利亚湖。斯皮克认为该湖就是尼罗河源头。回国后,斯皮克宣布发现了尼罗河源头,结果引起争议。1859 年他重返非洲,1862 年他终于看见维多利亚湖泻入白尼罗河的瀑布。这一发现证实了他以前的看法。斯皮克把他发现尼罗河

源头的探险历程以日志的形式记录下来，出版成书。伯顿也把探险的经过笔录成书，书名为《东非初探》（*First Footsteps in East Africa*）。

（4）蒙哥·帕克：《1795、1796 和 1797 年在非洲内陆的探险》（*Travels in the Interior Districts of Africa in the Years* 1795，1796 *and* 1797）。

蒙哥·帕克（Mungo Park，1771—约 1806），苏格兰探险家，医生。1795 年初与非洲协会（即非洲内地探险促进协会）签定合同，负责筹备和实施对尼日尔河的探险活动。1796 年 7 月他终于看见了尼日尔河。帕克的这次探险证实了尼日尔河的朝东流向，从而纠正了欧洲地理学界长期信奉的关于尼日尔河的朝西流向的错误说法。然而，关于尼日尔河的流程和终点，帕克依然无法解答。帕克回国后，把三年中对尼日尔河的探险活动及其见闻和经历，笔录成书，于 1797 年出版。

（5）理查德·兰德尔：《克拉伯顿上校在非洲最后一次探险的记录》（*Records of Captain Clapperton's Last Expedition to Africa*，2 vols）。

克拉伯顿（H. Clapperton），苏格兰人，曾经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1822 年，受英国政府派遣，与伍德内及德纳姆共同组成探险队。他们于 1823 年 2 月抵达乍得湖，成为第一批看见乍得湖的欧洲人。克拉伯顿于 1824 年 3 月抵达索科托帝国的首都，素丹贝洛热情接待了他，并给他画了尼日尔河的草图。克拉伯顿希望前往尼日尔河，遭到拒绝。于是，他于 1825 年返回英国。他撰写了《1822、1823 和 1824 年在北非的旅行探险记事》，于 1828 年出版。克拉伯顿的第一次探险带回了许多宝贵的非洲内陆资料，但是，尼日尔河之谜仍然没有揭开。1825 年，克拉伯顿受政府委托，再赴非洲。这次同行的是他的仆人理查德·兰德尔（Richard Lande，1804—1834）。在本书中，兰德尔记录了克拉伯顿最后一次在非洲勘察尼日尔河的探险活动的全部经过。

（6）兰德尔兄弟：《勘察尼日尔河流程和终点的探险旅行记》（*Journal of an Expedition to Explore the Sourse and Termination of the Niger*，3vols）。

由于尼日尔河流程和终点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英国政府于 1830

年任命理查德·兰德尔及其兄弟约翰·兰德尔（Richard Lander, 1804—1834; John Lander, 1807—1839）再赴非洲考察。他们的探险最终证实尼日尔河的河口就是欧洲商人熟知的油河河口。至此，西方人心中关于尼日尔河的谜底全部揭开，对尼日尔河的探险活动告一段落。兰德尔兄弟在回国后，把这次探险的过程笔录成书，于 1832 年出版。

（7）巴特：《在北非和中非的旅行和发现》（*Travels and Discoveries in North and Central Africa*）。

巴特（Heinrich Barth, 1821—1865），德国地理学家和探险家。1845—1847 年赴北非的突尼斯和利比亚旅行。巴特考察了卡诺、博尔努，尼日尔河中段及其支流贝努埃河、乍得湖、廷巴克图、戈戈（桑海帝国古都）和索科托等广大的中苏丹和西苏丹地区。巴特的探险和考察活动历时五年，行程一万英里。他在探险和考察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在返回欧洲后，把这些资料整理成书出版。书中记载了许多有关人种学、历史和语言方面的材料，记录了他在探险和考察活动中的各种细节。巴特的这本书为人们了解西非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至今仍然是世人了解西非的重要著作。

（8）戴维·利文斯顿：《在南非的传教旅行与考察》（*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戴维·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英国著名的传教士和探险家。1840 年受伦敦宣教会的委派，前往南非库罗曼传教。他先后发现了恩加米湖和赞比西湖。在非洲的长期生活，使利文斯顿亲眼目睹了奴隶贸易的种种罪恶及其对传教活动的冲击，于是，他决心投身探险，开辟一条自沿海通往内陆的商道，以合法贸易来取代奴隶贸易。1853—1856 年，利文斯顿进行了第一次探险。他在两年多时间内，由西向东横穿非洲，被誉为横越非洲第一人。利文斯顿回国后受到热烈欢迎，并受英国女王亲自接见。他利用回国的时间，把这段经历和见闻笔录成书，于 1857 年出版。

（9）戴维·利文斯顿和查尔斯·利文斯顿：《赞比西河及其支流探险记》（David Livingstone and Charles Livingstone, *Narrative of an Expedi-*

tion to the Zambezi and Its Tributaries)。

利文斯顿第一次探险的成功,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重视。英国政府支持他重返非洲,对赞比西河进行进一步的勘察。为此,政府帮助他组织了探险队,并配备了大量物质。这次探险途中先后发现了奇尔瓦湖和尼亚萨湖,专程勘察了尼亚萨湖以南的希雷高地。1862 年,利文斯顿又对赞比西河的另一支流鲁伍马河进行勘察。在这次探险活动过程中,利文斯顿目睹了葡萄牙人进行奴隶贸易的种种罪恶,因而不断向外界披露和批判葡萄牙奴隶贩子及其罪行,得罪了葡萄牙政府,后者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最终迫使英国政府下令中止了利文斯顿的探险活动。利文斯顿的第二次非洲探险活动中途夭折。1864 年利文斯顿回到伦敦,在 1865 年出版的此书中,他叙述了第二次探险活动的经历,并对葡萄牙奴隶贩子及其罪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10)斯坦利:《我如何找到利文斯顿》(*How I Found Livingstone*)。

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1841—1904),英国记者、探险家。1867 年被《纽约先驱报》派往埃塞俄比亚任英国远征军记者,1869 年又受报社委派,去非洲寻找探险中失踪的利文斯顿。11 月,他到达乌季季,找到了利文斯顿。斯坦利与利文斯顿共同生活了四个月,两人一起勘察了坦噶尼喀湖北端,结果没有发现任何从湖中北流的大河,这样就否定了坦噶尼喀湖是尼罗河源头的可能性。1872 年 3 月,斯坦利返回英国,同年,他撰写和出版了此书,书中叙述了他寻找利文斯顿的过程,回忆了他与利文斯顿共同勘察坦噶尼喀湖北端的经历。

(11)斯坦利:《穿越黑暗大陆》(*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

1874 年,斯坦利再赴非洲探险。他首先考察了东非内陆的湖区,通过环航维多利亚湖,他确定了该湖的范围。由维多利亚湖向西行进,证实了阿伯特湖与坦噶尼喀湖没有任何连接,从而否定了人们以为两湖相连的错误看法。这次探险基本上走完了刚果河的全程。斯坦利回国后,把这次对刚果河的勘察经历整理成书,并于 1878 年出版。

(12)斯坦利:《在最黑暗的非洲》(*In the Darkest Africa*)。

1879—1884 年,斯坦利接受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邀请”,

以"国际非洲协会"名义,第三次进入中非刚果河流域。他带领一批冒险家,先抵达桑给巴尔,然后潜回刚果河口,溯河而上直达刚果盆地。斯坦利在沿途以暴力、威胁和收买等手段,骗得与当地酋长签订的400多项"条约",建立了20多个商站和殖民据点。经过11个月的考察,他搞清了艾伯特湖及其支流的范围,确定了鲁文佐里山就是托勒密山。斯坦利回国后,把1879—1884年的非洲探险考察活动的过程记录下来。

(13)丁廉:《三洲游记》。

丁廉,广东番禺人。1877年与同伴巴仲和深入东非内陆考察,途经今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历时20个月。巴仲和死于途中。丁廉在考察途中每日把所见所闻以日记形式记录下来。回国后,撰写了此书。此书资料丰富,提供了东非在被西方瓜分前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值得指出的是,此书长期埋没于中国古籍之中,华东师范大学艾周昌教授编注的《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予以披露后,才为人们所认识。

西方列强瓜分非洲

内陆探险的进行,为西方列强入侵和占领非洲准备了条件。1884—1885年召开的柏林会议则揭开列强瓜分非洲的序幕。在短短二十余年中,西方列强你争我夺,很快把非洲瓜分完毕。非洲从此进入殖民地时代。

(1)卢加德:《不列颠赤道非洲的双重统治》(*The Dual Mandate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

卢加德(F. D. Lugard ,1858—1945),出生于印度,在英国皇家军事学院毕业后从军,参加过英国对阿富汗、苏丹和缅甸的殖民战争,也曾经代表东印度公司征服乌干达。1894—1895年,应皇家尼日尔公司之请,勘探中部尼日尔地区。其后,被英国政府任命为北尼日利亚高级专员。在任三年中,他根据在非洲殖民地工作的经验,逐步建立和完善了"间接统治"制度。所谓"间接统治",就是在表面上依旧保留非洲殖民地传统统治者(酋长等)、管理机构(土著法院、土著政权机构)和管理制度(土著税收等),但是它们都被纳入了殖民统治的轨道,传统酋长、

传统政权机构和传统的管理制度失去了昔日的独立性,实质上成为西方殖民当局的雇员、附属机构和管理制度。由于“间接统治”制度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因此西方列强纷纷引入这种制度,并在各自殖民地进行推广。卢加德在1922年出版了本书,主要叙述了他建立和推行“间接统治”制度的过程,以及“间接统治”制度的具体内容。

(2)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下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

此书是为配合周一良和吴于廑先生主编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教材而编辑的史料选辑,主要供高校历史专业的学生使用。该书于1964年出第一版,以后又多次重印。书中第十七部分为“18—20世纪初的非洲”,在这部分中,又细分为“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刚果”和“南非”。

(3)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上册,第一分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

此书是“国际关系史”教材的参考读物,内容主要是国际文件和资料,包括条约、协定、照会、备忘录、外交文书等原始资料。第二编第二章中,部分内容与西方列强侵略和瓜分非洲有关。

三、口述史料

(一)非洲的口头文化与口述史料

语言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因此也是史料的载体。非洲的语言,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等各种因素,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特色:

第一,非洲的语言种类繁多,多达1650种。[①]

第二,在非洲的语言中,大部分语言没有形成相应的文字;即便是有文字的语言,其文字也出现得较晚。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一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第227页。

第三，文字在非洲使用的范围不广泛。即使在今天，非洲广大农村的文盲率极高，许多居民仍然不会阅读和写作。

著名的口传历史学家J·旺西纳(J. Vansina)由此得出结论说："撒哈拉沙漠及其以南地区的非洲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口头文化，即使像西非这样从16世纪以来就存在文字的地区，也是属于口头文化，因为只有很少的人会写字，而且文字对于一个社会所关注的大事常常是没有多大作用的。"[①]由此可见，在非洲，口头语言发展得比较充分，而书面语言(或者称文字语言)则相对薄弱。这一特点对非洲史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其一，由于文字不发达，能使用的人数很少，因此直接影响了用文字记录史料。在非洲，文字形式的史料，远比世界其他地区少。

其二，口头语言在记录、保存和传播历史材料和知识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此而产生了"口传历史"。人们通过口头语言记录王国的编年史、部族史和家族史，并且代代相传。

曾任布干达首席大臣的阿波洛·卡格瓦(A. Kagwa)回忆说，小时候，"父亲削了许多木棍，用历史上重要活动家的名字给每根木棍命名。然后在儿子们面前叫木棍上所标示的人名，要儿子们讲述他们的故事。"[②]这种"口传历史"在非洲远比世界其他地区发达，因此，"口传历史"中丰富的"口述史料"成为非洲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随着研究的深入，口述史料已经越来越引起历史学家的兴趣和重视。综观学术界的意见，我们对口述史料可以做出以下的看法：

第一，非洲的口述史料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非洲的口头语言十分发达，在代代相传的口传历史中，讲述者常常具有良好的记忆力。

他们虽然代代相传，但是所涉及的口述史料却始终能保持原样。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一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第104页。

② 《东非诸国历史学的形成》，见《非洲历史研究》1988年1—2合刊，第88页。

马里著名的口头传说专家哈姆帕特·巴（A. Hampate Ba）在研究后指出:“非洲人记忆的特点之一在于,像从头至尾地放映一部电影一样,它完整地复活存留的事件或故事,并且再现其发生现场,使人身临其境。”他还举例说:“蒙泰伊教授（C. Monteil）曾向我讲过一些传说,这些传说是他父亲早在50年前收集的,现在只字未变。这说明口头传说所保存的材料忠实可靠。”[①]

第二,非洲的口述史料出于非洲人民,因而能真实反映非洲人民的思想和观点。

非洲的口传历史主要是由当事人(比如非洲传统社会中专司讲述历史的人或者传统社会中的长者等)有意识地脑记、口述本王国、本部族和本家族的历史和相关故事,他们与讲述的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所表达的内容真实反映了非洲人民的思想和观点。这种口传历史是原汁原味的非洲历史,没有外部掺入的杂质。英国口述史学家约翰·托什对此特别强调说,非洲的口述史料“是一种真正出自当地的受欢迎的材料——它是未受殖民主义污染的非洲往昔之声”。[②]

第三,当然,由于世代相传时也会出现误传误听、片面理想化本王国、本部族和本家族的历史等情况,口述史料中也不可避免存在受到歪曲和失实的史料。如果不加分析地全盘照搬照用,那么对历史研究将产生十分不利的后果。从这点出发,专家们认为,在利用口述史料时,必须首先了解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熟悉当地的传统文化背景,在此基础上对口述史料进行分析、考证和取舍。

总之,非洲大陆的特殊的传统文化,造就了口传历史在当地的特殊地位。口传历史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口述史料。因此,在非洲历史研究中,必须十分重视口述史料。对于口述史料,我们一方面以积极的态度收集、开发和利用,另一方面,在利用时应采取慎重的态度,鉴别其中的真伪,从而使口述史料更有效地为历史研究服务。

---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一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第146页。

② 《北大史学》,第一辑,第124页。

(二)非洲口述史料介绍

在非洲,口传历史和口述史料很早就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和利用。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直至 1965 年在达累斯萨拉姆召开的国际非洲史学家会议的决议中才正式表示:“口头传说是研究非洲历史的重要史料之一。”[①]现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1)伊本·卡尔顿:《柏柏尔人史》(*History of the Berbers*)。

伊本·卡尔顿(Ibn khaldun,1332—1406),北非人,生于突尼斯,是一位重要的早期非洲历史学家。他在 14 世纪末撰写了《世界史》一书,《柏柏尔人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该书中关于马里帝国的一章,是作者根据当时流传的口头传说,用阿拉伯文记录而成。有人认为,“多亏了他,我们才得以几乎可以肯定在任何现代意义上都是最早流传下来的热带非洲书面历史的片断”。[②] 他的著作始终是马里帝国历史的重要依据。

(2)《卡诺编年史》(*Kano Chronicle*)。

成于 1530 年代。该书用文字把豪萨地区流传的口头传说记录下来,编年史的起始时间为公元 999 年,截止时间为 1926 年,前后共 926 年,书中记录了从城邦国开始的 53 个酋长的姓名、统治时期以及当时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整部编年史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999—1807)为豪萨人酋长执政时期;第二时期(1807—1903)为富拉尼人人酋长执政时期;第三时期(1903 年以后)为殖民地时代的酋长执政时期。《卡诺编年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有助于我们了解黑非洲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情况,西苏丹的酋长制度,以及伊斯兰教传入黑非洲的进程。

(3)《基尔瓦编年史》(*Kilwa Chronicle*)。15 世纪 30 年代前后间

---

① 《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40 页。

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一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年,第 20 页。

世。该书根据东非沿海地区的口头传说整理成书。

(4)阿布德拉赫曼·埃·萨迪:《苏丹史》(*Ta'rikh al-Sudan*)。

阿布德拉赫曼·埃·萨迪(Abd al-Rahman al-Sa'di,1569—?)是一位廷巴克图的居民。他拥有许多贵族朋友,并且担任过"处在战争状态的各个亲王之间的外交居间人"。[①] 他利用这些特殊关系和特殊经历,收集了大量传说和资料,并于1655年发表。书中有苏丹地区各王国的编年史,对研究古代西非王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帮助。书中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描绘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画面。该书除了忠实记录当地的口头传说外,进一步对这些口头传说做了评述。

(5)马赫默德·卡提:《法塔史》(*Ta'rikh al-fattash*)。

马赫默德·卡提(Mahmud Ka'ti),生活在廷巴克图的学者。他曾经跟随桑海国王穆罕默德·阿斯基亚赴麦加朝圣,也亲眼目睹了16世纪摩洛哥人对桑海的入侵。作者对西非地区的一些口头传说做了文字记录,并做了评述,从而撰写了本书。此书成于1660年。通过本书,可以了解桑海帝国的历史。

专家们认为,《苏丹史》和《法塔史》,作为口传历史,其水平已经高于《卡诺编年史》和《基尔瓦编年史》。因为后两者仅仅对口头传说做了忠实的文字记录,而前者除了文字记录外,又进一步进行了评述,这说明非洲的口传历史的水平在不断进步。

(6)赖因多夫:《黄金海岸和阿散蒂史》(*History of the Gold Coast and Asante*)。

赖因多夫(C. F. Reindorf)根据当地的口头传说撰写而成,并于1895年发表。

(7)塞缪尔·约翰逊:《约鲁巴人的历史》(*History of Yoruba*)。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根据当地的口头传说,于1897年写成,但是该书的出版却是在24年后的1921年。

《黄金海岸和阿散蒂史》和《约鲁巴人的历史》这两部由非洲学者

---

① 巴兹尔·戴维逊:《古老非洲的再发现》,三联书店,1973年,第117页。

根据口头传说而写成的历史著作，受到了史学界的好评，被认为是早期有价值的、经典性的史学著作。这两本书在今天还被广泛阅读和引用。

（8）安得烈·克莱尔：《传说中的马里帝国》（*Le Fabuleux Empire du Mali*）。

法国历史学家安得烈·克莱尔（Anderée Clair）依据非洲当地的口头传说整理而成，于1950年代出版。该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9）哈姆帕特·巴：《18世纪马西纳富拉尼帝国史》（*History of the Fulani Empire of Macin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哈姆帕特·巴（A. Hampate Ba），马里学者。他是非洲史学家在收集、整理和出版口头传说和口传历史方面的杰出代表。他花费15年时间，访遍了从塞内加尔的富塔贾隆至尼日利亚的卡诺的沿途村落，记录了千余人讲述的口头传说，在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整理后成书。这本著作收集了大量珍贵的口头传说，并从中发掘出许多宝贵的口述史料，因而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第三章　研究史概述

对于非洲历史的研究，实际上始终与非洲的命运紧密相连。由于非洲大陆长期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它的历史长期受到忽视，甚至受到刻意的否认。只有当非洲独立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时，非洲的历史研究才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非洲本土的研究

（一）反对种族主义时期

非洲本土对非洲历史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第一时期是1960年代非洲大陆独立以前，可称为反对种族主义时期。

自15世纪以来，非洲大陆就一直是西方殖民势力渗透的目标。19世纪末，在瓜分的浪潮中，非洲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西方国家否认非洲大陆有其自身的历史，这种观点流行一时。著名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不是一个历史的大陆，它既没有显示出变化，也没有显示出发展”[①]。因此，在西方出版的世界历史书籍中，很少涉及非洲，即使谈到非洲，也只是把非洲作为西方文明的被动接受者。如，由海斯、穆恩和魏兰（C. Hayes, P. Moon and J. Wayland）编撰的教科书《世界史》（*World History*,1935），共49章，而完整叙述非洲的仅一章，名为“对非洲的征服”

---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51页。

(The Conquest of Africa)。书中以“黑暗大陆”为题写道:“直至19世纪末,非洲仍是‘黑暗大陆’。……对于外界而言,非洲的大部分是未知数,尚处于未开发的野蛮状态。非洲的大部分居民是黑肤色,而其中许多人的智力更加低下,因为文明之光还没有照到他们身上。”[①]上述观点代表了西方史学的主流看法。从这个角度出发,当时许多人认为,非洲的历史,是西方人登上非洲大陆以后的事情,换言之,是欧洲人给非洲带去了历史。1923年,A. P. 牛顿(A. P. Newton)教授阐发了这个观点:“在欧洲人来到之前”,非洲“没有历史。历史是从人类有文字记载时才开始的”[②]。一位牛津大学教授也公开宣布:“也许将来有一些可以讲授的非洲史。但现在还没有,只有在非洲的欧洲人的历史。其余的就是黑暗……而黑暗不能成为历史的主题。”[③]

为什么西方学者如此肯定非洲没有历史?从客观上讲,第一,非洲的地理环境比较特殊,造成了非洲(主要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长期与世隔绝的状态,与外部世界联系甚少,而外界对其也知之甚少。第二,非洲历史上的文字资料较少。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世界进入近代时期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地区尚处于原始社会的后期,一些部族甚至还没有文字。按照当地的传统,本部族的历史主要通过口述而代代相传。缺少文字记载,这给外界了解和研究非洲历史带来了困难。

严格地分析,上述客观原因不能成为“非洲没有历史”的根据。因为在古代和中世纪,各民族之间相互隔绝、互不往来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而历史也并非只能依靠文字来记录和反映。因此,“非洲没有历史”的论点之所以到处泛滥,主要是西方列强为推行种族主义统治而炮制出来的,是殖民主义者人为歪曲的产物。

西方殖民主义者进入非洲后,始终把当地的黑人作为掠夺、剥削和奴役的对象。为了替他们的殖民主义行径寻找借口,西方殖民者无视

① C. Hayes, P. Moon and J. Wayland, *World History*, Columbia, 1935, p. 748.

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一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第24页。

③ 同上书,第23页。



弱,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本就不存在",他宣布黑人"既不能进步,也不能教育",所以,黑人始终是"野性十足、犷悍不羁的自然人"。在这种推理下,非洲自然就没有历史了。

客观原因使得外部世界对非洲的历史缺乏了解,而西方殖民主义的人为扭曲,使得非洲大陆及其黑人居民被排斥在人类社会之外,成为没有历史的种族。于是,非洲成为"神秘"、"黑暗"的大陆,似乎非洲真的没有历史。既然没有历史,也就谈不上对非洲历史的研究了。

应该指出,非洲民族主义的先驱为批驳贬低黑人种族的种种谬论,重新肯定黑人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从而恢复黑人的种族自尊性和自信心,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其中包括对非洲历史的研究。泛非主义思想家伊奎阿诺(O. Equiano, 1745—1797)、班纳克尔(B. Banneker)、霍利(Holy)、霍顿和布莱登等人以非洲历史和非洲的传统文化为武器,对种族主义谬论发起反击。霍利出版了《关于黑人种族在自治政府和文明进步方面的能力,以海地革命和立法为证》一书,指出西方的种族主义理论是"无耻的压迫者制造的,其目的是以我们的血和尸骨为代价,来满足他们的利益"。在追溯非洲历史的基础上,他自豪地说:"对于黑人的历史研究得越深入,那么,对于黑人文化的赞扬就越热烈。"霍顿在《西非的国家与人民,英国人与土著》一书中批驳了诺克斯的观点,他指出,变化是自然的法则,没有永久不变的事物。因此"国家的兴衰、文明的兴衰,都是正常的。根据自然法则,处于野蛮状态的人不久成为文明人,也是可能发生的"。他呼吁黑人同胞们"必须生活在希望之中,因为转机可能出现"。他满怀希望地说:"黑人曾经治理了埃及,因此,他们将再次依靠自己的双腿而屹立在世界上。"[①]他回顾历史后指出,非洲有辉煌的过去,它曾经是"科学和文学的苗圃",他举例子说,"希腊化时代司智慧、艺术、发明和武艺的女神密涅瓦(Minerva)就是一位非洲籍的公主"。他鼓励说:"无论在什么地方,非洲人只要能够自我发现,他们就会走向兴盛。"他称赞非洲黑人是"永

① P. O. Esedebe,前引书,第27—28页。

久和永恒的人民"[①]。著名的泛非主义理论家布莱登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非洲的希望》、《古代历史上的黑人》和《非洲人对世界的贡献》等),认为非洲人自古至今一直对世界做出贡献。他赞美非洲辉煌的古代文明,而且特别肯定了非洲黑人对近代世界的贡献:"借助黑人劳动力,新大陆生产了糖和烟草;而借助糖和烟草,英国的商业发展起来。"遗憾的是,非洲民族主义的先驱们的呼声完全被西方种族主义的叫嚣所淹没。非洲各族人民不但丧失了政治独立,就连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努力也遭到扼杀。在这种形势下,自然不可能有机会去研究自己的历史。因此,当时既没有非洲人自己的史学研究队伍,也没有专事非洲历史研究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②]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可供研究之用的历史资料。一类是有关非洲地理、物产、气候、人种的报道。这些报道大多来自西方的探险家、传教士、殖民官员和军人之手。他们只是把在非洲的所见所闻笔录成书。另一类是关于殖民地政治、经济和社会其他领域的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来自西方殖民当局、殖民官员、特许公司、商人的一些统计、账目、通讯和回忆录。上述两类资料日后成为了解和研究非洲历史的重要史料。

(二)民族主义史学发展时期

本土的非洲史研究的第二时期是1960年代非洲国家独立以后,可称为民族主义史学发展时期。[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1960年代初,大批非洲国家走上了独立的道路。非洲各族在政治上的独立和解放,必然

---

① P. O. Esedebe,前引书,第26页。

② 1955年,曾经由非洲知识分子发起成立"尼日利亚历史协会",但是该协会没有取得实质性成绩。

③ Bahru Zewde, *African Historiograph: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ttp://www.ossrea.net/publications/newsletter2/article10.htm);王建华:《当代非洲史学及其民族主义学派》,《西亚非洲》1988年第6期。

会唤起经济和文化的复兴。在这种形势下,非洲历史研究迎来了崭新的局面。

非洲国家独立后,十分重视在文化教育领域的非殖民化工作,注意消除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论在非洲历史中的影响。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多次号召非洲的学者行动起来,尽早恢复非洲历史的真实面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非洲历史学科。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则提出,必须设立专门的非洲系和非洲课程,而且要把非洲课程建设为经典课程。恩克鲁玛和桑戈尔道出了独立之初非洲国家领导人和广大人民的普遍心声。达喀尔大学成立后,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学校的所有课程都面向非洲,就连中世纪史的教授也积极从事非洲中世纪史的研究和教学。可见,非洲国家独立以后,在民族主义领导人的有力倡导和推动下,非洲历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获得了良好的客观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首先,建立了必要的非洲历史教育和研究机构。

独立之初,新生的非洲民族国家在建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同时,重视非洲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喀麦隆的达喀尔大学、扎伊尔的金沙萨大学和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大学率先建立了非洲研究所,肯尼亚成立了非洲史前史研究所。以后,赞比亚、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等国家的大学里也建立了类似的研究所。今天,非洲国家几乎都有本国的高等院校,许多院校成立了非洲历史的研究机构,以尼日利亚为例,该国的三所著名大学——伊巴丹大学、拉各斯大学和伊费大学,都设有历史系,这三所大学的历史系在非洲历史研究方面成绩显著,现已成为西非地区乃至非洲的重要历史研究中心。

与大学历史系和非洲历史研究中心同时出现的是各种相关的学术团体。在西非,尼日利亚和加纳最早建立历史学会,其他国家也纷纷跟上。1972 年,仅西非和中非地区,就有 12 个国家成立了非洲史学会,至 1977 年,这个数字增加到 22 个。各种研究机构创办学术刊物,如:《尼日利亚历史学会杂志》、《西非考古杂志》、《非洲的过去》、《埃塞俄比亚》等。大大推动了非洲本土对非洲历史的研究。

其次,培养了一批本土的非洲史专家。

为了适应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研究工作逐步深入的需要,非洲国家着力培养非洲史研究的专门人才。到1970年代末,全非洲已经有500多位具有博士学位的非洲史专家,这表明非洲本土的非洲史研究队伍基本形成。随着这支队伍的不断扩大,已经涌现出许多学术造诣深厚、学术研究成果突出并具有国际学术地位的著名学者。这些人包括:尼日利亚的迪克(K. O. Dike)和阿贾伊(J. F. A. Ajayi)、塞内加尔的迪奥普(C. A. Diop)、布基纳法索的基-泽博(J. ki-Zerbo)、尼日尔的博布·哈马(H. E. Boubou Hama)、肯尼亚的奥戈特(B. A. Ogot)、坦桑尼亚的基曼博(I. M. Kimanbo)、赞比亚的布尔(M. Bull)、埃塞俄比亚的哈普特(A. Habte)等人。其中许多人以非洲民族主义的视野,批判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观点(诸如"含米特说"[①]、"非洲没有历史说"、"欧洲人为非洲带去了历史"等),实现"史料去殖民化",为恢复非洲历史的真实面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还值得一提的是,非洲本土历史学家逐渐形成了具有非洲特色的研究学派,其中最有影响的有伊巴丹学派和达累斯萨拉姆学派。

伊巴丹学派以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大学历史系为核心。1950年代中期,两位尼日利亚历史学家戴克(O. K. Dike)和比奥巴库(S. Biobaku)在非洲历史研究中,以非洲人的视角为研究的出发点,以本国及其周边地区为研究对象,开创了以非洲人为主体的非洲历史研究。在研究的方法上,两位历史学家十分注意收集口头传说,并把它作为史料加以应用。戴克和比奥巴库突破了欧洲史学家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以戴克为例,他的早期著作成为非洲历史研究的分水岭,因为以前"欧洲历史学家站在非洲之外来看待非洲的历史,他们写的或者是在非洲的欧洲人,或者是他们对非洲社会的影响。戴克把研究重点从欧洲人转变为非洲人本身,阐明了西非当地的社会——虽然与欧洲的交

---

① 所谓"含米特说",即非洲文明外来说。认为非洲历史上所出现过的文明,来源于其他大陆具有印欧血统的含米特人。这种说法一度十分盛行。

往已达四个世纪之久,但依然保留了自己的面貌——与欧洲商人之间的影响。他坚持认为,唯一可信的非洲历史是非洲人的历史"。[1]戴克和比奥巴库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而奠定了伊巴丹学派的基础。1955 年,尼日利亚历史学会成立,1956 年,该学会开始编撰发行《尼日利亚历史学会杂志》,这些又为伊巴丹学派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活动舞台。1960 年代中,戴克组织撰写和出版了一套《伊巴丹历史系列丛书》。此外,伊巴丹学派为尼日利亚各级学校编撰了历史教材,影响更加扩大。伊巴丹学派的大量研究成果,反映出它的学术特点和倾向。伊巴丹学派认为:第一,非洲人是非洲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因此非洲历史无疑具有连贯性。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和统治尽管对非洲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非洲人创造历史的活动并没有中断,他们对于殖民统治的反抗和斗争,就是这种活动的表现。第二,研究非洲历史,必须尊重非洲传统的史学。由于非洲的特殊性,口头传说在历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因此,必须批判欧洲人认为撰写历史只能依靠文字材料的传统观点。研究非洲历史,只有既利用文字材料,又发掘口头传说,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伊巴丹学派已经拥有一批世界闻名的专家学者,除戴克和比奥巴库外,还有阿贾伊(J . Ajayi)、阿严德拉(E. A. Ayandele)、阿费格博(A. Afigbo)、塔默诺(I. N. Tamun)和伊凯姆(O. Ikime)等,他们辛勤工作,培养学生,著书立说,已经在世界的非洲历史研究中取得了重大影响和重要地位。[2]

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则随着 1960 年代初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历史系的成立而逐步发展起来,其奠基人是兰杰教授(Terence Ranger)。在 1960 年代,该学派主要以民族主义作为自己的研究重心,力图以民族主义的眼光审视坦桑尼亚的历史,尤其是殖民时期的历史。在当时问世的研究成果(如《坦桑尼亚史》)中,充满了民族主义的色彩。兰格认

---

①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第 176 页。

② 参见李安山:《论伊巴丹历史学派——其形成、发展及批判》,《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 年第 3 期。

为,非洲人民对殖民入侵的反抗产生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它不但促使西方殖民当局做出妥协和让步,而且为日后的民族主义兴起创造了条件。伊利夫(John Iliffe)对于马及马及起义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1970 年代,达累斯萨拉姆学派的研究重心转向寻找非洲落后的历史原因。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沃尔特·罗得尼(Walter Rodney)于 1973 年出版了《欧洲如何使非洲不发达》一书,就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欧洲列强在非洲的活动(包括奴隶贸易、合法贸易与殖民统治)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罗得尼的结论是,欧洲列强在非洲的活动,并没有在非洲创造资本主义,相反,它的长期剥削使非洲陷入了不发达的境地。

从 1970 年代后期开始,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加大了对史学理论的研究和探讨。他们对独立以来的非洲史学进行了反思,批判了民族主义史学和非洲中心论;在此基础上,把研究的视角从少数英雄转到了广大人民群众,从而大大扩展了研究的领域。①

除了上述两个学派外,在东非,奥戈特(Bethwell Ogot)通过对居住在肯尼亚和尼罗河上游的罗族(Luo)的研究,树立了他的"人民史观"。在法语西非,出现了以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和基-泽博(Joseph Ki-Zerbo)为代表的史学家群体。

第三,非洲本土史学家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日益扩大。

非洲本土的历史学家努力发掘和整理各种历史资料,包括考古材料、口头传说等,对非洲历史重新审视,剔除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尽力恢复非洲大陆历史的真实面貌。在此过程中,他们奉献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1960 年代,尼日利亚史学家撰写了《伊巴丹历史丛书》(共计 15 本)和《非洲文化发展史丛书》、加纳学者出版了《勒贡历史丛书》和《非洲人物词典》、肯尼亚著名历史学家奥戈特主编了《扎马尼:东非史概论》,这些都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

① 参见李安山:《论达累斯萨拉姆历史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 年第 4 期。

随着非洲本土学者对非洲历史研究的深入,他们对外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这不但促进了世界对非洲历史的了解,而且也加强了非洲本土学者在国际历史学界的地位。1961 年达喀尔举办了国际赤道非洲学术会议,讨论了非洲史学的现状、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1962 年在阿克拉举行第一届国际非洲学家大会,会议提出,非洲历史应该是非洲人民自己的历史,因此,非洲人民的活动理应成为非洲历史研究的重点。这一观点得到非洲学者的支持,并且成为日后非洲史研究的指导原则。1965 年在达累斯萨拉姆召开了国际非洲史学家大会,强调在非洲历史研究中应该采用新观点、新方法和新材料,尤其是注意发掘非洲丰富的口头传说,充分利用非洲大陆的考古材料。至 1980 年代,非洲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十分活跃,比如,在国际史前史和原始史科学联合会中,非洲的会员占 1/3, 在第三世界论坛的 53 个成员国中,非洲占 22 个。可见,在世界历史研究领域中,非洲学者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非洲大陆在国际社会的崛起,以及非洲学者对非洲历史研究的日趋成熟的形势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编辑出版八卷本的《非洲通史》。1970 年,成立了国际科学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从全世界范围内挑选,共 39 人,而非洲学者占了 2/3,委员会主席也是非洲人——肯尼亚著名历史学家奥戈特。在《非洲通史》编写过程中,非洲学者发挥了核心作用。八卷的主编是清一色的非洲学者,每卷的许多章节也都由非洲人承担。现在这套巨著已经问世(中译本也已经出版)。有人评价说,《非洲通史》体现了非洲人是非洲历史的主人的原则,反映了非洲真实的历史。其出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其一,它打破了非洲历史领域长期来由西方学者独霸天下的局面,第一次由非洲学者领衔主编和撰写的一部大型非洲历史著作;其二,以非洲人的视角,全面、深入剖析非洲历史,最大程度地消除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还非洲历史以原来的真实面貌。从这个角度讲,《非洲通史》的问世,标志着非洲历史研究队伍的成熟,也标志着非洲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三）调整时期

本土非洲史研究的第三时期是 1980 年代至今，可称为调整时期。

进入 1980 年代，非洲大陆遇到了政治和经济危机。在经济领域，长期积累的问题在自然灾害的推动下，引发了经济危机。为了渡过经济危机，大部分非洲国家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计的“结构调整方案”，以西方经济运作模式为蓝本，开始了经济改革。由于非洲国家的国情与西方国家相差甚远，因此效果不佳。1980 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在政治领域，冷战时代的结束，使非洲国家在国际格局中回转空间缩小，而西方的压力难以抵抗。许多国家被迫实行多党制和政治多元化，政局一时陷入动乱。政治经济危机影响了非洲国家的历史研究，在独立之初曾经出现过的学术兴旺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其一，出现了“学术劳工移民”（Academic Labour Migration），由于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的下降，非洲历史学家们除少数在非洲大陆内部流动外，大部分流向西方国家的高校和研究所，而非洲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大多在西方发表和出版；其二，非洲大陆的学术研究出现隔裂化，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学术联系减少。这是因为一些学术组织开始萎缩，加之活动经费不足的缘故。

进入 1990 年代后，非洲大陆逐渐止住了经济滑坡，政局也开始趋于平稳，于是，学术研究的形势也趋于好转。一些学术组织积极开展活动，如非洲发展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The 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Africa, CODESRIA）和东非和南非社会科学研究组织（The Organization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OSSREA），前者创建了一个网站，用于学术交流；后者通过每年的竞赛活动，召开获胜者的学术研讨会，从而把东部和南部非洲的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性别研究）联系起来，此外它还召开社会科学（其中包括史学）的学术研讨会。

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整后，非洲史学工作者总结了过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伊巴丹学派。早在 1970 年代，由于内战的爆发，国内已经有人

开始怀疑尼日利亚是否是一个具有自身历史的统一民族？而伊斯兰正统主义学派(Islamic legitimist school)和新马克思主义学派(Neo-Marxist)的出现,更是对伊巴丹学派提出了挑战,认为他们研究的领域过于狭窄,主要集中在政治史领域,与“整体历史观”存在差异,在利用新的理论方面也不成功。在 1980 年代的军政权时期,学术氛围不断滑坡,大学的经费严重不足,伊巴丹学派再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伊巴丹学派经过反思后,已经做了一些调整,比如开设了一些新课,拓宽了研究的领域。此外,他们也加强了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和交流。

与独立之初相比,今天非洲的史学工作者的队伍比较整齐,除了老一代的专家,还有大量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毕业的研究生;研究领域已经大大扩展,研究成果包括了非洲历史的各个领域,如奴隶制、奴隶贸易、对殖民统治的反抗、性别研究和环境等全球问题。相信非洲的历史研究将重新走上发展之路。

(四)非洲本土的重要史家

非洲历史研究的进步,与非洲本土历史学家的辛勤工作密不可分。下面介绍一些非洲著名的历史学家。

(1)戴克(Kenneth O. Dike,1917—1983)

戴克为尼日利亚历史学家,曾任拉各斯大学副校长、非洲研究所所长、哈佛大学首位非洲历史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非洲历史,尤其是尼日利亚历史。他是伊巴丹学派的领军人物。他也是非洲历史研究领域中的标志性人物,有人形容他为“历史学研究的先锋”,也有人称其为二战结束后的二十年中出现的种种历史学学术进步的带头人之一。

戴克 1917 年出生于尼日利亚中东部的阿瓦克(Awak),1933 年起,先后在本国、黄金海岸、塞拉利昂、苏格兰和英格兰求学,并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拉各斯大学副校长,兼任尼日利亚国家档案馆馆长和英联邦大学联合会主席。尼日利亚内战后,他流亡美国,1971—1973 年任哈佛大学非洲研究委员会主席,1973 年被任命

为哈佛大学首位非洲历史学教授。1978 年回国,担任阿南布拉州立大学校长,1983 年去世,享年 65 岁。

戴克的主要著作有:《尼日尔河三角洲的贸易与政治,1830—1885》(*Trade and Politics in Niger Delta,1830-1885*);《1650—1980 年间尼日利亚东南部的非洲人:论尼日利亚社会经济的形成和转变》(*Aro of South-eastern Nigeria ,1650-1980:A Study of Social Economic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Nigeria*);《英国在尼日利亚的百年统治》(*A Hundred Years of British Rule in Nigeria*);《关于尼日利亚历史资料的保存和管理的报告》(*Report on the Preserv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Historical Records in Nigeria*);《尼日利亚的博物馆运动》(*The Nigerian Museum Movement*);《非洲研究和民族教育问题:戴克论著选集》(*Issues in African Studies and National Education: Selected Works of Kenneth Onwuka Dike*)。

戴克在非洲历史研究中,坚决反对非洲大陆没有历史的观点,反对非洲大陆的历史仅仅是西方人活动的历史的观点。他坚定认为非洲大陆存在悠久的历史,而且历史的主体是非洲人民。因此,他在非洲历史研究中,始终把研究的视角置于非洲人民身上,充分发掘非洲人在非洲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动积极和决定性的作用。此外,在非洲历史研究中,他积极提倡收集和运用非洲本土的历史资料,尤其是口头传说。他早在博士论文中,已经大量收集和运用非洲大陆的口头传说,并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为了广泛收集和保存口头传说,他做了大量工作,创建了尼日利亚国家档案馆,并自任馆长。在他的努力下,伊巴丹大学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的历史研究风格,被称为伊巴丹学派。戴克虽然已经去世,但是他对非洲历史研究的贡献和影响依然存在,作为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开拓人之一,他努力摆脱西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束缚,使非洲历史恢复其真实的面貌,从而使非洲历史研究实现了革命性的飞跃。

(2)阿德·阿贾伊(J. F. A. Ajayi,1929 年生)

阿贾伊是尼日利亚历史学家,曾任拉各斯大学副校长,现为伊巴丹

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 19 世纪的西非历史，著述甚丰。

阿贾伊是伊巴丹学派的代表人物。所谓伊巴丹学派由伊巴丹大学的专家学者组成。伊巴丹大学是尼日利亚第一所、也是多年主导尼日利亚历史研究的高校。伊巴丹学派除编撰了伊巴丹历史丛书外，还为尼日利亚的各级各类学校编写了历史教科书。当然，阿贾伊的最高学术成就还是他主编的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编写的《非洲通史》（第六卷），内容是 1880 年代以前的非洲。

阿贾伊的其他著作还有：《1841—1891 年的尼日利亚基督教使团：新精英的形成》（*Christian Mission in Nigerian 1841-1891*：*The Making of A New Elite*）；《西非史》（*History of West Africa*）；《非洲的传统与变革》（*Tradition and Change in Africa*）；《19 世纪的约鲁巴战争》（*Yoruba Warfare in the Nineteen Century*）；《千年西非史》（*A Thousand Years of West African History*）；《尼日利亚的政治文化演变》（*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Nigeria*）；《非洲历史上的人民和帝国》（*People and Empires in African History*）。

阿贾伊坚决反对欧洲中心论，他认为非洲的历史是由非洲人民自己创造的。例如对于 19 世纪的非洲历史，西方的某些史学家认为，主要是欧洲人的活动推动了当地历史的发展。阿贾伊驳斥了这种观点。他指出，19 世纪的非洲变化，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是 18 世纪业已发生的变化的继续，又在何种程度上是欧洲人日益频繁的活动所引起的？在 19 世纪早期，欧洲人提出"禁止奴隶贸易"，传教士大批进入内陆，以及西方商人不断扩大活动范围，其结果在经济上带来了新的机遇和进一步的挑战。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新兴贸易是 19 世纪以前贸易的继续"，而且，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非洲社会原有的权力结构、内部社会及经济关系网、商路、特别是原有的农业体制作为基础。因此，不应歪曲 19 世纪早期的发展格局，事实上，在 19 世纪初期，由 18 世纪延续下来的各种因素，大陆内部的各种变革因素，都比外来的变革因素更为重要。此外，他对西非主要的文明古国（加纳、马里和桑海）近千

年的历史进行了梳理、论述和评价，对恢复西非历史的真实面貌发挥了积极作用。

(3)基-泽博(J. Ki-Zerbo,1922—2006)

基-泽博曾任瓦加杜古高等教育中心历史学教授，非洲和马达加斯加高等教育理事会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是黑非洲历史，尤其是非洲历史教学法。其主要著作有：《黑非洲史》(*Histoire de L'Afrique noire*)；《黑非洲社会》(*Le Monde africain noir*)；并曾主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一卷)(*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ol. I, *Methodology and African Prehistory*)。

基-泽博认为，在很长时间里，对非洲历史的研究存在许多误区：第一，有些人把非洲各时期的社会看成是不会有历史的社会，各种荒诞的说法和偏见使得整个世界无法了解非洲的真实历史。第二，由于常常把欧洲中世纪作标准，所以在设想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时，只是以欧洲为参照系。第三，有人认为，"白非洲"和"黑非洲"有史以来就处于分裂状态，因此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于是，在古埃及和努比亚文明与撒哈拉以南各民族文明之间，被划上了一道无法逾越的界限。第四，随着贩卖奴隶和殖民化而出现的种族主义，把编史工作的基本概念歪曲了。于是，把非洲各族人民的历史降到了人种史的地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在非洲国家独立后，这种状况得到了改变。除了非洲本土的历史学家"深深感到需要在坚实的基础上重新恢复"非洲历史的真实面貌外，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开始使用非洲的原始资料，以比较严谨、客观和虚心的态度对非洲历史进行研究。基-泽博指出，研究非洲历史，必须重新认真研究编史工作和文化特性这两方面的问题，因为二者是密切相关的。他坚定地表示："我深信，非洲各族人民为赢得独立、巩固独立、进行开发、维护其文化特征所作的努力，应该扎根于对历史的觉悟中，这种觉悟一代接一代的重新焕发，敏锐地被意识到，并且流传下去。"

基-泽博对非洲历史的编纂工作提出了四项原则：第一是跨学科的原则，运用多种学科(如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口头传说、历史学等)

进行综合研究；第二，用非洲人的眼光看待非洲历史，不能用外国的价值观衡量非洲历史；第三，非洲的历史必须是整个非洲大陆的各个民族的历史，应该强调非洲共同的源流；第四，非洲史必须避免叙述过于烦琐，主要应该考虑文明、制度和结构：如耕作和冶金技术，艺术和工艺，商业网，权力的概念和组织，宗教的教义和哲学思想，国家和国家出现以前的问题，现代化技术等等。

（4）阿杜·博亨（A. Adu Boahen，1932—2006）

阿杜·博亨是非洲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曾任加纳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研究领域为非洲历史，尤其是西非殖民史。他 1932 年出生在加纳东部地区，1956 年他从黄金海岸大学毕业，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1959 年获博士学位。1967 年进入加纳大学历史系，1971 年晋升教授。他一生既从事学术研究，也从事政治斗争。1988 年，他发表一系列公开演说，反对罗林斯的军事独裁统治，1992 年在总统大选中，他再次投了罗林斯的反对票。博亨在非洲的学术界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是那些认为他的学术研究过于“浪漫”的人，或者是推崇他的学术思想敢于大胆设想的人，都十分敬重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编写 8 卷本《非洲通史》时，任命博亨担任国际科学委员会主席，并主编第七卷，这是他学术生命中的里程碑。

除了主编《非洲通史》（第七卷）外，阿杜·博亨的主要著作有：《非洲区域史》（*The Horizon History of Africa*）；《19—20 世纪加纳的发展和变化》（*Ghana: Evolution and Change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非洲人如何看待殖民主义》（*African Perspectives on Colonialism*）；《西非历史的主题》（*Topics in West African History*）；《加纳的斯芬克斯：对加纳现代历史的思考》（*The Ghanaian Sphinx, Reflections on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Ghana*）；《英国、撒哈拉和西苏丹》（*Britain, the Sahara, and Western Sudan*）；《姆范齐平和加纳的形成：百年历史 1876—1976》（*Mfantsipim and the Making of Ghana: A Centenary History, 1876—1976*）这本著作于 1997 年获得非洲出版界的 Noma 奖。

阿杜・博亨用毕生时间与殖民地时代西方史学家所遗留下来的错误观点进行斗争。后者认为非洲没有历史,即使有历史,那么也是野蛮和落后的历史。阿杜・博亨在其著作中,用大量第一手资料证明非洲人民一直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创造历史。他告诉他的加纳同胞,历史上充满了英雄的行为,人们应该利用这些历史知识来激励自己,完成生活中的各项伟大事业。

关于非洲殖民史,阿杜・博亨认为1880—1935年之间非洲面临着严重的殖民主义的挑战。在这种形势下,大部分非洲统治者都选择了对抗的战略,他们或者利用外交手段,或者利用军事手段,或者两者兼而用之。他反对西方史学家把某些非洲统治者称为"合作分子",因为所有的非洲人都勇敢面对放弃主权还是保持或者收复主权这个问题。那些把自己的命运同欧洲人连在一起的人有他们自己的目的。他们的行为并不简单等同于勾结。当然,非洲人的对抗都失败了。但是即便进入殖民统治时期,非洲人的反抗依然没有停止。他们使用各种手段和措施来抵抗殖民主义。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非洲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强化起来了。

对于非洲殖民主义的历史分期,阿杜・博亨认为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880—1919年为第一时期,欧洲人完成了对非洲的瓜分及占领,并采取各种行政措施和推广公路、铁路和电报这类基础设施,开发殖民地的资源。1919—1935年为第二时期,非洲人进行抵抗,尤其是成功抗击意大利法西斯军队的埃塞俄比亚,震动了非洲大陆。非洲孕育着新的斗争高潮。

(5)奥戈特(Bethwell A. Ogot,1929—　)[①]

奥戈特,肯尼亚历史学家,曾任肯尼亚历史学会主席、国际纪念路易斯・利基非洲史前史研究所所长、肯尼亚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奥

---

① 参考 Samson, *Topic: Foundation Works in African History: The Works of B. A. Ogot in Kenya History*; M. A. J. Ndeda,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 in Kenya: A Look at the Changing Dispositions of B. A. Ogot's Works since 1963*; 以及 http://www.codesria.org。

戈特主攻非洲历史，尤其是东非历史。他以民族主义的视角审视非洲历史，为消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谬误，重新构建非洲历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他不但在肯尼亚、东非，而且在非洲和国际学术界，都具有较高的学术声誉和地位。2001 年，在休斯敦召开的非洲学学会的年会上，他获得了“杰出非洲学学者奖”。

奥戈特的主要著作有：《肯尼亚：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成》（*Kenya: The Making of a Nation*）；《肯尼亚的非殖民化和独立，1940—1993》（*Decolonization and Independence in Kenya: 1940-93*）；《当代非洲的冲突》（*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Africa*）；《1900 年以前的肯尼亚——对八个地区的研究》（*Kenya Before 1900—Eight Regional Studies*）；《肯尼亚历史词典》（*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Kenya*）；《奥戈特论文选集，1960—1980》（*Reintroducing Man into the African World: Selected Essays 1960-1980*）；《奥戈特论文选集，1981—1998》（*Building on Indigenous: Selected Essays 1981-1998*）；并主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五卷）（*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Vol. V, Africa from Sixte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y*）。

奥戈特是位旗帜鲜明的非洲民族主义者。他坚决反对“非洲无历史”的观点。通过对肯尼亚、东非乃至非洲大陆的历史的研究，他指出，“研究表明非洲社会在长途贸易中已经具有良好的组织状态。毫无疑问，非洲人有宗教、哲学、军事组织、法律体系、医学和技术。非洲具有丰富多彩和意义重大的历史”。

奥戈特深知在非洲历史研究中口头传说的重要性。他深入研究非洲的口头传说，积极收集东非和非洲其他地区的口头传说，并将其运用于非洲历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于口头传说，他加以去伪存真。在研究东非大湖地区时，他指出，“口头传说大都讲述富有传奇色彩的祖先形象，他们被奉为天神、全民之父、或是粮食作物（如香蕉和谷子）和牲畜的传入者。人们把他们的功绩编成故事在人民口中流传，但很难断定它们的历史真实性。”

奥戈特早年研究罗族（Luo），他的研究成果《南部罗族史》（*A His-*

tory of the Southern Luo)向世人揭示了生活在肯尼亚南部的罗族人民生动活泼和丰富多彩的历史。这项成果曾经鼓舞了许多青年学生和学者,他们决心对肯尼亚各族的历史进行重新构建。年轻人的研究终于有了成果,1989 年他们献给奥戈特一件礼物——《肯尼亚现代史》,这是肯尼亚史学家对祖国历史深入研究的成果。

为了积极传播非洲历史,奥戈特经常在世界各地讲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编写《非洲通史》时,聘任他为国际科学委员会主席,并主编第五卷。他高度重视这项工作。他指出,充分了解非洲的过去,非洲人民之间的联系以及非洲同其他大陆的联系,不仅对全世界人民的相互了解是一项重大贡献,而且也是了解全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源泉。

(6)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1923—1986)

迪奥普为塞内加尔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曾经担任达喀尔大学放射性碳研究室主任。他博学多才,在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和文学上都有所建树。但是他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非洲中心论"。其理论对消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影响、重新认识构建非洲历史,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迪奥普的主要著作有:《非洲文明的源泉:神话和事实》(*The African Origin of Civilization: Myth or Reality*);《文明或野蛮:真实的人类学》(*Civilization or Barbarism: An Authentic Anthropology*)《前殖民时期的黑非洲》(*Precolonial Black Africa*);《黑非洲:结成联邦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基础》(*Black Africa: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Basis for a Federated State*);《黑非洲的文化统一:古典时代的父权制和母权制》(*The Cultural Unity of Black Africa: The Domains of Patriarchy and of Matriarchy in Classical Antiquity*);《走向非洲复兴:关于非洲文化和发展的评论,1946—1960》(*Towards the African Renaissance: Essays in Africa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1946-1960*);《古埃及居民与埃及古文字的解读》(*The Peopling of Ancient Egypt & the Deciphering of the Meroitic Script*)。此外,他也参与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的编写。

迪奥普为了反击西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散布的"非洲没有历

史"和"非洲文明是外来"的理论,对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进行研究。1954 年,迪奥普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非洲文明的源泉:神话和事实》(又译为《黑人民族与文化》),书中引用大量历史资料及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如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罗马经典作家关于古埃及人的记述,并通过对古埃及语与非洲黑人语言的比较研究,最终断定古埃及人主要是由黑人组成的;因此,古埃及文明就是黑人文明。古埃及的黑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典文明,无论在人文社会科学(文字、哲学、宗教、艺术)还是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历法、农业、医学)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自豪地宣布:非洲是有历史的！非洲的文明是由黑人自己创造的！迪奥普的观点有力批驳了西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理论对黑人能力的蔑视及对非洲历史的歪曲。确认了非洲具有自己的历史和古埃及文明是黑人创造的,迪奥普又进一步考证了古埃及与黑非洲在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亲缘关系,他进一步推断尼罗河文明是"黑人文明"。由于尼罗河文明对希腊文明和世界文明的作用,由此不难看出黑人文明与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的关系。

迪奥普的"非洲中心论"对于长期流行的"欧洲中心论"无疑是巨大的挑战和打击。学术界对此的争论仍在继续。支持者有之,认为在作为西方文明之源的希腊文明的形成期间,非洲文明是其重要源头;反对者同样有之,认为迪奥普的观点过于偏激。但是,客观评价迪奥普的"非洲中心论"时,应该承认他的理论有效消除了西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对非洲及其黑人居民的污蔑和藐视,有力提升了黑人种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积极推动了重新认识和构建非洲历史的进程。

(7)兰杰(T. Ranger,1929—　)

兰杰,著名的非洲历史学家,达累斯萨拉姆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长期从事非洲历史、尤其是津巴布韦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兰杰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57 年他去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大学任讲师,讲授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历史。因参加争取人权的斗争,1963 年被罗得西亚当局驱逐出境。之后,他先后去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和

牛津大学工作。从牛津大学退休后,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重返津巴布韦大学。他撰写和编辑的著作达 20 余种,发表论文 200 余篇。主要包括:《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合编);《关于中部非洲的历史》(*Aspects of Central African History*);《非洲后殖民时代的同一性》(*Postcolonial Identities in Africa*);《传染病与思想:对瘟疫的历史理解的文集》(*Epidemics and Ideas: Essays on the Historical Perception of Pestilence*);《非洲的福音主义基督教与民主》(*Evangelical Christianity and Democracy in Africa*);《津巴布韦解放战争时期的社会》(*Society in Zimbabwe's Liberation War*);《津巴布韦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士》(*Soldiers in Zimbabwe's Liberation War*)。

兰杰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西方殖民主义入侵和统治时期的抵抗运动、社会的宗教变化、大众文化和农民史等。在众多研究领域中,近年来他对传统与现代的研究更加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他在《传统的发明》一书中指出,许多我们认为起源于古代的传统,事实上在长达数世纪的时间里也不会去使用它们。然而在近年来,我们发现许多对传统的"发明"利用。比如,创立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民族文化"、搞清 19 世纪和 20 世纪英国皇家礼仪的细节、了解英属印度和非洲的帝国礼仪的起源等。其实,无论作为人类行为和想象的产物,还是作为自然力量的结果,传统都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发明的,它们对人类的政治历史曾经提供了有价值的贡献。然而现在对传统的发明和利用,却通常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激进运动的目的是发展他们自己的反传统。由于历史与现状的互动十分复杂,因此,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狂热沉湎于对礼仪的研究,则会给理解历史又提出新的问题。

兰杰对非洲史学的编纂问题十分关注,因为不正确的编纂理念将影响历史研究。他以南非和津巴布韦为例:在南非,历史编纂遇到两难境况,一方面历史学家不断在南非的层面上发明、想象和制造历史,另一方面,大学的历史系学生不断减少,社会上阅读历史著作的读者数量下降。在这种形势上,南非历史学家把发掘历史传统和历史遗产与国际旅游业挂钩。于是,酋长和国王成为"非洲传统复兴的象征",而罗

得岛和曼德拉则成为历史传统的内容。在津巴布韦又是另一种景象。大学中历史系学生数量充足,政府支持在每一个学校开展历史教学,而历史著作也拥有众多读者。然而,津巴布韦的问题是,国家坚持"解放和爱国的历史",要求每个学校开设上述历史,政府在电视台提供大量这类节目。于是,历史被缩小到了"解放和爱国的历史"。[①]

兰杰现仍活跃在非洲历史研究的舞台上,他现在担任英国津巴布韦学会主席,《南非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 Studies*)主编和《过去与当下》(*Past and Present*)副主编。

二、世界的关注

非洲大批国家的独立,以及非洲大陆在世界的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西方的一些大国和前苏联开始把研究的目光转向非洲。1967年,第一个热带非洲国家独立才10年,欧洲和美洲的40所大学就相继开设了非洲历史课程。奥立弗当时指出,仅就非洲历史以及考古学等相关学科而言,"如果我们算上仍在学校学习的人员。目前全世界可能有近千人积极从事于开辟这种专业知识的若干新领域"。[②] 一般而言,欧美国家的研究都以非洲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即综合研究非洲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因而又称之为"非洲学"。在西方国家,往往建立"非洲研究中心",从而把各个领域的非洲问题专家聚集在一起,对非洲进行系统和综合的研究。所以,历史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根据实际情况,下面的介绍也以非洲学的研究为背景,尽量突出历史学的研究。

---

① T. Ranger, *Historiography, Patriotic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Nation: The Struggle over the Past in Zimbabwe*. 参考 http://casl. elis. rug. ac. be/avrug/rander. htm。

② 戴维逊:《现代非洲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329 页。

(一)法国的非洲研究[①]

历史上,法国曾经是非洲殖民地(北非、西非和赤道非洲)的宗主国,因此与非洲的关系比较密切。但是在非洲国家独立前,法国的非洲研究主要服从于殖民统治的需要,研究领域局限于语言学、地理学和社会人类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日益高涨,迫使法国政府必须直面如何处理殖民地的棘手问题。同样,非洲殖民地也引起了法国政界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并引发了对非洲问题的全面研究。1946 年,法国建立了"海外科学技术研究局",开展对中部非洲和马达加斯加的研究;1958 年又成立"北非研究中心"和"黑非洲研究中心",加强了对非洲的全面研究。至 1980 年代,法国的同类研究机构已经达到 187 家,成为世界上同类研究机构最多的国家。此外,为了培养研究人才,法国在巴黎和马赛等地的大学里开设了非洲人种学、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和语言学等课程。

法国对非洲学的研究有以下特点:第一,政府十分重视。绝大多数的研究机构都能得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的支持和帮助(包括研究工作和研究经费),因此,法国研究机构的工作条件较好,有丰富的资料和藏书,研究人员每年可以赴非洲考察一两次;第二,法国的研究机构与国内外同类机构保持了良好的联系和交流,便于互通情报和合作研究。与之保持联系的研究机构既有法语非洲国家的研究机构,又有英美国家的研究机构,比如英国伦敦大学的"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非洲研究中心"等。

法国著名的研究非洲机构有非洲世界研究中心(由巴黎一大、普罗旺斯大学和法国国立政治学高等研究院组成,以研究非洲历史为主),非洲研究中心(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附属机构,研究重心为黑非洲的社会、历史、地理和人类学,此外还担负收集和研究资料的

① 参见康昭:《法国对非洲的研究》,《西亚非洲》1982 年第 5 期;潘华琼:《近期法国的非洲研究综述》,《西亚非洲》2007 年第 7 期。

任务。中心出版的刊物有:《非洲研究手册》、《非洲资料》、《非洲论文和报告汇编》等)、巴黎第七大学的"黑非洲小组"(研究范围是非洲经济史和社会民族运动史。曾经出版《非洲历史》和《非洲和1930年的危机》等专著),以及印度洋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对象除印度洋上各岛国外,还涉及东非和西非的沿海国家,诸如南非、莫桑比克、索马里、坦桑尼亚、肯尼亚、吉布提等)。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机构,如波尔多政治学院的"黑非洲研究中心"以及艾克斯—恩—普罗旺斯的"海外(殖民地)档案中心"等。

经过三代学者的努力,法国对非洲史的研究取得许多进展。在非洲城市化和妇女问题研究领域,尤其如此。但是,由于法国学者忽视口头传说,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明显落后于英国和美国。

(二)英国的非洲研究[①]

英国曾经是非洲最大的宗主国。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属非洲殖民地纷纷独立,英国建立相关机构,并加快了对非洲问题(包括非洲历史)的研究。

在英国的非洲史研究中,不得不提及非洲历史学的三位开创者和奠基人:奥利弗(R. Oliver)、费奇(J. Fage)和戴维逊(B. Davidson)。1950年代,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奥利弗和费奇分别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和加纳大学开设了非洲历史课程;不久,两人又共同主编《非洲历史杂志》(*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和《剑桥非洲史》(*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1960年代,两人再次共同出任英国非洲研究协会主席。与此同时,戴维逊经过长期研究,并结合非洲最新的考古成就,撰写出版了《古老非洲的再发现》等力作,他们的工作不仅推动了英国对非洲历史的研究,而且在世界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英国政府的政策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内学术界对非洲的研究。1961

---

① 阿伊津什塔特:《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对非洲问题的研究情况》,《西亚非洲》1980年第1期。

年英国“大学拨款委员会”发表了《海特报告》(海特为该委员会主席),强调了重视和发展对非洲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报告特别提倡在研究中使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即多学科的联合研究。英国政府采纳了《海特报告》。[①] 为此,由政府拨款,支持一些大学成立非洲研究中心。著名的研究中心有剑桥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爱丁堡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伯明翰大学西非研究中心、约克大学南部非洲研究中心等。一些不设立研究中心的大学,诸如牛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和利物浦大学,也开设非洲历史等相关课程,提供丰富的图书资料,使师生拥有较好的学习和科研环境。

英国对非洲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形成了一支有一定规模的研究队伍;其二,研究的方法更多的是采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从不同学科的视角探索同一问题,从而得出更加全面的研究结果;其三,注重微观研究,借此来说明复杂的社会变革;其四,研究中逐步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注意把非洲人民作为非洲历史的主体加以研究。

在介绍英国对非洲的研究时,我们不得不提及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因为该学院不仅是英国国内最大和最有影响的非洲学研究中心,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有地位和影响的研究机构。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正式建立于1917年,英国国王乔治五世是该学院的董事长,当时主要为英国在亚非的殖民统治提供服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体系的崩毁及大批亚非民族国家的独立,使学院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开始更多转向学术研究。学院的历史系成立于1932年,当时主要研究东方国家,自1950年代末起,非洲历史日益引起重视。原来的非洲历史课程是不连贯的,至1970年代,这种情况得到改变。非洲史专业的学生在入学头二年需修习《公元365—1600年的非洲史》、《1600—1900年的非洲史》、《20世纪的非洲史》等课程;第三年修习《基督教在非洲》、《撒哈拉以南非洲

① 《海特报告》的出台背景是:大批非洲国家独立,英国政府急于了解非洲的变化,以制定相应政策。

的伊斯兰教历史》,此外还有专题课程:《非洲领袖和罗得西亚当局》、《塞内加尔人:1854—1900 年的法国边境政策和非洲反动势力》。值得一提的是,该学院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有关非洲和非洲历史的杂志《非洲历史杂志》。该杂志于 1960 年创刊,内容分为两部分:学术论文和书刊评论,主要刊登关于非洲史的研究文章和非洲大陆的考古报告,大事记主要记载有关近现代史的重大事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除了《非洲历史杂志》,该学院还编辑出版《非洲法律杂志》、《非洲语言杂志》、《现代亚非研究》等。

英国的皇家非洲学会(Royal African Society)也是一个重要的机构。该学会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是英国建立最早的研究非洲的组织。通过出版《非洲事务》(*African Affairs*)和组织会议、讨论和其他活动,学会加强与非洲的联系。学会现有会员一千多名,在布里斯托尔和苏格兰设有分支机构,并与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爱丁堡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等保持密切的联系。《非洲事务》于 1901 年发行,是英国研究非洲的重要刊物,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每年发表文章约 30 余篇,内容涉及非洲学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社会、历史和环境等,并对近期出版的非洲学著作进行评价。

1970 年代末,英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用于非洲研究的预算大幅下降,这一度使人们对于研究发展的领头羊产生了担忧。但是,实际的情况要好得多。据统计,截至 1980 年代,英国的半数高校都教授非洲历史课程,而且有越来越多的本科生对非洲历史表现出浓厚兴趣。此外,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批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因此,英国的非洲研究继续在大踏步前进。

下面介绍几位英国非洲历史研究的开拓者。

(1)巴兹尔·戴维逊(Basil Davidson,1914—2010)

戴维逊是世界著名的非洲历史学家。1931 年任英国《经济学家》驻巴黎记者。二战爆发后,积极投入反法西斯的斗争。以后从事非洲历史的研究。由于成绩卓著,多次获奖(如海尔·塞拉西皇帝授予的金奖等);并先后获得英国开放大学和爱丁堡大学授予的荣誉学位。

他的主要著作有:《让自由到来:非洲近代史》(*Let Freedom Come: Africa in Modern History*);《黑人的负担:非洲与民族国家的磨难》(*The Black Man's Burden: Africa and the Curse of the Nation-State*);《非洲史》(*A History of Africa*);《非洲失落的城市》(*Lost Cities of Africa*);《非洲王国》(*African Kingdoms*);《再观非洲文明:古代至现代》(*African Civilization Revisited: From Antiquity to Modern Times*);《古老非洲的再发现》(*Old Africa Rediscovered*);《黑母亲》(*Black Mother*);《非洲人》(*The Africans*);《几内亚的解放》(*The Liberation of Guine*);《风暴中心的安哥拉人民》(*In The Eye of the Storm: Angola's People*);《现代非洲史》(*Africa in Modern History*)。其中,《古老非洲的再发现》、《黑母亲》和《现代非洲史》已经被翻译成中文。

戴维逊对非洲历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以全新的观点和方法研究非洲历史,并得出新的结论。他以大量的原始资料和考古证据,批驳了西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对非洲历史的偏见和蔑视,并改变了非洲文明是"落后"和"粗糙"的说法,得出了非洲文明,无论是就其文化还是技术而言,都相当精湛的结论。他指出:"过去许多人认为尼格罗人是一种没有历史的人。从这种观点出发,黑非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是一块人类从未依赖自己的努力把自己从野蛮的水平提高了多少的大陆。""现在,随着知识的增长,这种对于非洲人成就的看法,……看来并不见得比早期那种认为尼日尔河是流向西方的看法建筑在更可靠的基础上。地理上的发现已经证明尼日尔河实际上是向东流的。现在,历史学的发现证明非洲社会和文明发展的实际情况正和这种'几世纪长期停滞'的陈词滥调相反。世界上对于非洲过去的看法正在改变着。"在《古老非洲的再发现》等著作中,他以大量的资料列举了非洲各地的古代文明,向世人展示了非洲古代文明的光辉灿烂。

戴维逊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包括古代非洲的社会形态、殖民入侵、殖民统治及其对非洲传统社会的、经济、文化、宗教的影响,非洲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非洲民族国家的诞生、发展和前景等。值得指出的是,他在研究中更多站在非洲人的立场上,客观地提出和剖析问题。

他的研究推动了非洲历史的健康发展，他本人也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尊敬。

（2）费奇（J. D. Fage，1921—2002）

费奇曾任伯明翰大学的代理副校长兼西非研究中心主任。他的主要代表作有：《非洲史》（*A History of Africa*）；《非洲发现她的过去》（*Africa Discovery Her Past*）；《非洲历史地图集》（*An Atlas of Africa History*）；《对加纳的历史解读》（*Ghana：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西非史导读》（*A History of West African History：An Introduction Survey*）；《非洲史前史论文集》（*Papers in African Prehistory*）；《非洲社会和大西洋奴隶贸易》（*African Societies and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主编《剑桥非洲史》第二卷（*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Vol. 2）。

费奇在西方的非洲史研究中是最早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少数几位学者之一。1949 年他在加纳大学教授历史时，“很快看出当时进入这所非洲大学的学生，一般对英国和西欧历史的知识比对非洲历史的知识多得多。我终于感到有必要设法做一些事来帮助纠正这种不合理的畸轻畸重的状况。”他认为非洲的文明是非洲人自己创造的，他对“含米特假设”提出了批评。他指出，“含米特假设”是西方人形成的一种解释非洲历史的总方案，“它假定非洲的‘含米特族’是近乎欧洲人的白人，他们以及他们的文化生来就比尼格罗人的文化优越，因此凡是一个尼格罗民族取得显著进步的地方，就必须从‘含米特’影响或渗透中寻找解释”。费奇对西非历史尤其有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殖民统治时期给西非带来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更大、更激烈的变化。非洲人民在拒绝殖民地地位和殖民统治背后的主导思想之一，是殖民主义征服和殖民主义政策在本质上阻止了非洲历史的前进。此外，费奇还对加纳历史、非洲史前史和奴隶贸易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3）奥立弗（R. Oliver，1923—　）

奥立弗尤其长于东非历史研究。他为反对非洲历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恢复非洲历史的真实面貌，为培养新一代的非洲历史研究人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8 年被任命为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的非洲历史讲师之后,奥立弗致力于非洲历史研究和教学。他数次进入非洲,并跨越赤道非洲,在乌干达等国收集了大量第一手历史资料,其中许多是口头传说。1953 年,他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举办了第一次有关非洲历史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此外,他还创办了《非洲历史杂志》,推动了全球范围内非洲历史的研究,至今,它仍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非洲历史类的学术刊物。他培养了许多学生,至 1986 年退休时,累计指导了 42 篇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历史方面(包括各个领域)的论文,其中关于东非地区的更为集中。值得指出的是,其中 1/4 的论文是通过收集当地的第一手口头传说而写成。由于他的严格要求,论文质量很高,已经有 26 篇被正式出版。他培养的学生中,许多人成为非洲和美国大学的非洲历史的教学和科研骨干,有些人,如阿杜·博亨,已经成为国际著名学者。

奥立弗论著甚丰,择其要者列举如下:《1800 年以来的非洲》(*Africa since 1800*);《非洲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Africa*);《传教士在东非的作用》(*The Missionary Factor in East Africa*);《哈里·约翰斯顿爵士与非洲的争夺》(*Sir Harry Johnston and the Scramble for Africa*);《东非史》(*History of East Africa*);主编《剑桥非洲史》第三卷(*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3)。

奥立弗与费奇和巴兹尔·戴维逊齐名,他们都为批判非洲历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恢复非洲历史的原来面貌,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奥立弗 65 岁生日时,《非洲历史杂志》对他的工作做了总结,其中写道:1948 年奥立弗刚到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时,“非洲大陆的历史——除了欧洲人的扩张部分外——都受到忽视,但是,这种状况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1948 年,一个学生撰写非洲史论文,他很容易读完关于该课题的二手资料。到了今天,关于非洲历史的论文和著作浩如烟海,以致学生们必须竭尽全力阅读。”非洲历史教学和研究状况的根本改变,与奥立弗的努力有密切关系,他确实功不可没。

（三）美国的非洲研究[①]

“二战”前，美国对非洲历史表现出既忽视又无知的状态。但自1960年代起，美国也出现了研究非洲的高潮。在1965—1975年的十年里，非洲历史研究成为美国大学发展最迅速的学科。据统计，1950年代中期，美国全国的非洲历史学家不足10人，1960年为30人，1966年突破100人，1970年为350人，1970年代末达到600人。这个数字占当时全世界同类人数的1/2。美国非洲学研究人才一方面依靠国内培养，另一方面也大力从国外引进，据统计，美国的非洲史学科的教授中，80%是欧洲和非洲人。由此可见，美国国内研究非洲历史的专家队伍不但非常雄厚，而且呈现出国际化的特点。

在美国，并没有建立大型的研究机构，研究工作一般分散在各州和各个大学进行。成立非洲研究中心的著名大学有：宾夕法尼亚大学、伊利诺斯大学、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西北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印地安纳大学、伊利诺斯大学、耶鲁大学、波士顿大学等。这些大学的研究条件十分优越，不但具有丰富的图书资料，而且有充沛的研究资金和完善的设备。以西北大学为例，该校的非洲研究图书馆具有西文和非洲文字的藏书达十万多册、各类期刊二千五百种，还有大量档案资料、报纸和政府文件（如非洲政府出版物、统计资料、发展计划、立法机构讨论记录等），此外，该图书馆收集了该校历届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以及其他大学出版的有关非洲学的博士论文。

美国对非洲史的研究，最初是从研究欧洲人在非洲的活动开始的。从本质上讲，这样的研究并没有把非洲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因为它还是属于欧洲史的范畴。但是这种状况很快发生了变化，耶鲁大学的哈里·鲁丁（H. R. Rudin）教授及其学生们首开先河，开始改变研究

---

① 〔法〕何勒·贝利西埃：《美国对非洲的研究》，见《西亚非洲》1980年第5期、1981年第1期；P. 柯廷：《美国的非洲史研究概况》，见《世界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3期，第8页；辰中：《美国西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介绍》，见《西亚非洲》1984年第4期；张象：《美国非洲史研究的新动向》，《世界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5期。

视角,他们把殖民史作为非洲史的组成部分加以研究,并产生了一批成果。随着对非洲历史研究的展开,美国一些研究人员从非洲人的立场考察殖民主义,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则从开始专门研究西方殖民入侵和统治时期非洲人民的抵抗和起义。于是,美国真正意义上的非洲史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1980 年代以来,美国的非洲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第一,不断拓宽研究视野,把非洲史研究同世界史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出现了一批类似《安哥拉与世界》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与非洲》这样的研究成果。第二,积极开展非洲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对于妇女问题和非洲文化艺术等领域的研究取得许多进展。第三,通过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进行新的研究。

在非洲历史研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历史学家在建立和发展口述史学方面的贡献。范西纳(J. Vansina)在 1965 年发表了《口述传统:史学方法论研究》,从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上论述了口述传统、口述史料在非洲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为了推动口述史学的发展,1960 年代中,美国非洲研究学会在印第安纳大学的帮助下,成立了"非洲口述资料中心",专门收集和保管这类资料,供研究者使用。用口述资料研究非洲历史,使美国对非洲的研究更加深入,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美国的一些大学注意培养包括非洲历史领域在内的非洲学的专门人才。学校除了开设有关非洲学的课程外,尤其重视学生对非洲通用语言(英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南非公用荷兰语)和非洲当地语言(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豪萨语和阿姆哈特语等)的学习。

美国对非洲史的研究,基本上覆盖了整个非洲。任何一个非洲国家,都有专人研究,而且有相应的研究成果。美国国内还有一些在世界上有影响的杂志,如《非洲历史研究》、《非洲报道》和《非洲史:方法论杂志》等。

美国的非洲史专家在非洲史研究领域颇有学术建树,比如柯廷在

奴隶贸易的研究领域、范西纳在口述历史、格林伯格(J. H. Greenberg)在人类学和语言学、克拉克(J. D. Clarke)在非洲史前史等,他们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在全球的非洲史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下面重点介绍两位著名的美国非洲历史学家。

(1) 柯廷(P. D. Curtin,1922—)

柯廷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非洲的奴隶贸易史。其主要著作有:《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人口统计》(*The Atlantic Slave Trade:A Census*);《前殖民时代非洲的经济变化:奴隶贸易时期的塞内冈比亚》(*Economic Change in Pre-Colonial Africa: Senegambia in the Era of the Slave Trade*);《非洲和西方: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反应》(*Africa and West: Intellectual Response to European Culture*);《远古至独立的非洲史》(*African History: from Earliest Time to Independence*);《比绳索更长的时间:南非黑人为自由而斗争的历史》(*Time Longer than Rope:A History of the Black Man's Struggle for Freedom in South Africa*)。

柯廷在奴隶贸易史的研究上颇有创见。400 年的奴隶贸易究竟使非洲丧失了多少人口? 由于缺乏全面和可以信赖的统计数字,因此争论不断。1969 年,柯廷教授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数量做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和统计,并出版了《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人口统计》一书,书中的结论是 9566100 人。他认为这个数字的误差区间为 -9.8% 至 +10.3%,即大西洋奴隶贸易总量在 800 万至 1050 万人之间。这个数字尽管有人提出批评,但是为奴隶贸易的规模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基础。

关于奴隶贸易的影响,他指出,由于大批黑人的抵达,非洲对美洲社会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例如,在外表性状、语言、音乐、宗教、饮食、艺术、农业和建筑等诸多领域都有影响。在有些方面,非洲的影响很强,也很普遍,由此形成的美洲黑人文化足以与欧洲文化抗衡,有时竟相互补充。

对于非洲史学,柯廷认为必须抛弃欧洲中心论,因为这是非洲的殖民阶段遗留下的一份有待纠正的知识遗产。他对非洲历史研究中的种

族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做了批判。

（2）范西纳（J. Vansina，1929— ）

范西纳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教授。他在非洲历史研究，尤其在口述史学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主要的代表作有：《口头传说：关于历史学方法论的研究》（*Oral Tradition*：*A Study in Historical Methodology*）；《作为历史的口头传说》（*Oral Tradition as History*）；《口头传说》（*Oral Tradition*）；《与非洲同生活》（*Living with Africa*）；《现代卢旺达的祖先》（*Antecedents to Modern Rwanda*）；《热带雨林中的小路：赤道非洲政治传统史》（*Paths in the Rain Forests*：*Towards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radition in Equatorial Africa*）；《非洲艺术史：方法论》（*Art History in Africa*：*An Introduction to Method*）；《社会如何诞生》（*How Societies Are Born*）。

由于非洲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口头传说在非洲历史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60 年代，范西纳撰写的《口述传统：史学方法论研究》一书出版。他在书中对如何利用口头传说并把它作为原始资料，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特别在方法论上做了系统的归纳。此书问世后，影响很大。此后，对于口头传说的研究和利用，日益普及。范西纳认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口头文化，即使在西非（16 世纪就有文字），也是如此。因为只有很少数人会写字，而且文字对于一个社会所关注的大事常常是没有多大作用的。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口头传说是一代人用口头方法传给下一代人的口证。因此它完全可以作为历史资料来加以利用。实践经验证明，口头传说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们说明了一种文化范围内的历史变化。这一点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是正确的，所以即使在殖民时代，它的文字资料十分丰富，但是历史学家们还是不断求助于目击者的叙述，或者求助于传说，以弥补文字材料的不足。当然，在口头传说中也难免掺杂一些夸大或者失真的内容，因此历史学家必须在分析口头传说时，要进行去伪存真的工作。范西纳指出，口头传说已经被证明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每个历史学家目前需要做的是完善技术，以便使这个材料源泉能够奉献出蕴藏着的全部财富。

（四）前苏联和俄罗斯的非洲研究

1945 年，苏联非洲学奠基人奥尔德罗格（D. A. Olderogge）教授在列宁格勒大学创建了非洲语言教研室和非洲学教研室，专门从事非洲历史、文化、民族和语言的讲授和研究，由此开创了前苏联对包括非洲历史在内的非洲学的研究工作。1946 年，苏联科学院人种学研究所也成立了非洲研究室，不久出版了由奥尔德罗格和波铁辛共同主编的《非洲各族人民》。随着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1950 年代苏联加强了对非洲的研究。1959 年，成立了非洲研究所，直到 1973 年，该所已经出版专著 400 余种，平均每年 30 余种。进入 1960 年代，苏联和独立的非洲国家的关系日益密切，对非洲的研究进一步强化。为此，非洲研究所扩大编制，补充研究人员。至 1980 年代，全苏联的非洲学研究人员已经达到上千人的规模，出版的专业杂志有《亚非人民》、《今日亚非》和《苏联对非洲的研究》（年鉴）等。

苏联研究人员在非洲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率先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剖析非洲历史，清除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影响，从而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其研究成果在世界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比如非洲研究所组织编写《非洲史 1800—1918》和《非洲史 1918—1967》，就曾被译成多国文字。

非洲研究所从 70 年代中期的鼎盛时期后开始逐渐走下坡路，这与苏联在非洲政策的失败以及最终撤出非洲紧密相联。冷战结束后，该所的研究范围扩大，在传统强项黑非洲问题的研究之外，还开始研究中东北非地区。苏联解体后，非洲研究所在 1998 年进行了学科调整，现共有 10 个研究中心、1 个宏观问题研究室，研究人员 139 名，其中 4 人为科学院通讯院士，21 名科学博士，66 名副博士。和冷战时期相比，由于俄罗斯已从苏联时期的超级大国沦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其在西亚非洲地区的战略利益和卷入规模已大为缩小，这客观上使得非洲研究所（事实上俄科学院其他研究所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受到一定程度的冷落，处境艰难。和鼎盛时期的规模相比，不仅研究人员在数量上大大

减少,而且研究队伍严重老化,青黄不接。60 岁以上的研究人员占一半以上(俄科学院没有严格的退休制度),40 岁以下的几乎没有。微薄的薪水(一般研究人员每月工资不足 100 美元)不仅难以吸引优秀的年轻人加盟,甚至在职的科研人员为了生存,也不得不兼搞其他职业。科研经费也严重不足,研究所被迫采取向私营企业出租房屋的办法筹措经费。

尽管和过去的辉煌相比,现实的困难使人无奈,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非洲研究的停滞。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逐步复兴,俄罗斯对非洲的研究有所加强,非洲研究所确立了"非洲社会的演变及俄非关系的新阶段"作为基本的长期性的课题,也陆续出版了有关的著作、论文。[①]

(五)日本的非洲研究

京都大学的"非洲地区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African Area Studies)是日本国内唯一从事非洲学研究的学术研究机构。京都大学的非洲研究早在 1958 年向非洲派出第一支科研小组就正式开始了。随着研究工作的逐步开展和扩大,1986 年成立中心。中心有两个基本研究部门,一为干旱地区研究(Dry zone studies),二为潮湿地区研究(Humid zone studies)。为国外访问学者专门设立了历史与哲学研究部。1988 年,中心又申请成立生计研究部,此外还有数据处理和资料库。中心最初研究社会生态学,主要通过对古猿和猎人—采集者的考古研究,探索人类演进的历史。现在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包括使用交叉学科研究当代非洲问题,如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多部族社会的社会—文化整合等。中心定期出版《非洲研究文集》(*African Studies Monographs*)。每月组织一次研讨会,每年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这些活动都对公众开放。

---

① 参见贺文萍:《俄罗斯的西亚非洲研究现状》。

(六)比利时的非洲研究

比利时的利勃尔大学对非洲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该研究中心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历史、地理、政治、法律、教育、经济、人口、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对非洲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比利时对其殖民地(比属刚果)所实施的经济政策和社会影响;也有学者研究非洲的史前文明。

(七)荷兰的非洲研究

位于莱顿(Leiden)的非洲研究中心是荷兰国内唯一专门从事非洲研究的学术研究机构。中心虽然在莱顿大学校内,但它是一个独立的科研机构,其宗旨是更好地理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历史和现状,更好地了解非洲社会的未来发展。中心的主要功能是:第一,促进和承担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科学研究,尤其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第二,发挥非洲研究领域中国家中心的作用,积极推动这个领域的研究和教育;第三,在更广泛的公众领域中,促进对非洲社会的了解和有关非洲的知识的传播。中心目前共有22名研究人员,分为三个研究小组:非洲的经济及生态、非洲的政治和文化、实地调查非洲的变化。各个小组任期五年,以适应形势的变化。

三、中国学者的非洲历史研究

(一)研究史简述

中非关系源远流长。早在汉朝时期,中国与非洲已经发生了间接的往来。因此,中国对于非洲的报道在中国古籍中时有发现。唐人杜环在8世纪所作的《经行记》是中国关于黑非洲的最早文字记载;一个世纪后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再次提及非洲。宋代介绍非洲的著作有赵适汝的《诸蕃志》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这二部著作比较详细地介

绍了埃及、马达加斯加和东非沿海产生的物产、风土人情、地理和宗教等情况。元代时中国对非洲已经不那么陌生了。元代地理学家朱思本在其绘制的地图上,已标明了非洲。此外刘郁的《西使记》和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也对非洲有所介绍。明代的中非关系进入一个高潮,郑和下西洋正是这个高潮的标志。郑和代表明朝多次访问北非和东非的一些国家,而一些非洲国家的代表也访问了中国。跟随郑和下西洋的费信撰写了《星槎胜览》,对非洲的一些国家进行了介绍。

16 世纪后,中国赴非洲的学者、官员、商人有所增加,他们回国后将所见所闻笔录成书,其中有:18 世纪初樊守义的《身见录》,记录了路经好望角的见闻;18 世纪末谢清高的《海录》介绍了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索法拉、好望角的情况;中国伊斯兰学者马德新于 19 世纪中叶赴麦加朝圣,考察了埃及,回国后撰写《朝圣途记》;1850 年代,郭连城随意大利传教士去欧洲,途径埃及,写了《西游笔略》。

在中国古籍中,值得一提的是丁廉撰写的《三洲游记》。丁廉 1877 年深入东非内陆考察,途经今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历时 20 个月。他在考察途中每日把所见所闻以日记形式记录下来。回国后,撰写了本书。此书资料丰富,提供了东非在被西方瓜分前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如果说之前的中国古籍资料还仅仅介绍北非和东非沿海地区,那么,《三洲游记》首次下向国人介绍了非洲内陆,因此,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鸦片战争后,一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为了救国,积极寻求国外的强国经验。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比较全面介绍了非洲各国的情况,并且对于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对外开放和改革,给予高度评价。

进入民国时期(1911—1949),中国与非洲的官方关系有所发展,中国同阿尔及利亚、毛里求斯和马达加斯加建立了领事关系,与埃及建立了公使级外交关系。此后,一些中国学生赴非留学,他们为中非的文化交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从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与非洲的交往虽然长达两千多年,但是双方在交流的时间上缺乏连续性,在空间上,主要集中在北非

地区,因此彼此的了解还不够广泛与深入。可以这样说,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商人、官员和学者只是对非洲做了一些介绍,至于对于非洲的研究,尚没有出现。据统计,1897—1949 年间,国内仅仅出版有关非洲史的著作 8 部,几乎全是译作,而且集中在埃及史。可见,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主要停留在介绍非洲的层面上。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在大批非洲国家独立后,中国和非洲国家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由于双方在历史上就存在传统的友谊,再加上自近代以来相似的遭遇和相似的奋斗目标,中非关系在传统友谊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彼此有了进一步了解和合作的愿望。新中国成立后,有意识地介绍非洲大陆和当时蓬勃开展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非洲,系统研究非洲历史。1958 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成立了杨人楩教授领导的非洲史教研室,开始了非洲史研究和教学的开拓性探索。同一时期,国内其他大学也出台了类似的措施。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学者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去观察、分析和诠释非洲历史,注意克服欧洲中心论,批判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理论,因此得出了与西方殖民主义者不同的观点。中国学者认为,非洲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是非洲人民自己创造的,是世界历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导和推动了中国学者对非洲历史的研究,在中国,非洲历史恢复其原有的面貌,并作为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而出现在历史教材、报刊和其他书籍上。应该说,这是我国历史研究中的重大进步。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纳忠撰写的《埃及近现代史》(1963)和张铁生先生的《中非交通史初探》(1965)。

十分遗憾的是,中国刚刚兴起的非洲史研究被"文革"打断。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中国的非洲史研究不进反退,而恰恰在这段时间里,国外的非洲史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于是,中国在非洲史研究领域,与国外的差距明显拉大。在"文革"期间,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出于政治需要,1970 年代初期,翻译和出版了一批国外的非洲史著作,主要是国别史和地区史,共计 60 余本。应该说,这批著作中绝大部分是代表当时学术水平的名著。因此,这批译著的出版,对普及非洲历史

知识、了解国外非洲史研究动态以及日后推动我国的非洲史研究，起了一定的作用。

"文革"结束后，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非洲史研究迎来了繁荣时期，学术研究空前活跃，学术成果不断涌现。

第一，成立了全国性的非洲史学术组织。

1983 年，中国非洲史研究会正式成立。此举标志着我国的非洲史研究有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借此，国内的非洲史研究得以组织、协调和交流。二十多年来，尽管研究会的理事会数度换届，但是研究会始终以推动中国的非洲史研究为宗旨，积极组织学术讨论会，现已经举行年会 8 届，全国性的专题学术讨论会 10 余次。研究会协调国内的研究力量，承接大型的科研项目（诸如编写《非洲通史》[3 卷本]、编撰非洲史资料丛书和大型工具书），推动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等，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第二，学术研究空前活跃，学术研究领域不断扩展，非洲史研究逐步扩大为非洲学研究的倾向日益明显。

在"文革"前，受到当时国内外环境的限制，中非关系主要表现为政治关系，非洲历史的研究和教学紧跟政治形势，聚焦在政治领域，非洲历史也相应表现为单一的政治史。在当时的科研和教学中，非洲近代史只是介绍了非洲反对西方殖民入侵和统治的斗争，而非洲现代史则阐述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于非洲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包括对于世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没有深入涉及，或者只是根据政治需要而进行一般的理论分析。此外，即便是政治史的研究，也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在"文革"后，学术研究空前活跃，非洲史研究的范围和领域大大拓宽：其一，研究领域从单纯的政治史逐渐扩展到经济史、文化史、科技史、人口史、环境史等；其二，研究的地区已经覆盖了北非、东非、南部非洲、西非和中非；其三，研究的课题从宏观逐步转向微观，许多选题以某一国家或者某一特定时间和事件为目标；其四，研究的一些"禁区"被突破，诸如阿拉伯人与东非奴隶贸易、殖民主义的非洲历史上的客观作用问题，过去无人敢碰，现在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尽管在认识上还不能完全达成共识，但是讨论促进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非洲史研究逐步融入非洲学研究的倾向日益明显。许多非洲历史研究人员，在研究非洲历史的同时，注意结合研究非洲的现实问题，运用历史研究的成果来加以解释和说明，于是，非洲历史研究的范围不断向现实延伸，不断向其他学科渗透，使非洲史研究与非洲学研究逐渐相互融合。许多非洲史研究人员成为我国非洲学研究的核心和骨干力量，而许多大学的非洲研究中心则主要由史学研究人员组成。

第三，研究成果累累。

这一时期学术成果大大超过了建国后至"文革"时期，仅以有关非洲历史的出版物为例，列表如下：

中国出版的关于非洲研究方面的著作①

	专　著	译　著	大众读物	参考书	总　数
1949 年以前		14	5		19
1949—1966	10	60	35	6	111
1967—1978		111	5	1	117
1979—1994	41	68	48	9	166

由上表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不但非洲学方面的出版物的数量有了较大的增长，而且研究类的专著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值得指出的是，在各类出版物中，历史类占 31%，占据首位，其次为政治类，占 19.85%，再次为地理类，占 19.61%。这些统计数字明确告诉我们，这一时期非洲历史研究进入了实质性的发展时期，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均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还值得指出的是，非洲历史研究的领域突破了政治史的限制，进入了经济史、文化史等其他领域，并且出现了一批力作。

① 张毓熙：《中国非洲学著作近百年情况概析》，《非洲问题研究中文文献目录（1990—1996）》，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等出版，1997 年，第 272 页。

第四，形成了一支非洲史的研究队伍。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和积累，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相结合的教学和科研队伍。杨人楩、纳忠、吴秉真、陆庭恩、艾周昌等老一代的非洲史专家为我国的非洲史研究做出开创性的工作；中青年非洲史工作者紧紧跟上，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研究力量。现在有十几所高校开设非洲史或者非洲学的课程。北京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云南大学、湘潭大学和南京大学设置了专门的非洲研究机构（非洲研究中心或者非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西亚非洲研究所。四所高校（北京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云南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正式培养非洲史（学）的博士研究生。

（二）重要学者及研究成果

（1）纳忠（1909—2008），出生在云南省回族家庭，字子嘉，阿拉伯名叫阿布杜·拉赫曼。1931 年，远赴开罗爱资哈尔大学求学。1936 年，取得了该校的最高文凭“学者证书”。1940 年，纳忠学成回国后，先后到多所中国著名大学任教。纳忠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阿拉伯文化交流。他除了从事阿拉伯语教学外，勤奋笔耕，出版了《埃及近现代史》等 20 余部著作。1997 年至 1999 年又出版了 90 万字的巨著《阿拉伯通史》（上、下卷），发表了《历史上的中国与近东》、《清代云南穆斯林对伊斯兰学部的教学与研究》等论文 200 多篇。翻译《伊斯兰教》等 5 部著作。

纳忠先生曾任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巴基斯坦“希吉莱学者奖金”海外委员会、叙利亚大马士革阿拉伯语言学会等多家国内外学术机构的领导职务。他的教育和研究工作受到高度评价，1991 年被评为国家级“对高教事业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93 年获“中国阿拉伯语教学杰出贡献奖”，2001 年获得首届沙迦阿拉伯文化奖。

（2）张铁生（1904—1979），江苏高邮人。又名张铭鼎。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 年赴柏林学习。1936 年重新入党。在民主革命

时期，从事文化界、新闻界的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秘书长、亚非研究所副所长、亚非学会秘书长、中非友协副会长，西亚非研究所副所长。著有《中非交通史初探》。

（3）杨人楩（1903—1973），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1934年入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留学，攻读法国史，获学士学位，1946年起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1958年，北京大学历史系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建设非洲历史学科。他虽然年近花甲，但是毅然放下法国史研究，开始了非洲史拓荒工作。一方面他为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讲授非洲史课程，另一方面则他积极构思并着手撰写一部非洲通史。令人遗憾的是，“文革”打断了他的工作计划，甚至连书稿都散失殆尽。1971—1973年，他抱病断续增补和修改书稿，直至去世。1984年，在学生们的共同努力下，《非洲通史简编》终于出版。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非洲通史，因此具有特殊的意义。除了科学研究外，他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高质量的非洲史专业研究生。他们日后成为中国非洲史研究的中坚力量。

（4）葛佶（1929—　），浙江平湖人。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西亚非洲》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西亚非洲研究系主任、中国非洲史研究会顾问、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在长达40多年的非洲问题研究中，她撰写了数百篇著作和论文，翻译了大量书籍和文章，多次出国讲学。其代表作有：《非洲概况》是首部向国人全面介绍非洲的书籍；《南非——富饶而多难的土地》一书使国内读者对南非有更加客观、全面的认识。她主编的《简明非洲百科全书》凝聚了十几年心血，成为中央领导人和外事工作者对非工作的重要参考书。为表彰她在非洲学研究中做出的突出贡献，1992年她获颁国务院突出贡献特殊津贴奖励。2006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荣誉学部委员，同年荣获中非友协“首届中非友好贡献奖——感动非洲的十位中国人”的称号。

（5）陆庭恩（1935—　），上海市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

系,后留系任教。曾任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所长,现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1989—2001年曾担任中国非洲史学会会长,现任名誉会长。主要著作有《非洲与帝国主义》、《非洲民族主义政党与政党制度》(合著)、《非洲史教程》(合著),主编《非洲通史·现代卷》、《非洲农业发展简史》、《中国与非洲》等,发表有关非洲史的论文112篇。陆庭恩教授全身心投入非洲史研究,成果卓著,他的研究对于中国非洲史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担任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期间,他积极组织和协调中国非洲史研究力量,组织全国性攻关。他特别强调学术研究一定要结合国家需要,认为这样的研究才有价值和前途。此外,他还强调研究非洲必须深入非洲实际,这样才能有深刻的体验和丰厚的成果。

(6)艾周昌(1930—),1953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此后长期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主要从事亚非史的教学和研究。主要学术著作有:《早期殖民主义侵略史》(合著)、《非洲通史》(项目负责人,获教育部学术著作一等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三等奖)、《中非关系史》(合著)、《世界近代史》等,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艾周昌对于中国非洲史的研究,多有建树。在学术研究上,他打破了西方长期流行的"中非关系500年中断说",认为近代中非关系依旧存在,只是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变化。他编注的《中非关系史文选》和《中非关系史》,为研究中非关系填补了资料和研究的空白。

其他著名的非洲史专家还有:张文淳(已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芳川(已故北京大学教授,主要从事非洲历史、东非城邦等研究),郑家馨(北京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南非史和殖民主义史研究),顾章义(中国民族大学教授,从事非洲民族和非洲历史研究),许永璋(郑州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非关系史研究),李广一(湘潭大学教授,主要从事非洲对外关系研究),潘佩英(外交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法语非洲国家的研究),赵淑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等。

中国非洲史领域目前已出版的重要著作主要有:

(1)艾周昌、陆庭恩主编:《非洲通史》(三卷本)。

编撰一套多卷本的《非洲通史》,是中国几代非洲史学者的学术追求。1984 年在北京召开的西亚非洲史研讨会上,提出了这个目标。会后成立了以艾周昌、陆庭恩为负责人的项目组。经过近二十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非洲史研究人员十余年的辛勤工作,三卷本(古代、近代和现代)的《非洲通史》终于问世。这套《非洲通史》的特点是:第一,时间跨度长,从史前直至 1980 年代;第二,空间覆盖面大,包括整个非洲大陆;第三,用中国学者的观点剖析非洲历史。在批判了西方的“欧洲中心论”和“黑人自古天生低劣”等错误观点的基础上,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观点,观察非洲历史,从中寻找非洲历史的非洲规律。第四,在许多非洲历史的重大问题上,如奴隶贸易、中非关系、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等,都提出了中国学者自己的看法。这套《非洲通史》代表了当今中国学术界对于非洲通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2)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从远古至 1918 年)》。

杨人楩先生是我国非洲史研究的拓荒者。1960 年代前半期,他在讲授非洲史课程和指导非洲史研究生及青年教师的同时,开始编写《非洲史纲要》。1966 年,在“文革”冲击下,他被迫停止了这项工作,而且原稿也遗失了。之后,他抱病进行写作,直至 1973 年去世。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支持下,在杨先生的学生们的努力下,这本书终于出版。必须指出的是,这本书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非洲通史,因此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对于本书的特点,张蓉初先生做了这样的评价:作者在撰写过程中,“力图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尊重非洲学者的观点,批判地吸收当代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对非洲历史作综合的叙述和分析,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在写非洲史时曾对奴隶贸易、中非文化交流、西非古国的社会性质、伊斯兰教在非洲的传播、南部非洲津巴布韦古代文明等进行了一定的钻研。这些问题都在书中有一定的阐述”。[①]

① 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3 页。

(3) 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

这是作者关于中非交通史的一本论文集,包括五篇论文:《中非交通的历史关系初探》、《从东非史上看中非关系》、《再谈中国同东非的海洋贸易》、《中国同北非的交往》和《中国同非洲的海上交通》。值得指出的是,作者成书于 1960 年代,当时中非关系史的资料很少,因此,作者尽可能发掘、利用中国的古籍资料,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这本著作篇幅不大,仅 104 页,但它是中国第一本中非关系史领域的专著,而且至今仍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4) 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

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中非关系史。作者把中非关系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16 世纪初;第二阶段自 16 世纪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三阶段从 1949 年至 1990 年代。作者在收集大量有关资料、尤其是中国古籍资料的基础上,对中非关系各个阶段的特点做了深入的分析。作者特别否定了西方学术界长期流行的近代"中非关系 500 年中断说",并且指出了近代中非关系的特点。这本著作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于中非关系史的研究水平,具有中国研究特色。值得一提的是,艾周昌教授同时编注了《中非关系史文选》,从中国百万字古籍资料中,精选出 22 万字。这本文选实际上是《中非关系史》的姊妹篇。这两部著作和文选成为中非关系史研究中的代表性成果。

(5) 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

对于华侨华人史的研究,近年来得到较快发展,但是呈现出不平衡。相比之下,对于非洲华侨华人的研究就显得十分薄弱,只有几本关于非洲个别国家的华侨华人史著作。本书是阐述整个非洲大陆华侨华人历史的著作,因此填补了这个领域研究的空白。它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论述全非洲华侨华人历史发展的著作,因此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全书的资料十分丰富、扎实,不但收集了国内各类资料,而且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收集海外资料。本书的导论颇有特色,它介绍了非洲华侨华人史的史料、研究状况存在问题。本书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术

界的关注和好评（该书的姊妹篇《非洲华侨华人社会史资料选辑》于2006年出版）。

（6）葛佶主编：《简明非洲百科全书（撒哈拉以南）》。

本书是我国编撰出版的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各个领域、各个国家历史和现状以及未来发展的重要科学著作和工具书。全国共有60余位专家共同撰写和审定。全书167万字，分为三大部分："地区综合"、"国别"和"文献与附录"。本书按内容自成系统，论述结合、资料翔实、图文并茂、丰富多彩，是一本代表中国学术水平的百科全书，也是了解非洲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书。

（三）中国主要的研究机构

我国的非洲史研究至今尚无一个专门的机构。无论在高校或者在社会科学院，非洲史的研究往往纳入非洲学或者亚非拉研究的机构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有西亚非洲研究所和世界史研究所，在一些高校，有亚非拉史教研室。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少数高校成立了跨学科的非洲研究中心。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

英文名称为 Chinese Society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是中国研究非洲历史的群众性学术团体。成立于1980年，会址设在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现有会员160人（2007年）。领导机构为全体会员选举产生的理事会。研究会的宗旨是，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协调和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促进非洲历史研究的深入，推动中国—非洲关系的发展，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研究会的主要任务为：团结和组织全国非洲史的教学、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者开展非洲史和非洲问题研究；组织举办本学科学术研讨会、报告会；组织本会会员撰写、编辑和译介与本学科有关的专著、论文、报告和资料等；接受有关部门、机构的业务咨询；促进国际学术交流等。

研究会成立三十多年来，先后举办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二十余次，就

非洲社会主义思潮、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非洲阶级结构、非洲政治转型和政治发展、非洲现代化与经济发展问题、全球化与非洲、中非关系等理论课题进行学术研讨。研究会编辑出版了《非洲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 年)、《非洲通史》(3 卷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非洲研究系列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等有重大影响的学术专著,主持《非洲大事年表》、《非洲问题研究中文文献目录》等工具书的撰写,组织和协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八卷本《非洲通史》等学术名著的译介工作。出版会刊《非洲历史研究》28 期。积极鼓励和组织国内学者前往非洲进行学术考察和讲学,并邀请国外知名学者来华作学术访问和学术报告。为非洲史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亚非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是在亚非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国际背景下,于 1961 年 7 月 4 日正式成立的,原名亚非研究所,隶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研究中非关系的专家张铁生被任命为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研究所停止业务活动。1974 年部分恢复研究工作。1978 年研究所正式恢复。1981 年 1 月 1 日,西亚非洲研究所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从此,该所进入繁荣发展阶段。非洲学科研究重点转向以研究地区和国家当代政治经济发展和国际关系问题为核心,全面推动非洲研究学科建设;同时以基础研究为依托,跟踪研究非洲地区出现的重大问题、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对重点国家的政局变化进行综合性、理论性、战略性和预测性研究。目前,该所的研究范围已覆盖了非洲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社会、国际关系、宗教和民族等诸多学科和领域,并且在当代政治经济发展和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确立了一定优势。该研究所一方面通过培养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培养该学科领域专业人才;另一方面,通过著书立说、撰写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等形式(如每年一本的《国际形势黄皮书:中东非洲发展报告》、非洲《列国志》等),正在日益发挥政府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

西亚非洲研究所拥有国内最大的西亚非洲专业图书馆，馆藏中、外文图书近 3 万册，并有近百种中外文期刊及一些西亚非洲国家的报纸，并已建成《西亚非洲资料数据库》。该所自 1980 年开始出版《西亚非洲》杂志，该刊是国内最重要的西亚非洲研究学术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是我国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开展综合性研究的专门学术机构。前身为 1959 年设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的世界历史研究组；1962 年扩建为世界历史研究室。1964 年 5 月，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正式成立。

世界历史研究所以研究世界近、现代历史为主，同时开展对世界古代和中世纪历史的研究。非洲历史研究为该所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史研究室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自 1977 年以来，先后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非洲通史》的撰写任务，承担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该所相继培养了一批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为了加强国内非洲历史研究、加强非洲教学与研究人员的交流与提高，1980 年 4 月，该所与国内大专院校、研究机构的同仁们共同筹建了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经过多年的发展，为非洲史研究、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为普及非洲历史教学工作做出了一定贡献。

在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该所研究人员先后出访了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非洲国家，与非洲学者建立了学术联系，为我国非洲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研究所非洲研究室是国内从事非洲问题研究的主要机构之一，为综合性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其前身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于 1980 年正式成立，2003 年更为现名。该院亚非所非洲研究室以动态跟踪与基础研究为重点，重视非洲国别政治、经济、文化、安全与对外关系研究，侧重区域政治、经济、安全、社会形势及综合性课题研究。研究室与非洲主要国家驻华使馆及一些研究机构

有较密切的学术交流关系,并经常与美欧的非洲问题研究机构讨论非洲问题。研究室不定期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组织或参加有关的学术会议与研究项目,曾举办"非洲学术周"等活动,多次派团访问非洲国家,包括南非、尼日利亚、埃及、埃塞俄比亚等。参与编写或编写的著作有《简明非洲百科全书》、《历史拐点:21 世纪第三世界的地位和作用》、《南非经济——贸易与投资指南》、《非洲名人录》等。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成立于 1998 年,是一个跨学科、跨院系(所)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其宗旨为通过对非洲国家的研究,加深对非洲地区的了解。中心成员由北京大学各院系研究所从事非洲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语言和文学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人员组成,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和组织全校的非洲研究,举办报告会、讨论会和讲座,协助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接受来自校内外的咨询和人才培训任务,组织和推进国内外学术交流。中心学者已出版专著多种,涉及非洲的金融贸易、政治、民族、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其出版的《非洲研究论丛》为年刊,主要刊登对非洲地区和国家的政治、民族、经济、历史、文化、教育、宗教和国际关系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现已出 4 辑(《中国与非洲》、《非洲:变革与发展》、《影响历史进程的非洲领袖》和《亚非葡语国家发展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多次举办中非友好活动,如 1999 年的"中国——南非友好日活动",曼德拉总统应邀做了讲演;2000 年召开"中国——非洲友好关系发展国际研讨会",中国和非洲的 12 国代表参加会议。2006 年,中心同教育部国际司等联合举办"全国高校非洲教育科研与援非工作研讨会",会议取得成功,推动了我国的非洲学教学、科研和援非工作。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成立于 1998 年。该中心有以下特点:第一,中心立足本校,面向上海,集聚上海的非洲学研究力量。中心除了本校的教师外,还聘请了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教

授和研究员加盟,因此实际上是上海地区跨单位的非洲学研究中心。第二,中心兼有教学和科研任务。由于中心隶属历史系,因此具有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的招生、培养和授予相应学位的资格。第三,中心的研究重心是非洲经济和非洲历史,此外,也程度不同地涉及非洲政治和中非关系。中心多次举办中国非洲史学术讨论会,促进国内的非洲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并多次承担国家、上海市和教育部的研究项目。

湘潭大学非洲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

1978 年 9 月,湘潭大学成立了非洲问题研究室。1998 年,成立非洲法研究所。2005 年,为了进一步推进非洲研究,综合全校研究非洲的力量,由法学院牵头,联合马列学院、历史学院、外语学院和商学院,共同组建非洲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中心出版了我国目前唯一的三部非洲法专著:《非洲法导论》、《非洲刑法评论》和《非洲法律发达史》。在《西亚非洲》和《河北法学》杂志开辟"非洲法研究"专栏,在《人民法院报》开辟"非洲法纵横"和"非洲法律文化"专栏。目前,中心集中在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研究非洲法理论与实务;二是研究非洲法律变迁与历史发展;三是研究非洲人权与外交。尤其注意研究非洲的国别法和区域性国际法。其特色是,以非洲法为龙头,研究非洲的政治、外交、历史、经济与文化等问题。

云南大学亚非研究中心

云南大学是开展非洲史教学和科研工作较早的大学之一。在 20 世纪 50 年代,纳忠先生自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归国,担任云南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开始了亚非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进入 1990 年代,云南大学的非洲学教学和科研工作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1999 年,云南大学成立了亚非研究中心,此后因为考虑到亚非的范围过于宽泛,因此决定专门成立非洲研究中心。中心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教学上,中心招收世界史和国际关系两个专业的非洲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为中国的非洲学研究培

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在科研上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成立于2007年9月1日，由浙江师范大学与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合作共建，是中国高等学校中第一家综合性的非洲研究院，它的前身是成立于2003年4月的浙江师范大学非洲教育研究中心。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的发展目标，是要构建一个开放的学术平台，聚集国内外非洲研究专家和有志于非洲研究事业的后起之秀，开展系统、全面的非洲研究工作，积累学术成果，培养中国的非洲学人才，增进中国人民与非洲人民的相互了解，促进中非友好关系的发展。其下设三个研究所：非洲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所、非洲经济与贸易研究所、非洲教育与文化研究所，正在筹建非洲图书信息中心、非洲艺术传媒中心、非洲投资贸易咨询中心。研究院现有专兼职研究人员38名，可以培养非洲学领域的硕士研究生，并与国内外一些非洲研究机构和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相互派遣留学生，合作开展研究项目。

第四章　重点学术问题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和发展，国外学术界对非洲历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标志为：第一，运用不同学科（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等）的研究方法，不但发掘、整理了许多非洲历史资料，而且对非洲历史做出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第二，研究对象已经从宏观转向微观，微观研究成为非洲历史研究的主流；其二，随着对非洲历史研究的深入开展，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观日益失去了立足之地。“非洲历史是非洲人创造的历史”的观点越来越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欧洲中心论”和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遗迹在非洲历史研究中还不时出现。因此，还非洲历史以原来面貌，仍然是非洲历史研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

本章选择国内外学者共同研究过的若干重要专题，以介绍国内学者的重要关切为主线，结合介绍国外的研究动态。

一、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古代文明

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古代文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盛行这样的看法，即黑人是没有历史的人。按照这种说法，非洲人从来就没有发展过自己的文明。于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所发现的古代文明遗迹，统统被认为是外来者带来的文明，诸如“含米特人”、腓尼基人，或者来自北方而后来又失踪的“神秘的人们”。费奇曾经形象地描述道：“（欧洲人）对于非洲人在过去所取得的成就极端无知。例如，那时他们对

伊费和贝宁的伟大艺术一无所知。当这些艺术开始展示在他们面前时,他们立刻做出假定:这不是纯粹的非洲的艺术成就,它一定是产生于著名的地中海文明的被遗忘了的某些影响之下;而这种地中海文明正是欧洲人自己的文化的背景。"[①]但是,上述观点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随着研究的深入,历史事实逐步浮出水面,外来文明说更是不攻自破。以下举几个例子。

例一,诺克文化是西非早期铁器时代的代表。然而,在诺克文化遗址出土时,一些欧洲学者马上认为,西非的炼铁技术是从外部传入的,有可能来自北部的麦罗埃(今喀土穆附近),也可能来自卡尔他热(今突尼斯附近)。著名的非洲历史学家戴维逊历来反对非洲古代文明外来说,但是在诺克文化来源问题上,也显得犹豫不决,他指出,美索不达米亚把炼铁技术传给埃及,埃及又传给库施,于是,"有理由设想,它的产品和继之而来的技术——不断地、不可抗拒地传到西方和南方各地"[②]。然而,经过上世纪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上述观点遭到否定:第一,诺克文化所代表的西非早期铁器时代,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比如,由于刚刚步入铁器时代,制作技术十分粗糙,因此石器作为一种长期使用的工具,仍然得到保留,于是出现了铁器和石器混合并用的局面。又比如,诺克人的冶炼炉十分独特,呈圆筒形,内壁由黏土制成,炉壁上留有进风口,特制的风箱经进风口向炉内鼓风。诺克人的冶炼炉显得简单,而且炉内容量不大,但是这种独具风格的制作却恰恰表明了这是诺克人自己的创作。第二,西非其他地区也陆续发现了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址。尼日尔的《萨赫勒报》报道了尼亚美大学的尼日尔人文科学研究所在阿加德兹南部发现了许多与早期金属冶炼有关的遗址,经过碳-14的多次测定,遗址中的炼铁炉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这个历史事实说明,西非进入铁器时代早于麦罗埃和卡尔他热。因此,西非进入铁器时代,是当地人民总结了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经验的

① 费奇:《西非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86页。

② 巴兹尔·戴维逊:《古老非洲的再发现》,三联书店,1973年,第76页。

产物。

例二，大津巴布韦文化的石头建筑遗址被发现后，外来文明说甚嚣尘上。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非洲人不可能建造如此惊世之作，因而可能是阿拉伯人、腓尼基人、波斯人或者所罗门王派来的使者所为。比如，一位德国地理学家在考察了津巴布韦遗址后宣称，这是远古时代文明人的创作。因为山上的碉堡无疑是仿照莫里亚山上所罗门王的庙宇建造的，而山谷中的椭圆形建筑物则是抄袭示巴女王公元前10世纪在耶路撒冷时曾经住过的宫殿的样式。但是，这种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想最终被推翻。1905年，考古学家戴维·朗戴尔-麦弗基受英国协会之命，考察了一些遗址后宣布，大津巴布韦和其他同类的废墟都起源于非洲，时间在中古或者中古以前。他指出，在建筑样式上，"不论是军事的或是住家的，都没有东方或欧洲的任何时期样式的痕迹"，"住宅的特征毫无问题是非洲的——这些住宅包括在山头废墟中，并构成了废墟的重要部分"，而且"从住宅中发现的标本来检查，其艺术与制造都是典型的非洲式的"[①]。戴维·朗戴尔-麦弗基的考察结论遭到了外来文明说的极大反对。25年后，英国协会再次派出考古学家格特鲁德·卡顿-汤普逊赴实地考察，结果，汤普逊在其考察报告《津巴布韦文化》中再次肯定了戴维·朗戴尔-麦弗基的看法。她指出，"检查了从各个角落收集来的全部已有的证据之后，还没有一件是不符合班图根源和中世纪时期这种证据的"。她坚定而明确地表示，我"坚决不同意一再提出的调和性意见，即津巴布韦及同类的建筑是当地工人在一个'优秀的'外来种族或监督者指导下修建的"[②]。经过学者们艰苦的考察和研究，现在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在公元5世纪前后，一支已经掌握制铁技术的班图人由北方迁移至此，他们建造了最初的建筑。另一支班图族的绍纳人也迁移至津巴布韦后，在13—14世纪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此后，绍纳人的分支卡兰加人建立莫诺莫塔帕国家，定都津巴布

① 巴兹尔·戴维逊：《古老非洲的再发现》，第369页。

② 同上书，第370页。

韦。由此可见,津巴布韦在各个不同的时期的居民虽然有所变化,但是都属于班图族,是非洲大陆的土著居民,因此,大津巴布韦文化实际上是班图人长期积累的文明成果,是货真价实的非洲古代文明。

例三,东非沿海城邦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斯瓦希里文明。对于斯瓦希里文明,在很长的时间里,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它是一种外来文明。有人提出:"东非的历史纪念碑不属于非洲人,而应属于阿拉伯人,属于那些与非洲人混血,但是在文化上又不同于非洲人的、已经阿拉伯化了的波斯人。"也有人认为:"虽然这些文明建立在它们经济上所依赖的那块陆地上,但是,沿海城市却始终面向海洋,面向印度洋及其沿海地区所构成的庞大的海上区域。"[①]然而,迄今为止的考古和研究成果都证明上述观点缺乏科学根据,因为斯瓦希里文明确实是东非本土的文明:第一,斯瓦希里语的语法及其大部分词汇与当地语言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且斯瓦希里文学也明显反映出非洲口语的法则;第二,斯瓦希里的物质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这些个性在阿拉伯半岛和波斯物质文化中都无法找到。在斯瓦希里的石头建筑中找不到具体的共同点以说明其起源于近东、阿拉伯半岛和波斯,相反,有充足的证据证明,由于财富积累和社会经济分化,在当地颇具特色的泥土和树枝建筑技术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了这些石头建筑;第三,即便是伊斯兰教,在东非沿海地区也带有强烈的非洲宗教历史传统的痕迹,其突出的标志是:信仰神灵和神灵附身、崇拜祖先、巫术和卜卦。研究者们同时指出,斯瓦希里文明在其形成的过程中,确实吸收了许多外来文化,这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由于东非沿海城邦面向印度洋,因此对外贸易兴旺,大量阿拉伯商人和波斯商人不但经常在此经商,而且其中不少人迁入当地定居,这为东非沿海城邦接触和吸收外来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东非本土文明与外来文化交流和融合,最终形成了斯瓦希里文明。

在中国,学者们展开了对"含米特假设"(一译哈米特说,the Ham-

---

① UNSCO,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Paris, 1990, vol. Ⅲ, p. 589.

itic hypothesis)的批评。彭坤元指出,“在以往的许多历史著作中,非洲历史不过是作为欧洲人海外殖民史和扩张史的一个陪衬。……非洲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高度文化、发达的生产技术及其他有价值的东西,都来源于其他大陆,来源于具有印欧血统的、浅肤色的哈米特人或其影响。这些一度盛行的看法被称为‘哈米特说’,即非洲文化外来说。”他接着指出,“非洲历史学发展的早期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破除‘哈米特说’的恶劣影响,驳斥这一充满种族偏见和无知的谬论”[①]。彭坤元的观点代表了中国学者的基本立场。在研究非洲文明起源时,中国学者充分尊重历史事实,批评“含米特说”,还历史以原来的面貌。在这方面,宁骚撰写的《西非古代文明与“含米特假设”》[②]一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宁骚首先指出,随着撒哈拉大沙漠的出现,在撒哈拉的南缘形成了一条“黑白分界线”,线北居住着讲含米特语的白种人(柏柏尔人和古埃及人),线南生活着各族黑人。含米特人曾经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并对地中海东岸和北岸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由于大沙漠的阻隔,黑人各族与地中海文明很少联系,他们自主发展起来的当地文明,具有鲜明和独特的风格。以西非为例,面对西非古代文明,西方的一些学者不愿意相信,于是他们做出假设,把古代西非黑人创造的文明变成了含米特的功绩,例如加纳王国、桑海王国、加涅姆—博尔努、豪萨城邦、约鲁巴国家和贝宁等。宁骚进一步指出,历史事实已经证实,西非的新石器时代革命是西非黑人自身发起和完成的,因此有理由认为,西非国家组织和当地文明成果的产生是西非社会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外来文明影响的产物。宁骚最终的结论是:含米特假设无法科学地反映出西非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它只能起到为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张目的作用。随着对非洲历史研究的深入,这种理论终将被彻底抛弃。

---

① 彭坤元:《非洲史学》,见杨承芳主编:《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39 页;又见艾周昌主编:《非洲黑人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 3 页。

② 宁骚:《西非古代文明与“含米特假设”》,见中国非洲史研究会:《非洲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 年,第 127—154 页。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上古文明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是什么？中国学者李继东对这个问题做了初步的阐述。他的结论是：(1)黑非洲是人类早期文明的摇篮和中心。在人类早期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移民和技术从这个中心向外扩散，对周围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2)黑人的迁徙和移民对上古世界的民族格局形成渊源有重大影响。范围广泛的黑人移民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古代世界地区间的闭塞，扩大了经济文化交流，并为许多重要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3)黑非洲是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之一，众多的农作物在此起源并传入其他文明大区；(4)黑非洲是世界最早进入阶级社会和建立统一大帝国的地区之一；(5)黑非洲构成了地中海和印度洋海洋商业文明的一部分。其海上交通与地中海东岸和印度洋北缘地区文明的兴盛有密切关系和影响。作者在文章中对含米特假设等忽视黑非洲上古文明的理论和传统观念进行了批评。[①]

二、班图人的迁徙[②]

班图人迁徙是非洲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侧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班图人的起源地

班图人最初居住在什么地方？学者们进行了各种研究，其中，班图语言学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约翰斯顿(H. Johnston)于1919—1922年之间发表的研究报告是第一部旨在确定班图起源地并划分其扩散阶段的著作，通过对原始班图语中“小鸡”一词以及“河马”的词根进行分

---

① 李继东：《论黑非洲上古文明的世界历史地位》，《世界历史》1993年第3期。

② 参见塞利格曼：《非洲的种族》，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33页；S. 卢旺加-卢尼伊格、J. 范西纳：《讲班图语的各族人民及其扩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3卷，第110—128页；埃里克·吉尔伯特、乔纳森·雷诺兹：《非洲史》，海南出版社，2007年，第67—68页。

析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班图人源于大湖地区,具体的地点是加扎勒河流域;他认为班图人首先东迁至埃尔贡山,以后迁入维多利亚湖北岸、坦噶尼喀和扎伊尔森林地区;他推断班图人首次大规模迁徙进入中部和南部非洲的时间为公元前300年左右。人类学家塞利格曼的看法与约翰斯顿相同,他在《非洲的种族》一书中认为班图人起源于大湖地区,时间在新石器晚期。

著名的班图语言学家约瑟夫·格林伯格(J. H. Greenberg)从宏观研究入手,认为班图人起源于班图语歧异最大的地区。他把非洲的语言视为一个整体,从800种语言中提取200个核心单词,在这些核心单词的使用中,他发现班图语更接近于西非语言,经过深入分析,他推断班图人起源于尼日利亚的贝努埃地区的中部。

语言学家马尔科姆·格思里(Malcom Guthrie)提出相反的看法。他认为班图人诞生在班图语最大限度趋同的地区,他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推断这个地区就是在刚果河与赞比西河分水岭附近。自1973年以来,先后有三批各自独立的语言学家采用了不同的资料,以词汇分析为依据进行研究,结果都证实马尔科姆·格思里的观点是错误的。当然,随着计算机的广泛使用,研究还在继续深化。

吉尔伯特和雷诺兹(Erik Gilbert, Jonathan Reynolds)在总结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后指出,班图语当前的分布,原始班图语词汇所表明的环境,以及若干考古学证据,全都说明原始班图人生活在喀麦隆和尼日利亚之间的边境地区。

(二)班图人迁徙的动因

关于这个论题,国外学术界目前提出了两种解释:其一,人口激增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班图人由狩猎和采集经济向农耕经济过渡后,物质生活得到一定的改善,因而引起了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又引发了人口与土地的关系日益紧张。当土地已经无法支撑人口增长的压力时,班图人只得向外迁徙,寻找新的土地。考古学家梅里克·波斯南斯基支持这种观点,他的证据是:从西部非洲迁往中部非洲

的班图各族已经进入农业社会,公元前400年至公元200年之间从印度尼西亚引进的农业技术(香蕉和薯蓣种植)传播至中部非洲森林地带的居民后,迁徙的势头更加迅猛。

其二,征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班图人掌握了铁器,因而对其他居民形成了明显的优势。这种优势使班图人能够不断对外扩张,并征服其他居民。C. C. 里格利是征服理论的代表人物,他指出,班图人"是占优势的少数民族,善于用梭标打猎,他们作为肉食供应者享有无上威信;……因而不断吸引新的追随者,不断摆脱新的流动的冒险者团伙,终于整个南部非洲次大陆都使用铁器,并讲班图语"。

上述两种理论均有一定的依据,但也有可商榷之处。奥立弗对上述两种理论进行分析后,得出三点结论:(1)在公元前3000年后,在萨瓦那和乍得湖地区出现了人口增长对土地带来的压力,人口与土地关系的紧张引起了班图人向南迁徙;(2)原始班图人是一群已经进入铁器时代的猎人和渔民,他们经水路越过森林,定居在森林的南部边缘地区;(3)公元初前后班图人由森林边缘地区对外扩张。奥立弗的理论使人口激增理论和征服理论相互补充,融为一体,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S. 卢旺加-卢尼伊格和J. 范西纳指出,对于班图人的迁徙,或许可以引用其他一些更加重要的原因,比如饥荒、寻找更适宜的生活环境、瘟疫和战争等,但是这些因素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第三,班图人扩散的阶段性。罗兰·奥立弗提出了班图人扩散的四个阶段的理论。第一阶段,一批接一批的班图人沿着刚果河各河道从喀麦隆中部和乌班吉的林地向扎伊尔赤道森林以南的林地迅速迁徙;第二阶段,迁徙各族结合起来,定居下来,他们扩展穿过了南部的森林地带,其范围从海岸的一端到另一端,包括西海岸的刚果河口至东海岸的鲁伍马河之间整个中部非洲地区;第三阶段,班图各族迅速向南和向北进入气候更加湿润地区;第四阶段,占领当今班图非洲的其余地区。

第四,班图人的迁徙路线。班图人的迁徙路线十分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东、西和南三条路线:(1)西线是班图人最早对外迁徙的路线。他

们进入西赤道非洲，大约北起扎伊尔的北界，南抵安哥拉南界，西达大西洋海岸，东至邻近大湖地区的广大地带。(2)南线是班图人迁徙的数量最多的。他们先后进入鲁伍马河至赞比西河地区、赞比西河至林波波河之间地区，还有人进入南非。(3)东线：东迁的班图人于9—10世纪抵达东非沿海地区。

吉尔伯特和雷诺兹总结说，班图迁徙的初始阶段发生在中非森林地带。至公元1世纪，班图人几乎占领了全部森林。为了进一步扩散，班图人必须进入他们不熟悉的东非稀树草原。公元1世纪一些班图农业社会已经在东非沿海出现，扩散从那里转向南方。到公元1100年，班图人已经遍布从喀麦隆到索马里南部再到南非的地带。

中国学者在这个专题的研究尚不多。在关于班图人迁徙的影响方面，陆庭恩和艾周昌认为，班图人的迁徙给撒哈拉以南非洲带去了先进的铁器锄耕农业文明，促进了当地的生产发展，推动了文明的进步。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使人口得到增长；班图人和其他各族的交流和融合推动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产生，在一些地区，以部落联盟为基础，出现了早期国家组织。而杨人楩先生则指出，与西非诸国相比，中南非班图人的社会发展缓慢，这与其长期迁徙有关。因为在迁徙中，往往要发生一些部落战争，而且往往不能长期定居，所以每到新的地方，就为了适应环境而改变生活方式，在这种形势下，不容易突破原有的生产关系。[①]

三、非洲古国

非洲古代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在撒哈拉以南地区出现过一些文明古国。学术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① 陆庭恩、艾周昌：《非洲史教程》，第108页；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第167页。

(一)阿克苏姆古国

公元3世纪,一位基督教作家马尼(Mani, 216—276)列出当时的世界四大强国:一,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与波斯;二,罗马帝国;三,阿克苏姆帝国;四,中华帝国。[①] 由此可见阿克苏姆在当时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吉尔伯特和雷诺兹认为,阿克苏姆起初只是贸易城镇的联盟,但是它的势力迅速增长,这主要归功于它与各地(包括北非、阿拉伯半岛、东非和印度等)的贸易活动,因为它从中获利丰厚。[②] 法国考古学家安弗雷(F. Anfray)认为,公元前5世纪,受南阿拉伯影响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文明——阿克苏姆文明兴起。它基本上是一种农业文明。对于阿克苏姆的研究,由于文字资料较少,因此主要依靠当地铭文和考古研究。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阿克苏姆文明的特殊性来源于非洲本土,无疑是本地民族的产物。前苏联学者科比沙诺夫分析了阿克苏姆政治制度、经济和文化,他认为该国多数人从事农业和畜牧业,铁器使用十分普遍,政治制度是一种宝塔式的权力等级制度,属于早期封建制。它是当时世界贸易中第一流的贸易大国,也是热带非洲第一个铸造金属货币的国家。阿克苏姆在早期信仰多神教,具有农业和畜牧业崇拜的色彩;祖先崇拜在宗教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并受其他各国宗教思想的影响。埃塞俄比亚历史学家梅库里阿(T. T. Mekouria)曾对基督教传入阿克苏姆做了研究。[③]

中国学者的研究很少。何芳川依据国外的研究成果,对阿克苏姆做了分析。他首先对阿克苏姆兴起的背景进行剖析,他同意国外学者的观点,认为古代东西方之间途经红海的过境贸易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因素。红海很早就成为一条海上通道,随着人类活动的发展,尤其是印度洋上季风的发现和利用,红海两岸成为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据点,沿岸

① 何芳川:《阿克苏姆古国初探》,中国非洲史研究会:《非洲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第26页。

② 埃里克·吉尔伯特、乔纳森·雷诺兹:《非洲史》,第57页。

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2卷,第295—310页。

的港口纷纷崛起，直接促进了当地阿克苏姆国家的发展和繁荣。他指出，阿克苏姆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关于阿克苏姆国家的社会性质，学术界看法不一。有人认为阿克苏姆国家是奴隶社会，有人甚至认为是古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奴隶制得到充分发展的唯一国家；也有人认为，阿克苏姆国家是封建社会；苏联学者则认为阿克苏姆国家是一个保有浓厚原始公社制的早期封建制国家。何芳川认为阿克苏姆国家确实存在奴隶制，与古代罗马、希腊的奴隶制比较，奴隶的社会地位低下是相同的，然而，在奴隶的使用方面，两者存在明显的不同，由于阿克苏姆国家的战俘奴隶数量有限，因此在军队和生产领域的使用并不广泛。何芳川的结论是：阿克苏姆国家是一个不发达的奴隶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除奴隶制（主要是家长制奴隶制）以外，还存在浓厚的原始公社制的残余，也存在后来发展为封建制的经济因素。至于阿克苏姆国家衰落的原因，第一，由于伊斯兰教及其后的阿拉伯帝国的兴起，使途经红海的东西方贸易中断了，红海过境贸易的衰落，导致了阿克苏姆国家的衰败；第二，居住在阿克苏姆北方的游牧民族贝扎人的侵扰，也加快了阿克苏姆的衰败。[①]

（二）古代东非城邦

佐伊・马什和金斯诺思（Zoe Marsh，G. W. Kingsnorth）指出，公元7世纪后，在东非沿海地区，不断有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迁入。由于他们一向都以出海经商为生，又居住在他乡异域，所以在居民点构筑防御工事，于是就逐渐形成了城镇。[②] 埃里克・吉尔伯特和乔纳森・T. 雷诺兹认为，东非沿海出现的是“有时由国王有时由寡头集团统治的穆斯林城邦。城邦在军事上是弱小的，因为它们将社会储备主要用于增加财富而不是战争”[③]。罗伯特・罗特伯格（R. Rotberg）认为，根据有关

---

① 何芳川：《阿克苏姆古国初探》，中国非洲史研究会：《非洲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第26—48页。

② 佐伊・马什和金斯诺思：《东非史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7页。

③ 埃里克・吉尔伯特和乔纳森・T. 雷诺兹：《非洲史》，第111页。

的史料,从 7 世纪到 10—11 世纪,阿拉伯人和印度穆斯林在东非沿海的居留地逐渐形成。在东非沿海地区和各岛屿,大约从 11 世纪末或 12 世纪初起,就有了一些小城镇。它们主要是进行对外贸易的据点。他应用大量的中国古籍资料,包括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和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对东非沿海城邦的发展进行了阐述,叙述了当地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制度的情况。[①] 费奇(J. D. Fage)指出,“贸易据点对东非沿海的班图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伊本·巴图塔曾经说基尔瓦(Kilwa)的大多数居民是黑肤色的班图人。确实,阿拉伯移民在沿海地区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斯瓦希里伊斯兰文化。”[②]

中国学者何芳川对东非城邦的研究独辟蹊径,他针对国外的一些学者认为城邦是古代希腊和罗马的特有现象的观点提出挑战,认为古代东非也有城邦,并对古代东非城邦做了具体的解剖。他首先对城邦做了界定:“城邦是古代奴隶制的城市国家,是以城为邦、小国寡民的奴隶制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体。”根据这一定义,他对古代东非沿海地区的城邦做了剖析:第一,古代东非沿海地区城邦的产生和发展,在历史上源远流长,有着十分广阔的背景;第二,以城为邦、小国寡民是古代东非沿海地区城邦十分鲜明的外部特征;第三,古代东非沿海地区城邦是盛行奴隶制的商业城邦。鉴此,他得出结论:“大致在公元 10 世纪前后,东非的印度洋海滨发展和繁荣着这样一批城邦。它们为数甚多,各自为政,每个城邦都以一个多半是设防的城市为中心和主体,周围辅之以面积不大的、完全作为城市的补充的农业地带。它们都有完整的奴隶制社会的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是独立的古代国家实体。它们的政权具有阶级社会中国家应有的内外职能。它们规模虽小,却因商业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发达而富庶、繁荣,有着强劲的生命力,因而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

通过对古代东非沿海地区城邦的解剖,何芳川进一步提出:首先,

---

① 罗伯特·罗特伯格:《热带非洲政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112—124 页。

② J. D. Fage, *A History of Africa*, London, 1995, pp. 124-125.

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城邦并不是西方一家独有的骄傲。事实证明,在一向被认为落后的非洲大陆,就曾经出现过包括古代东非沿海地区城邦在内的三大城邦群(另外两个是以古代地中海沿岸的迦太基和乌提卡为代表的诸城邦,以及西非内陆的豪萨城邦),由此可见,用希腊人关于自己城邦的看法去观察世界,那将把世界其他地区的许多古代城邦排斥在城邦行列之外,这是不可取的。其次,认为城邦在古代世界具有普遍性,因此无论在东方或者西方,奴隶制城邦是一切古代奴隶制国家的必经阶段,那也是不妥的。在古代游牧和农耕两大世界中,游牧世界很难说必然经历城邦阶段;而在农耕世界是否必经城邦阶段也有待于进一步的科学考察。何芳川的结论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复杂的、丰富的,城邦产生的历史也是复杂和丰富的,因此,应该承认古代城邦的多样性。对于它们的政体、它们的原始公社残余成分的多少及其形式,不宜作过于细密的硬性规定,而是在以城为邦、小国寡民的外部特征的前提下,紧紧抓住其奴隶占有制的实质。[①]

(三)西非古国

在公元8—16世纪之间,西非先后出现了加纳、马里和桑海三大古王国。西非三大古国代表了当时非洲发展的水平,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之一。

加纳王国

关于加纳王国的崛起,戴维逊指出:“人们可以有理由发现铁的冶炼和对外贸易是两个主要的因素。它们对掌握了它们的人们有决定性的影响,它使政治和军事的集中成为可能。”[②]费奇的看法相同:“这个重要国家出现在尼格罗人地区和尼日尔以及塞内加尔河上游农业和产金地带的沙漠之间,地跨两面的边界,至少可以部分地用经济利益来解释。北非人以及代他们进行贸易的沙漠牧民要买尼格罗人所能提供的

---

① 何芳川:《古代东非沿海的城邦》,《世界历史》1983年第5期。

② 巴兹尔·戴维逊:《古老非洲的再发现》,第125页。

黄金和农产品，而用他们自己所能提供的尼格罗人所需要的金属和商品以及最重要的盐来换”，加纳的统治者控制了这种贸易，从中获得大量利润，这使它变得比所有的邻国更富裕和强大。[①] 罗伯特·罗特伯格研究有关资料后，对加纳的政治体制做了叙述：在公元10—11世纪，加纳达到顶峰时期。强大的君主在若干副王的协助下治理国家。每个副王在各自的领地行使一种从属权力，谋士们为国王和副王提供咨询。国王具有无比的权威，百姓对国王十分崇拜。[②]

中国学者陈绂根据国外的研究，对加纳王国做了介绍：第一，古加纳王国位于今加纳共和国西北约800公里处，两者没有政治实体上的渊源和联系；第二，加纳王国可能建于公元2—3世纪，至3—4世纪已经逐渐强盛。一些阿拉伯文献认为早期国王是白种人，而其臣民是索宁凯人。他指出，上述阿拉伯文献都在12世纪后，那时阿尔摩拉维德人（Almoravids）征服了加纳，所谓国王是白人，很可能与国家伊斯兰化有关系。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加纳王国的居民主体是索宁凯人（Soninke），而加纳王国的鼎盛时期也是索宁凯人统治的王朝；第三，现代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加纳”一词来自索宁凯人的国王尊号，意为“军事统帅”，后来很可能被外界误以为国王尊号即其国名；第四，考古发现，今毛里塔尼亚东南部昆比—萨莱赫村（Koumbi-Saleh）附近的古城废墟可能是加纳王国的首都，据研究，该城的商业和农业都曾经十分繁荣；第五，加纳王国随着撒哈拉商路的发达而鼎盛。加纳通过商品的贸易，聚集了大量财富，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第六，加纳的基本社会组织是部落和氏族，国王集世俗与宗教权力于一身；加纳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奴隶的使用比较普遍，包括家庭生活、农业生产、开采岩盐及其他体力劳动；罪人可以充当奴隶，战俘也是奴隶的重要来源；第七，公元11世纪中叶，加纳王国为了控制穿越撒哈拉沙漠的贸易，与西撒哈拉的桑哈贾人发生冲突，长期的争斗让阿尔摩拉维德人乘机而入，并于

---

① 费奇：《西非简史》，第36—37页。

② 罗伯特·罗特伯格：《热带非洲政治史》，第82—83页。

1076 年攻占加纳王国首都,加纳王国从此进入衰败时期;1240 年,加纳为马里所亡。[①]

马里王国

关于马里王国,费奇认为,它的特点是幅员广大,而且它有意识地以古代加纳的后继者自居。马里统治者发展和控制了加纳王国的贸易商道,并利用由此获得的财富来维持其军事和政治力量。与加纳相比,马里的贸易活动的规模更大,效率更高,因此也更加富裕和强大。14 世纪中叶,马里进入鼎盛时期,1324—1325 年国王穆萨(Musa)经开罗赴麦加朝圣,其盛大的排场震惊了世界。[②] 塞内加尔学者 D. T. 尼昂(D. T. Niane)对马里王国做了进一步研究,他收集了有关的文字资料和口头传说后指出,马里是一种邦联式的政治实体。国家由各省和若干属国组成,每个省又分为若干个区,这些区往往以氏族为单位,区由若干个村社组成,村社由当地传统首领管理。与当地传统首领密切结合的地方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国家的稳定。在经济上,马里主要依靠农业和畜牧业,大多数人从事农耕和放牧。贸易在经济生活中十分重要,马里是古代世界最大的贵金属生产国。[③] 马里学者 M. 莱-托尔(M. Ly-Tall) 则对马里的衰落做了分析,他认为在 14 世纪后,马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衰落过程,其主要原因是失去了对穿越撒哈拉贸易的控制,以及富拉尼人(Fulani)等周边民族的崛起所带来的威胁。[④]

中国学者郑家馨指出,关于马里社会制度,留下的历史资料很少,幸好其后的桑海王国的资料比较丰富,因此通过历史的逆向考察,可以对这个问题做出判断。马里王国的社会制度具有奴隶制的性质,它的商品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奴隶劳动,长途贸易就是很好的例子。奴隶主要通过战争中的战俘获得,而奴隶劳动也广泛应用于农业、手工业

---

① 陈线:《加纳王国》,《西亚非洲》1985 年第 6 期。

② 费奇:《西非简史》,第 45—51 页。

③ D. T. 尼昂:《马里和第二次曼丁哥人的扩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 4 卷,第 6 章。

④ M. 莱-托尔:《马里帝国的衰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 4 卷,第 7 章。

和商业等各个经济活动领域。从事经济活动的奴隶(如农业奴隶)被集中在一起生活,奴隶村落实行内婚制。郑家馨认为,在马里王国的后期,已经开始了逐渐形成农奴阶层的漫长历史过程。马里王国的政治制度是中央集权制,国王大权在握,拥有行政和司法的最后否决权,中央和地方官员均由国王任命。为了维持政权,国王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经济和贸易的持续繁荣,大大促进了马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交流。马里的一些城市逐渐发展成为伊斯兰学术中心,比如廷巴克图的桑科勒清真寺,其藏书数量惊人,成为著名的穆斯林世界的大学之一。值得指出的是,马里的文化具有独特的风格,它既吸收了北非伊斯兰文化的精华,又散发着西非黑人文化的特色。郑家馨最后指出,马里王国在西非历史上的意义在于,它使西非中心地区的经济和政治获得显著发展,并且超过了加纳王国时期的水平,而且创造了灿烂的西非中古文化,表现出非洲人民伟大的历史首创精神。①

桑海帝国

桑海帝国是非洲历史上西非地区最大的文明古国,塞内加尔学者西索科(S. M. Cissoko)强调指出,于16世纪建立的桑海,统一了西苏丹大部分地区,其版图超过加纳和马里王国,从而使数世纪以来形成的灿烂文明大放光彩。桑海在政治制度和行政体制方面颇有独创性,它摆脱了加纳和马里那种诸多王国联盟形式的传统政治体制,形成了森严的权力等级、层层集权和绝对的君主专制;在经济上,既有传统农业,又有城市商业;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城市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在文化上,伊斯兰教在城市中造就了一批文人精英,这批人以富有创造性的努力,为伊斯兰教增光添彩。②

中国学者屠尔康对桑海做了介绍。桑海建于公元7世纪,是尼日尔河北岸的一个小国。桑海兴起的原因是:第一,该国地处撒哈拉贸易商道的南北交通要冲,这种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它可以利用撒哈拉贸易

① 郑家馨:《煊赫非洲中古史的马里王国》,《西亚非洲》1986年第1期。

② 西索科:《12—16世纪的桑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4卷,第8章。

获得财富;第二,桑海人居住在尼日尔河畔,尼日尔河给他们带来了交通和贸易的便利,给他们带来了来自北方的新思想,包括治理国家的制度和方法。在穆罕默德·杜尔(Muhammad Toure)执政时期,桑海进入全盛时期。杜尔把伊斯兰教作为统治国家的思想基础,确立了伊斯兰教的支配地位,并按照伊斯兰教义进行行政改革。他制定了一套行政管理方法,根据个人的才能提拔官员;他实行职业军队制度,废除了以往全民当兵的做法。由于杜尔的支持,廷巴克图成为伊斯兰世界著名的文化中心。在桑海,奴隶劳动得到广泛使用。奴隶除了从战争中的战俘外,还可以通过买卖获得,因此奴隶制度在桑海已十分盛行。国王利用奴隶进行生产或者当兵,使奴隶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力量。奴隶劳动也成为桑海经济生活中主要因素之一。由于贸易的发展,桑海社会也形成了一个商人、手工业者和伊斯兰教士组成的特殊阶层,他们的社会比较优裕,与社会下层的贫苦农牧民有明显的差别。这种兴盛十分短暂。由于在桑海的政治制度中,没有明确的王位继承法,在杜尔统治的后期,宫廷的争权夺利不断,帝国很快衰退下去。屠尔康还对桑海帝国的发展各时期逐一进行了介绍。[①]

四、奴隶贸易

(一)国外的研究

对奴隶贸易总的看法

在西方学术界,对于奴隶贸易,存在着一些令人费解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15—19世纪的奴隶贸易是非洲传统奴隶买卖的继续,因此,发动奴隶贸易的责任不在西方。这种观点一度十分流行。[②] 英国著名的非洲历史学家库普兰(R. Coupland)在其著作《东非及其入侵

---

① 屠尔康:《桑海帝国》,《西亚非洲》1986年第6期。

② P. E. Lovejoy, *Transformation in Slavery: A History of Slavery in Africa*, London, 1983.

者》(*The East Africa and Its Invaders*)和《东非的开发》(*The Exploitation of East Africa*)中提出,阿拉伯人在东非从事奴隶贸易至少有二千年时间,换言之,阿拉伯人早在西方奴隶贩子进入东非前已经开创了此类活动。[①]

第二种观点认为,非洲奴隶贸易的迅速发展,非洲人和阿拉伯人应该承担责任。马什(Z. Marsh)和金斯诺思(G. W. Kingsnorth)说,促使东非奴隶贸易不断扩大的,主要是阿拉伯人。英国学者巴克斯顿在《非洲奴隶贸易和它的废止》一书中断言:"奴隶贸易的罪恶根子只能从非洲人自己那里去找。"法国著名非洲历史学家让·徐雷·卡纳尔也说,奴隶贸易是"非洲人自己亲手干下了毁灭自己的勾当"[②]。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上述观点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前苏联学者斯·尤·阿勃拉莫娃指出,"在欧洲人来到之前,非洲已经有了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奴隶制度在这里具有家庭的、宗法的性质。奴隶贸易后来以惊人的速度凶猛发展,乃是欧洲人发展奴隶贸易的政策所造成的直接后果。"[③]英国著名的非洲历史学家戴维逊在评论阿拉伯人的奴隶买卖时也指出,"没有任何迹象说明,奴隶买卖曾经在这种与东方的贸易中占压倒一切的地位,或者曾经不只是次要交易项目。现有的证据虽然微乎其微,却证明情况完全相反。……实际上印度洋上的奴隶买卖就像中世纪时许多国家之间的奴隶买卖一样,虽然持续不断,却是小规模的——是一种悲惨然而是次要的贸易,在财富和事业的总账中,没有什么重要性。"[④]

---

① 李安山:《国外对奴隶贸易和非洲奴隶制的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 年第 2 期。

② 吴秉真:《评当代西方学者对奴隶贸易的一些看法》,《世界历史》1983 年第 1 期。

③ 斯·尤·阿勃拉莫娃:《非洲——四百年的奴隶贸易》,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305 页。

④ 戴维逊:《黑母亲:买卖非洲奴隶的年代》,1966 年,第 155—156 页。

关于奴隶贸易的数量[①]

奴隶贸易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在资本原始积累的推动下,对非洲发动的一场劫掠。在这场持续400年之久的劫难中,非洲究竟损失了多少人口?由于不存在完整的奴隶输入和输出的统计资料,因此不可能推算出奴隶贸易的精确数字。尽管如此,各国专家们还是尽力收集和分析各种原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大致的推算。

大西洋奴隶贸易是非洲奴隶贸易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学术界的研究相对深入。专家们使用的第一种统计方法是计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所接受的非洲奴隶的数量。美国政论家邓巴(E. Dunbar)采用这种方法后,得出的总数为1388.75万人。20世纪初,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依斯(Du Bois)对邓巴的推算做了修改,他得出的最后结论提高至1500万人。1936年,人口统计学家库辛斯基(R. Kuczynski)在其著作《人口流动》中对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数量做了估算,他的结论与杜波依斯的完全相同,并认为这是相当保守的推算。库辛斯基所提出的数字得到各国学者的广泛引用。库普兰则认为大西洋奴隶贸易总量为2000万人。

1969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柯廷教授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数量做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和统计,并出版了《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人口统计》一书,书中的结论是956.61万人。他认为这个数字的误差区间为-9.8%至+10.3%,即大西洋奴隶贸易总量在800万至1050万人之间。

对于柯廷教授提出的数字,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非洲籍学者一般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这个数字过低。他们提出的数字为1540万。

印度洋奴隶贸易是非洲奴隶贸易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印度洋奴隶贸易的规模和数量的统计,通常以葡属东非和桑给巴尔这两个

---

① 参见舒运国:《外国学者有关奴隶贸易的若干数字统计》,《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

奴隶贸易中心的奴隶输出量作为估算的基础。达菲(J. Duffy)对葡属东非的奴隶输出量做了估算:1780—1800 年间,每年输出 1 万人,1850 年前,这个数字上升到 1.5 万人,其中十年高峰期为每年 2.5 万人。阿尔珀斯(E. A. Alpers)的估算比达菲详尽得多:葡属东非 1770 年代每年输出 3000 人,1780 年代为 4000 人,1820 和 1830 年代为 3.5 万人;在桑给巴尔地区,1770 和 1780 年代为每年 2000 人,1811 年达 6000—10000 人,1839 年为 4 万—5 万人,1860 年代上升到 5 万—7 万人。柯廷对桑给巴尔地区的推算是:1822 年以前为每年 1 万—1.5 万人,1860 年代为 2 万人,1870 年代和 1880 年代这个数字还有所增加。立夫(J. Lliffe)对桑给巴尔地区的推算是:1770 年代为 3000—3500 人,1834 年为 6500 人,1840 年代达到 1.3 万—1.5 万人。库珀(F. Cooper)在《非洲东海岸的种植园奴隶制》一书中,对桑给巴尔地区的推算是:1811—1860 年间每年输出 7000—20000 人,1860 年代上升到每年 2 万人。谢里夫(Sherriff)查阅了大量资料,尤其是以往为人忽视的波斯湾等地的港口海关资料后,认为历来对桑给巴尔地区的推算的数量都夸大了。他提出的数字如下:1800—1825 年间每年为 3000—3500 人;1840 年代为 1.3 万人;1860 年代和 1870 年代总共为 18 万人。

印度洋奴隶贸易的总量是多少?在 1978 年的海地会议上,伊尼科里(J. E. Inikeri)的估计为 200 万,而热尔波的数字则为 400 万。两者整整相差一倍。

在对奴隶贸易的研究中,奴隶在海路上的死亡率也是专家们关注的问题。对于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海路死亡率,有的专家注重其整体的估算,罗特伯格认为海路上的奴隶死亡率平均为 25%—33%,哈格里夫斯(J. D. Hargeaves)的估计为 1/6,而费奇认为至少是 1/6。另一些专家对各国贩奴船进行分别估算,有人认为,在大西洋奴隶贸易船中,法国船为 12%,荷兰和英国船为 17%,葡萄牙船为 15%,但是在 19 世纪禁止奴隶贸易后却上升到 25%—30%;达菲认为葡萄牙船的平均死亡率为 20%—30%。还有的专家根据不同时期进行估算,认为 16—17 世纪驶往巴西的贩奴船的奴隶死亡率为 15%—20%,19 世纪早期降

至10%。

对于印度洋上奴隶死亡率,至今尚无全面的推算,但是也有零星的估计。比如,18世纪末19世纪初,从西非至马斯克林群岛的海路死亡率为25%,由东非出发的贩奴船为21%,由马达加斯加出发的为12%。

奴隶贸易对非洲的影响

国外以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偏重于剖析传统非洲社会中的权力转移。由于奴隶贸易的冲击,参与奴隶贸易的地区通过贩卖奴隶,获得了财富和武器,这些地区的一些国家逐渐强大;此外,参与奴隶贸易的社会集团,如中间商人、负责对外事务的官吏等,也控制了越来越多的权力。这无疑是奴隶贸易带来的影响之一。然而,奴隶贸易对非洲带来的影响要深刻得多。例如,人口(尤其是大批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大量流失对非洲经济发展的影响;猎奴战争(或称为部落战争)的不断扩展对民族融合和民族国家的建立所带来的冲击;种族主义的掀起和黑人种族心态的变化;等等。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正在逐步展开。比如,有的学者已经明确提出作为非洲民族主义的泛非主义,其发端在于奴隶贸易。德国的盖斯(Geiss)教授具体剖析说,大西洋奴隶贸易被称为"三角贸易",即欧洲的工业品被运往非洲,在当地换取奴隶后,非洲奴隶又被运往美洲,被换成美洲的农产品或者原料,然后再返回欧洲。这种三地关系的互动,孕育了日后的泛非主义运动。还有的专家认为,正是奴隶贸易的痛苦经历和随之而来的黑人在全球的受歧视地位,唤醒了黑人民族觉悟。泛非主义是黑人民族觉悟产生和高涨的产物。[1]对于上述问题的深入的研究,必将有助于全面理解奴隶贸易对非洲的影响。

(二)国内的研究

如何看待奴隶贸易及其影响

奴隶贸易是国内史学界讨论得比较热烈的问题之一,讨论主要集

---

① I. Geiss, *The Pan-African Movement*, London, 1974.

中在如何认识奴隶贸易对非洲和世界的影响。

1963 年 10 月 9 日，杨人楩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西方殖民主义者在非洲贩运"黑奴"的罪行》一文，是我国学术界对非洲奴隶贸易研究的早期成果。文章阐述了奴隶贸易产生的历史原因、发展过程和后果，揭露和批判了奴隶贸易的罪恶。

"文革"后，对奴隶贸易进行了更深、更广的研究。除了出版介绍奴隶贸易的读物外[①]，学者们还发表了许多论文。徐济明在这方面撰写了多篇论文[②]，他首先对奴隶贸易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做出剖析，详细阐述了奴隶贸易从 16 世纪兴起到 19 世纪废止的过程，以具体事例说明奴隶贸易怎样为资本主义积累了资金，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阐述了西方主要国家在奴隶贸易中的活动。他认为，一切重大历史事件的根本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对于奴隶贸易这个对世界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仅局限于揭露其罪恶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方面去考察，说明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才能深刻揭示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然性及其发生、发展和废除的终极原因。此外，他对奴隶贸易给非洲带来的恶劣影响做了进一步研究：其一，奴隶贸易造成非洲劳动力的巨大损失和社会动乱，从而直接破坏了当地的农业生产的发展；其二，奴隶贸易在大量输出黑人劳动力的同时，欧洲及外地产品的倾销，又破坏了非洲本地工业；其三，奴隶贸易也堵塞了非洲新的经济发展机会。他的的结论是："在 14、15 世纪，非洲文明的发展程度未必低于欧洲，而且比美洲高得多。但是，经过 400 余年的奴隶贸易，西欧、北美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先进地区，拉丁美洲的经济也有了相当的发展，但非

---

① 吴秉真：《罪恶的黑奴贩卖》，商务印书馆，1984 年；袁闾琨：《万恶的黑奴贸易》，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

② 这些论文包括：《奴隶贸易与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历史》1983 年第 1 期；《奴隶贸易是造成非洲落后的重要原因》，《西亚非洲》1983 年第 4 期；《奴隶贸易引起西非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西亚非洲》1983 年第 6 期。

洲明显落后了。'欧洲和美国的先进，正是以非洲的落后为基础的。'历时400年的奴隶贸易，既是导致欧洲和美国先进的一个因素，也是造成非洲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还以西非社会为对象，再次解剖了奴隶贸易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他指出，奴隶贸易除了严重破坏非洲的社会生产力外，它在客观上也引起沿海和近海地区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使当地出现了新的社会经济因素。具体表现为沿海兴起了新的城镇和经济中心，西非的经济重心及政治权力中心由内地转向沿海，货币被广泛应用；在沿海各通商口岸出现了经纪人阶层，而且陆续出现一批受欧洲经济、文化影响的上层分子，如在欧洲或者本地教会学校接受教育的官员、商人、教师和技术人员；在传统的生产方式之外，沿海城镇中出现以雇佣劳动（即工资关系）为基础的劳资关系；沿海某些地区原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村社及家族结构开始松动，出现了以财产和权力为基础的新的继承方式。文章的结语说，把奴隶贸易仅仅概括为给西非带来破坏作用是不够全面的，因为它在客观上也促使西非内部新的社会经济因素的滋长。即便谈到破坏作用，也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社会生产力起的破坏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它对旧的生产关系和旧的传统也起一种破坏作用。因此，在研究奴隶贸易对西非的影响时，不能简单化地否定了事，而应该全面考察和分析。

沐涛以生活在尼日利亚的伊格博族为例，研究了奴隶贸易对非洲社会内部固有的奴隶制的影响。他认为，伊格博地区原先存在的是不发达的家庭奴隶制，大西洋奴隶贸易使当地猎奴活动空前猖獗，一切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遭到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奴隶贸易阻碍了伊格博奴隶制的发展。在禁奴运动开展后，奴隶制经济获得重新发展的机会，并向发达的家庭奴隶制过渡。[①]

吴秉真就奴隶贸易对黑非洲的影响做了探讨：在政治经济方面，"奴隶贸易像特大的风暴一样，席卷了黑非洲，使绝大部分的黑非洲遭到无比的苦难"。奴隶贸易不仅使黑非洲的社会经济长期停滞不前，

① 沐涛：《试论黑奴贸易与伊格博族奴隶制的发展》，《西亚非洲》1988年第1期。

而且造成整个社会大倒退。在社会思想意识方面,奴隶贸易产生种族歧视和部族问题 ,而这些问题至今还干扰着非洲的进步和发展。文章最后的结论是:"罪大恶极的奴隶贸易在非洲造成的影响是极其严重的,我想,对待它,正像我们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一样,应该全盘否定,而不应借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肯定它,为它评功摆好。"[①]艾周昌从殖民史的研究角度出发,对奴隶贸易做了解剖。他首先把奴隶贸易分解为两个时期: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和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他认为,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奴隶贸易为开发美洲殖民地提供了劳动力,从而为资本原始积累提供了财富;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奴隶贸易与机器工业的发展紧密相连,是培植棉纺织工业的物质基础。他还对奴隶贸易迟迟禁而不止的原因做了分析。[②] 罗建国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大西洋奴隶贸易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一,贩卖奴隶所取得的利润;二,奴隶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三,通过奴隶贸易而形成的非洲和美洲市场。[③] 高照明认为,奴隶贸易带来两种不同的结果:即欧美的先进富裕和非洲的落后贫穷。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充满了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冲突。在奴隶贸易中,人类为追求物质上的利益而牺牲了伦理道德,并将自身推向异化。奴隶贸易虽然促进了工业革命和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种暴力以弱肉强食为原则,非洲国家深受其害。奴隶贸易违背了人道主义。因此,目前西方国家理应多帮助发展中国家,这样人类文明才能实现自求。[④] 张金鹏以英国为例,剖析了奴隶贸易对经济经济的影响。他认为,自 17 世纪后,英国成为最大的奴隶贩子。奴隶贸易为英国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非洲黑奴对美洲的开发为英国工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廉价原料;奴隶贸易也改变了英国原有的经济体系,

---

① 吴秉真:《关于奴隶贸易对黑非洲影响问题的探讨》,《西亚非洲》1984 年第 5 期。

② 艾周昌:《关于近代非洲殖民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见中国非洲史研究会:《非洲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 年,第 171—178 页。

③ 罗建国:《全面评述大西洋奴隶贸易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江西大学学报》1984 年第 2 期。

④ 高照明:《奴隶贸易对非洲和欧美的影响》,《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 年第 4 期。

促使其经济结构、布局发生变化。[①]

关于东非奴隶贸易

国内对非洲奴隶贸易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集中在以西非为中心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上，1983 年以后，舒运国在对以东非为中心的印度洋奴隶贸易做了较长时间的研究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②] 他把东非奴隶贸易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6、17 世纪，其特点是，葡萄牙殖民者开创了东非奴隶贸易后，基本上垄断了这种贸易，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阶段的奴隶贸易规模不大；第二阶段为 18 世纪，其特点是，法国打破了葡萄牙对东非奴隶贸易的垄断，并成为东非最大的奴隶贩子；法葡同流合污，共同进行东非奴隶贸易；东非奴隶贸易的规模逐步升级；第三阶段为 19 世纪，也即所谓的"禁止奴隶贸易"，其特点是，西方殖民者以走私和"自由劳工移民"形式，继续进行奴隶贸易，这一时期除了法、葡外，美国和西班牙也跻身其间，使东非奴隶贸易的规模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舒运国认为在剖析东非奴隶贸易时，特别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东非奴隶贸易是非洲奴隶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禁止奴隶贸易"期间，东非成为非洲奴隶贸易的中心；第二，在东非奴隶贸易中，西方殖民主义者应该对此负主要责任，而阿拉伯奴隶贩子则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第三，奴隶贸易对东非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当地的一些国家和部落受到奴隶贸易的冲击而迅速衰落下去，并失去了抵御外来侵略的能力，从这个角度讲，它也为 19 世纪末西方大规模入侵和瓜分东非创造了条件。对于奴隶贸易中东非社会的变化，舒运国特别注意到商人—种植园主阶级的形成，他阐述了这个特殊阶级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分析了它们的特点：第一，使

---

① 张金鹏：《奴隶贸易对英国经济近代化的影响》，《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 年第 1 期。

② 舒运国：《东非黑奴贸易为何迟迟禁而不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3 年第 3 期；《西方殖民主义与东非奴隶贸易》，《郑州大学学报》1985 年第 1 期；《19 世纪的东非象牙贸易》，《史学月刊》1986 年第 6 期；《阿拉伯人与东非奴隶贸易》，《世界历史》1991 年第 5 期；《试析东非沿海地区的商人—种植园主阶级》，《郑州大学学报》1988 年第 4 期。

用残酷的暴力手段剥夺黑奴是这个阶级赖以生存的基础；第二，阿曼苏丹及其后继者桑给巴尔苏丹是这个阶级的总代表；第三，商人一种植园主阶级的活动与西方殖民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为西方殖民利益服务。

关于禁止奴隶贸易

国内学者对禁止奴隶贸易做了一些研究。舒运国认为，对于西方殖民者而言，他们在奴隶革命斗争的沉重打击下，为了适应工业革命所引起的生产力飞速发展的需要，不得不改变对非洲的殖民剥削方式，即废除奴隶贸易，而代之以就地剥削非洲劳动力，并把非洲改造成西方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吴秉真认为，西方启蒙思想家、欧洲的宗教团体对那里奴隶贸易的批判，加之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使反对奴隶贸易与废除奴隶制的呼吁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废奴运动。这也是禁止奴隶贸易运动掀起的原因之一。[①]

五、非洲近代史的开端及其阶段划分

非洲近代史的开端定于何时？关于这个问题，国外史学界的看法不一。

第一种观点，以“欧洲中心论”来衡量非洲历史。这种观点认为，非洲近代史是欧洲历史的延伸和扩大，因此，非洲近代史的开端是由欧洲历史进程所决定的。由此，他们按照欧洲历史的发展进程，从16世纪开始，把非洲近代史划分为“原始积累时代”和“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更有甚者，有人按照欧洲人在非洲进行殖民活动的不同阶段，把非洲近代史划分为“黄金贸易”、“奴隶贸易”、“传教与通商”、“殖民地”和“走向独立”五个时期，其中“奴隶贸易”是非洲向近代社会过渡

---

① 舒运国：《东非黑奴贸易为何迟迟禁而不止》；吴秉真：《非洲奴隶贸易四百年始末》，《外国历史大事记》（近代部分 第一分册），重庆出版社，1986年，第683—684页。

的转折时期。这种观点在西方史学界比较流行。

第二种观点,把奴隶贸易作为非洲近代史开端。西方进步学者,如英国的戴维逊和法国的徐雷-卡纳尔(Jean Suref-Canale),反对"欧洲中心论",认为在殖民主义入侵前,非洲人民独立自主地创造历史。为此,他们把15世纪中叶开始的奴隶贸易视为非洲历史的转折点,换言之,以15世纪中叶作为非洲近代史的开端。

第三种观点,非洲近代史的开端与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是一致的。苏联和东欧的学者多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标志着资本主义在英国的确立,从此,欧洲之外尚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地区和国家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至于非洲,奴隶贸易已经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因此更是如此。

中国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陆庭恩认为,历史分期问题乃是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问题。非洲近代社会的产生,是指由一种社会形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形态,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质变。但是,非洲进入近代社会,并不是进入完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进入一种变态社会,即由前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确立非洲近代史的开端,正是要寻找这种质变的起点。据此,他认为不能把15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在非洲贩卖黑奴或者1415年葡萄牙人占领休达作为非洲近代史的开端,因为这些历史事件对非洲历史发展的影响尚没有达到质变的程度。非洲历史的转折出现在16世纪,因为进行了半个世纪的奴隶贸易在其规模和危害程度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非洲社会固有的历史道路被逐渐堵塞,因而发生着畸形变化。因此,他提出非洲近代史的开端在16世纪初。[①]

张隆文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认为,非洲近代史是非洲各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也是非洲人民反殖反帝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的历史。对于非洲近代史的分期,主要障碍仍然是欧洲中心论(如

---

① 陆庭恩:《非洲近代史始于何时》,中国非洲史研究会:《非洲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第155—164页。

地理大发现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说、奴隶贸易说等），这个理论以欧洲历史发展变化为中心，忽视了非洲沦为西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因此是不可取的。“非洲观点”以非洲本身历史发展出发来研究近代史的开端，尽管有其合理性，但是也缺乏全面性。究竟如何划分非洲近代史的开端？文章认为，1876 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特二世在布鲁塞尔召开刚果河问题的国际会议，使西方列强对非洲的侵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标志着非洲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因此此事可以作为划分非洲近代史开端的上限，其理由如下：第一，此次会议规模大，参加的国家多，是一次为瓜分非洲而举行的国际会议，以这次会议为契机，西方列强对非洲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侵略扩张。因此，它是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第二，这次会议后，西方列强纷纷制定侵吞非洲的战略计划。从非洲全局角度来看，有了这些庞大的侵略计划，整个非洲的殖民地化才能成为现实。第三，在这次会议上，西方列强心照不宣地按照“抢先占领”的原则进行瓜分，这使 1884 年柏林会议的“有效占领”原则应运而生，从而在法律上确认了西方列强占领非洲的有效性。第四，这次会议后，非洲社会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完全改变了，非洲社会的矛盾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西方列强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完全取得了支配地位。[①]

艾周昌、郑家馨主编的《非洲通史 · 近代卷》的导论指出，本卷“叙述 16 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历史”。很显然，艾周昌和郑家馨的观点与陆庭恩相似。他们在导论中解释道：“非洲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不是由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由前资本主义（封建的、奴隶制的、原始公社制的）过渡到殖民地半殖民地，这是非洲各族人民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逐步由局部、次要的矛盾上升为全局、主要矛盾的时代。”

《非洲通史 · 近代卷》把非洲近代史划分为三个阶段。

---

① 张隆文：《关于非洲近代史开端的断限问题——与陆庭恩同志商榷》，《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 年第 2 期。

第一阶段:16—18 世纪末,这是非洲遭受殖民侵略和统治的初级阶段。当时奴隶贸易横行,给非洲大陆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同时,当时也是非洲古代大国衰落、分裂和瓦解以及许多新的国家创立和发展的时期。

第二阶段:18 世纪末至 1870 年代,这是非洲进一步遭受殖民侵略和统治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一方面许多国家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另一方面,非洲人民奋起反抗,进行近代化改革尝试和各种形式的社会变革,以挽救民族的危亡。

第三阶段:1870 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是帝国主义瓜分和再瓜分非洲阶段。在这一时期,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外,非洲国家均沦为殖民地;随着殖民地制度的建立,非洲社会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变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形成,反帝爱国活动席卷全非,民族主义开始兴起。①

中国学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依据非洲社会经济结构演变、阶级关系发展和社会主要矛盾演化的事实,建立了以 16 世纪为非洲近代史的起点、第一次大战结束为非洲现代史开端的新的非洲通史框架结构,弥补了西方学者阐述非洲历史的随意性和前苏联学者僵化的教条主义观点的缺陷。

六、殖民主义在非洲的历史作用

殖民主义在世界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这在非洲表现得尤为明显。

如何正确评价殖民主义在非洲的历史作用?这个问题在国外学术界存在争议。一种观点对殖民主义持肯定态度,如甘恩(L. H. Gann)

① 艾周昌、郑家馨主编:《非洲通史 · 近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23 页。

和杜伊格南(P. Duignan),他们认为殖民地制度"是非洲历史上传播文化最有力的动力之一,算起账来,它是功大于过"。第二种观点持全盘否定态度,如黑人史学家罗德尼认为:"有些人说:一方面存在着剥削与压迫,而另一方面殖民政府做了大量有利于非洲人的事,是他们开发了非洲。我们的论点是:这种说法完全是虚假的。殖民主义只有一面——它是一只吃角子的老虎机。"第三种观点持折中态度,英国学者菲尔德豪斯(D. K. Fieldhouse)说:"对于殖民主义不应该像通常加于它身上的那样全面赞扬或全盘否定。如果说它没有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来克服殖民地的贫困状态,也不能说它第一个使殖民地陷于贫困。"

关于殖民主义的影响,吉尔伯特和雷诺兹总结了西方学术界的研究后指出,一种观点认为,不应该把殖民主义对非洲历史进程的冲击看得"特别严重",因为非洲的政治文化是十分坚强的,它有能力在被殖民主义取代的困境中挺过来,也有能力在殖民主义衰退时重申自己的权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殖民主义的政治冲击十分深刻。由于非洲的殖民地化发生在欧洲的全球势力和影响的顶峰时期,因此欧洲对非洲的殖民统治显得异常强劲。殖民主义一度废止了非洲的主权,大多数殖民主义国家在其殖民地用欧洲的统治方式取代了非洲权力体系和行政管理制度。在另一些殖民地,尤其是英国间接统治下的殖民地,非洲的体制则从属于欧洲的权威之下。[①]戴维逊认为,殖民时代历史的内容无非是欧洲统治者对他们统治下的非洲人社会结构不断进行调整。殖民统治使宗主国文化对非洲历史形成了经久不衰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尽管不很深远,却远远不是只停留在表面。[②] 著名的非洲历史学家阿杜-博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殖民主义的影响确是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但必须一开始就强调,绝大多数积极的后果并非有意识计划的结果",而是"为促进殖民者的利益而采取的行动与措施所偶然带来的副产品"。阿杜-博亨从政治范畴、经济范畴和社会范畴三个方面进

① 埃里克・吉尔伯特、乔纳森・T. 雷诺兹:《非洲史》,第 336—337 页。

② 巴兹尔・戴维逊:《现代非洲史》,第 91 页。

行了分析。在政治范畴的积极影响是:比以前更大程度建立了持续的和平和稳定;形成现代独立的非洲国家在地理上的政治形态;引入了新的司法制度和文官制度;产生了新型的非洲民族主义,产生了泛非主义。政治范畴的消极影响是:非洲主权和独立的丧失;民族主义不是出自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而是来自对殖民主义的反抗;人为划分国界所带来的恶果。经济范畴的积极影响是:提供了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通过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非洲加入了世界经济;引入了货币经济。经济范畴的消极影响是:基础设施既不充足也不实用;自然资源贫乏的地区的发展完全被忽略;完全和有意识忽略工业化和加工业;原有的手工业和工业基础被摧毁;农业的单一产品结构;非洲人付出了惊人的、不公正的代价。社会范畴的积极影响是:城市化和人口增加;基督教、伊斯兰教及西方教育的传播;为非洲引入了新的社会结构。社会范畴的消极影响是:发展和扩大了城市与乡村的差别;产生了欧洲人和亚洲人的移民问题;种族主义的产生;妇女地位的下降。阿杜-博亨的结论是: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看,殖民主义是非洲过去和今后发展之间的分水岭。非洲历史进程已经并将继续受到它的影响。"因此非洲领导人今天在选择道路时最可靠的办法,不是把殖民主义一笔勾销,而是了解其影响,设法补救其已经形成的缺陷,并解决其失败所造成的后果。"[①]

如何评价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也是我国学术界近年来比较关注的理论问题之一。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1985)讨论了殖民主义的客观历史作用问题。学者们认为,非洲有长达400年被侵略的历史,殖民主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给非洲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有的学者认为,对殖民主义的客观历史作用应该一分为二,应该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这个问题。殖民主义的入侵的确使非洲传统社会逐步瓦解,进入了高一级的社会。但是,对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对于血腥的暴力掠夺应予以斥责。此外,殖民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

---

① A. 阿杜-博亨:《殖民主义在非洲:影响和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7卷,第634—654页。

个历史阶段对殖民地的影响各不相同，而不同的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影响也不一样。还必须指出的是，殖民地人民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而殖民主义者只是提供了一些条件。[①]

如何正确评价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的讨论，主要聚集于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理论上。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有的学者认为，殖民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没有什么进步意义，换言之，对于殖民主义应该应该采取全部否定的态度。林承节不同意上述观点，他认为，殖民主义者的活动目的是掠夺财富，其手段之野蛮，影响之恶劣，造成危害之深远，都是史无前例的，对此应作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殖民主义统治对殖民地在客观上的社会改造作用。后者并不是殖民主义者的主观目的，也不是其自觉行动，但却是社会行为不可避免地带来的社会效果。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何芳川指出，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在东方全然谈不上建设作用。梁志明认为，在理解“双重使命”时，应该注意在这两方面使命中都包含阻碍和促进两种因素和作用，不能简单理解为破坏性使命起阻碍和消极作用，建设性使命才起促进的积极作用。他同时强调，要把殖民统治者的主观动机与其政策措施的客观效果区分开来，应该依据历史资料，探索不以殖民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作用和社会影响。郑家馨提出，殖民主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作用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他具体剖析了殖民主义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特点后指出，无论从生产关系或生产力方面来说，都没有进步可言，因此，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在殖民地既不可能肩负“消灭旧社会的使命“，也不可能肩负“建设性使命”。他认为，在这一时期，殖民主义对殖民地的客观历史使命并不体现在“破坏

① 北研生：《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 年第 6 期。

性和建设性"方面,而是体现于它在突破世界的原始封闭性上的不可取代的作用。他对英国在印度和热带非洲的"双重使命"的表现做了具体的分析。李安山的观点与郑家馨相仿,他也认为对"双重使命"的理解切忌生搬硬套,千篇一律。他对此做了解释:首先是宗主国的情况不同,如工业化的英国和封建性的西班牙、葡萄牙,它们使"双重使命"在"执行"和"完成"上大相径庭。其次,殖民地区域不同(如城市和乡村、沿海和内陆),条件不同(如游牧方式与定居方式、集权王国与民族部落),社会集团不同(如知识分子或传统酋长、精英或民众),使所受影响存在质和量的不同。最后,时期不同(如殖民统治前期重绥靖,中期重稳定,后期重改革),对殖民地影响也不相同。[①]

郑家馨主编的《殖民主义史(非洲卷)》认为,殖民主义并不与资本主义完全同步产生和发展,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先驱,实际上也只是伴随着资本主义跑过其大半历史历程。对资本主义殖民制度与以往殖民制度的比较方面,作者认为它们的不同不仅表现在殖民剥削方式和殖民扩展范围上,更重要的在于殖民制度的作用和殖民地性质上。对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问题,本书认为破坏性使命和建设性使命中都是既有消极方面,又有积极方面。要把两种使命作为一个整体,看作一个过程中互相衔接的两个步骤。在过程的开端,建设性作用就寓于破坏性作用之中,而在整个过程中,破坏性作用同样也寓于建设性作用之中。可以说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之中两个并存而又矛盾着的方面。本书对以前研究薄弱的领域进行深化研究,包括对葡萄牙、比利时、意大利、德国等在非洲殖民统治所做的研究。作者对它们的殖民政策、殖民特点、殖民制度、殖民撤退等问题做了深入的探索。[②]

---

① 《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理论的学术讨论》,《北大史学》1995年第3辑;另可参考高津宁:《殖民主义在非洲有客观的历史作用》,《世界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4期;董小川:《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理论"再认识》,《光明日报》1992年10月10日。

② 郑家馨主编:《殖民主义史(非洲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请参见于展:《近十年来殖民主义史研究的新进展》,《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严钰钰认为,从 15 世纪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活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时间划分大致相当于西方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帝国主义时期。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方主要用暴力掠夺资源,如奴隶贸易;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它们力图把非洲改造成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进入帝国主义时期,非洲除了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外,还要成为投资场所和军事战略要地。①

李忠人指出,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特别是殖民主义统治制度的建立,使近代非洲的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土著国家政权被殖民政权所替代,传统的部落酋长制瓦解,家内奴隶制演变为专政奴隶制,并产生了新的商贸奴隶制和种植园奴隶制。与此同时,非洲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急剧变化,殖民土地制度代替传统土地制度,单一经济制度代替多种经济,同时兴起了近代化的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和城市。近代非洲政治经济和制度的变化有利于西方殖民主义者,他们在非洲掠夺了大量的财富,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变化打破了非洲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和社会的进步,非洲丧失了政治经济上的独立性,涣散了民族团结,瓦解了非洲社会的内聚力,使非洲沿着一条不利于自己的畸形道路发展。②

针对殖民主义在非洲的实际作用问题,中国学者还做了一些个案研究。

李安山在其专著《殖民主义统治与农村社会反抗——对殖民时期加纳东部省的研究》中,精心选择黄金海岸殖民地东部省为个案,从东部省的农村社会反抗的角度入手,把殖民主义统治同殖民地农村社会反抗的互动联系,包括宗教领袖与世俗权威的斗争,人民与殖民政府的敌对,平民与酋长们的冲突,下属酋长与最高酋长的对立以及由于可可

① 严钰钰:《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和瓜分非洲的三个阶段》,《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 年第 4 期。

② 李忠人:《殖民主义与近代非洲政治经济的演变》,《山西大学学报》1992 年第 4 期。

肿芽病导致的政治与科学的矛盾,向我们展示了殖民统治给殖民地带来的深刻变化和在黄金海岸引起的强烈反应。作者由此得出结论:"殖民主义在本质上说就是一种两难境地,当殖民政府将土著酋长结合进自己的政治体制后,它在当地政治舞台上造成了两个不能解决的难题:酋长权力的合法性和酋长对权力的滥用。这些问题引起不同社会阶层的反抗。"必须看到的是,"农村社会反抗在地方政治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引起了殖民政策的改变;在向殖民主义体制进行挑战的同时,农村社会反抗将传统的非洲平民转化为政治参与者,从而对民族独立运动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①。

汤平山剖析了利奥波德二世对刚果的统治,他指出,利奥波德二世在"刚果自由邦"实行了如下的殖民政策:第一,掠夺土地。利奥波德二世颁布法令,宣布刚果一切"无主土地"均属"刚果自由邦"所有。所谓"无主土地",包括当地居民尚没有直接耕作的土地,比如居民用以放牧、采集野果和处于休耕状态的土地。第二,垄断贸易。贸易大权掌握在"刚果自由邦"及其公司手中,有人形象指出,在"刚果自由邦",各国可以同土著居民以物易物、进行自由贸易的范围,连半平方公里都没有。第三,强迫劳动。为了掠夺当地的象牙、橡胶等产品,当局强迫土著居民从事采集、运输(包括修筑公路和铁路)的劳动。如不能完成所规定的数量,则将被扣押、鞭打、截肢,甚至砍头。第四,征收苛捐杂税。当局向土著居民强征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许多税收用粮食、家禽、瓜果和蔬菜等交纳。利奥波德二世实行的残暴的殖民统治,激起了国际社会、甚至比利时国内的强烈谴责和反对。1908 年,比利时政府宣布接管刚果,利奥波德二世长达 23 年的专制统治终于结束。②

钟伟云分析了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殖民政策后指出,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后,实施了一整套野蛮的殖民政策。在政治上实行分而治

① 请参见于展:《近十年来殖民主义史研究的新进展》。
② 汤平山:《利奥波德二世与刚果》,《西亚非洲》1982 年第 5 期。

之、直接统治和军事镇压的原则。与其他的殖民国家相比，表现出更大的残忍性。在经济上采取全面掠夺的措施，包括：(1)公开掠夺；(2)强迫当地人民交纳苛捐杂税；(3)实行强迫劳动；(4)掠夺土地，进行军事殖民和移民；(5)兴建工厂、商店和公路，以此把埃塞俄比亚变成进一步扩张的基地。在社会生活上，实行种族压迫政策，比如，在居住和公共场所以及社会职业方面，实行种族分离；推行所谓的"种族纯洁"方针，禁止种族通婚等。[①]

董波对两次大战间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的强迫劳动做了研究。他指出，至20世纪初，葡萄牙占领了非洲的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几内亚(现几内亚比绍)殖民地。由于葡萄牙经济落后，因此它的殖民政策不同于英法，它采取了更为原始和残酷的方法，来掠夺殖民地的财富，强迫劳动则是其中的手段之一。强迫劳动始于1870年代，至20世纪初，强迫劳动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尤其在两次大战期间，葡萄牙殖民当局更是肆无忌惮地推行。强迫劳动制度所采取的形式有：无偿劳工、契约劳工、向外输出的劳工和强迫种植。强迫劳动制度是葡萄牙殖民者为了把同土地紧密联系的居民变成廉价雇佣劳动力而实行的一种经济掠夺，它对当地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使当地原有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趋于解体；殖民地形成了单一作物的经济结构；对殖民地的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②]

潘兴明对中非"白人国家"南罗得西亚进行了解剖。英国在19世纪末瓜分非洲的狂潮中夺得大批土地，其中，它曾经考虑允许南罗得西亚和肯尼亚发展成为"白人国家"。肯尼亚始终没有成为"白人国家"，而南罗得西亚在1920年代便获得了近似自治领的自治殖民地的地位。但是，与其他"白人国家"相比，其"国家"地位始终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白人国家"南罗得西亚源于19世纪末英国在非洲的"二C

---

① 钟伟云：《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殖民政策剖析(1935—1941)》，《非洲历史研究》1988年第1—2期。

② 董波：《两次大战间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的强迫劳动》，《非洲历史研究》1986年第1—2期。

计划”。英国占领后，力图把它改造成一个“白人国家”，并且采取了许多措施。但是，它最终没有成为“白人国家”，其原因是：(1)从自然条件看，南罗得西亚的地区在白人移民迁入之前已经有为数众多的非洲居民，加之因各种原因而导致白人移民人数增长较慢，所以当地非洲人始终占绝对多数。这样的人口构成显然对“白人国家”不利。(2)从外部条件看，当时新的国际环境使得南罗得西亚殖民者不敢使用老殖民者的野蛮做法对付非洲土著，使得他们所建立的种族主义政权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唾弃，难以存在下去。(3)从其实行的政策来看，种族主义贯穿始终，迫使非洲人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抗，最终导致了白人少数统治的结束。[①]

七、非洲民族主义

(一)非洲民族主义

什么是非洲民族主义？西莱托(Ndabaningi Sithole)的定义是：“非洲民族主义是非洲人民实行自治的愿望，是他们要结束一切外国统治的愿望。从根本上说，非洲民族主义是非洲人民的意志。它反对外国控制，赞成非洲人统治，它是非洲人民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

英国学者托马斯·霍季金(Thomas Hodgkin)在《殖民地非洲的民族主义》等论著中，以非洲沦为殖民地后所出现的社会变化(如非洲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等)为视角，从中捕捉非洲民族主义产生的内外部因素。他对非洲民族主义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1)非洲的殖民地人民构成了一个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民族；(2)殖民地必须发动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民族解放运动；(3)在非洲殖民地，其社会精英同时具有两种合法身份，即既是前殖民社会的继承人，又是广大人民群

---

① 潘兴明：《中非“白人国家”及其崩毁之原因》，《世界历史》1993年第6期。

众的意志代言人。

对于非洲民族主义产生的背景和原因，科勒曼(J. S. Coloman)认为，有经济、社会、宗教、心理和政治等各种因素。经济因素是指在殖民地条件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转向以生产经济作物为主的殖民地经济，由此而引起了社会力量的变化，雇佣劳动力队伍大大壮大，中产阶级开始形成。社会因素表现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口流动加速。宗教因素主要指基督教的传播及其产生的影响。心理因素指西方文化和教育对人们产生的心理影响。政治因素反映在对传统权威的否定和"民族"象征的逐步形成。戴维逊(B. Davidson)对非洲民族主义的产生和演变做了阐述："一些非洲人接受了某种西方式的教育，并把它运用到各不相同的领地。他们发现了欧洲民族主义的价值，随之产生了这种民族主义的各种非洲模式，他们也取得了成功。尔后，在接近本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这些非洲人又努力摆脱这些模式所固有的局限性，并在这一过程中重新明确非洲同外部世界的关系。"

非洲学者对本地民族主义研究关集中在两个领域：非洲人民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反抗和非洲现代知识分子的作用。他们认为，非洲人民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反抗斗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反抗殖民主义入侵的斗争；(2)反抗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3)具有明确政治目标(要求自治等)的民族主义运动。此外，非洲学者做了大量的有关民族主义个案的研究，例如：戴克对尼日利亚的研究；阿贾伊对西非、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做了剖析；阿杜-博亨对加纳的研究，以及奥戈特对肯尼亚的研究等。[①]

中国学者对非洲民族主义做了一定研究。张甍指出，非洲民族主义除了具有一般反抗外来压迫的性质外，还具有自己特殊的性质，即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反对种族主义、具有"集体民族"的意识和厌恶资

---

① 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评述》，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非洲，变革与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伊·基曼博、阿·特穆：《坦桑尼亚史》，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71页。

本主义制度。这些特殊性质相互关联影响，对非洲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李安山认为，非洲民族主义是近代资本主义将非洲拉入世界经济体系和近代世界关系这一过程的产物。非洲民族主义思想的特点是：第一，本质特征是反帝、反殖和争取政治独立；第二，借用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口号，并赋予新的内涵；第三，具有温和的人道主义色彩；第四，强调泛非主义的种族性和大陆性。李安山将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880—1919年；第二阶段为1919—1935年；第三阶段为1935—1960年；第四阶段为1960年以后。他对四个阶段的特点做了分析。[①]

唐大盾阐述非洲民族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发展沿革，并做了一些个案研究。例如他对津巴布韦民族主义领导人西托莱的民族主义思想做了分析，认为其撰写的《非洲民族主义》一书，是非洲人中最早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民族主义问题进行全面阐述的重要著作。它重点阐述了战后非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原因、斗争目标和斗争方法，并有力地驳斥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白人至上哲学"，集中表达了作者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主张，有其进步性和积极意义。西托莱的民族主义思想基本上是温和、偏右和亲西方的，是战后非洲民族主义温和派的代表，并在以后有了新的发展和表现。唐大盾对南非早期的另一位主要的非洲民族主义者塞姆的"非洲新生"论做了剖析，这种理论认为非洲人具有"自己的"天赋和古老文明；受到殖民统治压迫的非洲人民正为自由和变革而斗争。因此，非洲将会新生。"非洲的新生"字义上指"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但更"意味着一种新的和独特的文明，不久将在世界上出现"。人们对塞姆的"非洲新生论"褒贬不一。但它却得到已故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高度赞赏和认同，并与前南非总统姆贝基20世纪末提出的"非洲复兴"论具有共同点和一致性，从而被认为是当代

---

① 张甍：《略谈非洲民族主义的特殊性》，《西亚非洲》1985年第5期；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第14—48页；《西非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及其表现形式》，《西亚非洲》1995年第3、4期；戴维逊：《现代非洲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非洲复兴思潮的重要渊源之一。

徐济明对非洲民族主义的先驱布莱登(E. W. Blyden)进行评价,认为布莱登对黑人种族做出的贡献是无可争辩的。他系统提出了非洲和非洲人在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思想,倡导黑人的传统精神,强调保持"非洲个性"。他致力于提高黑人种族对自己历史、文化的自豪感,阐述非洲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和成就,为重新恢复和确认尼格罗人种的尊严产生了重要作用。[①]

(二)泛非主义

作为黑人种族和非洲大陆的民族主义,泛非主义既是一种思想理论,又是一种政治运动。它在19世纪末诞生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中,无论在反对种族歧视、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中,还是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或是在建立民族经济、推动非洲实现统一的道路上,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它在非洲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国外学者的研究集中在以下方面:

第一,关于泛非主义的定义。著名的美国学者、泛非主义的创始人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指出,泛非主义的目标是,在所有的非洲人(指全世界的黑人)之间达到理智和理解的合作,以便"实现黑人在劳动和精神上的解放";美籍非洲裔历史学家洛根(R. Logan)认为,泛非主义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为了达到自治而发起的一场政治运动;尼日利亚政治家艾纳霍罗(Anthony Enahoro)坚持认为,泛非主义应该包括促进非洲大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避免非洲国家之间的冲突,推动非洲联合,增强非洲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塞内加尔政论家迪奥普(A. Diop)则把泛非主义等同于非洲的"个性"(Personality)和"黑人性"(Negritude);威斯鲍特(Robert G. Weisbord)把泛非主义定义为

① 唐大盾:《非洲民族主义的历史由来和发展》,《西亚非洲》1998年第5期;《西托莱的"非洲民族主义"著作与思想》,《西亚非洲》2007年第7期;《塞姆及其"非洲新生"论》,《西亚非洲》2005年第5期;徐济明:《西非现代民族主义的先驱者布莱登》,《西亚非洲》1988年第1期。

"20世纪的运动,……是一场全球范围内的血缘运动"。汤普森(V. B. Thompson)认为,泛非主义是"非洲人和具有非洲血统的人所从事的一项斗争,……一场战役,旨在恢复非洲文化中有价值的内容,它意味着非洲独立的政治团结"[①]。

第二,泛非主义诞生于美洲。美国学者维农·麦凯指出,"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泛非主义主要是由操英语的非洲人确立的"[②]。为什么泛非主义诞生于美洲?国内学者的分析更加深入和具体:首先,美洲有泛非主义产生的肥沃土壤。奴隶贸易把数以万计的非洲黑人运往美洲,共同的悲惨遭遇使他们打破了原来的地区、国家、民族和语言的界限,从而产生了共同的思想感情、共同的要求和共同的行动;其次,美洲黑人知识分子队伍的壮大以及美国的政治制度,为泛非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③]

第三,国外对于非统组织时期的泛非主义进行了一些研究。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观点:(1)非统组织在泛非主义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尼日利亚学者阿加拉(A. Ajala)指出 :"自1963年以来,非统组织是泛非主义编年史中唯一的大陆性组织";而美国学者扎卡尔(Mark W. Zacher)则认为,非统组织是"泛非主义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2)非统组织在推进非洲统一方面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托道夫特(W. Tordoft)认为,非统组织的成功之处是为成员国共同关心的问题和相互之间的争端的商讨和解决提供了一个平台;著名非洲问题专家科林·勒古姆也认为非统组织使非洲成为一个集体,它为非洲国家领导人提供了定期会晤的机会,以共同讨论非洲事务。(3)非统组织亦存在不足。塞尔范卡(Z. Cervanka)指出,非统组织在经济领域的表现令人遗憾;托道夫特则认为成员国不能遵守该组织的宪章,是它

---

① P. Olisanwuche Esedebe, *Pan-Africanism*, *The Idea and Movement 1776-196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ashington, 1982 ,pp. 1-3.

② 维农·麦凯:《世界政治中的非洲》,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120页。

③ 陆庭恩、彭坤元:《非洲通史(现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2页。

的失败之处。[①]

中国学者的研究近年来逐步加深。张宏明对泛非主义的定义加以补充和拓宽:泛非主义"在英语黑人世界表现为政治色彩突出的泛非政治思潮和运动;而在法语黑人世界则表现为文化色彩浓郁的泛非文化思潮和运动"[②]。

张忠民分析了泛非主义在美洲产生的原因:首先,美洲有泛非主义产生的肥沃土壤。奴隶贸易把数以万计的非洲黑人运往美洲,共同的悲惨遭遇使他们打破了原来的地区、国家、民族和语言的界限,从而产生了共同的思想感情、共同的要求和共同的行动;其次,美洲黑人知识分子队伍的壮大以及美国的政治制度,为泛非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③]

舒运国对早期(1900—1945)泛非主义的特点做了总结:第一,泛非主义诞生在美洲,早期的运动重心也在海外,而海外非洲裔则是当时泛非主义运动的主力军;第二,在理论上批驳种族主义,推翻对黑人种族的污蔑和歧视,是这一时期泛非主义斗争的主要内容;第三,早期泛非主义运动尚不成熟,从而表现出缺乏连续性和一致性。[④]

姜文灏对第五次泛非大会做了剖析后指出,泛非运动是世界近现代史上一场黑色人种的思想启蒙运动。在前四届泛非大会期间,泛非运动仅仅是一场黑人知识分子的思想运动,1945 年召开的第五届泛非大会则把运动推到一个新的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胜利,使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体系衰落和瓦解,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空

---

① A. Ajala, *Pan-Africanism: Evolution, Progress and Prospect*, Andre, 1973; M. W. Zacher,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d Collective Security, 1946-77*, New York, 1977; W. Tordoft,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Africa*, Indianapolis, 1984;唐大盾:《论非统——兼论非洲的统一与发展》,《西亚非洲》1993 年第 5 期;扬光、温伯友:《中东非洲发展报告, No. 5(2001—200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唐大盾:《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

② 扬光、温伯友:《中东非洲发展报告, No. 5(2001—200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7—8 页。

③ 陆庭恩、彭坤元:《非洲通史(现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22 页。

④ 舒运国:《试析早期泛非主义的特点》,《西亚非洲》2007 年第 1 期。

前高涨,这为泛非运动创造了新的历史条件;大战也给非洲的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革,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知识分子、工人阶级队伍发展和壮大,非洲人民的民族意识得到增强,民主思想深入人心。这些都为第五届泛非大会的召开准备了条件。第五届泛非大会具有与前四次大会截然不同的特点:(1)第五届泛非大会是以非洲人为主体的大会;(2)大会确立了"积极政治行动"的纲领;(3)大会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认识有了深化;(4)大会提出了经济自主的思想。这次大会是泛非运动史上一个转折点,突出了非洲人和非洲事务的内容,开始切实着眼于非洲本土的问题,使泛非运动的中心在思想上从美洲转移到了非洲,并在纲领、斗争手段和主张的内容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次大会是非洲人觉醒、独立思考和解决自己问题的首次例证。当然,这次大会也有不足之处,比如,泛非运动毕竟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运动,其观点和主张没有跳出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哲学的轨道,依然没有放弃"非暴力"的斗争原则。此外,大会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然而,从整体上看,战后泛非运动的积极方面占了主导地位。[①]

舒运国通过对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文件的剖析,认为这一时期的泛非主义呈现了三个特点:第一,非洲统一组织成为泛非主义的领导机构后,泛非主义的中心真正从海外转移到非洲本土;泛非主义的活动方式也从美洲和非洲的两地互动,更多成为非洲本土的运动;这些变化标志着泛非主义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第二,非洲统一组织的前期(1963—1979),泛非主义的重心集中在政治领域,其目标主要是推进非洲大陆的政治独立。第三,非洲统一组织的后期(1979—2001),非洲国家遭遇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和经济危机的包围,泛非主义重心转向经济领域。由于受到自身条件的制约,非洲统一组织在这一时期明显表现出力不从心的态势。因此,泛非主义需要新的、更高水平的领导

① 姜文灏:《战后初期泛非运动的新发展——论第五次泛非大会》,《西亚非洲》1984 年第 1 期。

机构,于是,非洲联盟替代非洲统一组织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①]

由唐大盾选编的《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选择了 1900—1990 年间泛非主义运动与非洲统一组织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献。这本文献的资料丰富,其中包括第一次泛非会议、第一届至第六届泛非大会、第一至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的决议和宣言;非洲统一组织的重要决议和宣言;以及泛非主义领导人的思想和言论。由于都是第一手资料,为研究泛非主义运动与非洲统一组织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值得一读的文章还有,刘鸿武《"非洲个性"或"黑人性"——20 世纪非洲复兴统一的神话与现实》(《思想战线》2002 年第 4 期),张忠民《泛非主义的产生及其对非洲的影响》(《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2 年第 3 期)等。

此外,中国学者还对泛非主义的思想家和领导人,诸如杜波依斯、加维、帕德莫尔等,做了一些介绍和研究。[②]

(三)非洲民族知识分子研究

非洲民族知识分子在非洲社会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它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尼日利亚史学家阿菲格博(A. E. Afigbo)指出,非洲知识分子"无可置疑地在殖民地非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历史上起更为重要的作用"。因为文化使他们得以接触西方世界的科学和社会思想,熟悉欧洲社会的风尚,并有能力在非洲的命运问题上同殖民国家对话。莫桑比克的蒙德拉纳(E. Mondlane)的评价更高:"大体说来仍然只有受过教育的少数人,才

---

① 舒运国:《试析非洲统一组织时期泛非主义的走向》,《世界历史》2006 年第 4 期。

② 郭文豹:《杜波依斯与非洲》,《西亚非洲资料》1983 年;夏吉生:《泛非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杜波依斯》,《西亚非洲》1994 年第 1 期;顾家稼:《杜波依斯与泛非主义运动》,《四川大学学报》1990 年第 1 期;宁骚:《帕德莫尔(泛非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世界史研究动态》1984 年第 11 期;黎伟:《泛非主义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加尔维》,《百科知识》1988 年第 6 期。

有可能了解事态的发展，才能同外部世界有充分的接触，也只有他们能够养成分析思维的习惯，从而掌握必要的工具来了解整个殖民现象。"[①]

非洲知识分子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李安山以西非为视角，对非洲民族知识分子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首先对民族知识分子做了界定："西非近代民族知识分子是指有着强烈民族意识，接受了一定程度的西方教育知识分子。"并指出，西非近代民族知识分子是西方文明输入非洲的产物，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与近代资本主义的活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从殖民体中的一个胚胎到活跃在反殖斗争中的一支政治力量就是它成长演变的全过程。从客观上讲，西非近代民族知识分子的形成与早期传教士在非洲的活动和 19 世纪前期兴起的废奴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西非近代民族知识分子的另一个来源是所谓的"克里奥人"，即在废奴运动中被释放的奴隶或者奴隶的后裔，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如果把西非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近代知识分子队伍大约在 1860 年代末至 1870 年代开始逐步形成，其表现为：第一，知识分子已经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出现；第二，当地的酋长和殖民政府已经把他们作为一个有影响、有活动能力的社会集团来看待。综观西非近代民族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可以将它们大体上分为两个时期，从民族知识分子的形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第一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 1950 年代末 1960 年代初为第二时期。在第一时期，西非知识分子对殖民统治的反应经历了从幻想迷惘到不满抱怨，再到要求内部改革的三个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反应，但是这毕竟是一种觉醒。在第二阶段，西非进入了为独立而斗争的决战阶段。各种以民族知识分子为领导的民族主义政党纷纷成立，他们已从要求殖民机构内部改革转到了争取摆脱殖民统治的斗争。作者的结论是：移植资本主义给殖民地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及其相伴的各种新的社会因素，民族知识分子的出现是其中

---

① 阿非格博：《殖民统治的社会影响：新的社会结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 7 卷，第 402 页；蒙德拉纳：《为莫桑比克而斗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第 112 页。

之一。尽管表面上西非民族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是依殖民政府的政策而变，但是从实质上看，则有更深一层的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从幻想迷惘到觉醒斗争是所有殖民地的民族知识分子都要经历的思想转变，而殖民统治从兴盛到衰亡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必然趋势。

李安山对西非民族知识分子做了进一步研究后指出，西非民族知识分子除具有一般知识分子的特征外，还带有西非历史和现实的特点：第一，内聚力特别强。这是因为：(1)他们共同受到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2)他们都掌握官方语言，从而使他们能自由地交换意见而不存在语言障碍；(3)他们大都接受过西方教育，因此在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上有共同之处。第二，具有强烈的种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绪。第三，具有积极进取精神和深沉的历史感。西非民族知识分子的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1)兴办教育、创办报刊会社，以启迪民智；(2)唤起西非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3)领导民族独立运动。为什么西非民族知识分子在民族独立运动中起一种持续的领导作用？作者认为，主要是西非无产阶级的组织程度不高，政治上不够成熟，大多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尚处于形成过程中，力量薄弱，而民族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最先接触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并认清了殖民主义的本质，同时又是文化水平最高的社会集团，且最少保守思想。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西非民族知识分子作为一支最先觉悟的政治力量，不但充当了反帝反殖斗争的先锋队，而且成为整个民族独立运动中的领导骨干。[①]

(四)非洲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民族主义思想指导下，非洲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大批昔日的殖民地摆脱了西方殖民统治，走上了民族独立之路。对此，戴维逊认为："推动非洲殖民地发生政治变革的因素很多

---

① 李安山：《论西非民族知识分子的形成及其发展》，《西亚非洲》1985年第6期；《论西非民族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作用》，《世界历史》1986年第3期。

相互关联,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殖民大国在 1945 年后虽然仍能抵制和推迟'非殖民化进程',但已无法完全阻止这一发展。"苏联学者认为,在非洲,不同的国家所规定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也各不相同,斗争通常针对殖民压迫的特殊表现形式而进行。由于政治力量对比和地方条件不同,斗争方式差异很大。有的国家采用武装斗争,另一些国家则采用其他斗争形式,如组织游行示威,召开群众大会,抵制宗主国商品,发起拒绝服从不公正法律的运动,在城市进行罢工,在农村组织暴动等。大多数非洲国家之所以能用非军事的方法取得政治独立,是世界各种力量对比的结果。社会主义力量的增强和帝国主义力量的削弱,大大促成了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苏联学者还剖析了非洲国家的各种政治力量组成及其结构:在大多数国家,无产阶级尚不成熟,而农民则日益卷入民族解放运动,资产阶级力量弱小,知识分子队伍不断壮大,并且承担了组织民族力量的任务。①

对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国内学界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陆庭恩就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研究谈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何发展迟缓? 原因如下:(1)西方殖民主义在几个世纪里对非洲实行超经济的残酷奴役和掠夺(主要表现为奴隶贸易),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它是使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受到阻碍的一个重要原因;(2)帝国主义在非洲实行残酷的经济掠夺和严密的政治统治,野蛮镇压非洲人民的反抗,这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受到阻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3)非洲本地资本主义发展非常缓慢而又不充分,作为西方殖民主义掘墓人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力量十分薄弱,这无疑成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发展迟缓的又一重要原因。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问题。文章认为,在分析这个问题时,应该坚持实事求是,对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做具体的分析是至关重要的。史实告诉我们,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用"资产阶级领导"是难以概括的。从整

---

① 戴维逊:《非洲现代史》,第 226 页;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非洲史 1918—1967》,上海人民出版社,"导论"第 1—35 页。

体来看,总称民族主义者领导为好,非洲民族主义者主要包括民族知识分子(有的属小资产阶级范畴,有的属资产阶级范畴)和资产阶级,还有封建王公贵族、酋长等。他们建立的政治组织是民族主义组织,建立的国家是民族主义国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要求建立民族独立国家。①

高晋元认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道路可以分为和平和武装斗争两种形式。非洲大部分国家通过和平方式获得独立,也有11个国家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赢得胜利。其中,阿尔及利亚、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安哥拉和津巴布韦完全依靠武装斗争,而马达加斯加、肯尼亚、突尼斯、摩洛哥和喀麦隆则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武装斗争。文章对上述11国民族独立战争的起因、特点和意义做了剖析。

民族独立战争的起因:(1)殖民帝国在这些地区具有较大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2)这些地区欧洲移民数量较多,因而存在与此有关的尖锐的土地问题和民族矛盾;(3)殖民当局顽固坚持殖民统治,对非洲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因此,合法斗争或者和平斗争方式难以展开。

民族独立战争的特点有:(1)几乎都在民族主义政党,尤其是比较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下进行;(2)部族因素对一些国家的民族独立战争产生深刻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其一,民族主义者把某个或某些部族作为发动和进行武装斗争的主要依靠力量,其二,部族因素被殖民主义者利用来分化殖民地人民,孤立和打击那些积极参加武装斗争的部族,达到削弱和扑灭民族主义武装斗争的目的,英、法、葡都使用了这个手法。其三,部族的隔阂和矛盾同政见分歧以及权力之争纠缠在一起,导致民族主义力量的分裂,甚至以部族主义冲击民族主义;(3)民族独立战争的方式主要是小规模的农村游击战;(4)国际援助,主要是非洲邻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对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

① 陆庭恩:《关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非洲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民族独立战争的意义有:(1)它为本国赢得了民族独立,并加速了非洲其他国家的独立进程,从而也加速了帝国主义非洲殖民体系的崩溃;(2)民族独立战争的胜利提高了非洲人民的民族尊严和国际政治地位,表明长期深受压迫的非洲人民有决心和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世界爱好正义事业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援下,争取自身的独立和自由;(3)民族独立战争的胜利为当时尚未独立的非洲地区的人民树立了光辉榜样,鼓舞他们坚持斗争,直至获得最后的胜利。[①]

由吴秉真和高晋元主编的《非洲民族独立简史》是国内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进行全面研究的一项集体成果。书中覆盖的时间近一个世纪(从19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非洲、非洲人民由反对殖民主义转而明确提出独立要求开始,至1990年纳米比亚获得独立,即非洲国家全部独立为止);而涉及的地区更是包括了整个非洲。该书的特点是,在内容上对非洲国家争取独立斗争的全貌叙述得比较简略,但是把以下两个方面作为重点,第一,二战后特别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斗争情况,因为这一时期恰恰是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全面高涨的时期,也是非洲各族人民获得独立的集中时期;第二,在非洲民族独立斗争中影响较大、在斗争方法上有典型意义的国家,包括埃及、阿尔及利亚、苏丹、加纳、几内亚、马达加斯加、喀麦隆、刚果、尼日利亚、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和纳米比亚等。此外,本书比较系统地叙述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英、法、葡在非洲殖民统治的崩毁过程。书中比较注意发掘在民族独立斗争中非洲国家内部部族和政党的作用和影响。这是国内第一部研究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争取独立斗争的专门著作,值得一读。[②]

此外,中国学者对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做了一些个案研究,比如高晋元和陆庭恩分别对肯尼亚的“茅茅”运动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失败的原因做了剖析,赵慧杰探讨了1954—1962年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

① 高晋元:《试论战后非洲的民族独立战争》,《西亚非洲》1986年第5期。

② 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

战争的社会历史背景、进程和历史意义。[①]

八、非洲的口头传说[②]

在非洲历史研究中，口头传说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史实来源。在对非洲的口头传说的研究中，美国的范西纳教授(Jan Vansina)的工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范西纳教授在二战后就对非洲进行实地考察，他积几十年的研究经验，对口头传说做了科学的总结，从方法论的角度阐述了运用口头传说进行历史研究的方法。

在历史研究中，从口头传说中寻找史料的方法早已存在。但是范西纳教授首先提出把口头传说作为历史来处理，并且把这种研究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范西纳教授认为，口头传说是用语词表达的信息，是从一代人以前的过去流传下来的叙述，这种信息必须是说的、唱的或者是用乐器演奏出来的口头陈述。口头传说主要包括四类内容：(1)熟记下来的发言演说(有的以诗歌形式表达)；(2)叙述，包括历史流言、个人传说、集体的叙述、关于起源的传说和所谓累积传说(如世系表)；(3)史诗，即叙事诗；(4)故事、成语和格言。由于各种因素(比如各地环境、交流方式和选择的标准等不同)，因此，口头传说必定有其失真之处，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反映社会的功能。口头传说是社会的工具，而且每一个口头传说都有自己确切的作用和功能。

如何处理口头传说，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工作。因为口头传说除了基本的内容和情节外，在不断传述的过程中，又被传述人加进了许多内

---

① 高晋元：《"茅茅"运动的兴起和失败》，《西亚非洲》1984 年第 4 期；陆庭恩：《肯尼亚"茅茅"起义的原因》，《史学月刊》1981 年第 2 期；赵慧杰：《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战争》，《西亚非洲》1986 年第 6 期。

② J. Vansina, *Oral Tradition as History*, Wisconsin University Press, 1985；请参见静水：《作为历史的口头传说》，《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 年第 10 期。

容。增加的内容中既有主观因素(个人的好恶、取舍以及夸大和缩小),也有客观因素(环境的需要)。范西纳认为,历代转述者的解释和修正,实际上如同历史学家,是对口头传说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恰恰是一种不容忽视的资料。当然,在处理口头传说时必须小心谨慎,必须精心区别无意识的曲解与有意识的篡改。辨别真伪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一方面把故事、诗歌和历史叙述进行比较,另一方面则参照其他学科(如考古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成果。

如何评价口头传说?范西纳认为,口头传说首先是一种资料,它不仅是关于过去的资料,同时也是关于人们怎样不断解释它的叙述;它不仅是一种原始资料,而且是一种假设,如同历史学家自己对过去发生的事件所进行的解释和假设。口头传说还是一种内部信息,它的涉及面远比一般有文字社会所保留的书面资料广泛得多,如人生观、迁徙争斗、生活、对外部世界的描述、关于本地人口或本集团各阶层的内部叙述等。口头传说也有缺陷,这主要表现在缺少年代顺序和参照资料,以及因为各种原因而产生选择性和解释。这些缺陷给历史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总之,口头传说在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如果没有口头传说,我们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的过去将毫无所知;口头传说所起的作用和书面资料是一样的,它们都是信息,只是口头传说的重要性因地区和时间而不同。

在我国,对于非洲的口头传说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高峥指出,每一个民族在文字发明或者传入之前,大多已经有口头传说产生。非洲的口头传说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包括神话、传说、祷词、民谣、故事和谚语等。它们从各个侧面反映了非洲人民的风俗文化和社会生活。由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多数部族和民族迟至 19 世纪尚无自己的文字,因此,口头传说对其早期历史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口头传说包含着事实与非事实,因此要从中发掘出有价值的史料,就必须了解非洲口头传说的特点,特别注意以下问题:第一,史实与理想;第二,史实与伦理;第三,史实与隐喻;第四,史实与解释。总之,口头传说中理想化的描述、伦理道德的说辞、文学性的隐喻和口述者的解释,都不能

算为纯粹的史实。但是,从另一角度看,它们又提示了历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情感,也是一些有价值的史料。实践证明,史学家发掘史料和把握史料的能力,则是其利用口头传说成功与否的关键。[①]

李保平对非洲的口头传说做了研究,就非洲口头传说中如何区别和甄别史实与非史实,论述了自己的看法。他的结论是:口头传说中既有反映客观历史的一面,也有失实的一面。"因此,史家在利用口头传说、口传历史时,必须熟悉当地的文化背景、了解非洲人民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和价值观念,必须对收集到的口头传说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要收集不同来源的传说进行比较,还要结合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成果,并与成文的资料作引证。"[②]

九、非洲的民族与部族

非洲大陆因其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形成了比较特殊的民族现象。西方学者以欧洲中心论为依据,过分强调非洲民族发展中的滞后现象,而前苏联学者则习惯于套用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他们对非洲民族的分析,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例如,前民主德国的一些学者认为,根据现代非洲多种多样的民族结构的国家,可以把非洲民族的发展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多部族结构的国家变成多民族的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利亚。第二种,孕育着部族冲突的多部族结构的国家,如乍得、布隆迪和卢旺达。第三种,目前虽然还没有部族冲突,但是在未来有可能形成为一些民族的多部族国家,如几内亚和塞内加尔。第四,同一部族构成的国家,如索马里和斯威士兰。这些学者认为,在非洲,民族仅在形成之中。但是,为了宣传,一些非洲国家的领袖却使用了"民族国

---

① 高峥:《非洲口头传说的史实分析刍议》,《世界历史》1990 年第 6 期。

② 李保平:《试论非洲口头传说中的史实与非史实》,《非洲历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家"这一概念，其目的是为了鼓吹国家的所有居民组成一个统一的民族。以资本主义为发展方向的非洲国家，把民族这个概念作为"和谐的现象"来利用，其目的是为了建立集权制的国家。苏联学者不同意使用"过渡性民族"或者"发展中民族"等概念。①

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讨，并提出了具有新意的看法。

顾章义对非洲民族的形成进行了研究。他指出，非洲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早在二三百万年前，非洲大陆已经有了人类活动；从公元前四千年起，非洲大陆开始出现民族共同体。至15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非洲前夕，不同的民族共同体已经到处可见。他的结论是：非洲的民族基本上是非洲土著居民自身发展而形成的不同的民族共同体。非洲大陆土著民族在历史上的频繁迁徙，一些民族相互间的混合，外来民族移入非洲后同当地居民的混合，使一些原有的民族共同体演变成别的民族共同体，这些都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十分正常和自然的现象。然而，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非洲民族发展的进程，非洲现代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也遭到破坏。直到非洲国家独立后，非洲各民族才为自身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②

1982年，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等四个单位先后两次联合举行"非洲民族形成问题学术讨论会"。会议在讨论非洲民族形成问题时，出现了四种不同的观点。③ 观点之一：在非洲，虽然也存在民族共同体，但是大多数仍没有发展成民族，而只能称之为部族。其理由为：第一，非洲的大多数人类共同体称自己为"Tribe"，而不是"Nation"或者"Nationality"；第二，这些人类共同体从生活方式到文化水平、社会经济状况都十分落后，甚至还处于原始状态。

观点之二：非洲人类共同体大多数处于部族阶段，但是不能以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作为区分民族和部族的界限，因为这种界限在事实上

① 《"非洲民族、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发展"国际学术会议》，《世界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2期。

② 顾章义：《非洲民族源流初探》，《西亚非洲》1981年第6期。

③ 顾章义：《非洲民族形成问题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西亚非洲》1982年第5期。

是很难划定的。

观点之三:目前非洲人类共同体大多数是民族,只有少数是部族。这种观点认为,我们既然已经承认非洲国家都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都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那么如果再说这些国家的人类共同体还不是民族,而是部族,那岂不是自相矛盾?这种观点还进一步指出,在西方入侵前,非洲的大多数人类共同体尚处于部落或者部落联盟阶段。但是在西方入侵后,非洲传统社会结构受到破坏,新的经济因素(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开始成长。二战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很大发展,有的国家还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形势促使非洲的人类共同体发生变化,即由原来的部落和部落联盟一下子进入了资产阶级现代民族的行列。应该指出,与欧美的现代民族相比,非洲的民族还不那么成熟,还保留着不少前资本主义的因素。这就是非洲民族的特点。当然,非洲的人类共同体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在一些偏远落后的地区,也确实存在少数部族。

观点之四:从历史上看,非洲是世界上形成民族最早的地方;从当前看,非洲的人类共同体,除个别尚处于原始社会发展阶段外,都已形成为民族,所谓"部族"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按照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四大特征,古埃及人是世界上最早形成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二战后,绝大多数国家获得独立,民族经济得到发展,民族意识大大增强,因此,非洲各地的人类共同体除个别尚处于原始社会发展阶段外,都已形成为民族。人类社会没有"部族"这一发展阶段,非洲也不存在"部族"这样的人类共同体。对于"部族"这个概念,有人认为在非洲是不存在的,国内经常使用这个概念,其原因有三:其一,解放初翻译出现误导,把斯大林著作中原意为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民族译成了"部族";其二,对非洲部落制度的残余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因此把非洲部落制度的残余看成"部族"问题;其三,把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看作只适合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人类共同体。

通过这两次讨论,与会者认为,非洲是世界上民族情况最复杂的地区,因此,认真研究和解决非洲民族形成问题,对于了解非洲的历史和

现状，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都有重要意义。

宁骚对非洲的部族问题做了进一步探讨。他认为，从整个人类的族体(ethnic groups)构成情况来看，既有处在同一水平的族体，又有处在不同水平的族体。在非洲，主要的族体有：种族共同体、氏族和部落共同体、部族共同体、正在形成中的民族、已经形成的民族，以及语言和传统文化共同体。在上述众多族体中，部族是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什么是部族？所谓部族，就是在部落联盟、雏形国家和早期国家的基础上形成的更高阶段的族体。部族和民族有什么区别？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部族尚保留着氏族、部落组织的躯壳，尚未最终摆脱血缘联系的天然纽带。既然在大的族体下还存在许多小的族体，那么大的族体的稳定性就不够了。在面临捍卫共同部族利益时，同一部族所属的氏族和部落一般表现出向心力，而当在同一部族内部发生利益争执时，所属的氏族和部落则表现出离心力。所以，尽管乍一看来非洲许多部族已经具备了民族四要素，但那是比较初步的，要发展到民族阶段，还要走一段漫长的路。他指出，在当代的非洲政治生活中，部族因素渗透到各种政治领域里，影响到各个方面。在非洲，政党与部族关系密切；部族矛盾渗透到军队，出现了军队部族化；部族矛盾反映在政府机构；而跨界部族的大量存在，是引发非洲国家之间边界冲突的诱因。是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舞台使部族问题如此深刻影响当代非洲政治生活？第一，非洲传统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的一般水平，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第二，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西方殖民主义造成的恶果；第三，在殖民征服和殖民统治时期，帝国主义国家利用非洲部族之间的隔膜和分歧，推行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的政策，有目的、有计划地挑动他们相互残杀；第四，各帝国主义国家实行的殖民地管理制度，阻止和妨碍了非洲各部族聚合成现代民族的过程。宁骚的结论是：传统的非洲社会形态和西方殖民主义统治，是非洲部族问题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因此，部族矛盾的解决，现代民族的形成，有待于完全根除帝国主义列强直接的或间接的殖民统治及其造成的恶果，有待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对传

统社会进行根本改造，并对国内各族实施一般性民主的民族政策。[1]

吴秉真对非洲部族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指出，在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道路上，大致都经过部族或与之相似的社会组织的阶段。但是，非洲撒哈拉以南的部族似乎特别吸引人们的注意。撒哈拉以南许多非洲国家的部族问题都很突出，这个地区的部族有其特点：首先，它与部落不同，很难说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在非洲许多部族中，由于历史的原因（如奴隶贸易），其人口中有相当数量来自不同地区，讲不同语言，信奉不同宗教；此外，在黑非洲的社会基层组织，其传统的世袭制度也都不以直接的血缘关系为主；其次，它与民族似乎也不同。因为非洲部族在形成中缺乏统一的语言和宗教，同时因为历史的原因，许多部族又被划分在不同的国家，有的散居在相距遥远的不同地区，因此用民族的基本标准来衡量，就存在很大差距。由于非洲部族本身的特点，部族矛盾和部族冲突表现得十分突出，更有甚者，非洲国家的政变、边境冲突以及难民问题都与部族矛盾和冲突发生着有机联系。她用大量的事实说明，非洲的部族矛盾和部族冲突是西方殖民主义埋下的种子。尽管非洲的部族问题十分复杂，但是非洲国家重视谋求这一问题的解决，因此，这个问题还是有望得到解决的。[2]

顾章义提出了与上述观点不同的看法，他否定了非洲存在部族的观点。他指出，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适合于各个地区和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人们共同体，即它不仅适合于欧洲地区，也适合于亚非等其他地区，既适合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适合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因此，不能因为非洲社会还存在部落制度的残余，就定义为“部族”，更不能因为非洲经济落后，就否定其民族的形成。他认为，把非洲一些人们共同体定义为“部族”而不是民族，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际上也不符合非洲社会的现实情况。多年来，顾章义坚持自己关于非洲“部族”问题的看法，认为所谓“部族”，在理论和实际上都是缺乏依据的。更

---

① 宁骚：《试论当代非洲的部族问题》，《世界历史》1983 年第 4 期。

② 吴秉真：《关于非洲部族问题的探讨》，《西亚非洲》1986 年第 5 期。

有甚者,“部族”说在国内学术界引起混乱。因此,“部族”不能作为对落后民族或者前资本主义时期民族的特别称呼。[①]

顾章义的观点得到了李安山的支持。李安山在其专著《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专立一章(第六章《部落、“部族”与“部族主义”》)进行讨论。他的观点十分鲜明:即在非洲学研究中不要使用“部族”一词。原因如下:第一,“部族”一词是典型的误译,应该予以更正。第二,“部族”一词含糊不清,中国学者的理解各不相同。第三,中国史书中的“部族”与我国一些学者在非洲学研究中使用“部族”时的理解相去甚远。第四,国际学术界已基本摒弃 tribe(中文译为“部落”,有些人译为“部族”)一词。第五,大多数非洲人不喜欢“tribe”这一带有歧视性的称谓。他说,我国学术界应该放弃“部族”,而改用“××人”或“××族”,放弃“部族主义”的提法,而改用“地方民族主义”这一权宜提法。[②]

包茂宏认为,冷战结束后,族际冲突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问题。与世界其他大洲相比,非洲的族际冲突具有层次多、内涵广、复杂化、烈度大、时间长等特点。它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影响更深远。非洲的族际冲突可以分为种族、民族、部族和氏族四个不同的层次,其内容也相当广泛。频繁发生的族际冲突导致非洲族际心理集体失衡,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断,甚至出现倒退,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不安,难民问题严重;族际冲突还引发地区冲突或者使冲突国际化。造成非洲族际冲突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本国民族发育不充分的因素,也有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既有历史上根深蒂固的族际对立情绪的发酵,也有当前政府政策失误的引导。为了解决非洲的族际冲突问题,非洲国家在实践中探索出一些成功经验:正视现实,制定并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是解决非洲族际冲突的当务之急;改造酋长制,逐步消灭部族主义;发展生产

---

① 顾章义:《评非洲“部族”说——兼谈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部族”还是“民族”?——评人们共同体的“部族”说》,《世界民族》1997年第2期。

② 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

力,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是解决非洲的族际冲突的根本方法;联合行动也是解决非洲族际冲突的有效方法。①

十、南非史研究

南非史学界对本国历史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

一,南非学者对于种族隔离制度的定义,基本是一致的,即种族隔离制度是以种族为划分基础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等级制度。它的特点是,对黑人(也含有色人种)进行歧视,并剥夺他们的基本权利。这种制度虽然早已出现,但是1948年国民党政府确定其成为种族关系政策,并使之法律化和制度化。关于这种制度的起源,说法众多。有的学者追溯到布尔人的边境传统,有的认为是传教士设立的保留地,还有的归结于开普殖民地或者南非金矿业的兴起。根据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布尔人是种族隔离制度始作俑者,另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19世纪末采矿业的兴起,才真正奠定了种族隔离制度的基础。

二,关于资本主义与种族隔离制的关系。南非激进史学派的学者认为,就其概念而言,阶级和种族不可同日而语,是完全不同的。然而在南非,这两者却紧密相连。种族之间的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同时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又得益于种族隔离制。经济发展可能会使种族隔离制朝"合理化"方向发展,但是它不能带来根本的变化。种族隔离制会日益强化,因此,要废除种族隔离制就必须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资本主义并没有创造种族主义,但是却利用和扩大了种族主义的意识,并通过建立种族隔离制而使其剥削合

① 包茂宏:《论非洲的族际冲突》,《世界历史》1999年第1期;关于部族问题的讨论,还可以参见吴增田:《黑非洲部族问题研究综述》,《西亚非洲》1998年第4期;阮西湖:《关于术语部族》,《世界民族》1997年第2期。

法化。在南非的历史和现实中,资本与种族主义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资本的积累和扩张需要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制通过资本而得到强化。

三,关于国家机器的作用。南非激进史学派的学者对南非的国家机器做了研究,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控制南非人民的工具:其一,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一方面国家通过立法夺取了黑人的土地,迫使其转化为无产阶级;另一方面,通过给白人工人以各种保护,使其成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其二,南非国家机器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通过超经济手段完成了对非洲农民土地的剥夺、对黑人工人的压迫,并通过立法建立了种族隔离制度;其三,利用种族隔离制度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四,关于史学研究的若干特点。南非学者对本国历史的研究具有下列明显的态度:其一,对历史的研究,尤其是近现代史的研究,学者们十分注意与现实的密切联系,他们的选题围绕着南非的现实而展开。对此,有人评论说,南非的历史研究基本上是受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激发而进行的。其二,在历史研究中,采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一方面,历史学家采用其他相关学科的已有成果和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其他学科的学者加入了历史研究的行列。这种多学科的交叉,大大丰富了研究的手段和成果。其三,近年来,南非近现代史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社会史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学者们把目光转向下列课题:在工业化进程中农村的地位和作用、城市化及其伴生的社会现象等。[①]

在非洲国别史研究中,中国学者对南非的研究比较集中,因此研究成果也比较多。

(一)早期殖民史

郑家馨对南非的早期殖民史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首先,他回答了

---

① 参见郑家馨:《南非史研究的发展状况及特点》,见张象主编:《彩虹之邦新南非》,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第437—452页;李安山:《南非近现代研究述评》,《世界历史》1994年第6期。

为什么荷兰人来到南非并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扩张的问题。他以世界市场及其对荷兰人的影响为视角，通过剖析阿非利卡人的社会阶级结构，指出当时国际贸易的推力和阿非利卡人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的张力，促使荷兰人从欧洲来到南非，他们与世界市场的联系不但成为他们征服当地土著居民的优势所在，而且也是大规模土地扩张的动力。其次，他对布尔人占领南非后的民族关系做了分析，指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组织水平相对落后，因此在布尔人的剿灭下，桑人和科伊人失去了独立民族的地位；班图人依仗其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组织结构，尽管遭到布尔人的征服，但是没有失去主体民族的地位，这为日后班图人重新成为南非的主人准备了条件。[1]

(二)英布战争[2]

英布战争爆发于1899—1902年。它是一场具有世界影响的战争，因为已经成为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标志；同时，它在南非历史上，又是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争，因为战争直接决定了南非的历史发展进程。对于这场战争的性质，国内外史学界均存在不同看法。英国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英国作战的目的是“传播西方文明”、“建立社会秩序”、“保护欧洲侨民的利益”、“引导落后民族走向自治”；布尔史学家则认为，这是布尔人“捍卫独立”的战争；苏联史学家认为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是“争夺剥削非洲人的优先权的战争”，但同时又认为布尔人的作战是为了“进行自卫”。中国学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张谦让认为，由于南非钻石和黄金矿业的迅猛发展，生产的高度集中引起了垄断资本的形成和垄断组织的产生，罗

---

① 郑家馨：《南非开普殖民地的建立和殖民土地扩张》，《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论19世纪以前南非的社会经济结构》，《非洲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殖民地扩张与南非各族的历史命运》，《世界民族研究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论布尔人大迁徙中经济因素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5期。

② 请参见张谦让：《南非钻金矿业的发展与英布战争》，《非洲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试论英布战争性质问题分歧意见的症结》，中国非洲史研究会：《非洲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第203—221页；郑家馨：《英布战争性质辩析》，《世界历史》1984年第6期。

得斯和克鲁格为了保证在激烈的争夺中取胜，获得高额垄断利润，总是力图夺取和独占南非的经济利益；英、德等国际垄断资本侵入南部非洲，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为了在争夺南部非洲的斗争中战胜对方，独占高额利润，总是力图霸占原料来源地、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国人、德国人、布尔人等殖民主义者在经济上瓜分南部非洲的同时，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南部非洲殖民地的活动，及瓜分和重新分割非洲领土的斗争，这些斗争不断尖锐和激化，最终酿成了英布战争的爆发。就战争双方而言，张谦让认为，英国发动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是十分明显的，因此，英布战争性质的分歧的症结主要在于对布尔人的认识。他从布尔国家的性质、战前所奉行的政策、从事战争的目的和英布勾结到英布联合四个方面进行剖析。他认为，第一，布尔国家是殖民国家；第二，布尔人奉行的是掠夺和扩张的政策，是残酷剥削和压迫非洲黑人的政策，是保护布尔人殖民利益的政策；第三，布尔人对英作战的目的是为了重新瓜分南非黑人的土地，为了争夺钻金矿和铁路的垄断权，夺取南非地区的霸权；第四，由于南非土著是英布殖民者掠夺和奴役的共同对象，这就决定了英布双方从争夺、火并最终走向联合。文章最后的结论是：英布战争中的英布双方的参战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打击对方，以建立自己在南非的殖民霸权。因此，布尔人所进行的战争同样是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而绝非“被压迫民族”的“自卫战争”。郑家馨的研究更注重经济领域，因此也更深入一些。他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一，剖析布尔人在南非的阶级地位；其二，研究导致这场战争的政策，特别是布尔共和国战前三十年的政策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其三，分析布尔地主“捍卫独立”的真实的经济内容。他认为，第一，布尔人绝非无害的“和平移民”，他们的土地依靠疯狂损害土著居民的地权而获得，因此他们同非洲人的关系建立在深刻的阶级对立的基础上，他们是殖民主义者；第二，战前三十年布尔统治集团在南非的政策表明，它们推行的是典型的殖民兼并政策，因此与英国的政策无异，英国推行的“开普—开罗”殖民帝国计划与布尔人的“布尔非洲”计划在实际中势必发生严重冲突，这是英布战争的深层

次原因;第三,布尔人"捍卫独立"的真实经济内容是维护其单独统治非洲人而能获得的最大殖民利益。他的结论是:这场战争的性质不是交战的一方(布尔人)力图推翻民族压迫,而另一方(英国人)则为维护这种压迫。战争是为了掠夺自然资源,为剥削黑人劳动力的优先权,为建立有利于自己的经济体制而进行的,因此,这场战争的实质不是民族战争,而是殖民战争。

(三)种族隔离制度

杨兴华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起源、形成和当时的状况以及其得以长期维持的原因,做了比较系统的剖析。他认为,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起源应该追溯到17世纪中叶,即1652年荷兰殖民者占领和建立南非的开普殖民地开始。随着白人殖民者不断掠夺当地非洲居民的土地,殖民地也不断扩大。尽管白人殖民者在南非掌握了权力,但是白人处于绝对的少数,他们被黑人像汪洋大海一样包围着。这种社会人口结构,成为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主要基础。在1910年以前,英、荷殖民者对当地居民实行种族主义政策主要通过战争大规模杀害黑人,同时也制定了个别种族歧视法令;随着1910年南非联盟的成立,白人种族主义统治进入一个新时期,其标志是通过白人政权的一系列立法活动,使种族歧视法律化和制度化。这些种族主义法令不但把黑人的一切政治权利剥夺干净,使黑人遭受最残酷的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剥削,而且使黑人处于被隔离、被歧视、被迫害和被屠杀的境地。于是,种族矛盾成为南非各类社会矛盾中最尖锐和主要的矛盾。南非当局为什么能长期坚持种族隔离制度?这里存在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原因:其一,南非白人统治集团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使南非当局有可能维持庞大的国家开支和保证白人较高的经济、文化生活标准,这是南非巩固种族隔离制度的基础。其二,南非白人统治集团掌握着强大的镇压机器和宣传工具,也善于采取镇压和分化相结合的反革命两手策略。其三,由于南非当局推行种族主义制度,使白人工人阶级与白人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得到掩盖和缓和,而白人种族和黑人种族之间的矛盾却始终显得

尖锐和突出。大多数白人工人站在南非政府一边,维护种族隔离制度。其四,南非当局得到英美等西方大国的支持。其五,南非反种族隔离的力量尚不够强大,因此在很长时间里处于劣势。这表现在黑人的斗争基本上是自发的,缺乏统一和坚强的领导;黑人工人阶级还不成熟,更没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的领导;黑人农民深受传统的部落的影响,而且被分割在各个黑人家园;国内各个解放组织的政见不一,不能团结一致,更削弱了斗争的力量。[①]

刘兰对于阿非利卡人政治经济优势地位的确立与种族隔离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历史考察,揭示了两者的内在关系。其文章指出,阿非利卡人是欧洲早期殖民者在征服南非过程中逐步融合而成的一个白人种群。进入 19 世纪 70 年代,金矿的发现和矿业经济的发展使南非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阿非利卡人陷入了经济困境。为了摆脱困境,阿非利卡人借助国家政权,通过种族隔离制度,确立了自身的政治优势地位,而且通过强化经济领域中的种族隔离政策法规,最终实现了阿非利卡人的经济崛起。可以说,种族隔离制度事实上成为阿非利卡人手中的工具,通过种族隔离制度,阿非利卡人实现了独揽政权和经济崛起的双重目标。[②]

郑家馨运用恩格斯的“合力论”剖析由曼德拉、布特莱齐和德克勒克所代表的三种分力所形成的“一个总的合力”如何影响和支配南非历史进程。作者的结论是:其一,南非从种族主义统治向种族平等的社会的过渡,并非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不自觉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合力)的产物。其二,三个人都对历史进程做出过贡献或者产生过影响。其三,在南非“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中,合力就是推动南非向一体化社会发展的力量、经济发展需求的力量、经济

---

① 杨兴华:《试论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世界历史》1987 年第 2 期。

② 刘兰:《南非种族隔离制与阿非利卡人政治经济优势地位的确立》,《世界历史》2003 年第 5 期。

运动的力量。[①]

除了上述论文外，还有几部著作是必须提及的。杨立华、葛佶、何丽儿、舒展和贺文萍合著的《正在发生划时代变革的国度：南非政治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论述南非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专著，书中介绍了南非多种族社会形成的历史；各种族之间的关系；南非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力量；南非黑人三个多世纪、特别是近百年来的反抗斗争；南非的资源和经济发展过程，特别是两种经济体制的并存和矛盾；南非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南非自 1990 年以来的变革和发展前景。该书的特点之一是，在阐述南非多种族社会的形成和种族主义统治兴衰的同时，剖析了种族隔离制度与南非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特别是种族经济不平等对南非社会发展的影响，并根据南非社会的特点，探讨种族多样性、政治经济分裂的社会实现国家统一和种族共存的途径。该书是特点之二是，书末专门设一附录，为读者提供了南非的大事年表、种族、部族和人口构成以及南非基本的经济统计数字。

葛佶撰写的《南非——富饶而又多难的土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是又一本研究南非历史与现状的专著。该书较全面地介绍了南非的历史，从南非的史前居民到白人的进入和种族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种族主义经济的两个极端，种族主义制度下白人和黑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和心态；非洲人反对种族主义统治的斗争及其前景。该书材料丰富，作者以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描述了南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如果说以上两本专著都在新南非成立以前出版，当时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斗争尚未结束，南非的发展前景还难以预料，那么，张象主编的《彩虹之邦新南非》（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 年）则撰写于新南非成立之后，因此，作者们有了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特别是能借鉴前

---

① 郑家馨：《南非三位风云人物与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结束》，《世界历史》1995 年第 1 期。

人研究成果，对南非种族主义统治和种族主义制度作比较全面的总结。这本40万字的专著把历史与现状有机结合起来，在介绍南非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和文化史的基础上，剖析了新南非建立的历史根源、现状及其前景。该书采用了许多新资料、新研究成果，也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妇女运动问题等）。值得一提的是，书中专门设有附录四则（南非史发展状况及特点；国外的南非现状研究；南非研究书目；译名对照表），这些十分有价值的资料无疑对于学习和研究南非问题的读者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艾周昌、舒运国、沐涛和张忠祥合作撰写的《南非现代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以现代化为视角，对南非历史进行剖析。该书的特点是：其一，由于南非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研究中的个案，因此作者把南非现代化放在世界现代化的全过程中加以考察，并与澳大利亚、新西兰进行了比较；其二，现代化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也涉及政治、国防、文化和科技领域，因此该书的研究综合性地考察了上述领域；其三，该书虽然是个案研究，但是在非洲大陆具有典型意义。

沐涛撰写的《南非对外关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是中国学者第一部研究南非对外关系的著作。作者以外交为视角，主要研究1948年马兰领导的国民党政府上台后，为了维护种族隔离制度，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形势下所采取的不同的对外政策，并且剖析了南非对外关系不断发生变化的原因，尤其是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

十一、中非关系史[①]

中非关系史是我国学术界关注较多、也是成果较多的一个领域，起步于1960年代。1965年，张铁生出版了《中非交通史初探》，这是国内

---

① 关于这一专题，请参阅朱凡：《中非关系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见《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5期。

第一本研究古代中非关系的著作,共收集了五篇论文。按照张先生的说明,第一篇《中、非交通的历史关系初探》作为总论,剖析了汉、唐与非洲的交通和贸易往来;第二、三、四篇作为分论,其中第二篇《从东非史上看中、非关系》和第三篇《再谈中国同东非的海洋贸易》分析中国与东非的交往,认为中非直接贸易开始于宋,因为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和造船技术的提高,"中国人既有到东非去的可能,东非人当然也能到中国来"。在中非贸易中,中国对非洲香料和象牙的需求推动了双方贸易的发展。第四篇《中国同北非的交往》剖析了中国和北非的往来,认为中非交通史上,中国与北非的交往最早;第五篇《中国同非洲的海上交通》则总括地研究了中非的海上交通。张先生的研究成果不仅代表了当时国内研究的最高水平,而且至今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文革"结束后,随着国内非洲史研究的蓬勃开展,中非关系史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中国学者注意发掘中国古籍中的有关史料,出版了《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朱杰勤校订)、《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郑鹤声、郑一钧)和《郑和航海图》(向达)等一批古籍资料。

在中非关系史研究中,对于中国古籍中的地名的考证始终是学者们关注的中心。杜环在《经行记》中所载的摩邻国,中外史家都认为在非洲,但是具体位置却有不同看法。许永璋认为"摩邻"应该在摩洛哥或者马格里布,他以杜环所记的内容为主要依据,同时参照了其他史籍加以印证。他对学术界关于摩邻国应该在今肯尼亚的马林迪或者在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古国的说法予以否定。[1] 陈公元研究后认为,中国古籍中提及的"三兰"就是索马里的泽拉港,他还提出中国与非洲的外交关系最早始于宋代与"层檀"的相互交往。[2] 何芳川以钱币和国王的称号为视角,提出"层檀"即"层拔",是指桑给巴尔岛及其附近的东

---

① 许永璋:《摩邻国在哪里?》,《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2 年第 4 期。

② 陈公元:《有史可考的第一个达到非洲的中国人》,《外国史知识》1982 年第 2 期;《从贾耽的"通海夷道"看唐代的中非关系》,《西亚非洲》1983 年第 3 期;《中非历史上最早的外交关系》,《西亚非洲》1980 年第 2 期。

非沿海地区。[①] 艾周昌经过深入研究，认为杜环是从今天伊拉克的巴士拉出发去非洲的；杜环所指的摩邻是今摩洛哥，而老勃萨则是今天的利比亚。[②] 在中国古代史籍中，还出现过“黎轩”和“已程不国”。陈乐明介绍了我国学术界关于“黎轩”的几种不同的解释（如指阿拉伯某地、在叙利亚和埃及之间、黑海一带古希腊的殖民地等等）。至于“已程不国”，作者认为应该在今埃塞俄比亚。[③] 沈福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从战国时代埃及宝石的输入着手，阐述了最早的中非关系；他认为《后汉书》中的“兜勒”即阿克苏姆王国，而《经行记》中的“摩邻”同样在阿克苏姆王国；他还深入研究了唐代杜环和元代汪大渊的非洲之行等活动。[④]

对于来往于中、非的使者，学者们也进行了探讨。许永璋把研究的视野转向来华的非洲人和访非的中国人，对访华的非洲人和访非的中国人进行了调查和研究。此外，许永璋和陈公元都对唐代杜环的访非活动做了阐述，沈福伟、陈公元还著文介绍了元代汪大渊的非洲之行。[⑤]

在古代中非关系史中一些问题的讨论上，许永璋提出了独特的看法。第一，中非关系史的开端，作者认为中非交往首先从民间开始，它早于官方的记录，因此应该在张骞通西域之前。第二，中非关系史的下限，作者认为应该在 1840 年，即中国丧失了独立国家的地位以后。第三，中国船舶何时远航非洲？作者认为在唐朝。第四，关于中国古籍中的非洲地名考证，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摩邻为摩洛哥或者马格里

---

① 何芳川：《层檀国考略》，《社会科学战线》1984 年第 1 期。

② 艾周昌：《杜环非洲之行考辩》，《西亚非洲》1995 年第 3 期。

③ 陈乐明：《古代中非关系史中的黎轩和“已程不国”究竟在哪里？》，《西亚非洲》1994 年第 1 期。

④ 沈福伟：《结绿与埃及宝石贸易》，《中华文史论丛》，1983 年第 4 辑；《中国和非洲国家最早建立的外交关系》，《海交史研究》1984 年刊；《唐代杜环的摩邻之行》，《世界历史》1980 年第 6 期。

⑤ 许永璋：《古代到过非洲的中国人》，《今昔谈》1982 年第 6 期；《古代到过中国的非洲人》，《史学月刊》1983 年第 3 期。

布，老勃萨国为托勒姆森（现译为特莱姆森），层檀国应为桑给巴尔，三兰国也为今东非沿海的桑给巴尔，剌撒国不在非洲，而在今阿拉伯半岛南端的沙尔韦恩角。[①]

对于近代华侨和华工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中的第九辑“非洲华工”以及方积根汇编的《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收集了许多有用的中外资料。许永璋阐述了近现代进入南非的华侨和华工，认为这是近代中非关系的主要内容。在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流传着近代中非存在“500 年的中断说”。艾周昌经过深入研究后，以大量的史实驳斥了“中断说”，并对近代中非关系的特点做了总结：(1)古代以来的旧交通被破坏，新的航道被殖民主义者所垄断（葡萄牙、荷兰和英国人）。非洲的奴隶和中国的商人、学者和华工都是乘坐西方的船只到达中国和非洲的。(2)由于旧的交通要道被殖民者所控制，旧的传统贸易也就遭到破坏。新时期的贸易是通过殖民国家的中介，由他们的商业公司所垄断的。(3)近代黑人和中国人的相互移植，是资本主义国家掠夺劳动力的结果。不论是中国的黑人，还是非洲的华工，都共同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同样处于殖民奴隶的地位。(4)古代的中非官方关系，是独立国家之间的平等友好的关系，而近代的中非官方关系是一个不能自主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与殖民地的南非、莫桑比克和扎伊尔的关系。在近代，由于中国和非洲都遭到西方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因此，两者的关系不但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联系上，而且表现在反帝反殖斗争的相互激励和相互支持上。这些都是近代中非关系与古代中非关系的不同之处，也是它的特点。[②]

比较全面介绍中非关系的专著和论文有郑家馨和何芳川的《古代中国与北非、东非人民的友好往来》、陈公元的《古代非洲与中国的友

---

① 许永璋：《古代中非关系史若干问题的探讨》，《西亚非洲》1993 年第 5 期。

② 艾周昌：《近代时期的中国与非洲》，《西亚非洲》1984 年第 1 期；《近代华工在南非》，《华侨史论集》（一）。

好交往》以及沈福伟的《中国与非洲》。但是上述专著和论文尚集中在古代。1989 年,艾周昌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从浩瀚的中国各类史籍中摘录百万字,再精选后得 22 万字,编成《中非关系史文献(1500—1918)》。该文献的内容分为五个部分:一,黑人在中国;二,非洲见闻录;三,时人论说;四,华工与华侨;五,中非外交。文献的问世为国人深入研究近代中非关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1996 年,艾周昌和沐涛合作撰写了《中非关系史》,书中涵盖了自古至今 2000 余年的中非关系历史,因此堪称国内首部全面、系统介绍中非关系历史的著作。全书把中非关系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公元前 2 世纪—16 世纪初,即西汉到明初。这一时期中非关系不断发展,双方关系是和平友好和平等互惠的;第二时期,从 16 世纪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由于非中先后落入西方列强的控制,因此非中关系受到殖民主义的强制而表现出扭曲的形态;第三时期,从 1949 年至今。这一时期中非关系得到全面发展,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

在中非关系史研究中,李安山对非洲华侨华人史的研究必须一提。2000 年出版的《非洲华侨华人史》填补了国际社会在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换言之,这本著作是世界上第一部阐述非洲华侨华人历史发展过程的历史专著。因此,该书问世后,在国内外引起了注意。全书 56 万字,中外各类资料丰富翔实,全面介绍了华人自清代开始迁入非洲,直至 20 世纪末的各个时期的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口、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

十二、非洲文化和文明

著名的非洲文明研究专家康纳(G. Connah)指出,在很长时间里,“英语世界的大部分著作仍然不理解热带非洲社会在前殖民地时代所取得的成就”。许多人还认为非洲居民只是散居在由草屋或者泥草屋

组成的小村庄里。因此,这些著作尚不能反映非洲文明的真实面貌。[①] 他的评论反映了西方国家长期轻视非洲文明的状况(关于这一点,本章第二个专题,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古代文明中已有介绍)。令人高兴的是,这种形势正在改变。

中国学者对于非洲文明进行了研究,先后出版了数部著作。最早出版的是宁骚主编的《非洲黑人文化》。该书的主要内容是:(1)介绍非洲黑人文化的主体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人和环境的互动关系和它对非洲黑人文化的影响;介绍诸种因素影响下的非洲黑人文化的变迁和进化。(2)介绍非洲各种文化系统里个人行为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行为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如何遵循表现为习俗的社会规范和文化模式;介绍展示人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的节日庆典。(3)介绍非洲黑人各族的传统宗教信仰。(4)介绍非洲黑人各族的技术文化、隐含于巫术中的科学思想、隐含于传统宗教信仰的哲学思想以及隐含于政治行为中的政治思想。(5)介绍非洲黑人的雕塑、绘画、人体装饰、口述史学和文学、音乐、乐器制作、舞蹈等各种形式的活动中对美的追求。(6)介绍非洲黑人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吸取和贡献。

刘鸿武撰写的《黑非洲文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试图将撒哈拉以南热带非洲大陆的黑人文化置于世界文化的宏观背景上,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着重探讨黑非洲文化发展进程的若干重大问题。通过对这些相互关联问题的探讨,勾画出黑非洲文化的大体轮廓,梳理黑非洲文化历史由来和现实走向,从而总结黑非洲文化的独特的形态、基本特质和基本结构形态。书中对黑非洲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它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异同以及这些异同之缘由和意义做了分析。同时,著者还剖析了进入近代以后,尤其是20世纪以来,在整个世界历史宏观环境和黑非洲历史命运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况下,黑非洲文化经历的广泛而深刻的变迁转型过程,这些变迁转型的复杂和矛盾的特点和性质,以及它与当代黑非洲现实政治经济格局的复杂关

① G. Connah, *African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1987.

系。作者在序言中指出，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有一个基本想法，即试图用一个中国人的眼光，写出一个中国人对遥远世界的非洲黑人文化的一种直接的、个人心灵的体验和感受。[①]

艾周昌主编的《非洲黑人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是《世界文明大系》（汝信总主编）中的一本。作者在绪论中指出，非洲黑人文明，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黑人各民族过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作者叙述了非洲黑人传统文明的产生和形成的自然条件和历史背景以及非洲黑人文明的传递过程和各个文明中心的形成；叙述黑人文明的载体，论述了经济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文学艺术、哲学、美学、宗教、伦理习俗和科学技术；探讨了近代以来非洲黑人传统文明的变迁，展望非洲黑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必将弘扬优秀的文明传统，创造出具有"非洲个性"的现代文明。

李广一等著《非洲：走出干涸》（吉林摄影出版社，2000 年）同样关注非洲文化。但是，这本书在空间上涵盖了整个非洲，既论及非洲的阿拉伯文化，也论及黑人文化。

除了上述著作，也发表了一些论文。《西亚非洲》在 1996 年第 6 期开辟了专栏，讨论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徐济明指出，传统文化可以分为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非洲之所以没有产生现代政治，是由于非洲传统文化中的精英文化不够发达，其原因有二，一是非洲缺少产生国家学说的社会基础；二是非洲没有产生国家学说的政治需要。传统文化包括精华和糟粕两部分，有些传统文化，如原始民族制和古老的家族观念，在现代社会暴露出明显的消极影响。因此，非洲应该采取扬弃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这样才能推进非洲政治现代化的进程。葛公尚认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一对矛盾，对此不应回避。传统文化具有两重性，在人类社会中起着积极和消极的作用。非洲文化存在若干个类型区，因此非洲国家的现代化模式绝不可"一刀切"。郑家馨指出，非洲传统文化的排他性、封闭性和凝固性较强，而吸纳性和开放性

① 还可以参见刘鸿武：《论黑非文化特征与黑非文化史研究》，《世界历史》1993 年第 1 期。

较差。非洲传统文化的这些弱点虽然对现代化不利,但是绝非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实现现代化是非洲的唯一出路,培养和健全市场机制是非洲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途径,在此过程中需要文化观念的更新,需要摈弃传统文化中消极的内容,这是痛苦和长期的过程,需要战略眼光、进取精神和持之以恒的努力。静水指出,认为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的理论是错误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传统文化和传统至少在一些方面有利于非洲的发展,比如语言、传统医学和习惯法。文章的结论是:传统是文化的精髓,要振兴一个民族,必先振兴其文化,而要振兴其文化,则必须对其传统有一个中肯和客观的认识。[①]

---

① 徐济明:《非洲传统文化与政治现代》;葛公尚:《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制约关系初探》;郑家馨:《非洲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体制》;静水:《略论非洲传统与发展的关系》。

附录一　学术资源

一、工具书

1. 希林顿主编:《非洲历史百科全书》(Kevin Shillington ed., *Encyclopedia of African History*, New York/ London, 2005)。

这是一本在新世纪出版的非洲历史百科全书,它呈现出非洲历史的连续性和其中的变化。该书一方面继承了以往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提供了非洲大陆新的参考资料和在新世纪非洲史学者的新观点。全书共3卷,时间涵盖了从史前至21世纪初,空间包括了整个非洲大陆及其周边岛屿。该书的检索使用也十分方便,既可以按照字母的排列顺序,也可以按照主题的内容。

2. 黑利:《非洲概览》(Lord Hailey, *An African Survey*, Oxford, 1938)。

这本书出版虽然比较早,但是书中对于非洲的政治、经济状况做了详细的介绍,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3. 马修斯:《当前非洲历史研究主题:非洲历史研究资料指南选集》(Daniel Matthews, *Current Themes in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A Select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Resources for Research in African History*, Westport, Conn., 1970)。

这本非洲历史研究资料指南涉及非洲通史和海外非洲裔等领域,并且对有关资料目录作一介绍。书中尤其强调非洲国家独立后新发现

的资料。

4. 穆勒等主编:《南非史书目选集》(C. Muller, F. Van Jaarsveld and T. Van Wijk, eds., *A Select Bibliography of South African History*, Pretoria,1966)。

本书出版较早。按照时间和主题编排,时间分类为"史前时代"和"没有白人的南非"等。

5. 约翰·沃罗诺夫总编:《非洲历史词典》(John Woronoff, *African Historical Dictionaries*, Screcrow Press,1974—)。

1974 年开始由斯盖尔克罗出版社推出的以每个国家为单位的分国历史词典系列,已经出版了 80 多卷,目前还在进行之中。[①]每一卷都包括这个国家的历史、经济、社会、地理和族群等,多数卷次都有这个国家的大事年表、统计表、地图等。有人评论说,这套工具书大概是国际非洲史学界迄今为止受到批评最少的工具书系列。

6. 欧洲出版公司:《撒哈拉以南非洲》(*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 Europa Publications,1971—)。

1971 年开始每年一卷,是年鉴和指南性质的工具书。在每一卷的第一部分中,都有知名学者关于整个非洲大陆的历史、现状问题政治事件、经济发展趋势、工农业发展整体状况的介绍;第二部分则是分国别的调查报告,涉及非洲 53 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状况,每个国家都包括背景知识的详细介绍,其中也包括一些历史背景知识介绍。

7. 国际非洲研究所:《国际非洲研究指南》(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Institut International Africain, *International Guide to African Research/Etudes Africaines Guide International de Recherches*, 1975)。

该书收集了国际上 500 多家研究非洲机构(包括研究非洲历史的机构)的研究方向、结构和人员等。本书的结构主要是:第一部分:将

---

① 包括有的国家分卷已经推出新版本,有的甚至已经有第三版,故而总数已经有 80 多卷。

进行研究非洲的所有国家都一一列举出来；第二部分，按照非洲总论、东非、北非、南部非洲和西部非洲的顺序介绍每一地区正在进行的相关研究。在附录部分，主要收集了每个国家正在进行非洲研究情况，正在进行非洲研究的组织、专家中心、研究所和系的名录，正在研究的部落、语言、地点和研究课题的名单以及非洲问题研究者的名单。

8. 詹姆斯·达飞、米修·弗雷和迈克尔·希姆斯编辑：《国际非洲学学者专家指南》(James Duffy, Mitsue Frey and Michael Sims, *International Directory of Scholars and Specialists in African Studies*, Crossroad Press, 1978)。

该书囊括了从事非洲研究(包括研究非洲历史)的2700名学者的名单，主要包括了学者的出生年月地点、国籍、职位、所属机构、研究志趣、研究地区、出版物以及在非洲研究方面的情况等。

9.《非洲国家纪录》(*African Countries Record*, African Publishing Company)。

这是研究非洲各国当代历史的最重要的工具书之一，每年一卷，至2006年已经出版了第28卷。每卷的体例基本一样，即第一部分是非洲各国的现状问题；第二部分主要是按照非洲西、中、东、南、北和法属各个区域的顺序，对所有国家进行综述；第三部分主要是各种档案材料的汇编。

10.《非洲概览》(*African Survey*, African Research Ltd.)。

关于非洲各国现状的年度报告，前1—6期由英国非洲研究有限公司出版，第7期(1970年)开始从纽约出版，是研究非洲当代问题和当代历史的重要工具书。

11. 克拉克：《非洲史前地图集》(Compiled under the direction of J. D. Clark, *Atlas of African Prehistory*, Chicago, 1967)。

这是一本仅有62页的地图集，内容主要涉及非洲史前时代，包括非洲岩画、石器时代和史前的文化遗址等。每幅地图都附有说明，介绍非洲各地区的考古研究成果。

12. 费奇：《非洲历史地图集》(J. D. Fage, *An Atlas of African Histo-*

ry, London, 1978)。

这是世界上第一本非洲历史地图集,共由62幅黑白地图组成。这些地图不但包含了从罗马时代至今的非洲历史,也覆盖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整个非洲大陆。作者力图以各时期非洲地图的变化,来驳斥"欧洲中心论",尤其是如黑格尔散布的非洲没有历史的错误观点。

13. 弗里曼-格伦维尔:《现代非洲历史地图》(G. S. P. Freeman-Grenville, *A Modern Atlas of African History*, London, 1976)。

该书在非洲历史和文化的教学中,作为补充材料,受到好评和欢迎。与费奇的同类著作不同,它的特点是内容简洁、精确和分类恰当。作者共选择了70幅地图,涵盖了从最早的石器时代直至1975年的大跨度时间段。值得指出的是,本书地图十分具有特色,比如,班图人迁徙路线图和各个时期非洲内外贸易路线图等。

14. 赫茨雷:《非洲条约地图册》(Sir E. Hertslet, *The Map of Africa by Treaty*, London, 1967)。

地图册制有地图66幅,主要根据各种条约的划界制成,尤其是西方瓜分非洲时期,比如,英国于1788年与非洲土著统治者签订的条约等。本地图册初版于1894年,至今已经多次再版。

15. 葛佶主编:《简明非洲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我国第一部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百科全书,内容包括地区综合(概述、历史、政治发展、国际关系、经济发展)、国别、文献与附录(文献、非洲的地区组织、非洲基本情况统计资料、当代中国非洲关系大事记)等,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工具书。

16. 马惠平编:《非洲问题研究中文文献目录(1949—1981)》。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北京图书馆文献研究室出版。由于当时的经费和条件的限制,只出版了油印本。现在很难找到和借阅了。

17. 张毓熙编:《非洲问题研究中文文献目录(1982—1989)》,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1990年。

18. 张毓熙编:《非洲问题研究中文文献目录(1990—1996)》,中

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1996 年。

19. 成红、赵萍编:《非洲问题研究中文文献目录(1997—2006)》,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2006 年。

《非洲问题研究中文文献目录》中国非洲史研究会首先发起,得到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支持而编著的。依据时间已经出版了四集。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所谓非洲问题研究,是指非洲学研究,因此,非洲历史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第二,所有四集都没有公开出版,因此没有书号和出版社。但是,这套书给中国的非洲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全书分为论文资料、图书目录、学位论文、内部出版物和附录五个部分。在前三个部分又细分为发展中国家、非洲总论、北非、东非、西非、中非和南部非洲。细分的各个部分中,都专门辟有历史专栏。这套书内容丰富,给中国的非洲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二、原始史料集

(一)西非地区

英国的阿思隆出版社(Athlone Press)在 1960 年代初启动了《欧洲档案中有关西非历史资料的指南》(*Guides to Materials for West African History in European Archives*)系列丛书的出版工作。至今,已经出版了下列资料集:

卡森:《比利时和荷兰档案中有关西非历史的资料》(Patricia Carson, *Materials for West African History in the Archives of Belgium and Holland*, London,1962)。

赖德:《葡萄牙档案中有关西非历史的资料》(A. F. C. Ryder, *Materials for West African History in Portuguese Archives*, London,1965)。

格雷、钱伯斯:《意大利档案中有关西非历史的资料》(Richard Gray and David Chambers, *Materials for West African History in Italian Ar-*

chives, London,1965)。

卡森:《法国档案中有关西非历史的资料》(Patricia Carson, *Materials for West African History in French Archives*, London,1968)。

纽伯格:《英国对西非政策:1786—1874 年间资料选编》(C. W. Newburg, *British Policy toward West Africa: Select Documents 1786-1874*, Oxford,1965)。这是一本颇受好评的资料集,有人认为它的出版,“推动了关于 19 世纪英属西非政策的教学”。资料集内容包括英国外交政策和殖民当局的官方文件。

劳:《英国在西非,1681—1683》(Robin Law, *The English in West Africa,1681-1683*, Oxford,1997)。英国皇家非洲公司在 1681—1699 年间遗留下 3000 多封信件,这对于研究西非这一时期历史具有很大价值。作者从中挑选了 634 封信件,编辑成书。

杜格南:《非洲研究中的美国资料手册》(Peter Duignan, *Handbook of American Resources for African Studies*, Stanford,1965)。该书收集了在非洲研究中涉及的美国国内的资料。尽管历史研究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由于美国黑人在历史上与非洲大陆保持着密切关系,因此这本资料手册中有值得一读的内容。

(二)东非地区

弗里曼-格伦维尔:《东非沿岸地区史料集,公元初至 19 世纪初》(G. S. P. Freeman-Grenville, *The East African Coast, Select Documents from the First to the Earlier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1975)。

全书的史料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组成部分:(1)古代阿拉伯世界的商人和旅行家所撰写的资料;(2)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在东非沿海的活动;(3)18 世纪后期法国人在东非沿海地区的奴隶贸易活动;(4)东非沿海的城市和岛屿的历史。

佐伊·马什:《东非资料集》(*East Africa Through Contemporary Records*, Cambridge, 1961)。

佐伊·马什(Zoe Marsh)是著名的非洲历史学家,撰写出版了《东

非史简编》(*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ast Africa*)等著作。他在该书序言中说,书中的大部分材料是"尚未出版或者只是在当地出版,或者甚至没有刊印"。全书分为13部分:史前时期、印度洋贸易、葡萄牙人及其后继者、奴隶贸易、19世纪的桑给巴尔、19世纪的内陆探险、布干达的传教活动、瓜分非洲、乌干达保护国、修建乌干达铁路、非洲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当地的历史和坦噶尼喀。

(三)殖民统治与非洲民族主义

布鲁斯·费特:《非洲的殖民统治资料集》(Bruce Fetter, *Colonial Rule in Africa, Reading from Primary Sourc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布鲁斯·费特在导言中指出,本资料集"叙述殖民统治在非洲建立、运作和衰亡的历史。这是第一本既涉及欧洲统治者,又涉及非洲人民的资料集,其覆盖的范围是整个非洲"。作者还指出,本资料集涵盖的时间为1830—1962年。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欧洲人对非洲的征服",时间为一战之前,具体内容为四类:欧洲殖民主义的背景;对伊斯兰非洲的征服;自由主义在南非的冲突;法国和比利时对非洲的征服。第二部分为"殖民统治时期",时间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具体内容为四类:对殖民地的管理;殖民地经济;非洲现代化的第一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民族主义运动。第三部分为"非洲走向独立",时间为二战以后,具体内容为二类:非殖民化;革命性的变化。该书所选资料,均出自这段历史的直接参与者,诸如殖民官员、传教士和殖民地的当地居民等。作者为全书撰写了导言,进行了介绍。在每一段资料前,作者都有一段简短的文字加以说明。

利格姆:《泛非主义:简要政治指南》(Colin Legum, *Pan-Africanism, A Short Political Guide*, London, 1962)。泛非主义是非洲黑人的民族主义,至今已经延续了100多年。泛非主义对于唤醒非洲黑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团结反帝反殖和争取非洲大陆的整体独立,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该著作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剖析泛非主义的兴

起和泛非主义运动的发展；第二部分为关于泛非主义的资料选编。

唐大盾选编：《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选（1900—1990）》（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

该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源远流长的泛非主义运动”，收集了自 1900 年第一次泛非会议至非洲国家独立时期的重要会议的决议和其他文件。第二部分，“争取非洲统一的艰难历程”，反映了为建立非洲统一组织，非洲国家所经历的矛盾和斗争。第三部分，“在斗争中前进的非洲统一组织”，收集了非洲统一组织成立直至 1990 年期间为推动非洲的发展和统一所发表的重要文件，包括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第四部分，“泛非运动领导人文选”，选登了泛非运动的思想家和领导人杜波依斯、加维、帕德莫尔、阿齐克韦、恩克鲁玛、塞古·杜尔、尼雷尔和卡翁达等人的著作和演说。

卡梯、基尔逊：《非洲读本：独立的非洲》（W. Cartey and M. Kilson, *The Africa Reader: Independent Africa*, New York, 1970）。

这是一本关于非洲各族人民争取非洲独立的历史进程的资料集。全书共分六个部分：（1）非洲的制度：自治的基础；作者收集了非洲民族主义思想家海福特（C. Hayford, 1866—1930）、肯雅塔（J. Kenyatta, 1891—1978）、霍顿（J. Horton）和布莱顿（E. W. Blyden, 1832—1912）的观点，认为传统的非洲社会制度使非洲具有实行自治的良好基础。（2）争取独立的运动；收集了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阿齐克韦和卢蒙巴等人在反对殖民主义统治和争取独立斗争的代表性言论。（3）知识分子在非洲独立中的作用；收集了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的观点，诸如桑戈尔的“黑人性”。（4）非洲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恩克鲁玛和尼雷尔等人对非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新殖民主义、乌鲁马和自力更生等思想的阐述。（5）尚未独立的非洲国家：镇压与反抗；南部非洲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如曼德拉，对尚未独立的南部非洲地区的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统治的斗争的呼吁和号召。（6）非洲的军国主义；叙述了非洲国家对外政策中对于军事因素的考虑，以及南部非洲的游击战争。

马丁·米诺格、朱迪斯·莫洛伊:《非洲的目标和态度:资料选集》(*African Aims and Attitudes*, *Selected Documen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马丁·米诺格、朱迪斯·莫洛伊(Martin Minogue and Judith Molloy)在序言中说,编辑这本资料选集的目的是"向读者提供有关非洲领导人和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和目标的资料,这些资料取自他们的著作和讲话"。作者特意指出,本书所说的非洲是专指撒哈拉以南非洲。全书共分五个部分:(1)殖民主义和非殖民化。选择了霍顿、海福特、恩克鲁玛(N. Nkrumah, 1909—1972)、阿齐克韦(N. Azikiwe ,1904—1996)和桑戈尔(L. S. Senghor,1906—2001)等人的言论,反映了非洲早期民族主义者的思想。(2)建设国家:哲学与问题。汇编了坦桑尼亚、赞比亚、肯尼亚和其他一些非洲国家的资料,说明非洲国家领导人通过什么样的哲学原理去解决国家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3)泛非主义。收集了非洲统一组织成立前后(1958—1967)的泛非主义运动的资料,以及泛非主义领导人的一些谈话。(4)斗争在继续。本书出版于1970年代初期,当时南非尚处于种族主义统治之下,葡萄牙还统治着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因此,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斗争还在继续。本书选编了非洲统一组织的有关文件和南非、葡属殖民地的资料。(5)军人的政治态度。非洲国家独立后,出现了许多军政权。本书选择了一些军政权领导人,如阿明(Idi Amin ,1928—2003)、蒙博托(Mobutu,1930—1997)等的言论,反映了军政权的政治态度。

(四)中非关系史

非洲与中国的关系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学者通过整理中国古籍,收集了大量有关资料,编辑成书的有如下几种。

艾周昌编注:《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文选是作者从中国古籍中精选22万字而成,主要辑录了1500—1918年间有关中非关系方面的中文资料。文选共分五个部分:一,黑人在中国;二,非洲见闻录;三,时人论说;四,华工与华侨;

五,中非外交。资料集填补了近代中非关系研究的空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方积根编:《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新华出版社,1986 年)。作者利用在非洲工作之便,参观了非洲一些华人侨居国家的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收集了国外有关非洲华侨史的专著和华侨报刊刊登的文章,以及有关的档案。在此基础上,汇编了这本资料集。资料集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论文选编;二是专著摘译。这本资料集所收集的有关中外资料丰富,为非洲华侨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李安山编注:《非洲华侨华人社会史资料选辑》(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 年)。这本资料选辑是作者撰写的《非洲华侨华人史》的姊妹篇。资料来源于:一,当时官方的文件和档案资料;二,非洲发行的中文报刊;三,非洲华人学者和华人社团领袖赠送的资料。资料选辑分为三个部分:一,文件与报道(分为 1800—1911 年、1911—1949 年和 1950—2005 年三个时期);二,回忆与访谈;三,附录。由于资料丰富,涵盖的时间和空间广阔,因此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5 年)。这是一本关于出国华工的综合资料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第一辑《中国官文书选辑》中,收集了有关南非华工的外交函件、政府照会、各类文稿、电报等 154 件。该汇编第九辑为《非洲华工》,内容包括:一,英国报刊关于南非招募华工的报道和评论;二,论著选辑;三,游记。

三、期　刊

(一)国外期刊

(1)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Cambridge.

研究非洲历史最重要的期刊,由剑桥大学出版,很多高校都可以在网上数据库中浏览全文。杂志涉及从石器时代晚期直至 1970 年代末的非洲历史。近年来,该杂志主要倾向于收录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

等方面的内容。

(2)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Boston.

由波士顿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办,1968 年创刊,原名为《非洲历史研究》(*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1972 年改为现名。刊登非洲历史的研究文章,包括从对于史前的考古,直至当今非洲大陆的发展。该刊物还特别关注非洲与美国黑人之间的互动研究。

(3) *History in Africa*, Los Angeles.

由美国非洲研究学会(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USA)主办。

(4) *African Archaeological Review*, Cambridge.

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1983 年创刊,每年四期。是一本反映非洲考古发现和研究的重要刊物。

(5) *Journal of the Royal African Society*, 1901—1943, 后改名 *African Affairs*, London.

英国伦敦皇家非洲学会主办的杂志,自 1901 年开始连续出版,是当今世界上关于非洲当代事件的最古老、最重要的杂志。每年四期,内容包括政治、国际关系、文学、艺术、音乐等,在学术界、外交官等范围内流传甚广, 1996 年以来的期刊的内容简介可以通过网络查阅(http://www.oup.co.uk/afrafj/)。

(6) *South African Historical Journal*, Cape Town.

开普大学历史学系、南非历史学会出版,主要刊登有关南非历史的原创论文、历史观察和评论文章。网址为 http://web.uct.ac.za/depts/history/sahs/。

(7) *South African Archaeological Bulletin*, Claremont, C. P.

南非考古学会编辑出版的杂志,主要涉及非洲、尤其是南非的考古动态和该学会的活动。每年一期。如在 1993 年刊登了南非沃特威尔斯特兰大学考古系岩画研究室的霍尔曼的《关于南非西开普省库比岩画的初步报告》(J. Hollmann,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Koebee Rock Paintings, Western Cape Province, South Africa")。

(8) *Historia*,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South Africa*.

南非波切夫斯特鲁姆基督教大学主办,网上可以检索目录和摘要,也可以进行全文查阅(http://journals. sabinet. co. za/hist/)。

(9) *Journal of Natal and Zulu History*, Natal.

该杂志由纳塔尔大学历史系主办,重点关注纳塔尔地区和祖鲁民族的历史。网址为:http://www. history. und. ac. za/journal_of_natal_and_zulu_histor. htm47000000000AA。

(10) *Kronos*: *Journal of Cape History*, Cape Town.

西开普大学历史研究所主办,每年一期。主要是讨论从殖民时代以前至今的开普历史(http://www. uwc. ac. za/arts/ihr/kronos)。

(11) *Lagos Historical Review*, Lagos.

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历史与战略研究系出版。每一期都有索引和内容提要,可以通过非洲杂志在线查阅(http://www. ajol. info/journal_index. php? ab = lhr)。

(12) *Revue Sénégalaise d' Histoire*, Universite Cheikh Anta Diop.

塞内加尔的谢赫·安塔·迪奥普大学历史系出版的法语杂志。全文可以在线阅读,网址为 http://tekrur-ucad. refer. sn。

(13) *Tanzania Zamani*.

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历史系和坦桑尼亚历史学会共同主办的杂志,网址为 http://www. udsm. ac. tz/drp/tanza_zaman. php。

(14) *African Economic History*, Wisconsin.

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非洲研究室出版。网络上(http://polyglot. lss. wisc. edu/afrst/publications/aeh/index. htm)可以查阅论文目录。

(15) *Sudan Notes and Records*, Khartoum.

1918 年创刊,主要刊登苏丹的历史、人口、社会制度、民俗、语言和经济等领域的论文。

(16) *Transactions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Ghana*, Legon.

由加纳历史学会于 1952 年创办。1952—1956 年,学会的名称是"黄金海岸与多哥历史学会"。杂志发表加纳和非洲历史论文,也报道

学会的活动。

(17) *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 Ibadan.

以伊巴丹大学为中心的尼日利亚历史学会,成立于 1955 年。次年,创办本刊物。这本刊物注重学术性,为非洲本土的历史学家提供了发表研究成果的平台,在国际史学界具有一定影响。

(18) *Tarikh*, Ibadan.

尼日利亚历史学会办的另一历史刊物,对象主要是高中生和本科生。

(19) *West Af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Ibadan.

关于西非考古的专业刊物。1971 年创刊。1976—1979 年由伊巴丹大学出版社负责,1980 年以后,由西非考古学会负责。1971—1976 年用英语出版,1976 年后,用英语和法语出版。

(20) *Etudes d' Historire Africaine*, Kinshasha.

《非洲历史研究》,刚果国家大学主办,1970 年创刊,周刊,发行量约在 1000 份。

(21) *Azania: Journal of the British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in East Africa*, Nairobi.

本刊物由英国东非研究所主办。该研究所以内罗毕为基地,旨在推进东非的考古、历史、语言和人种的研究。研究所的活动范围包括苏丹、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马拉维和津巴布韦。杂志受到国际同行的好评,成为国际考古学界的重要刊物。

(22) *Tanganyika Notes and Records*, Dar es Salaam.

由坦噶尼喀学会于 1936 年创刊,1965 年学会改名为坦桑尼亚学会。刊物注重对该国历史等学科的研究。

(23) *The Uganda Journal*, Kampala.

乌干达学会(Uganda Society)编辑发行,于 1934 年创刊。乌干达学会成立于 1923 年,半个世纪后,在 1980 年代一度解散,1994 年重新恢复活动。学会致力于在乌干达的学术研究中发挥突出的作用。发行《乌干达杂志》是学会主要工作之一。

(24) *History in Africa*, Wisconsin.

威斯康星大学出版,主要关注非洲史学史和研究非洲史的方法论,以及对已有学术成果的分析和批判,也有对历史档案报告的分析和对史学理论和非历史性数据的分析,每年一期,网址见 http://www.rci.rutgers.edu/%7Ecallasa/asa_publicationslist.htm。

(二)国内期刊

(1)《历史研究》,该杂志是代表中国史学界最高研究水平的学术期刊,由中国史学会创办。关于非洲史的研究论文虽然数量极少,但是质量都较高。

(2)《世界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代表中国的世界史的最高研究水平。杂志辟有专题论坛、研究综述、史学理论与方法、争鸣、书评和学术报道等栏目,每年约有 1—2 篇关于非洲历史的论文或者书评。

(3)《西亚非洲》,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主办,是中国非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的代表之一。除了"论坛"板块外,还不定期设有热点透视、学术争鸣、外论摘要、人物志、学术动态、非洲教育研究、非洲法研究、书刊评价、资料库等栏目,刊登了大量有关非洲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法律、宗教、军事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和相关书评。该杂志的特点是:一,关于非洲学领域的信息量(包括研究成果、学术动态和最新的非洲发展形势)不但十分丰富,而且特别集中;二,对当前非洲大陆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报道和剖析十分及时;三,所刊登的论文具有较高水准。因此是一本非洲学研究者的必读杂志。

(4)《非洲历史研究》,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主办,不定期内部发行。杂志刊登非洲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包括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翻译国外学者的论文。该杂志对推动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的学术研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近年来由于经费和人力等原因,已经停刊。

(5)《亚非译丛》,由当时的亚非洲研究所主办。油印本于 1959 年 9 月创刊,月刊,油印本内部发行,共试办过 10 期,1960 年停刊。

1962 年 7 月复刊,为内部发行的月刊。1964 年亚非研究所分为西亚非洲研究所与东南亚研究所后,两所仍继续合办《亚非译丛》,到 1966 年 5 月共出刊 47 期。同年 6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亚非译丛》被迫停刊。该刊物主要是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介绍亚非国家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6)《西亚非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主办,1978 年创刊,不定期内部刊物,截止 2000 年底共出刊 159 期,每期约 8 万字。创刊初期以刊登资料性或调研文章为主,1986 年后以刊登系统资料和不宜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为主。

(7) 大学学报。一些建立了非洲研究中心的高校,以及一些具有非洲历史(非洲学)研究力量的高校,诸如北京大学、云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湘潭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民族大学、南开大学等,其学报也会不定期刊登校内教学科研人员对于非洲历史的研究成果。

一些社会科学类杂志,如《历史教学问题》、《国际政治研究》、《世界知识》、《世界博览》、《名人传记》、《阿拉伯世界》、《亚非发展研究》、《军事历史研究》、《国际问题研究》和《世界政治与经济》,也会刊登一些有关非洲的研究论文和报道。

四、网络资源

1. 撒哈拉以南非洲历史的网络资源(Africa South of the Sahara:African History on the Internet),属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与学术信息资源,其网址为:http://www-sul.stanford.edu/depts/ssrg/africa/history.html。

该网站内容十分丰富,包括非洲历史的众多领域,如:海外非洲人、非洲中心主义、军事历史、考古、人口普查、年表、论文、电子书籍、殖民时代、内陆探险、非洲王国、古代文明、宗教、学术组织、泛非主义、奴隶

制、南非、美国与非洲和学术组织等。值得充分利用。[1]

2. 人类学索引在线(Anthropological Index Online, http://lucy.ukc.ac.uk/AIO.html),伦敦人类博物馆创办,现在已经出版32期,收录了从1957年至今有关非洲人类学方面的论文,网上可以通过关键词来索引。

3. 学术期刊论文全文数据库(JSTOR, http://www.jstor.org/jstor/),内容涵盖生态、经济、教育、历史、政治科学、人口研究和社会学。在非洲历史研究方面,收录了所有重要的刊物,因此是查询非洲历史研究性文章的重要数据库。

4. 非洲杂志在线(African Journals On-Line, AJOL, http://www.ajol.info/),共收录了非洲21个国家的175种杂志,内容涉及文化艺术、语言、文学、农业科学以及社会科学,有些杂志是法语的,有法语摘要。从1988年开始,"非洲杂志在线"开始成为荟萃非洲杂志的重镇。

5. 非洲解放运动杂志索引(Liberation Journals Index),该数据库收录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关于非洲的杂志。其中几个著名的刊物分别为:《黑人世界评论》(*La Revue du Monde Noir*)、《黑人研究》(*L'Étudiant Noir*)都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学术期刊,《非洲现状》(*Présence Africaine*)则是"二战"后出现的研究泛非洲的重要学术期刊。

6. 1940年以来非洲相关会议的论文索引数据库(Africana Conference Paper Index, AFRC, http://nucat.library.nwu.edu),美国西北大学编辑。

7. 缪斯工程(Project Muse, http://muse.jhu.edu),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数据库,其主要学科领域有:区域/国家研究、人类学、艺术、西方古典文化、经济、教育、电影戏剧和表演艺术、语言学、法律、文学、图书馆学及出版、医学与健康、数学、音乐、哲学、政治和

---

[1] 除了斯坦福大学外,欧美许多著名大学都设有类似的网站,如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大学和爱丁堡大学等。可以首先登录该校网站,然后再打开诸如"非洲研究中心"之类的网页进行查阅。由于此类网站数量众多,因此不一一列举。

政策研究、历史、国际关系、科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等。其中在区域/国家研究、文学、历史、政治、政策研究上尤为突出。关于非洲历史研究的内容也十分丰富。

8. 非洲期刊文献每季索引(Quarterly Index of African Periodical Literature, http://lcweb2. loc. gov:8081/asian/qsihtml/qsihome. html or http://lcweb2. loc. gov/misc/qsihtml/),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内罗毕办公室(Library of Congress Office, Nairobi)出版,自从1991年以来,该数据库每年从东部非洲和南部非洲的24个国家的300多种杂志中收集数据;1997年以来,该数据库也包括了喀麦隆、加纳、加蓬和塞内加尔等国家的杂志。

9. 非洲期刊文章评论(Review of African Periodical Articles, RAPA, http://www. jepspublishing. com/journal. htm),是杰珀斯(JEPS)2001年开始出版的学术文摘和评论杂志。

10. 南非杂志在线(SAePublications, http://journals. sabinet. co. za/),涵纳了南非共500多种杂志,可以查阅南非出版的有关历史研究方面的杂志。

11. 南非学术数据库(South African Studies Database, http://www. nisc. com),一个很专业的学术数据库,收录了南非1987年以来各种学术期刊论文,由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第摩的国家信息服务公司(The Nat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s Corporation, NISC) 辑录。

12. 国际社会史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http://www. iisg. nl/-womhist/vivahome. html),由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创建,收录了1995年以来关于非洲历史和非洲女性社会问题的研究文章。

13. 非洲数字图书馆(African Digital Library, http://www. AfricaEducation. org. /adl/),由南非终身教育技术中心与非洲大学联合会(Association of African Universities)建立的数字图书馆,收藏了3800多种图书。读者可以在线全文阅读。

14. 东非百科全书(Living Encyclopaedia for East Africa – Teaching

and Learning about East Africa Project, http://www. sas. upenn. edu/African_Stuides/NEH/neh. html),宾夕法尼亚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等机构合作创建的项目,主要是为有关东非以及斯瓦希里语的教学活动提供充分的资源,内容包括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各国的基本信息,有特别丰富的历史学方面的资料。

15. 莱顿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网上图书馆(African Studies Centre, http://asc. leidenuni. nl/library/catalogues. htm),网上可以查阅该机构研究人员的大部分重要作品,也可以查阅免费电子杂志和新闻公报,例如,该中心的档案员卡特里恩·鲍尔曼所著的《非洲学研究网络资源述评》[①]一文,是重要的史学史方面的成果,尽管发表于 1998 年《非洲事务》上,但至今仍然是易于获取的非洲研究入门性文章。读者还可以通过非洲研究中心的网站链接到 1996 年的"荷兰非洲学研究者数据库"(Database of Africanists in the Netherland)。

16. 非洲时代在线(African Timelines: History, Orature, Literature, and Film, http://www. cocc. edu/cagatucci/classes/hum211/timelines/htimelinetoc. htm),由考拉·阿嘉图西编辑,是俄勒冈社区中心学院人文学院一门在线课程,主要是一部非洲编年史,包括古代非洲、非洲的帝国、非洲奴隶贸易和欧洲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和独立后的非洲以及独立后的非洲等等。其优点在于,附录中包含进一步研究非洲问题的详细书目。

---

① Katrien Porlman, "Evaluation of African-Related Internet Resources", *African Affairs*, 554, vol. 97, No. 38, 1998, pp. 401-408.

附录二　关键词

非洲(Africa)最早,人们称非洲为"利比亚"(Libya)。"利比亚"一词来自希腊文或者埃及文,它在《创世记》里指利布人或利宾斯人的土地。自罗马时代起,"阿非利加"(Africa)一词取代了原先的"利比亚"。"阿非利加"原来指北非沿海地带,从公元前1世纪末开始,成为对整个大陆的称呼。关于其由来,学术界有许多说法。比如有人认为是来自居住在迦太基南部的一个柏柏尔人部落的名称;有人认为是来自腓尼基词,意为富饶地区和水果之乡;有人认为可能起源于拉丁语,意思是"阳光明媚";或者来自希腊语,意思是"没有寒冷",等等。

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面积达800多万平方公里的撒哈拉沙漠把非洲一分为二,沙漠以北地区被称为北非,沙漠以南地区被称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由于沙漠的阻隔,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难以发生联系,因此两个地区的历史发展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例如北非地区与外部世界(欧洲和亚洲)的联系较多,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在近代以前,处于比较封闭的发展状态。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北非,或者撒哈拉以南非洲,都独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

班图人迁徙(The Migrations of Bantu)黑人又被称为尼格罗人,他们可以分为苏丹族和班图族两种。一般认为,班图族起源于西非的今尼日利亚与喀麦隆交界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而人口激增,从公元1世纪起,班图人开始了大迁徙,时间持续1800年之久。班图人在迁徙过程中带去了铁器,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推进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出现。

班图文明(Bantu Civilization)散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班图各族

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提高，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其中包括：伊费—贝宁文化、刚果文明、大津巴布韦文明、马拉维文化和马蓬古布韦文化。这些文化和文明都是班图人独立创建的，成为非洲黑人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祖鲁人（Zulu）祖鲁人是南非黑人的主要部族之一，系东南班图恩古尼人北支的后裔。东南班图人早在公元2—3世纪就已出现在林波波河沿岸，以后逐步扩散到南非的各地区。18世纪末，开始形成部落联盟，1838年祖鲁人与布尔人交战于恩康姆河河套，祖鲁人战败，从此失去了独立，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统治。

含米特假设（Hamitic hypothesis）20世纪上半叶广为流传的一种种族主义思潮。它认为非洲没有历史，因而也就无所谓文明。因此，在非洲出现的文明，都是外来文明，都是由外来民族创造的。英国人类学家C. G. 塞利格曼在其1930年出版的《非洲的种族》一书中，直截了当地写道："非洲的文明就是含米特人的文明，非洲的历史就是这些人与其他两个非洲种族尼格罗人和布须曼人交往的记录。"随着非洲历史研究的深入，这种理论已经宣告破产。

西非早期铁器时代（Iron age in West Africa）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西非是最早使用铁器的地区。至今已经发现的早期铁器时代遗址有诺克文化遗址、伊格博马库遗址、萨奥文化遗址等。研究表明，西非很早就进入了铁器时代。诺克人在公元前5世纪已经学会冶铁。铁器的使用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诺克文化（Nok Culture）诺克文化代表了西非最著名的早期铁器时代，其遗址位于今尼日利亚的诺克地区。它大概起源于公元前10世纪，在公元前3—前2世纪达到顶峰。从发掘出的文物来看，当时的诺克人已形成较成熟的农业社会，他们还独自发明了冶铁技术。值得指出的是，诺克人在雕刻艺术上已经自成风格，并且达到很高水平。

阿克苏姆王国（Axum kingdom）非洲古王国，起源于今埃塞俄比亚提格雷省的阿克苏姆地区。它建国于公元1世纪前后，国都阿克苏姆城，以基督教为国教。4世纪时国力鼎盛，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都

十分发达。其疆域曾经越过红海，到达亚洲西部。该王国使用的埃塞俄比亚文，使埃塞俄比亚成为黑非洲唯一拥有自身文字记载历史的国家。7 世纪遭北方游牧民族攻击而衰亡。

穿越撒哈拉贸易（Trans-sahalan trade）早在公元前 1000 年，通过穿越撒哈拉沙漠，北非和西非已经发生了贸易往来。公元 1 世纪罗马人将骆驼引入后，贸易迅速扩大。公元 7 世纪后，阿拉伯人逐步控制了撒哈拉商道，并使贸易规模进一步发展。自北非通往撒哈拉以南非洲，形成了西部、中部和东部三条商道。穿越撒哈拉贸易沟通了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也促进了西非古国的形成和发展。

库施王国（Kush）非洲东部古代王国，是一个黑人国家。约公元前 11 世纪摆脱埃及统治独立。公元前 8 世纪，库施征服上埃及首府底比斯，之后又占领孟斐斯。约公元前 730 年，库施国王建立埃及第 25 王朝。约公元前 656 年，亚述人入侵，库施人被迫退出埃及，重回纳帕塔。公元前 530 年左右，库施将首都南迁至麦罗埃（今喀土穆以北 150 公里）。公元 350 年，阿克苏姆军队毁麦罗埃城，库施王国灭亡。

加纳王国（Ghana）西非最早出现的大国。由于缺乏文字资料，只能依据口头传说进行研究。建国时间一说公元 1—2 世纪，一说 2—3 世纪。有人说创建者是白人，也有人说是黑人。但是其居民肯定是索凯宁人。由于该国控制了南部的黄金产地，因而垄断了对北非的黄金贸易。9—11 世纪进入兴盛时期。13 世纪为苏苏国征服，后又成为马里王国属地。

马里帝国（Mali）由马林克人在公元 8 世纪建立的西非古国。曾经为加纳属国，趁加纳衰落而获得独立。在松迪亚塔领导下，击败苏苏人，称霸西非，人称马里帝国。帝国的经济发达，贸易繁荣，其控制的地域更大于马里。穆萨在位时期（1307—1332），帝国进入鼎盛，他赴麦加朝圣之事使马里声名远扬，甚至传到欧洲。1360 年后，因争夺王位的内讧不断，国力日衰。

曼萨·穆萨（Mansa Musa）马里国王，1307—1332 年在位。他积极发展经济和对外贸易，扩张疆土。他邀请许多穆斯林学者来马里，开

展学术活动，廷巴克图的散科尔清真寺成为当地著名的大学。他在位时期为马里鼎盛时期。1324—1325 年他赴麦加朝圣，队伍达 6 万之众，沿途挥金如土，使开罗市场的金价大跌。

桑海帝国(Sanghai) 西非古国，也是非洲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公元 7 世纪前后为桑海人所建。1009 年由库基亚(Koukia)迁都加奥(Gao)，故又称加奥王国。曾经被马里征服，14 世纪末独立，并逐渐强盛。廷巴克图不但是桑海帝国的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中心之一。

加涅姆—博尔努王国(Kanem-Bornu) 非洲乍得湖地区的古国，公元 8—9 世纪建于乍得湖东北的加涅姆。11 世纪起，以伊斯兰教为国教。13 世纪因遭外族入侵而迁至博尔努。加涅姆—博尔努王国全盛时期，控制了 12 个属国。国家经济和贸易繁荣。

豪萨城邦(City-States of Hausa) 西非豪萨人建立的一系列城市国家(7 个城邦和 7 个卫星国)的统称，位于今尼日利亚北部和尼日尔南部。关于它们的起源，有许多传说。一般认为，这些城邦建于 1000—1200 年。城邦在生产上各有分工，并且广泛使用奴隶劳动力。14 世纪，接受了伊斯兰教。

贝宁王国(Kingdom of Benin) 西非古国，位于尼日尔河三角洲一带，建都贝宁。当地居民从事农耕，工艺制品(青铜制品和象牙雕刻)具有很高水平。15 世纪后，葡萄牙、英国和荷兰殖民者相继入侵，成为西方奴隶贸易的重镇之一。1897 年沦为英国殖民地。

僧祇城邦(Zenj) 也称东非沿海城邦。Zenj 在波斯文中为“黑人”之意，这里是指古代阿拉伯地理学家对今索马里以南非洲东海岸黑人居民的统称。非洲东海岸以印度洋为商道，早在公元前与外界发生贸易往来，7 世纪，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不断迁居这里，与当地黑人居民共同生活，于是，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城邦，至 15 世纪末，城邦已达 37 个。这些城邦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得到很好的发展。

斯瓦希里文明(Swahili Civilization) 东非沿海城邦在其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斯瓦希里文明。在很长时间里，一些西方学者

认为这是外来文明。经过深入的调查和研究,现已证实,这种文明是一种以本土的黑人文明为主体,但是又吸收了外来文化(如阿拉伯和波斯文化)的非洲文明。

伊斯兰教的传播(The Spread of Islam)公元 7 世纪,阿拉伯人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后,开始对外扩张。阿拉伯人大批迁居北非和东非沿海地区,伊斯兰教也随之进入当地。在西非,跟随阿拉伯人穿越撒哈拉的贸易的足迹,伊斯兰教也在当地落户。伊斯兰教的传播,对非洲历史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奴隶贸易(Slave trade)西方在非洲进行的掠夺人力资源的罪恶活动,时间长达 4 个世纪(15—19 世纪)。在这场浩劫中,非洲丧失了数以亿计的人口,文明出现了大倒退。而西方国家却因此而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非洲在奴隶贸易中损失的人数、阿拉伯人在非洲奴隶贸易中的作用以及奴隶贸易对于非洲和西方国家产生的不同影响等问题,学术界仍有争议。

内陆探险(Exploration)在很长时间里,西方对非洲的了解只是停留在沿海地区。工业革命后,西方工业资本为了把非洲改造成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发起了内陆探险运动。数以百计的西方探险家(队)深入内陆,考察了非洲的地理、气候、物产和人种等。他们的活动使世界了解非洲,但是客观上也为殖民主义入侵和瓜分非洲准备了条件。

传教活动(Missionary)西方大规模的传教活动始于 19 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在沿海地区建立传教站,然后向内陆渗透。传教士开办学校、医院和慈善事业,使基督教在非洲很快传播开来。传教活动就其实质而言,是西方的一种文化侵略活动。因此,传教活动在许多地区受到当地群众的抵制,并出现了非洲人自主管理的独立教会。

柏林会议(Berlin Conference)西方列强为争夺和瓜分非洲而召开的国际会议,1884—1885 年在柏林召开。会议确立了瓜分非洲的"有效占领"原则;确认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以个人名义占领"刚果自由邦";承认各国在刚果河流域自由贸易和自由通航的权利。会议后,西方列强立即掀起了瓜分非洲的狂潮。

瓜分非洲(Partition of Africa)至"一战"前夕,整个非洲几乎被西方列强瓜分完毕。英国殖民地占据了非洲面积的29%,法国占35.6%,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分别占7.7%,西班牙占1%,葡萄牙占9.8%。名义上保持独立的只有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前者受英、法、意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后者受到美国的控制。

阿杜瓦战役(Battle of Adwa)1896年2月,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在国王曼涅里克二世的领导下,埃塞俄比亚人民进行积极的抵抗。3月1日,在阿杜瓦战役中,意大利军队遭到埃塞俄比亚军队的包围,几乎全军覆灭。同年10月,意大利被迫与埃塞俄比亚订约,承认埃塞俄比亚的独立和主权完整。阿杜瓦战役使埃塞俄比亚保持了政治独立。此役也成为非洲人民反抗西方殖民主义者斗争的光辉典范。

萨摩利·杜尔领导的反法斗争(Samori Touré)萨摩利·杜尔是几内亚著名的民族英雄。1891年法国对几内亚发动进攻,萨摩利·杜尔领导人民进行了长达7年的反侵略战争。为了有效抗击法国殖民者,他坚决实行焦土政策和坚壁清野。1898年,法国殖民军结集重兵,两面夹击,才镇压了反抗。萨摩利·杜尔于1989年9月被俘,1900年死于流放地。

直接统治(Direct Rule)西方列强占领非洲殖民地后,废除了当地的传统统治者和传统社会制度,代之以由宗主国直接统治。一般而言,由宗主国委派总督,由总督组织管理机构,制订制度,任命各级官员。非洲人被排斥在殖民机构之外。尽管有少数非洲人被任命担任一些办事员之类的职务,但他们只是执行当局的命令而已。法国对非洲殖民地的统治被认为是直接统治的样板。

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西方列强占领非洲殖民地后,在形式上仍然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统治者和社会制度,但是在实质上,其统治者和传统社会制度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独立地位,成为西方殖民当局的统治工具。英国殖民官员卢加德先后在印度、乌干达和尼日利亚做了探索,又在尼日利亚进行了实践,以后在英国殖民地推广。

殖民政策(Colonial policy)西方列强在非洲殖民地强制推行一系

列的殖民政策,包括建立政治统治、推行单一经济作物生产、掠夺当地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实行奴化教育和同化政策等等。西方的殖民政策的全部出发点和归属,就是追求宗主国殖民利益的最大化。

马及马及起义(Maji Maji rebellion)坦桑尼亚人民反抗德国殖民统治的群众武装起义(1905—1907)。马及(Maji)在斯瓦希里语中为“水”的意思,起义者相信,只要服用鲁菲季河的圣水,便可以在对德军战斗中刀枪不入。起义遭到德国殖民军的残酷镇压。马及马及起义属于非洲人民早期反抗西方殖民统治的斗争。

赫雷罗族起义(Herero in rebellion)西南非洲人民反对德国殖民统治的斗争。1904 年,玛赫列罗(Samuel Maherero)发起反德的起义,得到霍屯督人的响应。起义坚持了三年,消灭德军五千余人。德国不断增加兵力,并得到了英国的帮助,才残酷镇压了起义。

一战中的非洲(Africa in World War I)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列强之间的战争,但是它们的非洲殖民地却被深卷其中。非洲本土成为一个重要战场,几百万非洲人也在为各自的宗主国相互撕杀。非洲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战争也教育了人民,非洲的民族意识逐步觉醒。在战争期间,非洲许多地区爆发了反抗欧洲殖民者的斗争,如奇伦布韦领导的起义。

委任统治(Rule under a mandate)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国际联盟确认,战败国德国的原殖民地分别交给英、法、比和南非,成为它们的委任统治地。委任统治与原先的殖民统治没有本质的区别,唯一不同的是,宗主国要接受国际联盟的监督,委任统治地如有不满,也可以向国际联盟申诉。

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黑人的民族主义,既是一种思想,又是一种运动。它发端于 19 世纪末,要求全世界的黑人团结起来,首先争取非洲大陆的独立,最终目标是建立非洲合众国。泛非主义无论在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中,或者在非洲国家独立后的发展进程中,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影响。重要的代表人物包括杜波依斯、加维、恩克鲁玛等。

法绍达危机(The Crisis of Fashoda)英法为争夺非洲殖民地而发

生的一次冲突。1898 年 9 月,英国殖民军在镇压了苏丹的马赫迪起义后,沿白尼罗河南上,到达法绍达,而来自法属刚果的法国殖民军在两个月前已经抵达。英法两军发生对峙,战争迫在眉睫。法国担心德国乘机发难,于是对英让步,于 11 月撤军。

英布战争(Boer war)英国对南非布尔人的战争,也称"布尔战争"。英国占领南非后,布尔人(南非荷兰移民的后裔)向内陆迁徙,并于 19 世纪建立以奴役黑奴的种族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1899 年 10 月,英国发起攻击,布尔人战败,上述两地被英国吞并。

二战与非洲(World War Ⅱ and Africa)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非洲不但成为交战国的人力资源和农矿产品的供应地,而且成为一个重要的战场,非洲人民在二战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战争教育了非洲人民,进一步唤醒了非洲民族觉悟的高涨。战后掀起的民族独立运动推动了非洲大陆的独立。

沙佩维尔惨案(Sharpsville Massacre)为强化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南非当局于 1952 年颁布实施《通行证法》。1960 年 3 月 21 日,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沙佩维尔和开普敦近郊的兰加爆发了反对《通行证法》的群众示威游行,有上万名群众参加。警察向示威者开枪,死 70 多人,伤 240 多人。

非洲年(The year for Africa)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大陆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在 1960 年一年中,非洲的法属、英属和意属共 16 个殖民地宣告独立。在同一年,比属刚果也走上了独立的道路,于是,独立的国家达到 17 个之多。因此,在世界现代史上,1960 年被称为"非洲年"。

非洲社会主义(African Socialism)二战后非洲民族独立国家领导人所提倡和奉行的各种社会主义的总称,包括阿拉伯社会主义、村社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非洲科学社会主义。非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不同,它的实质是非洲独立的民族主义思潮。

非洲统一组织(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OAU)为了追求非

洲统一的目标,1963 年 5 月 22—25 日,31 个独立的非洲国家首脑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集会,成立非洲统一组织。该组织在捍卫非洲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促进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1 年,为非洲联盟所取代。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Apartheid in South Africa)西方殖民主义为了实行对广大黑人的统治而制定的一种制度。它以肤色为标志,白人成为社会的统治者,而黑人则失去了一切政治、经济和其他权力,成为社会最底层的被统治者。在南非,这种制度发展到了顶峰。南非广大黑人为推翻种族主义制度,进行了前赴后继的斗争。1994 年种族主义制度被推翻。

丁冈(Dingane,约 1790—1840)南非祖鲁王国国王,1828—1840 年在位。为了击退布尔人的进犯,1938 年 12 月 16 日,他率领祖鲁军队与布尔人在恩康姆河一带发生决战,祖鲁人英勇杀敌,但伤亡惨重,祖鲁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河水,该河从此改名"血河"。南非人民为了弘扬他的斗争精神,把 12 月 16 日定为"丁冈日"。

马赫迪·穆罕默德(Mahdi Muhammad,1844—1885)苏丹民族英雄,1881 年自称马赫迪(意为救世主),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号召民众反抗外国统治者。不久发动起义,并向英国殖民军发起进攻。1885 年占领喀土穆,击毙英国总督戈登。他随后统一了各部落,建立了统一的马赫迪国家。

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英国探险家和传教士。一生中有 30 年在非洲探险和传教。他先后在南非传教,以后又考察了赞比西河、尼亚萨湖(今马拉维湖)和坦噶尼喀湖等。在探险过程中,他同情非洲人民,反对奴隶贸易。他把在非洲的所见所闻笔录成书出版,推动了外界对非洲的了解,也为西方入侵非洲提供了帮助。

罗得斯(Cecil J. Rhodes,1853—1902)英国人,1870 年抵南非,因开采钻石矿而致富。之后通过兼并其他公司,建立垄断组织"德比尔统一矿业公司",次年成立英国南非公司。积极参与本国政府在南部非洲的扩张,1890—1896 年出任开普殖民地总理。

基班古(Simon Kimbangu，约 1889—1951)刚果(金)基班古教创始人，反对殖民统治的基班古运动领导人。早年受过英国浸礼会教育。1921 年在基督教基础上创建基班古教派，宣传在上帝面前，黑人与白人平等，号召非洲人拒绝为西方殖民者工作，推动了反对殖民主义斗争。比利时殖民当局把他投入监狱。1951 年病死于狱中。

海尔·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1892—1975)埃塞俄比亚皇帝(1930—1974)。1931 年颁布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制，并进行教育和行政等领域的改革。1935 年，领导人民抗击意大利法西斯军队的入侵，一度流亡国外，1941 年回国复位。非洲大陆独立后，积极推动非洲统一组织的建立。1974 年被武装部队政变推翻。

恩克鲁玛(Kwama Nkrumah，1909—1972)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加纳开国总统。曾积极参加和组织第五次泛非大会。1946 年回国领导加纳的民族独立运动。1960 年加纳独立，他被选为共和国总统兼总理。1966 年因政变而被推翻，寄居几内亚，1972 年病逝。他一生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坚定倡导和推动非洲大陆的统一。

尼雷尔(J. K. Nyerere，1922—1999)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首任总统。长期领导争取坦噶尼喀的自治与独立运动。坦噶尼喀独立后，担任首届总统，1964 年坦噶尼喀同桑给巴尔合并后，又担任坦桑尼亚总统。他对内推行“乌贾马村”运动，宣称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外积极参加第三世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1994 年主动辞去总统职务，1999 年病逝。

曼德拉(Nelson Mandela，1918—)非洲杰出的政治家。1944 年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1952 年当选为该组织副主席。为反对种族主义制度，创建军事组织“民族之矛”，开展地下武装斗争。1962 年被捕，铁窗生涯长达 27 年之久。1990 年出狱后，以过人的胆识和高度的政治智慧，推动南非实现了种族和解，并举行了南非历史上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1994 年，他当选南非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成立了民族团结政府，长达 300 多年的种族主义统治宣告结束。1993 年，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推荐阅读文献

非洲大陆的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各族的历史发展又各具特色。目前对于非洲历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因此,全面介绍这些成果,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推荐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分类加以介绍。读者可以根据情况,自行进行选择。

一、非洲通史类

J. D. Fage and Roland Oliver (General Editor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Cambridge, 1975—1986).《剑桥非洲史》8 卷本,代表了目前国际学术界在非洲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书中观点更多代表欧美学者的看法。各卷信息如下:

Vol. 1, *From the Earliest to C. 500 BC* (edtied by J. Desmond Clark);

Vol. 2, *From C. 500 BC to AD 1050* (edtied by J. D. Fage);

Vol. 3, *From C 1050 to C. 1600* (edtied by Roland Oliver);

Vol. 4, *From C. 1600 to C. 1790* (edtied by Richard Gray);

Vol. 5, *From C. 1790 to C. 1870* (edtied by John Flint);

Vol. 6, *From C. 1870 to C. 1905* (edtied by G. N. Sanderson);

Vol. 7, *From C. 1905 to C. 1940* (edtied by A. D. Roberts);

Vol. 8, *From C. 1940 to C. 1975* (edtied by Michael Crowder).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8 卷本。已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

公司翻译出版。这套通史主要由非洲本土学者编撰,同样是目前国际学术界在非洲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的代表之一,书中更多反映了非洲学者的观点。各卷信息如下:

第一卷,《编史方法及非洲史前史》(编辑:J. 基-泽博);

第二卷,《非洲的古代文明》(编辑:G. 莫赫塔尔);

第三卷,《7 世纪至 11 世纪的非洲》(编辑:M. 法西);

第四卷,《12 世纪至 16 世纪的非洲》(编辑:D. T. 尼昂);

第五卷,《16 世纪至 18 世纪的非洲》(编辑:B. A. 奥戈特);

第六卷,《1880 年代以前的非洲》(编辑:J. F. A. 阿贾伊);

第七卷,《外国统治新的非洲,1880—1935 年》(编辑:A. A. 博亨);

第八卷,《1935 年以后的非洲》(编辑:A. A. 马兹鲁伊)。

艾周昌、陆庭恩主编:《非洲通史》,3 卷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这是中国几代非洲史学者梦寐以求、艰苦创业的结晶。它不但代表了中国在这个领域的最高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中国学者的研究特色。各卷信息如下:

《非洲通史》(古代卷),何芳川、宁骚主编;

《非洲通史》(近代卷),艾周昌、郑家馨主编;

《非洲通史》(现代卷),陆庭恩、彭坤元。

Basil Davidson, *Africa: History of a Continent*, London,1966.

Basil Davidson, *Horizon History of Africa*, New York,1971.

以上两本通史均为著名非洲历史学家戴维逊撰写,阐述线条清晰,资料丰富,比较多卷本非洲通史,可以在较短时间里了解非洲大陆的历史发展进程。

J. D. Fage, *A History of Africa*, London and New York,1995. 很受欢迎的通史著作,1978 年出版后,于 1988 年和 1995 年两次再版。

Jean Hiernaux, *The People of Africa*, London,1974. 内容和阐述都更加简明扼要。

E. Gilbert and J. T. Reynolds, *Africa in World History: From Prehis-*

tory to the Present ,Prentice Hall, 2003. 把非洲历史的发展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用全球史观剖析非洲历史。

African Historical Demography (2 vols), African Studies Center, University of Edinburgh,1977 and 1981. 人口学一直是非洲学研究中的薄弱领域,这是因为非洲历史上缺乏人口统计资料,某些地区即便有,也十分零碎。为了开展非洲历史人口学的研究,英国爱丁堡大学先后于 1977 年和 1981 年召开专题研讨会。以上二卷著作即是两次会议的论文集。应该指出,以上著作为深入研究非洲的历史人口学揭开了序幕。

罗兰・奥利弗、安东尼・阿特莫尔:《1800 年以后的非洲(1800—1979)》,商务印书馆,1992 年。本书主要叙述了自 19 世纪起到 1980 年代止的非洲各国的历史和欧洲人在非洲的重大活动,并简要地介绍了这个时期非洲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基本情况。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编著:《非洲史,1800—1918》(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编著:《非洲史,1918—1967》(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

以上两本著作实际上是姊妹篇。这是前苏联学者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非洲历史的成果。书中确立了以非洲人民为非洲历史的主体的观点,批判了欧洲中心论。这些史观对于中国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

西克・安德烈:《黑非洲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1973—1978 年。作者是匈牙利著名学者,曾任该国外交部长。本书原为三卷,中译本只是翻译了前两卷。对于本书的争议很大,匈牙利方面认为,本书出版是国际科学研究中的大事,但是英国的一位评论员认为,本书有很多弄错事实的地方。

罗特伯格:《热带非洲政治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作者文笔生动,叙述清晰,引用了许多原始资料。

巴兹尔・戴维逊:《现代非洲史——对一个新社会的探索》,中国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 年。阐述 20 世纪初至 1970 年代中期非洲历史非洲进程,着重论述了非洲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非洲民族国家的诞生、现状和非洲前景。中译本的特色是,为了便于中国读者的理解,译者做了大量的注释。

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从远古至 1918 年》,人民出版社,1984 年。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非洲通史,至今仍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陆庭恩、艾周昌:《非洲史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年。一本很有特色的中国高校非洲历史教材,内容简洁明了,至今仍有许多高校在使用。

顾章义:《精粹世界史——崛起的非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年。对于初学者,这是很好的教材。

丹林编:《非洲大事年表》,知识出版社,1986 年。对于宏观了解非洲历史发展进程,有很大帮助。

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该书按照时间的顺序,叙述 19 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非洲、非洲人民由反对殖民主义转而明确提出独立的要求开始,到 1990 年纳米比亚获得独立,非洲大陆全部独立为止。因此这是一本记录非洲人民从争取独立到赢得独立的全过程的史书。

郑家馨主编:《殖民主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该书揭示了自 1415 年以来西方殖民国家在非洲殖民活动的轨迹,它们在各个时期所奉行的不同殖民政策和制度与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和对非洲殖民地的影响。这是中国学者对殖民主义与非洲历史的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陆庭恩主编:《非洲农业发展简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年。本书阐述了非洲大陆农业生产的起源、发展和现状。

二、地区和国别史

Ajayi, J. F. Ade and Crowder, Michael (eds.), *History of West Afri-*

ca, 2 vols, London, 1985. 这是二卷本的西非史,主编都是非洲著名学者。

Oliver, Roland and Others(eds.), *A History of East Africa*, 3 vols, Oxford, 1963-75. 一部内容比较丰富、研究有相当深度的东非历史。

Birmingham, David, and Martin, Phyllis(eds.), *A History of Central Africa*, 2 vols,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83. 一位史学评论家指出,在很长时间里,学习中非历史的学生们,因为缺少一本全面的教材而苦恼,现在,伯明翰主编的二卷本《中非史》为他们解决了问题。

Wilson, Monica and Thompson, L. M(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2vols, Oxford, 1967-71. 二卷本的《牛津南非史》,收编了许多关于南非历史的论文,尤其是关于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方面的研究。

Duffy, James, *Portuguese Africa*, Harvard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关于葡属非洲(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殖民地历史的著作不多,这是较好的一本。

Crowder, Michael, *The Story of Nigeria*, London, 1962. 这是一本较好的尼日利亚历史著作。全书16章,9章阐述前殖民时代的历史,3章讲述殖民时期,4章叙述民族主义的掀起、发展和国家的独立。有评论认为,在古代史方面,笔墨少了些,比如对于诺克文化的阐述。

Little, Kenneth, *West African Urbanization: A Study of Voluntary Assocition in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1965. 作者对西非地区的城市化与社会变化直接的关系做了研究。他认为,城市化是西非社会生活变化的中心。

Ajaye, J. E. Ade, *Christian Missions in Nigeria 1841-1891: The Making of A New Elite*, London, 1965. 非洲最早的现代教育是由西方传教士引进的。也正是在西方教会开设的教会学校里,培养了非洲最早的民族知识分子。本书对此有很好的剖析。

对于非洲地区和国别史,我国在1970年代组织翻译了一批著作(约60余部)。这批著作经过选择,大多具有较高学术水平。至今,中

国的非洲史学者仍然在使用。下面介绍其中一部分。

费奇:《西非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一本阐述清晰的西非史,在奴隶贸易等专题方面,收集了大量资料。值得一读。

佐伊·马什、G. W. 金斯诺思:《东非史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主要阐述东非沿海地区的历史沿革。资料比较丰富。必须指出的是,著作中明显存在欧洲中心论。书中附有的参考书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路易·约斯:《南非史》,商务印书馆,1973 年。对于南非历史的研究有一定参考意义。但是,作者对南非种族主义的观点值得商榷。

廷德尔:《中非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对于研究中非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约翰·赖特:《利比亚》(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作者是一名英国记者,利用赴利比亚工作的机会,收集了大量资料,写成本书。

迈基·希贝卡:《独立的苏丹》(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年。作者是苏丹历史学家,曾经任喀土穆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这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展而成。全书资料丰富,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罗贝尔·科纳万:《多哥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作者曾经担任法国驻多哥官员,在多哥度过了大半生。书中阐述了多哥从史前时代至 1959 年的历史。内容涉及多哥的自然、地理、部族、宗教、风俗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

伯恩斯:《尼日利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书中的地图和参考书目等内容具有参考价值。

威·恩·弗·瓦德:《加纳史》(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 年。作者曾经在加纳从事殖民教育达 16 年之久。本书涉及的时间从公元 1200 年(葡萄牙入侵),至 1957 年独立止,因此实际上就是一部加纳殖民史。

伊·基曼博等主编:《坦桑尼亚史》,商务印书馆,1976 年。这是坦

桑尼亚本土学者的著作。作者们以非洲人的眼光重新审视了坦桑尼亚的历史,得出了与以往西方学者不同的结论。

克里斯多弗·法伊夫:《塞拉勒窝内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年。作者曾经担任英国在塞拉勒窝内(现译塞拉利昂)殖民政府的档案保管员,他在当地收集了许多历史档案、文件和书报材料,因此本书的资料比较丰富。书中涉及的内容,主要是殖民地时期。

弗吉尼亚·汤普森:《法属索马里,吉布提与非洲之角》,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本书主要介绍法属索马里沦为法国殖民地的历史过程,及其现状。书中对法属索马里的地理条件、民族构成、宗教信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做了介绍。

加布里埃尔·埃斯凯:《阿尔及利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这是一本简要介绍 1830 年法国入侵至 1957 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前夕历史的小册子。

厄斯诺·巴伯吉:《毛里求斯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年。本书阐述毛里求斯被发现至 1957 年期间的简史,也有人称之为“毛里求斯的一部简要的编年大事记”。

贝莉埃:《塞内加尔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资料比较丰富,有一定参考价值。

郁心强:《尼日尔简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 年。这是中国人写的尼日尔历史。作者利用在尼日尔工作之便,对尼日尔历史做了研究,最后撰写成一本简史。

刘鸿武主编:《从部族社会到民族国家:尼日利亚国家发展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 年。作者 1992 年受国家教委指派,赴尼日利亚留学一年。利用在尼日利亚收集的资料和丰富、生动的亲身感受,对尼日利亚国家发展史做了研究,最终以本书作为研究成果。本书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尼日利亚史,全书资料翔实,层次清晰,剖析深刻。

杨立华等合著:《正在发生划时代变革的国度:南非政治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论述南非的政

治经济发展的专著，既阐述了南非种族主义统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又介绍了南非社会的政治、经济现状。

葛佶：《南非——富饶而又多难的土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这是又一本研究南非历史与现状的重要专著。

张象主编：《彩虹之邦——新南非》，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较全面地介绍了南非的历史，由于该书撰写于新南非成立之后，因此，作者们有了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特别是能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对南非种族主义统治和种族主义制度做比较全面的总结。

沐涛：《南非对外关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国第一部研究南非对外政策的专著。

艾周昌等：《南非现代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用现代化的视角剖析南非历史发展。

何丽儿：《南部非洲的一颗明珠——津巴布韦》，当代世界出版社，1995年。中国学者的著作，全面介绍津巴布韦的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全书六章中有三章介绍历史。

钱乘旦主编的"英联邦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共17本，其中涉及非洲国家的有6本。这6本著作的共同特点是，从现代化作为视角，剖析英联邦中的非洲国家的历史进程。包括如下书目：

(1)陈令霞、张静芬：《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缔造民族国家的里程》，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2)庆学先、罗春华：《西非三国：尼日利亚冈比亚塞拉利昂：对抗与和解的悖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3)陈仲丹：《加纳：寻找现代化的根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4)潘兴明、李忠：《南非：在黑白文化的撞击中》，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5)姜忍忠等：《中非三国：津巴布韦赞比亚马拉维：从部落跃向现代》，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

(6)刘金源：《印度洋英联邦国家：马尔代夫毛里求斯塞舌尔：海

岛、小国、异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年。

近年来,国别史研究日益引起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自 2000 年以来推进的《列国志》项目,目前已经由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一些非洲各国的志书,例如《贝宁》、《刚果民主共和国》、《利里亚》、《加蓬》、《安哥拉》等,其中均有对于这些国家历史部分的介绍。

三、中非关系史

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非关系两千年》,中华书局,1990 年。这是国内第一部分量较重的论述古代中非关系史的专著。作者搜集了大量史料,经过系统整理,对两千年中非关系发展的历史做了比较全面的叙述,并对很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书中涵盖了自古至今 2000 余年的中非关系历史,因此堪称国内首部全面、系统介绍中非关系历史的著作。

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 年。本书是世界上第一部阐述非洲华侨华人历史发展过程的历史专著。全书 56 万字,中外各类资料丰富翔实,全面介绍了华人自清代开始迁入非洲,直至 20 世纪末的各个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口、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

方积根编:《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新华出版社,1986 年。作者利用在非洲工作之便,在当地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搜集了国外有关非洲华侨史的专著和华侨报刊的文章,以及有关的档案材料,并编辑成书。资料比较丰富,具有参考价值。

艾周昌选编:《中非关系史料选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年。作者广搜博采,辑录了大量有关中非关系的中文资料,并进行了详细的注释。这些资料,有不少属于 16 世纪至 18 世纪的范围,对古代中非关系史研究很有帮助。

李安山编注:《非洲华侨华人社会史资料选辑》,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 年。这是作者所著《非洲华侨华人史》的姊妹篇,或者称为资料集。内容分为"文件与报道"、"回忆与访谈"以及"附录"三部分。本书除了提供大量资料外,还专门讨论了非洲华侨华人史的中、外文资料及其利用。

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三联书店,1965 年。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中非关系史专著,尽管只有五篇论文,但是均有较高学术水平。

戴闻达(J. L. Duyendak):《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商务印书馆,1983 年。这是荷兰汉学家戴闻达利用中国古籍中有关非洲的报道所做研究。

陈公元:《古代非洲与中国的友好交往》,商务印书馆,1985 年。根据中国古籍资料,对中国、非洲的古代关系进行的阐述。

许永璋:《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考论》,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 年。作者是中国著名的中外关系史(尤其是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专家,本著作是作者的部分成果,共计收录 43 篇。著作涉及的时间和空间均十分广泛,值得一读。

四、史前及古代

Bassey Andah, Alex Okpoko, Thurstan Shaw, Paul Sinclair(eds.), *The Archaeology of Africa Foods, Metals and Towns*, Routledge, 1994. 本书阐述了非洲大陆的考古研究及其成果,向读者展示了非洲悠久的文化和历史,广受好评。

Oliver, Roland and Fagan, Brian M., *Africa in the Iron Age, c. 500B. C. to A. D. 1400*. Cambridge, 1975. 这部著作勾画出曾经被忽略的历史。作者中一位是历史学家,另一位是考古学家,他们力图传递文化和政治制度多样性的理念。书中有许多地图,帮助读者理解相关的内容。

Connah, Graham, *African Civilizations: Precolonial Citie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 –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1987. 作者在导言中指出：撰写这部著作的目的是纠正广泛流传的一种成见，即非洲人都生活在长满草丛的小村子里，或者泥屋里，而不是生活在城市和国家里。这部著作成功了。即便对于外行而言，这本书也通俗易懂，书中的图解十分生动，个案研究引人入胜。

Cheikh Anta Diop, *The African Origin of Civilization: Myth or Reality*, Lawrence Hill Books ,1989. 这是迪奥普的一本重要著作。他以非洲考古和人种学的研究成果，证明古埃及的法老是黑人血统。

Levtzion, Nehemia, *Ancient Ghana and Mali*, London, 1973. 加纳和马里都是西非古国，然而，考古提供的信息不多，只是涉及它们的起源和发展。作者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其中包括一些开拓性研究。本书对于了解西非古国的历史具有积极意义。

Chapurukha M. Kusimba, *The Rise and Fall of Swahili States*, California, 1999. 在11—16世纪，东非沿海地区出现了一系列城市，之后形成了世界闻名的斯瓦希里文明。本书阐述了本课题研究的背景，追溯了斯瓦希里文明的兴起和衰落的历史过程以及从斯瓦希里文明中获得的启示。

Levtzion, Nehemia, and Pouwel, Randall L., *The History of Islam in Africa*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0. 伊斯兰教在非洲的传播和发展，一直是非洲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本书对此做出了很好的阐述。有人评论说，本书既是本科生的标准教材，又是学者们在这个领域的参考书。

Trimingham, J. Spencer, *Islam in West Africa*, London, 1959. 在殖民主义者入侵前，伊斯兰教已经进入西非。本书阐述了伊斯兰教在西非传播的过程，并且指出，至18世纪末，伊斯兰教已经融入当地社会，成为当地社会和政治力量。作者是著名的非洲伊斯兰教研究专家，他的其他著作还有：*Islam in the Suden*, London, 1949；*Islam in the Ethiopia*, London, 1952；*A History of Islam in West Africa*, London, 1962；*Islam in East Africa*, London, 1964。

Gibb, H. A. R. (trans and ed), *Ibn Battuta: Travels in Asia and Africa*, *London*, 1929. 讲述了伊本・白图塔游历亚洲和非洲的经历。

Smith, Robert, *Kingdoms of the Yoruba*, London, 1988. 热带非洲的历史,往往缺乏文字资料,这给研究带来了困难。作者克服困难,在研究约鲁巴国家历史方面,取得了成绩。

Garlake, Peter S., *Great Zimbabwe*, London, 1973. 大津巴布韦遗址发现后,非洲文明外来说再次甚嚣尘上。这些建筑是非洲人建造的吗?本书对此做了研究。书中有许多照片。

戴维逊:《古老非洲的再发现》,三联书店,1973 年。作者站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立场上,根据丰富的考古资料,证明了非洲黑人种族与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

戴尔・布朗主编:《非洲:辉煌的历史遗产》,华夏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这是布朗主编的《失落的文明》丛书中的一本。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的评价是:"在这里,考古学不再是报告、简报的堆积和一般人读不懂的论文,而是丰富深刻又不枯燥繁琐,贴近人们的真实生活,适合大多数读者的需要。"

五、奴隶贸易

Curtin, P.,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 Census*, Wisconsin, 1969. 奴隶贸易的规模究竟有多大?非洲总共丧失了多少人口?这些问题尽管无法得到精确的答案,但是各国学者还是不断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研究,而且也得出了不同的数字。在这类研究中,柯廷的成果令人瞩目。他在收集大量各类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在奴隶贸易期间,输入美洲的非洲奴隶为 956 万人。柯廷的著作出版后,引起各国专家的关注,但见智见仁,意见不一。

Inikori, J. E. (ed.), *Forced Migration: The Impact of the Export Slave Trade on African Societies*, London, 1982. 这是一本论文集,涉及的

内容包括非洲的奴隶制度、火器的输入对于非洲奴隶贸易的作用以及奴隶贸易对于非洲的影响等。

Anstey, Roger,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nd British Abolition, 1760-1810*, London, 1975. 作者聚焦于三个方面：奴隶贸易对于工业革命所需的资本积累的作用；奴隶贸易对于非洲的地理、人口、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以及禁止奴隶贸易的出现。后者是本书的重点。作者认为，禁止奴隶贸易并非单个因素的作用，而是宗教热情、民族利益和政治环境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巴兹尔·戴维逊：《黑母亲——买卖非洲奴隶的年代》，三联书店，1965 年。英文版为 *Black Mother, the Years of African Slave Trade*。作者阐述了西方在非洲从事罪恶的贩卖黑人的历史，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十五世纪至十九世纪非洲奴隶贸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专家会议的论文报告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编撰《非洲通史》，在海地太子港专门召开专家会议，对于奴隶贸易进行了专题研讨。这本论文报告集收录了世界各国专家的不同观点和看法，学术价值颇高。

斯·尤·阿勃拉莫娃：《非洲：四百年的奴隶贸易》，商务印书馆，1983 年。作者是苏联学者，这部著作代表了苏联的研究水平。作者在收集、剖析了大量有关资料后，对于奴隶贸易的发展阶段、西非贩卖奴隶的体制、黑人的反抗、走私奴隶贸易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且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六、殖民统治

Gifford, Prosser, and Louis, W. M. Roger (eds.), *Britain and Germany in Africa: Imperial Rivalry and Colonial Rule*, New Haven, 1967. 1965 年春季，美国耶鲁大学举办了“帝国竞争与殖民统治”的专题研讨会。

会后，收录了会议的 24 篇论文，出版成论文集。这些论文大部分基于欧洲和非洲的档案资料，对欧洲帝国主义在非洲的外交政策以及欧洲宗主国在非洲所建立行政体系进行了剖析。

Gifford, Prosser, and Louis, W. M. Roger(eds.), *French and Britain in Africa: Imperial Rivalry and Colonial Rule*, New Haven, 1971. 这本论文集与上述论文集是姊妹篇。

Gann, L. H, and Duigan, Peter (eds.), *Colonialism in Africa, 1870-1960*, Cambridge, 1969—1975. 5 卷本：第一卷，《1870 年至 1914 年间殖民主义的历史与政治》；第二卷，《1914 年至 1960 年间殖民主义的历史与政治》；第三卷，《殖民主义统治下非洲社会的变化》；第四卷，《殖民主义经济》；第五卷，《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主义的参考书目》。

Coupland, Sir Reginald, *East Africa and Its Invader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Death of Seyyid Said in* 1856, Oxford, 1938. 作者是一位东非史研究专家，这本著作和另一部著作 *The Exploitation of East Africa 1856-1890*(London, 1939)在东非历史研究的领域中，具有较大学术影响。

Pakenham, Thomas, *The Boer War*, London, 1979. 布尔战争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爆发一场十分惨烈的战争。由于战争对于南非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成为南非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作者分析了战争的起因和结果，他特别提出，在这场战争中，南非黑人的因素不可忽视。在战争阵亡者中，黑人占了五分之一。

Hess, Robert L, *Italian Colonialism in Somali*, Chicago and London, 1966. 意大利在非洲的殖民地并不多，但是却有自己的特殊的管理方法，本书对此做出了分析。

郑家馨主编：《殖民主义史(非洲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本书研究了 1415 年以来 500 多年欧洲列强在非洲大陆的殖民活动，它们在各个时期奉行的不同的殖民政策和制度，以及殖民主义对于非洲殖民地的影响。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全面研究殖民主义与非洲的学术著作。

七、非洲民族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

Hodgkin, Thomas, *Nationalism in Colonial Africa*, London, 1956. 作者是著名非洲史研究者。这本书虽然早在1956年就已经出版,当时大部分非洲国家都没有独立。但是现在读来仍然感到新鲜。作者在书中分析了非洲社会的力量的变化:如农民、城市工人、基督教徒、知识分子、政党和议会等。他对民族主义的崛起和非洲的独立充满信心。

Legum, Colin, *Pan-Africanism: A Short Political Guide*, London, 1962. 对于泛非主义的形成和早期发展做了很好的阐述。本书的后半部分附有许多原始资料。

Thompson, V. Bakpetu, *Africa and Unity: The Evolution of Pan-Africanism*, London, 1969. 同为研究泛非主义,但是其重点在于关注非洲国家独立后,如何实现非洲统一的问题。

July, Robert W., *The Origins of Modern African Thought*, London, 1968. 本书的副题是 Its Development in West Africa during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可见本书重点是介绍西非地区的非洲民族主义者,如克鲁梅尔、霍顿、约翰逊、海福特和布莱登,阐述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以及对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影响。

Rotberg, Robert I.,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Central Africa: The Making of Malawi and Zambia, 1873-1964*, Harvard, 1965. 罗特伯格在给学生们讲授非洲历史时,对于中非地区给予特别关注。他查阅了大量档案,收集了许多亲历者的口述资料,使本书材料可靠,令人信服。

张宏明:《近代非洲思想经纬:18、19世纪非洲知识分子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作者对18、19世纪非洲知识分子的产生和发展、非洲民族主义的形成做了梳理。这对于了解非洲民族主义的历史提供了基础。

吴秉真、高晋元:《非洲民族独立简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作者指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回顾和总结"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无疑是十分必要的。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李安山:《殖民主义统治与农村社会反抗——对殖民时期加纳东部省的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年。著名非洲历史学家戴维逊指出,如果不研究非洲人的抵抗和反抗的真实情况,永远也不可能理解非洲历史。作者以此为视角,聚焦加纳农村的反抗斗争。全书资料丰富,观点鲜明,值得一读。

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 年。这是一本全面、深入研究非洲民族主义的学术著作。内容包括上篇"非洲民族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下篇"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的建构"。

陆庭恩:《非洲与帝国主义(1914—193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二十年,非洲发生了许多变化:本地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和发展,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变化,现代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新时期。作者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做了全面、深入的剖析。

八、非洲经济史

Wickins, P. Lionel, *Africa, 1880-1980: An Economic History*, Oxford, 1986. 本书阐述了一个世纪的非洲经济史。作者以 10 年为一个阶段,分 10 个阶段分析了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本书的资料十分丰富,论述比较清晰。

Munro, J. Forbes, *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1800-1960*, London, 1976. 这是一本教材。作者广泛运用经济统计资料,剖析了 1800—1960 年间非洲与世界经济关系的演变。本书自出版以来,广受

好评。

Hopkins, A. G. (ed.), *An Economic History of West Africa*, London, 1975. 对于非洲经济史的研究还不多见,关于西非经济史的著作也不多。这部著作向人们提供了西非经济发展史若干专题研究。

R. Berg and J. Whitaker, *Strategies for African Development*, Berkeley, 1986. 这是一本论文集,内容包括殖民地经济对于非洲国家的影响、非洲的社会结构、对于经济的管理、非洲国家的农业政策、工业化以及教育、妇女等问题。

陈宗德、吴兆契:《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发展的历史、现状、发展战略及其得失,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舒运国:《非洲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非洲国家独立后经济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口增长过快。本书分析了非洲国家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剖析了非洲人口增长过快的原因,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罗建国:《非洲民族资本的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作者对非洲民族资本出现和发展的历史做了阐述。对于非洲民族资本的研究尚不多,加之非洲民族资本的独特特点,因此,本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舒运国:《失败的改革:20 世纪末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结构调整评述》,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年。结构调整是非洲国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导下进行的一次经济改革。其效果如何?作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九、当代非洲政治

Springhall, John, *Decolonization Since 1945: The Collapse of European Overseas Empires*, London, 2001. 作者在著作中不但阐述了战后去殖民

化的进程,而且提出了理论分析框架。因此,这本书虽然比较简洁,但是完全能满足一般读者的需要。

Decalo, S., *Coups & Army Rule in Africa: Motivations and Constraint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非洲国家独立后,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现象是军事政变和军政府的频频出现。作者通过对达荷美、多哥、刚果(布)和乌干达等国军事政变和军政府的分析,剖析了非洲国家军事政变和军政府多发的原因以及产生的影响。他特别驳斥了军事政变和军政府统治能够推动非洲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稳定政局的观点。

Salih, M., *African Democracies and African Politics*, Pluto Press 2001. 西方民主从来就不适宜于非洲国家。但是,非洲国家独立以来,西方国家往往以援助为条件,在非洲推行西方民主。作者对此进行了分析。

Friedland, William H. and Rosberg, Carl G. (eds.), *African Socialism*, New York ,1964. 非洲社会主义属于非洲民族主义的范畴。在发展国家独立之初,曾经十分盛行。本论文集对非洲社会主义的定义、内容、与非洲传统社会关系、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等问题做了分析。

陆庭恩、刘静:《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政党制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作者分析非洲政党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非洲政党的特点以及政党制度对于非洲国家的影响。

徐济明、谈世中主编:《当代非洲政治变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年。对于非洲国家独立后的政治发展,做了较好的阐述。

张宏明:《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本书内容包括:非洲国家经济状况与政治发展、部族主义与非洲国家政治发展、东方政治文化与非洲政治发展等。

贺文萍:《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研究》,时事出版社,2005 年。全书分为两个部分。上篇为综合研究,主要从理论上阐述民主概念的起源和界定,探究非洲民主化的发展历程,分析制约非洲民主化进程的各方面因素,并对十余年来非洲民主化的发展做出评估。下篇为国别个案研究,挑选出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乌干达四个具有不同历史发展脉

络和民主发展进程、有一定代表性的非洲国家，从个案研究的角度着手，借助发展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深入剖析非洲政治民主变革产生的背景、根源及其对非洲政治发展的影响。

十、非洲人物研究

A. P. J. 范伦斯伯格：《非洲当代领袖》，重庆出版社，1985 年。作者是南非历史学家，他撰写的著作包括 45 位非洲国家领袖，中译本从中选择了 32 位。书中介绍了他们的人生，尤其是走上政界的经历和执政后的内外政策。本书的特点是资料丰富。这本书中的人物大多是非洲国家第一代领导人，许多已经作古。

陈公元等主编：《非洲风云人物》，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年。中国学者撰写的非洲人物传记，旨在介绍和评述二战以来非洲大陆涌现的反帝反殖斗士和英雄、当代非洲著名政治家，以及其他有影响的非洲政界、军界人物。

陆庭恩等主编：《影响历史进程的非洲领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该书是探讨非洲当代政治人物的专辑。作者中除了学者外，还有多位长期从事非洲工作的资深外交家。由于工作关系，他们能提供难见的资料，从而使该书增色许多。

曼德拉是南非反对种族主义统治的英雄、新南非的开国元首。他的传奇人生引起了世人的格外关注。在 1995 和 1996 年，国内连续撰写、出版了三本曼德拉传记，作者们从不同角度描述曼德拉的人生：

杨立华：《曼德拉——南非民族团结之父》，长春出版社，1995 年。

温宪：《黑人骄子——曼德拉》，当代世界出版社，1995 年。

李安山：《南非斗士曼德拉》，学苑出版社，1996 年。